第五帝国的终结

THE END OF THE FIFTH EMPIRE

雷思海 著

- 极盛与霸权的踉跄之路
- 神话破灭的千年迷惘
- 永远看不见胜利的悲哀
- 僵化帝国的新世纪谋划



时事出版社

第五帝国的终结

第五帝国的终结

谁说帝国主义不会终结？！

一个妄想统治世界的国家，即使再强大，也必将遭致世界的反对。

打伊拉克是为了反恐，还是垂涎石油？

世界货币：美元乎？欧元乎？



ISBN 7-80009-776-5/D·334

定价：22.00元

第五帝国的终结

雷思海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五帝国的终结/雷思海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
ISBN 7－80009－776－5

Ⅰ. 第… Ⅱ. 雷… Ⅲ. 美国－研究 Ⅳ. D77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3995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88547595
传　　真：（010）68418647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spublish.com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0.375　字数：249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前　　言

气象学家 E.N. 洛伦兹曾撰写一篇有名的论文，题目是《一只蝴蝶拍一下翅膀会不会在得克萨斯州引起龙卷风?》，结论是初期条件一点微小的不同，就可能导致结果的巨大差别，他把这种现象称作“蝴蝶效应”。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也不乏这种“蝴蝶效应”。一场战争往往折射出整个历史进程的转折处，古罗马帝国的条顿堡之战、拿破仑帝国时代的滑铁卢之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在当时的诸多战事中不过是丛林一木，但后来的历史却证明，它是一个转折点。

多少年之后的历史学家一样会给正在成为历史的伊拉克战争一个几乎同样的位置，那就是看似是美国霸权扩张的伊拉克战争，却是结束美国在 20 世纪确立的霸权的真正开始，新罗马帝国将从此一路下沉。

60 多年前，和中国有着极深渊源的美国《时代》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宣称，“20 世纪是美国世纪”，这个长长的激励美国人心的音符，将随着新罗马帝国盛筵的撤席渐渐消弭在一个新的世纪里。如果我们把苏联看作是继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之后的第四帝国，那么，当前的美国就可以称作是第五帝

国。

虽然本书将从当前的现实开始，但要看清楚一个曾经如此辉煌帝国的斜阳路，还需要追溯到更加久远的从前，也需要探寻正在滚滚而来的未来。



目　　录

第一章
怎么瞄上萨达姆





在许多关于美国政府如何决定打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最盛行的一种是，美国决定推翻萨达姆政权，是因为“9·11”恐怖袭击，因为萨达姆政权是对美国威胁更大的一个“恐怖主义源头”。美国《时代》周刊的一则报道如此描述了这个决策的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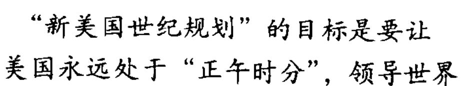
> 2002年3月的一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自己的办公室中会见三位美国联邦参议员，讨论如何处理伊拉克问题——要么通过联合国，要么通过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
>
> 这时，美国总统布什将头探进赖斯的办公室，对于赖斯他们的讨论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布什很简单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他妈的萨达姆，我们必须干掉他。”

据一位当时在场的人士后来对《时代》周刊回忆说，三位联邦参议员不太自然地笑了笑，赖斯则会心地笑了。一年以后

（2003 年）的 3 月 20 日，随着美国的巡航导弹降落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布什把在赖斯办公室突然蹦出的那句话变成了实际行动。






“新美国世纪规划”的目标是要让
美国永远处于“正午时分”，领导世界

按照这个说法，是拉登改变了历史。时间是在 2001 年。另一种少为人知的说法是：2000 年布什政府还没有上台

的时候，一个华盛顿新保守派思想库“新美国世纪规划”递交给了即将登上总统宝座的布什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为美国领导人制定了一个确立“21世纪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的目标。

这个目标要让美国永远处于“正午时分”，成为永远的帝国，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没有一个帝国曾经强大到统治全世界。

“新美国世纪规划”的创始人包括：美国现任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国防咨询委员会主席佩里、切尼的办公室主任利比、军备控制副国务卿勃尔顿和国防政策委员会的科恩等等，这些政客和政治家被美国的政治评论家称之为鹰派或者新保守主义者。

根据他们为美国确立的目标，美国要成为全球惟一的警察，不受联合国或世界舆论的影响，防止任何其他竞争对手对美国支配地位形成任何挑战。“新美国世纪规划”的主任、新保守派主要人物之一的威廉·克利斯托尔相信这些目的是好的和正确的，他用了“仁慈的全球霸权”（benevolent global hegemony）这个术语来描述美国在当今和今后世界上的地位。



要实现这个宏大的目标，需要做很多的事情。这个思想库举例说，比如更多的国防开支；重新考虑对沙特阿拉伯的政策；进一步正视朝鲜的威胁；尤其重要也是最迫切的一步是，推翻伊拉克萨达姆的政权，这既是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也是为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推行美国式民主的一个突破口。

采取这些即使在美国新保守派自身看来也将是激怒世界的一系列动作，则需要一个良好的借口，在“9·11”事件一年之前，保守派为此写道：

> 这样的雄心，如果没有一个灾难性的、类似珍珠港的催化事件，不太可能实现。

按照这个说法，是美国新保守派改变了历史。时间是在2000年。拉登不过是误打误撞，扮演了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的角色，给了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和鹰派一个21世纪的“珍珠港事件”。

还有一种似乎更加离奇的说法，它来自一位前美国政府职员，同时也是一位宏观经济学家对两则新闻的评论。

2000年10月，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颁布了一条行政命令，坚持将“敌人的通货”美元全部出手，换成欧元。欧元后来的升值使萨达姆这个纯粹出于感情好恶的决定，给他的政权赚了数百万欧元。

2001年11月24日，伊拉克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阿扎维宣布，伊拉克政府决定自2002年初开始正式以欧元取代美元作为外贸结算货币，并以欧元取代美元作为对外商业活动的货币。伊拉克中央银行为此进行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此后，伊朗、朝鲜也先后宣布要在对外商业活动中不使用美元，而是使用欧元，委内瑞拉也可能步其后尘。

这两则消息，虽然不为外界注意，但却被关心美元地位的美国专家认为，可能预示着美国的噩梦。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前政府官员评论说：

> “对于美国联邦储备局来说，最坏的事情莫过于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将国际石油交易的标准货币由美元过渡到欧元。”
>
> “因此布什政府，或者更确切地说企业—军事—工业网络集团，需要伊拉克有一个傀儡政府存在。这个傀儡政府的作用不是别的，正是保证其回到美元的路线上并一直坚持下去。”

> “所以，萨达姆在2000年决定采用欧元时起就决定了他要倒霉的命运。这就成了布什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的动因。除了撤换萨达姆并建立一个听话的政府，没有其他办法挽救美元。”

按照这个说法，美国是为了确保世界石油以美元作为标准交易货币，而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萨达姆想不使用美元，就已经注定了他的命运。

三种说法，都揭开了一定的秘密，但也都无法解答所有的疑问。

在美国一直不得志的鹰派，为什么在新的千年里重新执掌了美国的内政和外交？

一直以“仁慈的霸权”而自豪的美国，为什么却发动了这样一场大规模的、与其理念格格不入的战争？



在冷战结束之初，地缘政治真空乍现的时候，美国没有利用惟一的超级大国地位进行扩张，为什么却要在世界多极化成为共识的时候，决定这么做呢？

美国的鹰派们为什么恰恰选择了这个时候，不是1996年，不是2010年，而是2003年？

要回答这些疑问，就无法绕开冷战结束后，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脉络以及美国在这一段时期内作为地球上惟一帝国的历程。

第二章 极盛与帝国



未来在哪里?



在过去的10年期间，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未来在美国!

当美国自诩以道义的力量战胜苏联，并一直鼓吹自由和民主的时候；当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在过去的10年内为全世界信息产业人士顶礼膜拜的时候；当美国的公司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财富神话的时候；当比尔·盖茨以人类历史上创记录的短时间聚集起世界上最大的个人财富的时候，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都愿意相信，美国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去美国就像好莱坞电影常常用的对白那样：回到未来!

一、十年的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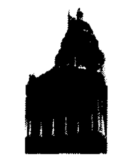
在雄厚的金融资本、复杂得许多人从未听说过的金融工具和先进科技水乳交融的催生下，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公司哲学大放光彩的10年，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强劲火车头。当时，

只有美国人能够如此骄傲、令人信服地说，美国代表着人类未来的方向。

美国遇到了一个少有的兴盛时期，短短的 10 年，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增长，堪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利益相媲美。

20 世纪 70—80 年代，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 GDP 的比重一直徘徊在 20%—25%之间，进入 90 年贷后，美国的 GDP 在世界中的份额一路攀升，比重从 1990 年的 24.2%提高到 2000 年的 33%。

> “同胞们，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信息化时代，这是美国复兴的伟大时代。
>
> 作为总统，我所做的一切，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行政命令，提议和签署的每一项法令，都是在努力地为美国人民提供工具和创造条件，来实现美国的梦想，建设美国的未来——一个美好的社会，繁荣的经济，清洁的环境，进而实现一个更自由、更安全、更繁荣的世界。”



这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 2001 年离任之际发表的告别演说中的一段话。它描绘了美国人心中的理想国实现的途径。

截至 2001 年 2 月，美国经济已持续增长 118 个月，成为自 1854 年以来，美国经济史上 32 个增长周期中最长的一次，并且似乎还会持续下去，没有尽头。10 年来的持续增长，使美国积累了殷实的家底，2000 年，美国 GDP 的规模几乎相当于紧随其后的日本、德国、法国三国 GDP 的总和，相当于中国的 8 倍，俄罗斯的 20 倍。

美国在全球经济的三大领导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都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全球高科技人才被源源不断地吸引到美国，美国也是最受外国公司欢迎的国家。1999年，美国吸引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1/3以上。

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的经济现象，一度让当时的经济学家们摸不着头脑。根据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同时出现高经济增长率、高劳动生产率、高经济效益和企业利润以及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的情形，即所谓“三高两低”的局面，是无法得到理论上令人满意的解释的。

这一无法解释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成为现实。这个现实意味着这样一个简单道理：钱突然地特别好赚了，财富来源突然地增加了，天上可以掉馅饼了，不会有经济危机了。



这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40多年里，或者再远到资本主义发轫以来的历史时间里，隔几年就经历一次经济萧条的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所熟悉的常识确实不同，至少是经济起伏的周期拉长了，如果这个周期可以被无限拉长的话，就和“永久繁荣”无异。这简直是一个神话。

被这个神话眷顾的美国，是集上帝万千宠爱的美国。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2月7日的国情咨文中自豪地宣称，“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过如此大的繁荣和社会进步”。

如果再对比20世纪70—80年代的情况，人们会更加明白这些“赞歌”一点也不过分。越南战争以后，因为高赤字、高通货膨胀以及战争不利造成的资本外流情况，美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而西欧、日本则蓬勃发展，迎头赶上。

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经济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时，象征着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这个体系规定美元等同于黄金，也就是说，美国用纸印刷出来

的美元可以换取世界各国的黄金。

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发展，使美国经济的规模相对缩小，美国经济不再像以前那样强大到被盟国完全信任。盟国担心：有一天它们的国民用汗水辛苦积攒的美元储备，再也换不回黄金，而只是一堆废纸。

以克林顿为首的美国“新经济”的倡导者们不遗余力地推广、制定一系列经济、资本及法律政策，为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迅速崛起扫平了道路。





美国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
去美国就像“回到未来”

从1995年开始，被誉为资本主义“精神堡垒”的《财富》杂志不再对工业企业与服务企业分别排名，而是混合地排出全球500强的名次，这个排名被看作是世界各国经济实力的“微缩景观”。

在1995年的全球500强座次表上，有151家美国公司、149家日本公司。并且，居前四位的公司都是日本公司：三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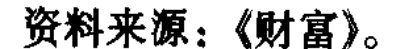
公司、三井公司、伊藤忠商事公司和住友公司，而在前10名中共有6家是日本公司；欧盟国家的公司为155家。三分天下的格局中，日本呈现出咄咄逼人的势头。

到了2001年，日本公司在全球500强中已经下降到88家，美国则上升到197家，欧盟为143家。命运发生了逆转，排名前3位的成了美国公司：沃尔玛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前10名中，有6家是美国的公司，只有一家日本公司：丰田汽车公司。

2001年度全球500强部分排名

排名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亿美元）	国别
1	沃尔玛公司	2198.12	美国
2	埃克森—美孚公司	1915.81	美国
3	通用汽车公司	1772.60	美国
4	英国石油公司	1742.18	英国
5	福特汽车公司	1624.12	美国
6	安然公司	1387.18	美国
7	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	1368.97	德国
8	英荷壳牌石油集团	1352.11	英/荷
9	通用电气公司	1259.13	美国
10	丰田汽车公司	1208.14	日本




资料来源：《财富》。

在500强名录中，还有一些来自美国的新贵。它们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诸如CISCO、DELL、INTEL、MICROSOFT、SGI

等信息科技企业，它们其实都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真正的高速发展，都是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至于 YAHOO、EBAY 等标志性电子企业就更不用说了。

美国终于无可争议地重新夺回了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重新把日本和欧洲甩在了后面。

二、“新经济”神话

一个新的经济学名词由此应运而生：“新经济”。

1994 年，美国《商业周刊》第一次提出，美国已进入一个生产力快速增长的时代——“新经济”时代。

按照《商业周刊》的解释，所谓“新经济”是一种面向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以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也是“市场+制度”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日趋成熟的经济。



当时，这一并不怎么清楚的定义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质疑。他们认为，“新经济”不过是一个喜欢创造新词的好事者的灵感之笔。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经济的车轮一直滚滚向前，到 2001 年终于打破了美国历史上的最长增长纪录，并一直保持“三高两低”的辉煌成绩。

这使许多怀疑论者渐渐相信了新的经济理论，“新经济”也成为了美国政府最常用的政策术语。美国政府开始越来越多地将“新经济”的一些因素考虑到部门统计数据中去。

首创“新经济”一词的《商业周刊》再次发表封面文章，为“新经济”的定义添砖加瓦：

> 这一巨大的繁荣景象并非建立在虚幻的假象之

上，它反映出人们乐于在革新性信息技术方面进行大规模风险投资以及10年来美国一直对金融市场、政府和公司进行的改革，以降低成本、增加灵活性和提高效率。其结果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新经济”，其特点是高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

“新经济”对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发展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可以看看下面一系列枯燥，但却反映真实情况的数字。

美国商务部和电子协会1998年的统计：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美国雇用职工最多的行业，约1500万人。

其职工的工资比全国私营企业平均工资高出73%，新富翁基本上都是产生于这个行业。而传统制造业则就业人数不断下降，汽车、飞机、造船、铁路、航天等部门加在一起的就业人数不过150万。



电脑和电讯业的增长速度是美国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大大超过传统上被认为是美国经济主体的汽车制造业、建筑业和化学工业。

1995年到1997年信息技术产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达27%，而传统的两大支柱产业——建筑业只占14%，汽车工业仅占4%。

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美国1999年的失业率降到了24年来的最低点，通货膨胀回落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

信息技术还拥有巨大的渗透力，使美国企业加快了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在企业中大规模地普及计算机辅助技术和网络技术。信息的畅通大幅度地提高了企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效率，促进了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2.2%，其中制造业为2.8%，较80年代高出

一倍多。

在跨入新世纪门槛之际，美国上自总统，下至普通百姓，都一个劲儿地为“新经济”大唱赞歌。

一批“新经济”学者出现了。他们提出的“新经济”理论认为：在信息经济时代，生产要素投入具有“溢出效应”和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比如，IT产品的价值会随着相关的其他兼容设备的使用而上升，并且信息资源“共享”不会带来额外的成本。在“数字经济”中，生产与价格的形成机制与传统的工业经济截然不同，经济增长与生产要素投入之间的线性关系消逝了，而这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新经济”论者得出的结论是，全球化和信息技术以完全不同于工业化时期的方式塑造了现代社会，强劲的生产率增长能使美国经济在没有通胀的压力下长期增长，“新经济”的发展可以不再受传统经济周期规律的束缚。



《新财富时代》一书的作者布赖恩·韦斯伯里则更为乐观和大胆：

> “美国已进入一个刚刚开始的新财富时代，通货膨胀不会上升，衰退不可能出现，股市也不是泡沫，我们怎么能这么肯定？因为我们目前创纪录的经济复苏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技术、全球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表明，将来利润、收入、就业机会和股票价格会继续增加和上升。”

“新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有目共睹的。

原本好好的经济秩序，可能会在一夜之间被完全打破，不知名的企业可以在瞬间成名，许多百年老店的市值竟然不抵一个“新经济”宠儿的几分之一。许多以“新经济”为特征的企

业，常常以爆发性速度，在用户市场和资本市场激荡风云，令人瞠目结舌。

一些企业甚至根本不用去考虑资本的原始积累，去考虑单纯的利润和成本，发展就是一切。什么模式能实现最快速度的发展就是好的模式，发展速度成了衡量一切的惟一标准。

“新经济”能如此吸引人，还在于它和每一个人密切相关。在许多不谙熟其本质的人看来，“新经济”充满着无序性。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这个时代里，每天都有命运逆转的奇迹上演。所有人都触手可及“新经济”，只要有了智慧，或者说 idea，个人就能获得成千上万的投资，然后在极短时间内成为业界代表，或者完全由一个人创造一个行业。

一个个神童创造财富的传说不断流传在世界各地的媒体报道里，这些年轻人没有社会经验，没有从业经验，有的只是无限的想像力和逻辑推理能力，然而，只要他有好的主意，他就能编出好的软件程序，就能用很短暂的时间，积累起前人不可想像的财富，就像比尔·盖茨一样。



即使是口号和模式本身，也前所未有、大规模地成为商品，被投资家们在硅谷的生产线下不断加工、出口到全世界。那些为“新经济”服务的所谓“铁锹与水贩子”也顺风顺水地发财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积累了几个世纪的经济理论似乎已经彻底被遗弃。基于以上认识，有人甚至把“新经济”堪比物理学中爱因斯坦时代对牛顿时代的革命：

> 面对“新经济”，牛顿时代渐渐离去，爱因斯坦时代悄悄来临。经济领域的牛顿时代是价格调节供需的时代；而尊重自然的相对性是“新经济”的重要内容，竞争的相对性已客观存在，当物质财富到达一定

程度后，价格调节供需的力度越来越有限。

这种“新经济”的机理无论是从科学技术对“新经济”的贡献方面来说，还是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平行关系来讲，都属于爱因斯坦时代。

三、推向全世界

从一开始，美国人就明白，“新经济”离不开全球化，脱离了全球化，“新经济”也只能是空话一句。《商业周刊》当时发表的题为《把“新经济”推向全球》的文章最能体现美国人的这一心情。



让世界各国皈依于包括经济制度在内的所有美国制度，一直是美国历届领导人孜孜不倦追求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美国才会在处理世界事务时如同处理国内事务一样得心应手，才能让在这一制度下，通过激烈竞争成长起来的美国企业的优势在全球每一个角落得到充分发挥，也才会有彻底的安全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其在西方世界中的全方位霸主地位，倡导推进经济全球化，以求在上述过程中谋取经济和政治双重利益。有人说，迄今为止，世界经济体制基本上是美国主导制定的，这几乎是一个事实。

国际经济与政治权力相转化的过程，可以用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的名言：

“谁拥有最大的市场，谁就拥有最大的权力。”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美国不遗余力要按照自己的

意志来制定世界经济秩序和规则。

但越南战争之后的70—80年代，世界经济三足鼎立的局面削弱了美国制定世界经济秩序的能力。这一段时期内，各种多边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小了，美国与欧洲之间，美国与日本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越来越多。

如果不是西欧和日本还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美国从西欧和日本那里得到让步的可能性会更小。这限制了美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世界经济秩序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的发展使美国经济找到了新的力量和“声望”，美国的新贵公司、资本市场、智囊机构以及克林顿政府都竭尽全力要把发轫于美国的“新经济”推向全世界，并在这一过程中主导一系列“新经济”领域全球性规则的制定。



此时，冷战的结束也结束了对全球市场的人为政治分割，这恰恰给了“新经济”一个前所未有的扩张空间。

首先，是美国“新经济”公司在全球的扩张。欧洲、日本等国家的第一批新兴网络公司中都有美国资本的介入。美国公司以资本、知识产权入股等模式在美国之外建立网络公司、信息服务公司或者信息技术实验室。

其次，是美国资本向全球各国进军。“新经济”的标志性资本市场纳斯达克（NASDAQ）从1000点到突破5000点，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实现同样突破用了23年。

以纳斯达克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吸纳了数万亿美元，这些资本随后又经过美国公司扩张到世界各地的“新经济”中。纳斯达克也走出美国本土，开始考虑设立欧洲的纳斯达克、日本的纳斯达克、香港的纳斯达克。除了香港外，欧洲纳斯达克、日本纳斯达克后来先后成为现实。

在国家的层面上，克林顿政府更是不遗余力。“新经济”成为几乎所有重要国际会议的首要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领导人相信了美国的推销，在日本和欧洲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发展“新经济”已经成为许多政府的优先政策，各国不约而同地为此而规划长远未来，许多信息产业白皮书显示出了它们和美国一样的雄心。

寰宇之内，地球之上，“新经济”可以无所不在，美国人甚至提出要把互联网弄到月球和火星上。美国推进“新经济”的一个有利于他的理由是：“新经济”适于其他国家，发展“新经济”是世界经济繁荣之路。

渐渐地，电子商务、信息高速公路、因特网等等新词汇开始充斥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媒体。美国的这种“带头作用”以及这种带头作用的好处，在1996年12月达成的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和1997年1月达成的电信市场协议中，表现得最为清楚。



“新经济”极大地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全球经济要素的流动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快。各国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前所未有地加深了，“经济全球化”成为20世纪90年代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世界各国的普通人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体会这样一个抽象的国际政治学术语。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资深财经记者查德·隆沃思对此进行了形象的描述：

> 就在这一刻，可能有个德国商人正搭乘瑞士航空公司班机，在法国上空用飞机上的电话，打到伦敦金融市场以日元买进美元。在中国大陆的工厂，工人正为空中巴士和波音公司制造飞机零件。在爪哇西部的

工业区，数以百计的印度尼西亚妇女正在韩国投资的工厂，为耐克（NIKE）公司制造运动鞋。

在塞浦路斯中部偏僻山村的边缘，汽车驾驶员可以在24小时营业和只接受信用卡的自助加油站加油。在纽约、东京和伦敦紧张忙碌的办公室里，大约50家全球投资和商业银行的员工，每天处理超过1.3万亿美元的货币交易。这些精明干练而又待遇优厚的年轻人，掌握了全球金融活动。

在印度班加罗尔，电脑程序员正为摩托罗拉和英特尔等美国公司设计最新的电脑软件，薪资只有加州硅谷的1/10。在萨尔瓦多摩拉桑省终年暖和的山区，几十个工人在简陋的工棚里，为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儿童缝制雪衣。在德国汉堡的豪华餐厅，两名穿着红色外套和粉红色衬衫的德国商人，正向两名穿着深色西装的日本商人推销生产机具——这四个人使用的是全球经济体系通行的语言：蹩脚的英语。



芝加哥有个店员向我推销电视机，我问他："美国、日本和韩国品牌有什么不同？"他笑着说："韩国品牌是在马来西亚做的，日本品牌是在美国生产的，美国品牌其实也是日本和韩国公司在墨西哥制造的。"

经济全球化实在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无法以寥寥数语让人一眼洞穿，上述这段浮光掠影的描述，当然无法全面反映经济全球化的全部体系和运行规律，更何况，经济全球化这个体系还在不断地成长、演变。

最要紧的是，查德·隆沃思的这几段话无法说明：在全球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体系本身可能是不平

等的；金融投资和技术转移也是不平等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和损失分配也是不平等的。

那么，谁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最大的获利者？自然是美国。

以信息技术发展为核心而带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最大程度地反映了美国的利益，满足了美国的愿望。只要看看“新经济”战略和全球化为美国带来了什么，就可以明白：

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经济领域，美国可以凭借其第一强国的巨大动能，迅速进入并占据主导；

一个新的平衡机制，美国可以抛弃已经很难扭转的传统世界经济中的包袱，以先动者的优势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平衡机制；

一个新的国家战略，利用“新经济”的蔓延，将美国的新势力渗透到全世界，在未来的信息战中取得战略威慑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以及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占有优势，因此能够确保本国企业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能够进入全球所有市场，在所有领域参与竞争，并且通过多边途径推行美国战略利益。

从微软公司到太阳微公司，我们不难发现，美国总是试图创造全球通用产品，这些产品从计算机语言，到各种软件程序和工业标准。美国人热衷于将他们的产品推销给所有的人，并将生产过程分解至最简单化，以便母公司的子公司可以在全球任何角落复制它们。

而随着这些产品生产准则而来的则是在全球推销美国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人眼中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

“新经济”带动下的全球化使美国主导了新标准的制定。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如此描述制定规则这一点的重要性：

> “这是新的标准之战，在这场战斗中，谁能够抢先制定规则，占领规则的领地，谁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颐指气使，挥舞无比优越的权柄。”

而更发人深省的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于1944年在他名噪一时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的一席话：

> “不论是谁，一旦掌握了全部经济活动的控制权，也就掌握了我们生存的命脉，从而就有力量决定……我们所追求的其他方面的价值以及替我们安排这些价值的优先顺序，进而让我们相信我们应当为什么样的目标而生活和奋斗。”



四、美国文化的鼎盛

20世纪90年代，美国文化也随着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美国式力量，向世界各国辐射，施加影响。

在非洲的喀麦隆，有模仿美国音乐的歌手，随处可以看到好莱坞的大片宣传画；在北京的地铁里，有人手里拿着好莱坞的电影光盘叫卖。还有风行全球的可口可乐、麦当劳、迪斯尼、好莱坞、CNN、NBA。

这些情形表明，美国文化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强势文化”，对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进行着单方面的输出。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人口较少的地方性语言、风俗习惯和社会生活方式正在被对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效仿和跟进之风所吞噬。

即使是一些人口众多、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如印度、法国，也感觉到了美国文化铺天盖地而来。

在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中，电影是当代综合性最强的艺术，因此也是影响最大的文化产业。好莱坞已经处于世界电影产业的支配地位，是世界电影业的“首都”。它的庞大无敌和入侵世界其他各国的情形，最能代表美国在文化领域里的霸权。

好莱坞大片排在世界各地电影票房的前几位，极少当地电影能够望其项背。2000 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好莱坞电影占目前世界电影市场份额的 92%左右。

同样在 2000 年，美国的放映商们以 5.39 美元的平均票价，从 14.2 亿人次的观众口袋里掏走了 76.6 亿美元，加上影院放映之外的产值，美国本土电影产业的年产值应当在 400 亿美元以上。



即使是在以热爱电影艺术而闻名的法国人那里，最受欢迎的也是好莱坞。据统计，在当今的法国影院中，放映的影片 60%是美国的。有份记者调查报告曾这样无奈地描述道：

> 如果你问五个法国人，有一部美国电影和一部法国电影，只准选一部看，你选哪一部？三个人说选美国电影，一个人说选法国电影，还有一个做不出选择。近年来，在法国票房最好的电影，还是美国的《泰坦尼克号》。

著名影片《情人》的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曾悲观地说，今天的世界已没有人能制作所谓的“民族影片”，除了美国，因为美国文化已成为全世界的文化。

好莱坞还显示出逐年扩张的趋势。1980 年，好莱坞的海外收入占其总收入的 30%，现在占到了一半左右。与此同时，

很少有能在美国叫座的外国新电影。外国电影在美国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不到3%。

在好莱坞之外的文化产业中，我们还能看到更多的“美国制造”：FOX、CNN的电视新闻、MTV频道的流行音乐、《时代》杂志、ESPN的体育直播等等。

这些繁杂的文化商品的传播跨越了地域时空的限制，借助卫星技术，到达五大洲的每个角落，美国CNN电视网甚至在世界上最偏僻的角落之一、南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上着陆了。

美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已占其GDP的18%至25%，400家最富有的美国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公司，美国音像业的出口额已超过航天工业的出口额，是美国创造利润最多的行业之一。



从英国泊来的“盎格鲁—萨克逊”文明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到达巅峰时刻，美国获得了全球“文化霸权”。而“文化霸权”反过来又成为美国人向全世界施加影响的得力工具。美国文化产业利用其自身优势，以一种诱导的姿态来迫使民族文化对它的认同，同时排斥民族文化对自身的认同。

这种诱导一方面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运作来实现的。目前，美国的文化产业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之一。在文化产品的制造方面，由于美国本土的制作成本日益升高，因此很多文化产业都在本土创作的同时，将录像制品拷贝之类的工业迁至那些低成本的国家去完成。这使得美国文化产品的输出，在获得最大数量的消费大众的同时，还能够更大程度地获得被输出国的接受。

美国还将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资源拿来，经过“美国化”之后，再重新推广到别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改造其他文化，并据为己有。

有一个中国人最熟悉的例子，就是动画片《木兰》（MULAN)。在华人圈子中，花木兰可谓家喻户晓。她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已深入人心。这个传奇故事通过多种形式代代相传，它曾经是民间口头流传的故事，也曾经是诗词、歌曲、戏剧和教科书的主题，甚至曾经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其主题是中国文化所推崇的孝道。

1998年，迪斯尼公司以此为题材制作了动画片《木兰》。片中的木兰虽然还是代父从军，但主题已经变成女性对自我身份的追寻。正如影片中木兰在歌中所唱，她将永远不会去做一个“完美的新娘”或“完美的女儿”。她追问：“什么时候我才能展现那个真正的自我?”当木兰的性别曝光后，她甚至承认自己这样做并非仅仅为了父亲，更是为了实现自我。

这部影片在新加坡首映后，在全球循环放映，总收入达3亿美元，成为迪斯尼利润最高的影片之一。《木兰》仍然保留着中国传奇的基本故事情节，但又被赋予了崭新的美国式文化含义，成为当今世界的新传奇。中国传奇被跨国公司西方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也是美国文化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改造其他文化、据为己用，并创造巨额利润的过程。



类似的文化改造和占有的例子不胜枚举。通过这种做法，好莱坞把美国的观念融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形式中，最终偷梁换柱，取得最大效果。

另一方面，美国文化扩张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文化扩张是美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基本原则。美国是最早奉行“新殖民主义”的国家，其文化输出意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强烈。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元老艾伦·杜勒斯曾说过：

> “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的

方法思考问题。”

“通过电视和电影院中的广告节目、连环漫画、杂志广告，美国公司对墨西哥底层普通百姓思想的影响，毫无疑问，比墨西哥政府和墨西哥教育制度的影响更为持久。”

在对外交往中，美国政府经常把文化政策与国家关系挂钩。如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美国在同意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时，经常把不要干扰“美国之音”作为一个前提条件。

美国国会在“1995年中国政策法”中将开办“自由亚洲电台”列为重点条款之一。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谈判代表则要求中国开放国内文化市场，接纳美国各类影音制品。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也为之制定了相应的文化战略，试图以“美国化”来代替全球化，用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来“重塑”整个世界。

前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大卫·罗斯科普在谈到全球化促进不同文化的整合时说：

“对美国来说，信息时代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必须是在世界的信息传播中取得胜利，像英国一度在海上居支配地位那样支配电波。”

“未来的世界文化一定要以美国文化居于支配地位。”“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他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

值观。”

如前所述，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有企业自发行为和政府行为两个方面。但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和政府的两方面推广最终会合二为一。企业的经营性活动会受到政府的支持，而政府的文化政策，则会为各种跨国企业所奉行。

2000年11月28日，应美国驻外使、领馆外交官们要求，美国政府第一次在白宫举行了主题为“文化与外交”的研讨会。该研讨会由美国总统府、第一夫人希拉里办公室、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合赞助。出席会议的有美国艺术家、艺术赞助人、基金会负责人、企业界首脑和外交官等250余人。

研讨会旨在讨论如下命题：（一）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外交中的作用；（二）如何更好地把文化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日常运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三）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多边组织在促进文化了解和交流中的作用；（四）使世界共享美国多样化文化的方法和手段。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因素，综合促成了今天美国文化在全球的地位。300多年前，以“五月花”号船到达北美为标志，从英伦漂流到美洲大陆的“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终于在美洲大陆发展到最高峰。身居全球文化中心的美国文化，自然要向外扩张，而那些居于边缘的文化，则受制于美国文化的霸权，无法将自身的文化能量释放出来。



五、软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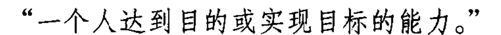
美国在经济领域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其文化的中心地位也引起全球范围内的模仿和学习，还有嫉妒。这些

都让美国人自豪、欣喜，一个“软力量”理论由于可以解释美国这一光荣，而开始一纸风行。

“软力量”理论的主要创造者约瑟夫·奈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曾在克林顿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中出任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衰落论”开始盛行，奈撰写了《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在这本著作中，奈分析了历史和现实中的权力结构和形态的变化。奈提出，在国际关系中起作用的不仅有军事、经济的“硬权力”，还有由文化、意识形态、民族凝聚力、国际机制等构成的“软权力”。其后，奈又在一系列著作和论文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这个概念。

奈首先把权力定义为：


“一个人达到目的或实现目标的能力。”



由于权力同时还包括“能使他人做不愿做的事的能力”，所以，国家在运用权力的时候存在一个如何评估自己与他人的权力大小的问题。而权力通常与占有的资源相关，构成权力的资源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人口、领土、自然资源、经济规模、军事实力、政治稳定性等等。

然而，资源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权力，这两者间存在权力转化的问题。所谓权力转化就是“将以资源为标准的潜在实力，转化为以改变他人行为为标准的现实权力的能力”。

这就类似人们打牌，手里攥的牌点大小并不能直接决定牌局的胜负，还将取决于牌手如何出牌。

奈认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环境下，权力的转化力和转化方式各不相同，不同类型的资源的重要性也各不相同。在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农业和人口是最关键的权力资源；在俾

斯麦时代的欧洲，铁路和工业制造力是国家制胜的关键；到了19世纪末，决定大国竞争的最重要的权力资源是航海和海军实力。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以及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权力结构和性质的巨大变化。

奈指出，在一个信息化和相互依赖的世界上，权力的转化力减弱、扩散性增强，导致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和军事力量作用的下降。在这种状况下，以“同化性”为标志的“软权力”可以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奈指出：

> “同化式实力的获得靠的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者是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能力。……这种左右他人意愿的能力与文化、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等这些无形力量资源关系紧密。这一方面可以被认为是‘软权力’，它与军事和经济实力这类有形力量资源相关的‘硬权力’形成对照。”



“软权力”（soft power）是相对“硬权力”（hard power）而言的。“软权力”主要来自一些无形的力量资源，包括文化、意识形态、机构和机制等，“软权力”的获得主要依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设定国际议事日程的能力、创造与自己体制一致的国际规范与国际机制的能力等。

“硬权力”是通过军事或经济制裁、利诱的方式强迫起作用的，而“软权力”是通过文化、意识形态、制度的吸引力发挥作用的。换而言之，“硬权力”是“命令”别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软权力”是“要”别国做自己想做的事。

“软权力”具有扩散性和非垄断性。经济和军事资源通常

是固定的，一旦被占有就很难转移。而文化、信息、知识等资源很难被垄断，而“软权力”恰恰是通过它们的扩散来发挥作用的。

“软权力”对别国的影响是无形的、非对抗性的。通过强制方式运作的“硬权力”往往遭到对象国的抵制和仇恨情绪，而“软权力”的影响是柔性的、潜移默化的，甚至得到对象国政府和民众的欢迎。

奈提出“软权力”理论的初衷是为了驳斥“美国衰落论”。他认为，20世纪末国际力量结构的变化导致“硬权力”的下降，这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普遍现象，并不能构成美国“衰落”的理由。相反，美国在“软权力”方面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足以担当“注定领导”的责任。





武力是帝国征服别人永恒的杀手锏

在这些言论发表了10年之后，奈再次指出：

> “21世纪的力量将依赖于有形和无形这两种力量源泉的结合。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同时在军事、经济和‘软权力’这三个方面都拥有优势。”

“新经济”在美国的蓬勃发展和美国文化在全球的霸权地位，使奈的“软权力”理论吸引了更多信奉者。实际上，把“新经济”推向世界的过程中，充分浸淫了美国人对美国“软力量”的自信。

六、仁慈的帝国



与“软权力”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美国当今的霸权是一种“柔性霸权”，或者是一种“仁慈的霸权”、“平和的霸权”。所谓“柔性霸权”，就是不依靠武力征服，而是依靠自身的吸引力，赢得在世界事务中压倒性的影响力和对世界制度的管理权力。一句话，“仁慈的霸权”就是通过体系、制度和吸引力维持的霸权。

提出这种理论者认为，这是由美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全方位领先而产生的一种强大的楷模作用所导致的。美国强大的“软力量”，在无形之中攻城掠地，侵蚀全球各地，并在各个层面发挥着惟美国马首是瞻的影响力。

“仁慈的霸权”甚至被一些学者追溯到冷战期间。美国在联邦德国和日本驻扎部队，形成一种“仁慈的占领”，因为“被占领者实际上欢迎这种占领，并担心美国军队会调回国内”。这可能是“仁慈的霸权”理论所获得的最早的灵感。后

冷战时代，由于暂时没有直接的军事对峙，美国的经济和文化力量又在全球扩展，并拥有绝对的优势地位。理论学者把这种局面看作是“美国的仁慈霸权”。

在对这些理论的陶醉中，美国官员们自然倾向于认为世界是美国单极的，并以美国的力量和品德自夸，夸耀“仁慈的霸权”。

他们向其他国家宣讲美国的宗旨、规则、制度，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的一切是具有普遍合理性的。

前美国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这样解释其他国家所微词的“美帝国主义”：

> “从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上来说，和历史上的那些强大势力不同的是：美国的力量和她的强大之处并不在于她是否能形成或保持对其他国家的统治力量，而是在于她为了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而与其他国家合作的能力……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有意促进全世界利益的。”



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则对“仁慈的霸权”做出了最简明的结论，他将美国称作“第一个非帝国主义的超级强权”，以赞颂美国独特的美德和力量二者同在。

确实，在当今的世界，美国力量的一部分是通过一个明显由美国设计的全球体系来发挥的。这种“体现美国经验”的体系的基本模型是在冷战期间出现的，主要是美国为遏制其全球性对手苏联而架构的。它的形成和表现包括以下几点：

1. 吸收“美国式民主”国家进入美国体系。美国的全球体系强调有选择地扩大其成员，如被打败的对手德国和日本，在移植了美国认可的“民主制度”后，成为美国体系的中坚力

量，分享美国的经济和技术优势。

这种褒奖作用从另外一个角度促进了“美国式民主”在海外的吸引力。一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喜欢有意识地仿效美国的风格，像约翰·肯尼迪等美国总统在国外都有不少仿效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就喜欢克林顿的风格，认为他亲切的言谈举止习惯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范例。

2. 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模式的推广。美国人认为，寻求个人成功会创造财富，同时还会促进自由。因此而产生的理想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结合，是有力的结合。个人的自我实现“是上帝赐给的权利，它会做出榜样和产生财富，因而同时也能够有利于别人”。

相应地，美国的经济模式强调全球自由贸易和不受约束的竞争。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的成功，更突出了美国企业在全球的楷模作用，西欧和日本都认为要不落后的话，就要改革各自重视工会和员工福利的企业文化，仿效美国更有竞争力的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经济文化。



3. 精确打造的机构体系。像美国的国内制度一样，美国全球霸权还需要有一个相互交织的机构和条约体系，来保障美国在全球的盟友和友好力量。该体系是由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组织机构和条约构成的。

北约：这个机构体现了大西洋联盟，它把欧洲拥有最大生产力和最有影响的国家与美国连接起来，甚至使美国成为欧洲内部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美日安保条约：固定了美国与日本的双边政治和军事关系，把亚洲最强大的经济同美国捆在一起，使日本实质上成为美国的一个保护国。

在中东地区，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和科威特、沙特等国保持密切的条约式的关系，使美国力量在中东地区形成强

大存在。

美洲国家基本上是美国的后院，美国在现存的西半球多边组织中自然起主要作用。

美国还参加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之类新成立的跨太平洋多边组织，使美国成为亚太地区事务的一个主要参与者。

以上是政治方面的体系安排，在经济方面，安排一样精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因为其成员几乎囊括了世界各国。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

此外，美国还构筑了一些地区性经济合作：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到最近 2003 年 5 月刚刚签订的美国和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等。



以上是美国全球体系的大致轮廓。其中大部分是针对冷战对手苏联所设计的，而一旦苏联倒下，美国成了第一个也是惟一的全球性大国时，美国就可以现成地在全球应用该体系，并且随时可以扩大它。

虽然这个美国体系不是等级制度森严的金字塔形状，但它能确保美国处在世界的中心。对此有人如此评论：

> “在这个相互交织的宇宙中，力量是通过不断的讨价还价、对话、沟通和寻求正式的一致意见来行使的，但力量最终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华盛顿，那里才是必须玩力量游戏的地方，而且是按照美国的国内规则来玩的。”

这个体系再加上美国文化的“磁铁般”的吸引力，使美国人认为美国是“独特的霸权”、“仁慈的霸权”，有人甚至用一

个比“超级大国”（superpower）更有分量的新词——“顶级大国”（hyper power）来描述美国。但这些都不足以反映美国在当今世界的真正形象，那就是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的帝国。

在1968年的著作——《国家还是帝国》中，学者罗伯特·塔克教授为帝国进行了这样的定义：

帝国必须是以造就和维持国际秩序为特征。

对照定义，10多年前，苏联也算是一个帝国。在当今世界中，能符合这一定义只有美国一家。从1776年到今天，美国已从建国之始仅拥有大西洋东海岸的13个英国殖民地，成长为横跨美洲大陆，东到大西洋，西至太平洋，南濒加勒比海，北临北冰洋的庞大国家。



美国的军事、政治及经济影响力遍及全球，冷战后成了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并要通过各种手段，把美国的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向全球推广。美国认为，全球各个角落发生的事情，都可能和美国的利益有关。

美国的政治家们曾经津津乐道的威尔逊主义、罗斯福的理想主义等等自命“天真”理论中对美国外交理念的构想，似乎在冷战后的10年中突然开花结果，美国人认为，“仁慈的霸权”就是这个理念的具体体现。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乐意接受美国推广的从商品到制度的所有东西。

同时，美国的思想库也在忙于架构美国长久称霸世界的蓝图，“民主和平论”、“主权过时论”、“文明冲突论”，到最近的“先发制人论”等等理论学说如走马灯，其背后无一不有一个相同的心态：“天下者，美国之天下。”

美国在全球推行自己中意的秩序，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帝国。这一点也得到了西方众多学者的认同。美国学者罗伯特·利特瓦克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发挥了独一无二的制度建设作用。美国，无疑是一个帝国。然而，这个帝国与历史上的帝国不同，它是受欢迎的。用一位挪威历史学家格尔·兰德斯塔德的话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体系，是一个“受邀请的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

美国保守派代表人物、《华尔街日报》的编辑迈克尔·布特也大力鼓吹这一观点，在其著作《以和平为目的的战争：小战争与美国实力的腾飞》中，他自信地声称：

> “我们——美国人，没有向往过帝国，没有建立过帝国，也没有规划过它的轮廓——它落在美国的肩上完全是偶然的。”
>
> “我们是吸引人的帝国，是人人都想加入的帝国。”



这种和美国“天定命运”论一脉相承的“不情愿帝国”论点，和有关“仁慈的霸权”理论形成呼应。它的潜台词是美国虽然是帝国，但与历史上所有帝国不同，它是建立在“仁慈的霸权”之上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帝国论在美国国内得到了更多的响应。关于美国是否应该采取帝国政策以及如何对这样的政策进行价值与道德判断等等，已成了有关美国地位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主流媒体上，诸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利坚帝国主义”、“全球帝国式统治权”之类的词已经没有了贬义，更没有受到谴责，相反，“美利坚帝国”已经被许多美国人认为值得捍卫。

美国学者斯蒂芬·布洛克和威廉·沃尔福思2002年在美国《外交》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美国的“独特的霸权”地位做了更加全面的肯定，认为目前国际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美国同时在所有领域都占据着支配地位。美国实力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全球不大可能形成针对美国的挑战。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希望陷入不得不与美国为敌的境地之中。因此，美国帝国是美国不可回避的责任。

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奈格尔与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在其著作《帝国》中这样描述美国已经作为一个帝国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 帝国正在我们的眼前出现。
>
>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当殖民制度已被舍弃，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的障碍最终坍塌，我们已经见证了经济和文化方面交流的不可抗拒、不可扭转的全球化。
>
> 伴随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
>
> 帝国是一个政治对象，它有效地控制着这些全球交流，它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



对“仁慈的霸权”的自豪，使美国人相信美国将是一个新的帝国，一个受欢迎的帝国。因为，美国不必侵略就可以获得世界各国最广泛的承认，美国自身就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些美国帝国的新特点，也成为众多学者为美国帝国唱赞歌的信心基础。

美国著名学者肯尼斯·沃尔兹反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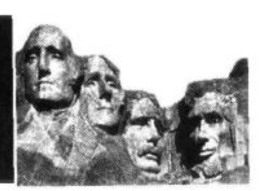
“哪个国家，或者哪些国家具有物质上的力量和政治上的意志，能够结束美国的‘单极时刻’呢?”

美国战略家保罗·肯尼迪则预测说：

“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在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方面仍将在世界上独占鳌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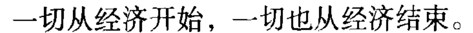


第三章
踉跄之路



借助冷战的胜利，美国确立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霸权，成为新的帝国。但冷战的胜利决不是美国一家的胜利，它同时也是俄罗斯、中国、欧盟、印度、日本等大多数国家的胜利。和平红利的天平只是暂时地向美国倾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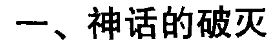




一切从经济开始，一切也从经济结束。

10年繁荣描绘的“仁慈的霸权”，很快将被“新经济”泡沫的破裂弄得信心摇坠。科技创新、实力对比的变化，一切都在加速，其优势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容易被超越，古罗马帝国一千年经历的力量对比变化，现在可能在数十年间就可以完成。

在全球化和所有国家都竞相追赶的情况下，冷战后10年的美国霸权，可能犹如昙花般朝开夕落。



一、神话的破灭

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政治、经济威望大增，大量外

资涌入，股市一路飙升，美国家庭金融财富增长两倍，消费开支也大幅度增加。同一时代，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平均达到40%。而1995年美国的家庭储蓄率为6.8%，1997年为3.8%，1998年为0.2%。由于牛市连续的到来，习惯于把每月工资全部花掉的美国人，进入了一个比里根时代更加疯狂的高消费时期。

资本市场投给那些新兴网络公司的钱，被很多暴发户挥霍在各种豪华奢侈品上，这些钱是冲着未来的赢利去的，但未来的赢利却遥遥无期，美国人过度地预支了未来的财富。

高债务再次出现了，金融资本主导着美国经济“从纸到纸”的循环：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发行纸币支付巨额的贸易逆差，然后各顺差国再以美元购买美国发行的其他类型的“纸”：如政府债券、公司股票等等。通过这种方式，美元再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



在美国资本市场中的资金没有变少，但其所有权却变了。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截至2000年3月，外国投资者拥有的美国资产包括：购买美国股票1.4万亿美元，占美国股市市值的7%；拥有美国公司债券9000亿美元，占美国公司债券总额的20%；持有美国联邦国债1.3万亿美元，占联邦国债的3.5%；直接投资1.2万亿美元，占5%到8%。

美国公司和个人债务飞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初期非金融公司债务年增长率为5%，1995—1999年为12%，家庭债务总额以10%的速度上升，1999年负债6.3万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美国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八成。

股市的牛市最终也演化为冲天的泡沫。1995年美国股市平均市盈率为113倍，1999年一季度竟高达38倍。1995年，股市收益46%来自于利润，54%来自于资产溢价，1998年全部来于资产溢价。高科技股票带头上升推动牛市，高科技股票

特别是网络概念股，平均市盈率70倍，“雅虎”等股票市盈率一度高达前所未有的400倍。

美国大约有1/3的家庭入市炒股，各种基金乃至于地方政府财政都参与金融投资、投机，国民收入中资本收益占到60%。美国最盛行的私人金融投资形式对冲基金借款的杠杆比率为1:7，再以借款为抵押，以平均5—10倍的比率进行证券投机。

同时，贸易逆差也在扩大。国际资本流向美国，美元持续坚挺，美国传统物质生产部门受进口产品打击而削弱。1995—2001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从1090亿美元增加到4500亿美元。

由于美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绝对地位，各国以美元作为储备和主要结算货币，对美元需求增加，美国有条件增发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所需求的货币，大幅度提高以金融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比重。



美国的金融资本也因此更加脱离实物经济，在投机资本压力下，推出新的衍生交易品种，追逐只有“泡沫经济”才能提供的超额利润。

在这个大的经济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的核心产业——信息科技成为决定美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信息技术产业持续繁荣则美国经济繁荣，遇到挫折则美国经济下滑。

信息产业从一开始就是个高风险产业，其发轫和兴旺都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在“新经济”神话的非理性鼓舞下，信息科技产业很快就投资过度。

1998年，纳斯达克4817种成份股总值2.9万亿美元，1999年竟飙升到6.7万亿美元，是道琼斯30种股票总值3.8万亿美元的近两倍。而道琼斯股票在这10年间的涨幅比过去100年间的涨幅还要大。

投资过度的结果是赢利预期得不到实现，使泡沫最终膨胀到破灭的顶点。1999年信息技术产业的颠峰时期过后，“新经济”神话的破灭只是时间的问题。不可避免的经济调整日益临近。信息技术产业泡沫的破灭，将意味着整个美国经济的重整。

同样的一块石头，掉进大海里和池塘里，激起的波浪肯定不能相提并论。事实证明，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的创历史记录的长时间经济增长，一方面固然得益于“新经济”本身的特点，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经济全球化，扩大了整个世界经济吸纳美国经济负面因素影响的能力，从而延缓了周期的到来。

尽管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10年繁荣时期，时时小心谨慎，希望美国经济能以最微弱的震荡调整，但经济的轮盘无法按照人的意志随时改变运行轨迹。



“新经济”神话在新千年开始坠落。2000年，美国股票市场开始崩盘，到2001年3月20日，纽约股市市值已由16.96万亿美元，缩减为14.56万亿美元。纳斯达克市场高科技板块从5000点跌破了1700点。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损失市值5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一半。

经济与股市相互推动的“财富效应”对美国经济施加反作用，扣除房贷、信用卡融资等负债，美国家庭平均拥有的房地产、股票等财富净值在2000年减少2%，由1999年底的42.3万亿美元降到41.4万亿美元，这是1945年以来，美国家庭财富首度缩水，家庭直接持股的价值由8.75万亿美元降到6.6万亿美元。

2000年下半年的石油大幅度涨价，曾经一度掩盖了美国经济衰落的先兆。美国抵抗石油涨价冲击的能力比欧洲、日本强得多。欧洲、日本经济首先衰退，2001年4月日元贬值，欧元疲软，美元坚挺。

但随之而来的“9·11”事件，彻底打破了美联储希望美国经济软着陆的愿望。2001 年 11 月 26 日，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宣布，美国已经进入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的第 10 个经济衰退期。

二战后美国经济衰退的起讫年份和持续时间

开始年月	结束年月	延续时间
1948 年 11 月	1949 年 10 月	11 个月
1953 年 7 月	1954 年 5 月	10 个月
1957 年 8 月	1958 年 4 月	8 个月
1960 年 4 月	1961 年 2 月	10 个月
1969 年 12 月	1970 年 11 月	11 个月
1973 年 11 月	1975 年 3 月	16 个月
1980 年 1 月	1980 年 7 月	6 个月
1981 年 7 月	1982 年 11 月	16 个月
1990 年 7 月	1991 年 3 月	8 个月
2001 年 3 月	至今	



祸不单行，另外一个打击也不期而至，这就是对美国式经济制度的质疑。这是美国跨国公司管理层导演的监守自盗的恶果，虽然一切看起来都令人难以置信。

2001 年世界 500 强排名第六的能源巨头安然公司，其生意规模超过千亿美元。该公司曾创造性地实现了能源产品的“金融化”。它所开发出的一系列金融工具，复杂到令专业人士都未必尽然了解的程度。作为华尔街的宠儿，安然的触角还伸入到互联网，做起了宽带资源交易，并把能源交易搬到了网上。能到安然公司工作是许多美国人梦寐以求的选择，而安然公司

曾被认为是“新经济”时代传统产业发展的典范，做着实在的生意，有良好的创新机制。

但就是这样一个被当作美国乃至全世界表率的大公司，却孕育了巨大的虚假财务丑闻，丑闻曝光后，安然公司的股价从2001年的每股85美元跌至2002年的不到1美元一股，投资者的损失超过数百亿美元。

继安然公司之后，凯马特百货连锁店、世界通信、施乐等美国国际大公司相继曝出同样的丑闻。更为严重的是，魏斯评级公司在调查了7000家美国公司后发布的报告说，有多达1/3的美国上市企业可能存在捏造盈利报告的问题。

假账问题的另一面，则涉及到会计、审计、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诚信和监管问题。如在安然、世界通信等公司的假账丑闻中，以安达信为代表的会计师事务所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在“新经济”泡沫破灭的同时，美国公司的信用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信用危机震撼华尔街，震撼着美国经济。



四年前，若您问任何一位亚洲企业的老板，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得到的答案可能都是有朝一日能让他们的企业在美国纳斯达克股市上市，搭上美股上涨列车，创造无法想像的财富。但四年过后，纳斯达克几乎已被新闻媒体遗忘，只是当2003年6月纳斯达克黯然退出欧洲时，人们才对它多注意几分。

对美国的政治家们来说，“新经济”泡沫的破灭，一系列公司丑闻的曝光，使美国丧失的并不止是纳斯达克、美国公司制度的崇高地位，而且也是美国公司制度对世界的表率作用以及对“美国仁慈”、“柔性霸权”前途的信心。

20世纪90年代，美国自诩的“仁慈霸权”、“柔性霸权”是建立在其经济领先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了经济方面的继续遥遥领先，美国的“仁慈霸权”将难以为继。

二、不确定的下一次浪潮

悲叹和惋惜之余，美国人更关心的问题是：谁来拯救“新经济”？下一波转动经济轮盘的浪潮将是什么？

普遍认为，下一波经济强劲增长的浪潮将拜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技术所赐。

据统计，信息技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18%，而生物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将不亚于信息技术。美国《时代》周刊预言：2020年世界将进入生物经济时代。

专家预测，继狩猎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网络经济之后，人类第五个经济形态将是“生物经济”。

美国学者理查德·奥利佛出版了一本名为《生物技术时代的来临》的书，他在书中预言，生物技术的崛起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把网络经济从衰落中挽救出来，从而形成一个以往任何时代的增长速率都无法比拟的发展阶段：



> 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就开始大力发展信息、网络技术，到90年代，信息、网络新产品问世，形成了信息网络产业，使美国经济持续10年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如今，“新经济”发展受挫，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更新的技术将取而代之。
>
> 目前，美国、欧洲等都在加紧进行生物工程的开发，生物技术将比网络经济更深层次地改变农业、工业、制造业，谁能够在生物技术中引领潮流，谁就将是下一轮竞争中的获胜者。

目前，布什政府已经将生物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生物技术研究开发费用高达380多亿美元，仅次于军事科学。2002年，美国国会决定将每年的4月21—28日定为“生物科技周”。

但在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领域，情况已经不像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领域那样，只有美国先知先觉，一路领先，而其他国家都在远远追随。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地区纷纷采取加强领导、增加投入、搜罗人才、抢占专利、培育产业、建设园区等措施，加速抢占“生物经济”制高点，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英国政府1999年开始实施“基因组谷”计划，2000年发表了“生物技术制胜2005年的预案和展望”战略报告。英国政府的目标是保持英国生物技术位于世界第二的水平。



德国政府将2001年命名为“生命科学年”，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已经成为其科技投入最高的领域之一。

在制造业中崛起，在信息时代落后的日本，决心在生物经济时代再创辉煌，提出了“生物产业立国”口号，并发布了“开创生物技术产业的基本方针”。

新加坡被认为是亚洲生命科学研究热潮中决心最大的国家，政府力主推动“生物经济”，制定了“5年跻身生物技术顶尖行列”、把新加坡建成“生命科学中心”的目标，将外汇储备的5%—10%用于生物技术及产业发展，并于2000年设立“生命科学部长委员会”，高薪吸引国外人才，形成亚洲屈指可数、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体系。

在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领域里，美国的优势并不明显，只是诸强之一，这无法保证美国在该领域取得压倒性的优势，美国要在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领域独占鳌头不会像在信息技术产业中那样轻松。

除此之外，另外一个困扰美国同时也是所有国家的因素是，目前的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还没有取得革命性的突破。因此对其大规模地市场化应运和开发还需要时日。

过去10年的“新经济”，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9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物理学家、贝尔研究所的肖克莱博士发明了半导体收音机。半导体的最终大规模应用带来了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革命性传播。

生物技术革命性运用的开始可以追溯到1983年的美国出现了第一例转基因植物。



有经济利益的地方就有帝国的存在



20年之后，大约有二十余种转基因作物被引进到农业生产领域，并已进入消费市场，它们是：玉米、马铃薯、大豆、

棉花及小麦等。这些转基因作物对病虫和杂草有较强的抵抗能力。这类自体免疫的植物将有助于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中国的农民降低生产成本，减少杀虫剂的施用，以减轻环境污染并提高生物多样性。这是生物技术的第一次革命性应运。

专家们指出，生物技术革命或者说第二次生物技术的革命性应运将关系到能源生产，目前科学家从植物中已经能够提取诸如乙醇类的燃料。乙醇比传统石油污染更少，但其生产价格仍然高于石油。

使大规模地提取比石油更便宜的能源成为可能，可以通过特定的转基因技术来生产油菜或玉米，以将生产成本降低并提高植株的含油量。一旦这一前景成为现实，那么生物技术将引起人类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观念或现象（比如因资源有限而引发的国际政治斗争）将会随之消失或产生。



在生命科学领域，目前也同样面临进展缓慢的局面。2003年4月10日，参与人类基因组图谱破译工作的德国科学家宣布，由于技术原因，人类基因组图谱破译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下属的德国工作组协调人赫尔穆特·布勒克尔认为，在人类目前所拥有的技术手段和认识水平条件下，破译人类基因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因为人类染色体的部分区域，尤其是着丝点和端粒部分尽管基因较少，但很难用传统测试技术进行精确破译，因此，要有所突破，科学家们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这表明，基因组研究工作现在还很难进入应用研究阶段。人类希望借助基因技术操纵生命，完善人类免疫系统的梦想，依然遥远。

在信息经济步入成熟阶段前，生物经济即将孕育。而革命性的市场投放阶段预计将在2025年后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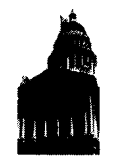
分析家预言，如果美国能在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领域获得突破，将会极大地带动经济的发展，让美国霸权优势扩大。但现在还没有出现这种迹象。

三、追逐的竞争对手们

霸权的另一个危机来自竞争对手的兴起。

欧洲的“立盟结义”，日本的蓄势待发，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自觉的多极化外交政策，使美国的霸权之路已经远不是一条仅有着磕磕绊绊的“雀斑小路”。

欧盟：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老欧洲自然死亡，新欧洲因此被逐渐催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美国凭借绝对优势地位，通过马歇尔计划实现了对欧洲市场的分割和占有。自此以后，美国历任总统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大西洋同盟”。

随着经济的恢复，欧盟国家开始要求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为自己谋取利益。二战战胜国之一——法国这个有着帝国历史和辉煌文化的国家，是首先起来要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

这里不能不提一个人——戴高乐将军。他是法国第五共和国之父，是法国光荣的象征，有人甚至称他是“最后一个伟大的法国人”，法国前总统蓬皮杜在宣布戴高乐死去的时候，这样叹息：

“戴高乐死了，法国变成了寡妇。”

戴高乐的地位来自他对重现法兰西辉煌的决心和努力。在他的“缺少了伟大，法国就不成其为法国”的信念下，戴高乐确立了法国的全球外交战略：维护民族独立，力争大国地位；对美既联盟又独立，对苏既坚定又对话，打破美苏两极格局，推动世界多极化；建立以法国为核心的“欧洲人的欧洲”；主动向中东、拉美等地出击，树立法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大国形象。

抗美独立，避免沦为美国的二流伙伴，是戴高乐实现其大国抱负的主轴。戴高乐政府不仅坚持发展独立核防卫力量，更重要的是，法国要在北大西洋联盟内享有与英美平起平坐的地位的要求遭到拒绝后，1966 年戴高乐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这个行为，用白宫发言人的话来说是“对准联盟的心脏刺了一刀”。



法国独立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在不懈延续，但真正让美国担心的是，法国和德国联合起来独立于美国。真是担心什么就发生什么！

1962 年，在欧共体成立初期，法国总统戴高乐和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这两位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互访，并于次年 1 月 22 日，在巴黎爱丽舍宫签署了《爱丽舍宫条约》，规定了两国首脑定期会晤。

这一条约反映了法德两国人民期盼和平相处的意愿，标志着法德两国捐弃前嫌，实现了真正的谅解。法、德都需要通过走欧洲联合之路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法国有强烈的大国意识，但经济实力不足；德国虽经济实力雄厚，但因历史原因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受到压制。

因此，只有通过法国这个“政治领袖”出主意，德国这个“经济巨人”出财力，才能使法德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车轮滚滚向前的“发动机”。40 多年来，从戴高乐与阿登纳，到德斯

坦与施密特；从密特朗与科尔，到希拉克与施罗德，法德几代领导人都恪守承诺，每年至少正式会晤两次，共同商讨欧洲一体化道路上所遇到的问题。

2003年1月22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聚会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隆重纪念象征着法德和解的《爱丽舍宫条约》签订40周年。两国发表了《共同政治声明》，重申继续履行《爱丽舍宫条约》，加强法德"特殊关系"。希拉克说，推动欧洲建设的法德"发动机"已在"全速运转"。

法国和德国是欧盟的核心层，只要法国和德国矢志追求政治和经济上的共同政策，欧盟的共同外交和独立于美国的防务政策必将最终实现。

1999年1月1日，欧洲货币联盟正式成立。这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瓦解以后国际金融史上的最重大事件，甚至被视作"西方文明史的新的转折点"，也最能体现欧洲的联合趋势。虽然美国当时对欧元的态度被形容"只是打了个哈欠"，但实际上却难以平静。



2002年1月1日，欧元在12个欧洲国家正式流通，并迅速取得国际金融市场的认可，经济共同政策的梦想在欧洲逐渐成为现实，欧元时代来临了。欧洲统一货币的目的：在其看到了美元作为世界第一硬通货所获取的利益后，通过统一的货币来维护欧元区的利益。欧元时代的来临，除了对欧洲本身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外，也将对世界经济格局造成深刻影响。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欧元之父"的孟德尔声称，欧元必将改变国际金融体系的格局。孟德尔认为，欧洲12个主权国自愿放弃本国货币，共同使用同一种货币，这是世界货币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欧元进入国际金融舞台的重要性将逐渐显露出来，在未来的十年，作为储备货币，欧元

将取得与美元同等的金融地位，届时所有外汇储备的调整都将涉及欧元，各国央行有可能将会持有同美元数量相当的欧元，如果全球外汇储备每12年增加一倍，那么全球各国央行就将增加相当于一万亿美元的欧元储备。他认为，这种金融力量的转移是二战后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全球第一大货币之后，国际金融领域出现的最重大进展。

有着挑战“美元特权”天然特质的欧元开始令美国人暗自心惊。“美元特权”是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反复强调的概念，它指的是：其他国家当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不平衡时，都不得不进行一番痛苦的国内政策调整，如削减公共支出和降低进口等；美国则不然，它长期处于国际收支经常帐户逆差的状况，却可以通过印刷美元，弥补逆差。简而言之，其他国家必须“挣外汇”，美国则只需要“印刷”本国的货币，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支配外国创造的财富。



如果有一天，各国不再接受美元为硬通货，也就是要求各国以自己的货币来购买产品时，美国的霸权将如同被掘掉基石的宫墙。2001年的时候，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就提出，联合国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中允许其出口到国际市场的石油，必须以欧元来支付。伊朗、朝鲜等国家随后也效法伊拉克的做法，提出在外贸活动中不使用美元。这一少有人注意的动向，在美国智囊机构却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他们担心，如果提出者是欧洲，美国将怎么办？

近代欧洲到1945年就死亡了，正是由于近代欧洲的死亡，欧洲人才有了建设现代欧洲的冲动，欧洲联合得以启动和推进。在共同经济的基础上，一种新欧洲意识已经可见其形。

新欧洲意识包括欧洲国家对自身脆弱性的认识，也包括对欧洲本身深厚文化积淀的认识，同时更是对欧洲各种力量——

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一一识，也是对各种力量必须共存，最终走向融合的认识。

欧盟国家在教育下一代时，已经自觉把这种以融合为主轴的新欧洲意识作为必须有的意识之一。如法国教育机构早已采取措施，加强各级学校的外语教学，强化欧盟国家的语言文化交流，铸造法国新一代的“欧洲意识”。

法德联合成为新欧洲的核心，彻底地结束了近现代历史上欧洲大陆战乱连连的可能，并使欧洲在全球系统中作为一个整体呈现自己的面貌，这决定了它迟早有一天会上升为一支决定性的世界力量。

俄罗斯：从俄罗斯出现在欧洲外交棋盘上的那天开始，它就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逐者。在近代欧洲国际关系体系中，俄罗斯和谁结盟，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决定着欧洲大陆的势力对比。



1810年，拿破仑以革命的大旗横扫欧洲大陆各国。要不是俄罗斯在1812年挫败了拿破仑大军的进攻，法国很可能早就成为欧洲大陆的惟一主宰者。在以后的近百年历史中，俄罗斯始终是欧洲和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

当今的俄罗斯是曾经和美国共同主宰世界第四帝国的苏联的继承者。正如它的国徽所标示的一样，俄罗斯以帝国的历史为荣：双头鹰，头上是彼得大帝的三顶皇冠，鹰爪上是象征皇权的权杖和金球，鹰的胸前是一只盾，盾的中间是俄罗斯传说中一位杀死怪物的勇士。

在2003年5月31日圣彼得堡300周年的庆典上，当世界上所有最强大国家的首脑聚集一堂时，人们明白，没有人能忽视这个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

在经济发展无法支撑扩张的情况下，苏联不得不以崩溃的方式退出了它帝国式的势力范围。美国、欧洲正在蚕食俄罗斯

的势力范围。美国通过北约东扩与中亚国家进行军事协作，竭力削弱俄罗斯的传统领地，要让俄罗斯无法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挑战美国。

但俄罗斯不会让美国的力量过度逼近自己，反弹是必然的，其关键就是俄罗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俄罗斯联邦拥有17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1.5亿人口，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家底。1992年的休克疗法差点置俄罗斯经济于死地，使俄罗斯经济经历了几乎跨越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震荡和起伏。

普京上台后对俄罗斯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新千年开始，俄罗斯经济开始出现起色。普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迅速把俄经济引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2000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达到8.3%，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001年，在美国和西欧经济发展普遍放慢的情况下，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均增长5.5%。外汇储备也比前一年增加了103亿美元，达到了383亿美元，创近年来的历史最高水平。



目前，俄罗斯有8%—12%的人口即1200—1800万人的人均月收入超过6000美元，莫斯科每天的商品零售额为6000多万美元。2001年俄罗斯人均GDP为1500美元，人均进口额近300美元，是中国人均水平的两倍左右。

据俄罗斯科学院院士B. 马尔帝诺夫估计，俄罗斯的GDP将在2015年从现在的世界第9位上升到第6位。届时，俄罗斯人均GDP将达到4500美元左右，人均进口额将达2000美元。

一个拥有巨大核武器库的国家，一旦在经济上强大起来，其地缘政治的要求必然会重新复活。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力量，依然会转换成政治影响力，为俄罗斯政治影响的上升提供新的维度。

在新世纪的头20年里，俄罗斯将会完全甩开苏联过度扩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平稳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并更加主动地出击，谋求在世界上应有的位置。

它庞大的核武库、它帝国的传统和自豪感、它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将使俄罗斯在20世纪最后10年里急剧收缩的翅膀重新扩张开来。

日本：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近百年来，除了苏联外，只有日本曾经两次对美国形成真实的挑战。第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日本从军事、经济等名方面全面向美国挑战，争夺对西太平洋和东亚的控制权。这次挑战以日本的战败而告终。

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挑战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不仅仅是争夺东亚和东南亚的市场，而且还有全球货币金融的主导权。



20世纪80年代，日元成为和美元一样受到欢迎的货币。其强劲的风头让美元一度黯然失色。日元坚挺所引发的资金外流甚至让日本政府自身都不堪忍受。当时在日本首都东京，充斥着前来淘金的世界各国人，东京被这些外国人称为“YEN－TOWN（元都）”，就像人们称呼一个到处是黄金的地方为宝藏一样。

在日本著名导演岩井俊二导演的电影《燕尾蝶》中，可以看到白皮肤、蓝眼睛的西方人和黑头发、黄皮肤的东方人一起为日元疯狂。那时候有一个流行的说法：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如果按当时的发展速度，没多久就可以把美国买下来。事实上，日本当时也已经开始了“购买美国”的行动，这是在政治、军事力量欠缺的情况下，日本惟一可以挑战美国的地方，也恰恰是美国霸权的最脆弱处。

日本掌握的美国政府债券让美国政府对每年的日美会议充

满朝圣的意味。也就在那时候，日本向美国发出了第一声呼喊：日本可以说不！

美国学术界开始讨论“日本第一”的现象，研究美国生产力停滞的原因，当时甚至有人怀疑美国是否要步大英帝国之后尘而开始走上衰落之路。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与美国都发生了转折。日本不愿放弃旧有的市场与优势，仍对传统工业产业投入巨资并忽视了信息革命的征兆，日本再次被美国甩在了后面。

但这也只是十年间的较量。目前，日本自政府至民间企业都期望寻求新的动力，推动经济早日走出困境。除了进行财政和金融改革之外，日本新一代纷纷把目光投向科学技术。在美国为信息技术而欢欣、憔悴的时候，日本瞄准的是下一个十年的竞争优势。



日本政府和民间权威机构对21世纪的日本技术竞争力进行了分析、评估。他们预测到2010年，在16个主要技术领域中，日本可以与美国平分天下，日本将在电动汽车领域、下一代移动电话技术、“光”技术等八大技术领域领先美国，而在其他另外八项技术领域中，与美国差距微小。

控制着巨额美元储备的日本，一旦在经济上重新获得优势，将再次挑战美国霸权中的薄弱环节。

中国：在人类历史4/5的时间里，中国一直享受着世界大国的辉煌，她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绵延5000年没有断绝的文明古国之一。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专家的定量测算，1820年，中国GDP高居世界首位；当时西方最发达的英国位居世界第四；居第二、三位是的印度和法国。当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8.7%，比印、法、英三国的总合还要多。

清朝末期，中国遇到了西方文明的挑战和压迫。和日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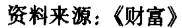
样，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学习西方，重新跻身世界强国之林，但一连串的灾难让中国的大发展一滞后就是一百多年。

历史欠中国的，现在终于可以归还给中国了。在全球外资都把眼光投向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发展已经无法阻挡。20 年来，中国经济以 7%—8%的年均速度增长。

1995 年以来，在《财富》杂志全球 500 强排行榜上，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中国企业的崛起。1995 年仅有 3 家中国公司入围。但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以及公司会计标准的提高，中国公司的表现在稳步提高。2001 上榜的中国公司共有 11 家，行业涉及电信、银行等诸多领域。

2001 年度全球 500 强中的中国企业

排名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亿美元）
60	国家电力公司	483.74
81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414.99
86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403.88
214	中国电信	222.72
243	中国工商银行	198.27
277	中国银行	178.69
287	中国移动通信公司	174.05
311	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	161.64
389	中国建设银行	130.82
392	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130.03
471	中国农业银行	106.56


资料来源：《财富》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各种论调层出不穷，几乎所有的声音都来自美国。无论是“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威胁论”，两种论调的出笼都有一个相同的时代背景，那就是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增强。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国内出现了两种担心，一种是怕日渐崛起的中国政局不稳，引起全球动荡；二是怕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构成威胁，形成挑战。两种担心中，尤以后者为重。在这两种担心的后面是对无法把握和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焦虑。

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不久前的一段话颇能反映出这些人的心态。他说：

> “虽然中国实力的增长可能构成美国在21世纪最大的单项战略挑战，但我们影响这一走向的常规手段却十分有限。”



四、和平的压力

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家，任何人或事或物都可以量化成为金钱。有人说，甚至美国总统都可量化为金钱，和平也一样。在诸强追赶时期，和平对美国而言是一种压力。用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来说：现在增加一个时期的和平，带给美国相对于其他竞争者的好处是递减的。

冷战后10年的和平期间，美国需要在全球推行其“新经济”理念，这是美国对和平需求最强烈的时候，和平也发挥了最大的效用。

当时美国凭借信息技术的优势，在全球遥遥领跑，各国远远追随，和平的红利最大限度地被美国收入腰包。美国借助其

在经济领域的威望和权力，得以把以好莱坞、美国式民主为核心的软权力影响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推进。

而现在，和平就像是经济学家们常说的“第四杯水”，对美国霸权来说，它对美国已经没有解渴的作用，它只是给了美国和竞争对手们一个安定的环境来追赶美国。

和平为美国集中全力在全球推行“新经济”提供了条件，同样也为其他国家采用新的技术，进行本国的产业革新带来了好环境。在美国这只领头大雁飞过之后，欧洲、日本、俄罗斯、中国将很快跟近。

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推进，全世界几乎用了 3000 年的时间。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所用的时间不过百年。

从工业浪潮到信息技术浪潮的过度时间也变得更短。科技越来越快地传播，使后进国家学习先进国家所需要的时间更加短暂，只要有一个适当的和平环境，先进国家的优势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容易被竞争对手复制、购买和赶超。



历史上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都是在新技术进入成熟期后，被新兴的强国取代，而取代的基础则是在新技术成熟期的一段和平时期内铸就的。

目前，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已进入成熟期，可以预见的是，其他国家借助信息技术，优化本国产业结构，激起新的发展势头，而美国的速度将慢下来，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

美国目前依然是世界上的惟一超强，但“滞后效应”使经济颓势对美国霸权的影响要等到若干年后才会水落石出。因此，美国鹰派眼里的和平并不像其他国家领导人眼里那么可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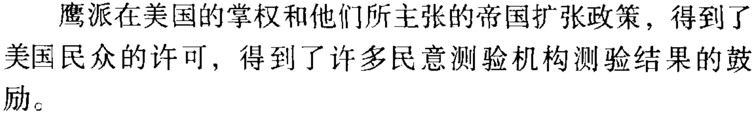
第四章 鹰派的鼓噪



不能把全体美国人都看作鹰派，但也不能把鹰派和全体美国人彻底分离开来。



鹰派在美国的掌权和他们所主张的帝国扩张政策，得到了美国民众的许可，得到了许多民意测验机构测验结果的鼓励。



比如最近的一项民意测验说，在伊拉克战争之后，60%以上的美国人都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要理解鹰派，则要从2000年说起。

一、千年的迷惘

在基督教文明国家里，“千禧年”包含宗教涵义，有神圣的意味，同时也夹杂许多恐惧。许多骇人听闻的末世预言都宣称新旧千年之际，是世界将面临大毁灭的开始。

一些天文爱好者推算1999年8月18日九大行星会在天空排成十字状，地球刚好排在这个大“十”字的正中央。这将激

发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得处于中间的地球引力完全紊乱。

当这一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后，相信这类预言的人又说在2000年5月4日那一天，九大行星会排列成一条直线。届时太阳与地球引力会失去平衡，带来潮汐改变、洪水、地震，阿尔卑斯山、洛矶山、喜马拉雅山等在数小时之内就被移到海边。

还有人从16世纪法国医生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诗集《诸世纪》中获得灵感，认为1999年的第七个月份，天空中会出现一个“恐怖大王”，在它之下的所有东西将会完全消失，这个“恐怖大王”是核战的爆发。

“公元”纪年方法源自于耶稣受难的传说，《圣经》记载，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亡两天后，在第三天复活，并且在不久后升天，这是圣经宣称的最大的神迹。而《圣经》又说：

“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许多预言家据此认为这些经文其实是一种暗示，他们推测耶稣死亡的这两天指的是此后的两千年，所以既然耶稣在第三天一大早复活，那么两千年一过，也就是人类历史正要迈向“第三个千年”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会复临，末日审判就要到来。

时光流逝，上帝的末日审判并没有到来，预言的破灭体现了宗教的虚幻，却表明信仰和恐惧的复杂结合，加上对现实的迷惘的确能改变一些人对世界的看法。在自认为最能体现上帝意志的国家美国，鹰派的声音越来越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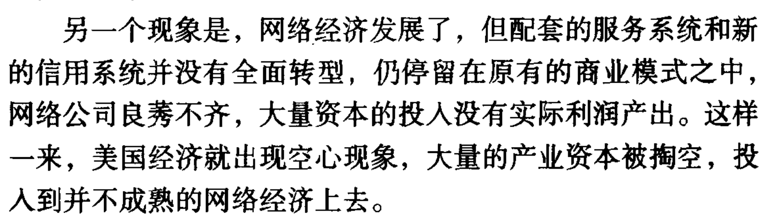
美国的鹰派认为新世纪头20年将是美国帝国的决定性时代，要么是长久的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要么就是很快沦落到诸强之一的地位。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是美国鹰派划时代的一个年份。

“新经济”泡沫的破灭引起的焦虑、对美国霸权不保的担心和新千年的宗教情绪结合到了一起，使2000年大选成为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的较量：谁能维护美国在今后的霸权？

戈尔是克林顿政府的延续，其经济政策重点是发展网络和高科技，在外交上继续强调国际合作，批准京都议定书。戈尔要通过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以及美国超越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来维持美国“仁慈的霸权”。

但这个时候，“新经济”的颓势已经出现。投资界已经看到了一个危险的信号：美国基础行业中，募集资本困难，而网络经济高涨，资本狂热投入。信息技术行业和一些基础行业发展极不平衡，几个州出现电力能源危机。而电力投资在以往是最稳妥的投资，是很受欢迎的投资项目，竟然出现资本募集困难，可见其他基础行业募集资本会更难。缺乏了基础设施支撑的发展是难以长久的。





另一个现象是，网络经济发展了，但配套的服务系统和新的信用系统并没有全面转型，仍停留在原有的商业模式之中，网络公司良莠不齐，大量资本的投入没有实际利润产出。这样一来，美国经济就出现空心现象，大量的产业资本被掏空，投入到并不成熟的网络经济上去。

事实表明，“新经济”已经无法使美国继续保持经济繁荣。关心美国霸权地位的人明白，没有经济上的遥遥领先，外交上的多边主义，是不足以阻挡世界多极化的潮流的。

布什代表的是新保守主义势力。保守主义势力是支撑美国鹰派的基础，其对内经济政策是发展基础行业，调整产业结构和资本结构，振兴传统产业，同时大幅度减税。

在对外政策上，布什政府认为，由于美国霸权的力量正在下降，必须采取果断手段，阻止和延缓这一衰落的继续。

布什具体的竞选纲领表明，他主张美国要利用其现有的强

大力量，甩掉多边主义的羁绊，主动出击，阻止其他力量挑战美国霸权。美国需要执行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在每一个领域，美国要获得看得见的好处。

如在全球环境问题上，美国绝对不能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承担对世界的义务，而要继续无节制地做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国。在联合国问题上，如果联合国不服从美国的意志，就有必要将其搁在一边。

政治捐款比投票更能代表美国的民意风向，囊括美国主要企业的美国“财富500强”公司老板，没有几个是戈尔的支持者，他们统统支持布什。能源、金融、保险、房地产商是布什第一大筹资来源，共向布什捐款1300万美元以上，金融大鳄索罗斯的公司就给布什捐款数百万美元。

戈尔则只得到了关心本身而不是世界秩序的劳工组织的捐款，这些人基本来自美国中下层社会，他们希望提高自身福利待遇，而不是关注美国的海外驻军。



《洛杉矶时报》当年一项有趣的调查也发现，戈尔比较受女性选民的欢迎，她们一样不太关心美国的国际地位，而“好斗、多有雄才大略和抱负”的男性选民则大多倾向支持布什的。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前所未有的势均力敌局面告终，新保守派势力凭借着微弱的优势，迎来了他们希望的总统，剩下的事情就是在新总统的第一个4年任期内，逐渐恢复鹰派势力的失地，并按照鹰派的意愿，重塑美国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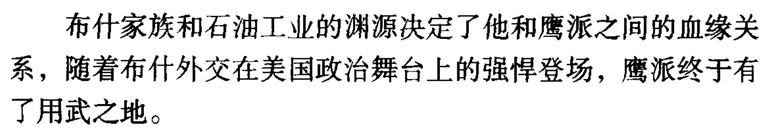
大约10个月之后，“9·11”袭击事件的发生，使新保守主义势力和鹰派得以戏剧性地迅速得势。

二、鹰派崛起

美国鹰派主要由美国共和党内的传统强硬派、国会中的右翼势力、重工业和军火行业的财阀、军事和情报部门负责人、冷战时代就已存在的保守型智囊库以及具有极端思维倾向的部分媒体组成。

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由于其内阁成员多数主张实施积极的对外接触战略，鹰派一度被打入了冷宫。而10年“新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使美国鹰派失去了经济的阵地，但随着“新经济”泡沫的破灭，鹰派所有关于财富以及美国未来的观点。开始抬头。





布什家族和石油工业的渊源决定了他和鹰派之间的血缘关系，随着布什外交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强悍登场，鹰派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首先，鹰派人士直接地成为了布什政府的核心人物，从而和国会的右翼势力首次形成“院府呼应”，结束了美国长期存在的“院府相争”格局。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鹰派中的领军人物，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32年，是共和党内有名的右派。他咄咄逼人的强硬辞令，总是能在国会引起阵阵喝彩。

副总统切尼是老资格鹰派人物，他认为美国的霸权应该加强，如果不是因为心脏暗疾的拖累，他应该和拉姆斯菲尔德一样活跃。

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被称为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的“建筑大师”，是主张美国“武装保卫台湾”的始作俑者。

理查德·珀尔（伊拉克战争后已经辞职），普林斯顿大学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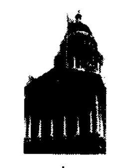
治学硕士，在里根时期任国防部副部长，任布什政府的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是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战略制定者。

在美国国会，老右派赫尔姆斯退休了，但他的影响还在。

军工财阀和军、情部门首脑构成了美国鹰派的另一个层次。

冷战结束后，英、法、德和俄罗斯都被迫进行了痛苦的调整，但美国的军工财阀采取了另外的方法避免行业危机，他们不断研制新式武器直至大规模地介入太空竞争，相关费用越来越大，暴利程度也越来越高，美国国防开支更是一路狂涨。

在美国，通过扩张性的国防预算，一般都需要经过以下几个“程序”：首先是由军、情部门上报发现“某国正在部署一种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战术导弹”、“某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正在可怕地扩散，对驻外美军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等类似情报，然后“相关的威胁程度”则由专家即军火商来继续说明，以引起国内对保护美军士兵安全的高度重视。



最后，军、情部门和军火商们一致强调只有配置新式武器装备才能提高美军战斗力，防范威胁。

另一股势力则发挥着思想引导的作用，他们以智囊库的中立面目出现，往往跟大众传媒合作，以表面公允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国际事务的夸张分析与强硬立场。

智囊库的系统评估方法与媒体的渲染与炒作，往往能达到引导公众眼球的“理想效果”。在这方面，保守派控制的媒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旗帜周刊》是人所共知的新保守派杂志，也是鹰派思想的源头，其发行量虽然只有5.5万份左右，但读者都是在美国政治坛有影响力的人物。美国《国家》杂志专栏作家埃里克·奥尔特曼如此评价它：

“这家杂志直接同当权派对话，为他们说话。要

想了解这届政府的所思所想，就必须读这一本杂志。”

此外，《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著名报纸，也被新保守主义势力和鹰派所控制。

2001年，尤其是“9·11”事件后，鹰派在美国全面抬头，各个层次的鹰派势力协同运作，彼此呼应，在美国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潮。

有媒体曾以“朝鲜威胁论”的出台来说明美国鹰派的“协同运作”。这确实是一个经典的实例，不妨再次引用这个案例：



布什上台后，布什政府中的强硬人物就宣布要重新审查过去若干年的美国对朝政策；随即在美国国会中就有议员出面公开批评克林顿时期的对朝接触政策太软弱了，“对付朝鲜，必须大棒在前，胡萝卜在后，而不能颠倒过来”。

而美国军方也立刻采取相关动作，从2001年开始，美国第七舰队加强了对朝鲜海军的电子干扰，驻韩美军还联合了日本自卫队及当地韩国军队举行了以“朝鲜为主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当朝鲜声称有权在遭到侵犯时采取必要手段自卫后，美国的情报部门拿出绝密情报“证实”：“朝鲜从未放弃过核战略构想”以及“一直在谋求其他对付美军的特种手段”，而特种手段中自然“包括了生物武器”。

其后，美国最负盛名的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开始设立课题，论证“朝鲜威胁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其专项报告分析了朝鲜的军力、国防投入、战时体制和“领导人的极端与好战性”，论述了驻韩美军随时可能遭遇危险的种种可能。在其一项报告的结论部分，兰

德公司的研究人员指出："大浦洞"导弹有可能在2005年拥有攻击美国本土的能力。

正是这个预测性和假设性的"攻击美国本土能力"，立刻成为美国媒体描述朝鲜的重点，而朝鲜在美国公众中的"邪恶形象"也顿时变得真实而具体起来。

作为结果，美国政府的对策马上出台：增加预算用于导弹防御体系的构建、加强第七舰队等前沿遏制力量、拒绝朝鲜申请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发展资金的要求（因为资金可能被用来投入军事目的），最后再"先发制人地予以打击"，以"彻底摧毁朝鲜对美国的核威胁力量及其他常规威慑能力"。

只是由于朝鲜并没有被美国成功地孤立，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加大了对朝鲜的接触，再加上韩国总统金大中实施阳光政策，朝鲜半岛的局势并没有朝美国鹰派预定的方向发展。



三、新保守主义

思想是行动的源头，鹰派的根基在新保守主义者当中，其思想的圣经是一种叫"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学术界、舆论界与政坛上影响日益增强。"新保守主义"有着非常深厚的哲学基础，其思想先驱为20世纪50—70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政治学讲座教授的列奥·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是犹太人，生于德国，20世纪30年代因担心纳粹迫害而离开德国，先到英国，后到美国，并在芝加哥大学教

授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他一生出版了15本书和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带出了一大批学生，现在美国政坛上最活跃的人中，很多都是他的徒子徒孙或是新保守主义哲学的信徒。

施特劳斯被誉为是“使古典政治哲学再生”的大师。其著作《自然权利和历史》，几乎是单枪匹马地颠覆了几百年以来的“自由主义”，构成了新保守主义的精神内核。

“自由主义”是欧洲宗教改革的产物。基督教的分裂导致长期的宗教战争，给欧洲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痛苦，在此背景下，欧洲发展出了“自由主义”哲学。“自由主义”哲学摈弃古典政治哲学，提出文化多元主义或价值多元主义。正如人们所评价：



> “自由主义”把古典政治哲学中人类普遍追求的美好生活降低为和平生活，其核心是价值多元主义或某种价值相对主义。它把创造美好生活的任务交给个人，交给不同的宗教。

“自由主义”构成了近代以来西方政治秩序的哲学基础，并形成相应的政治架构。在国内，它要求政教分离，政府只关心秩序，个人有信仰自由、舆论自由，美好生活的问题由个人选择；在国际上，它主张不同的主权国家都有寻求不同美好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同的主权国家为了维护世界秩序，就发展出了国际法。国际法的目标就是维护世界的秩序、和平，而不是保证所有国家都追求同一种美好生活。

“自由主义”精神衍生出来的国际秩序，可以追溯到1646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个条约的前提就是承认政教分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精神有了进一步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基本沿袭这一精神。

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施特劳斯研究了曾经在欧洲盛行的霍布斯、马基雅维利、柏拉图、苏格拉底等先哲的古典政治哲学，构建了一个对西方思想史的全新解释。

该书认为，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要寻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内容并非因人而异，而是只有一种美好生活：符合自然正当的生活。

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样一种追求是伟大的传统，但近代以来逐步被“自由主义”破坏了。罪魁祸首就是“实证主义”，它使尘世间的人们把美好生活忘掉了。所以施特劳斯提出伟大号召：

回到古希腊，追求自然正当（美好生活）！

因此，在施特劳斯看来，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争不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斗争。

在这个“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根基上，生长出来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认为：以财产私有制为根本、人权为有机组成部分的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最终形式，放之四海而皆准，而美国的制度是这一制度的完美体现，甚至有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经过神恩钦准的社会形态。

“新保守主义”忽视乃至无视因不同历史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民族或国家的独特性。同时，他们认为美国是西方文明自古希腊以来的正宗传人，美国价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价值。

施特劳斯的学生、20世纪80年代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艾伦·布鲁姆说：

"当我们美国人认真谈论起政治时，我们认为我们的自由、平等原则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其他原则是合乎理性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一部美国史，就是一曲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凯旋之歌"，"民主制度以外的任何政体一概没有理论依据。"

"如果说哲人的政治理想曾经变成过现实，那就是美国了，而美国几乎是一帆风顺地达到了这一目标。"

"通过对人的自然权利的认识和接受，人们找到了统一与一致的基本点。沐浴在自然权利的阳光下，阶级、种族、宗教、国籍，甚至文化都已消逝，或许可以说，它们减弱了，这给人们带来的是共同利益，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兄弟。"



"新保守主义"认为，美国就是理想的普遍价值体系的化身，是民主政治的典范。因此，美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奉行的是普遍主义原则。他们鼓吹美国式政治理论与文化的霸权或垄断地位，认为美国是世界的领袖，肩负在全球推行民主和人权的政治使命。

他们甚至主张美国应该不惜采取政治乃至军事行动，为全人类立言，在美国的统治下，为全人类开太平。

他们宣称摒弃所谓"道德相对论"，自称代表了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普遍原则，是道德与德行的化身，是全人类普遍真理的代言人。在他们的眼中，推行美国式民主制度是一场全球性的道德圣战。

"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外交上表现为一种激进的道德帝国主义。前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曾说：

“美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就是推行‘普遍性的启蒙理想’。”

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应该采取“一种以国力和道德自信为后盾的外交政策”，应该成为全球组织的总指挥。亨利·基辛格也曾以傲慢的口气说：

“全球化是美国统治的另外一种说法。”

哲学家黑格尔所提出的“普鲁士国家是自古希腊以来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形态”的断言，曾被普鲁士用来作为强化扩张意志的理由，如出一辙的是，“新保守主义”的美国文明至上论，也被美国人用来作为美国建立全球帝国的理论依据。



四、鼓励战争的哲学

得到鹰派青睐的还有“新现实主义”，它和“新保守主义”构成了理念和方法上的互补和对应。所谓“新现实主义”，仍以现实主义为基础，但具有新的特点，它新就新在追求绝对安全和鼓励动用军事手段上，是进攻的现实主义。

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莫过于2001年出版的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强权政治的悲剧》一书。该书认为，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生存本能决定了强国的基本行为是恐惧、自我帮助和实力最大化。

米尔斯海默认为，所有强国都会进行实力扩张，扩张实力的基本动机是保障本国的安全，一国的实力扩张会使另一个国

家感到不安全，促使另一个国家也进行实力扩张，导致各国追求实力的竞赛，实力的竞赛是没有止境的追求。

因此，米尔斯海默的“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用米尔斯海默的话说：

“战争是由各国实力结构的变化所造成的。”

只要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就会引起实力结构的变化，必然将引起战争。为了说明其理论，米尔斯海默对冷战后形成的许多关于战争可以避免的理论，一一予以驳斥，其主要论点如下：



美国强大论

美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超过全世界军事力量的总和，因此一些人认为美国应该有足够的安全感。对此，米尔斯海默说，一个国家的实力分成两种：一种是潜在实力，另一种是现有军事实力。潜在实力的主要构成是人口和富裕程度，而潜在实力均可转化成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他又说，如果中国的人均 GDP 达到香港的水平，那么中国的潜在实力将是美国的四倍。所以，美国要及早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阻止中国的崛起。

各方克制论

俗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循此常识理解，如果每个国家只注重自身防御，不去侵犯其他国家，世界就可以保持和平。但进攻现实主义者并不这样认为。

他们认为强国的特点就是“实力极大化”，“最好

的防御就是进攻”。这个论点的根据是，一个国家的所得就是另一个国家的所失，因此每一方都要争取在竞争中取胜，从而获得对其他国家的统治地位。为了生存，一个国家不得不用进攻性态度对待其他国家。

在米尔斯海默看来，一个放弃称霸的国家采取的是错误的决策。正常的强国就是要考虑扩张和征服，其结果就是强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国家为了取得胜利不惜使用欺骗和残暴手段。在这个世界上，各国和睦相处的和平是极不可能的。

核武器遏制战争论

人们普遍相信核国家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因为战争会使核国家相互毁灭。但是米尔斯海默说，他可以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他说，正因为核武器太可怕，因此，一个理智的国家领导人可以发动战争，但不会使用核武器，即使是出于防御性目的。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核武器不会减弱国与国之间的安全竞争。

经济联系论

人们认为国家的主要目标是经济繁荣。当所有强国都获得繁荣时，它们就不再有发动战争的动机，因为战争会破坏经济联系，从而破坏繁荣。没有人想破坏繁荣，所以也就没有人会发动战争。

对此，米尔斯海默又表示不同意。其理由是：

第一，地区性和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会破坏繁荣，现在就很可能处在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之中。在危机之下，国家没有繁荣，战争也就不会带来进一步的损失。即使没有危机，也有一些国家不如其他国家繁荣，因此它们也不会在战争中损失，反而有可能从战

争中得到利益。比如，伊拉克对科威特的战争。

第二，一个国家总希望进行一场快速的战争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针对一两个国家的战争只消耗一个国家的少量财富。此外，征服他国还可能为自己国家带来巨大的财富。

第三，从历史上看，1900—1914年之间，欧洲各国有广泛的经济联系，而且各国也处在经济繁荣之中，但是1914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民主国家无战争论

有人提出理论说，如果中国转变为和美国一样的"民主国家"，那么美中之间就可以避免战争。也有一批西方理论家论证，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因为民主国家有良好的意愿，它们之间能够相互了解，并不像米尔斯海默所假设的那样无法确知对方意图。



对此，米尔斯海默说，上述理论有严重的问题，历史事实表明民主国家之间依然有可能发生战争。

他还列举了多篇支持这一观点的专著和论文。此外，他说，没有什么理由表明民主国家之间一定是善良友好的，他们同样遵循实力平衡的原则行动。

放弃现实主义

有学者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现实主义所讲的那样，完全由实力结构所决定。各国对国际政治的态度影响了国家的行为。西方世界700年来，都使用现实主义的语言说话，因此导致了战争，如果各国放弃现实主义的观点，世界就会有和平。

对此，米尔斯海默说，既然现实主义通行了700年，那么它就已经深深地进入了人们的思维，各国都按照这一理论行动，人们怎么可能轻易放弃这种思维

习惯呢？如果放弃了现实主义，又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它？如果有这样一个替代物，那么人们又怎样知道它会更好还是更坏？即使一个国家放弃了现实主义，它会不会又在某一天卷土重来？对于这些问题，社会结构主义都没有提供答案。

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

尽管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利益冲突，但是仍可以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规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战争是否由此可以得到避免呢？

米尔斯海默说，国际机构无法阻止国家不按照现实主义原则行事。比如，联合国并没有阻止1992到1995年间巴尔干半岛的战争。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票使得很多决议无法通过。现在，亚洲不存在有影响力的国际安全组织。



欧洲虽然有北约组织（NATO）和欧盟，但是它们也不能阻止各国不按照各自利益行动。此外，一些强国实际上按照自己的需要影响国际组织的面貌。比如，当美国不想让前安理会秘书长加利连任时，它就设法迫使他退出，尽管当时安理会所有其他成员国都想要他留任。美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国家，美国经常撇开国际组织，去做它认为符合自己利益的事。

战争消耗国力

反对战争的人说，战争一方面消耗本国的国力，破坏自己的经济；另一方面又得不到好处，各国应当致力于创造财富而不是发动战争。

对此，米尔斯海默回答说，战争未必会毁坏自己的经济，美国在两次大战中，普鲁士在1862—1870年的战争中，都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虽然美国在二

战中花费巨大，但美国今日的经济是世界最强。英国曾经是个殖民地遍及世界的大英帝国，如今这个帝国已经崩溃，英国经济也大不如前，但是很少有经济学家将此归咎于英国的国防开支。

英国的国防开支实际上少于它的竞争对手。苏联确实由于国防开支过高而崩溃，但是学者们对苏联崩溃的原因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有理由认为，苏联崩溃是由于其经济结构不好，而不是由于国防开支过大。

战争没有好处

反对战争的人还说，即使战争胜利，征服者依然无法得到经济上的好处，尤其是在信息技术时代。在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中，征服者将会遇到民众的广泛持续的反抗，在信息时代，镇压民众的反抗是很困难的，如果阻止信息交流，那么经济发展就会窒息，如果开放信息，那么反抗意识就会到处传播。



对此，米尔斯海默说，即使在信息社会中，征服者依旧可以从被征服国家的经济中得到好处，征服者可以通过收税，没收工业产品，甚至没收工厂来获利，还可以没收该国的自然资源。

即使不靠上述方式，征服者还有三种方式可以为自己获利。一种是让被征服国家的人到征服国的军中服役，或者强迫他们在征服国中做劳工；第二种是占领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第三种是取消被征服国的强国地位，减少征服国的一个竞争对手。

从 1941 年到 2001 年，鹰派在美国几乎从未获得过真正的政治权力。“9·11”事件之后，鹰派控制了华盛顿的权力。

鹰派对世界的看法是，美国霸权的衰落是实际存在的，但衰落的原因是由于美国政府软弱的意志力和误导的政策所致。他们相信，美国的潜力无与伦比，问题只在于如何运用它。而“新保守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就已经提供了最好的指导。



第五章 新罗马帝国计划



19世纪，曾经有一位名叫亚当·亨利的学者向美国人描述了将来有一天，太平洋成为美国内湖的情景：如果美国人占领了中国市场，那么，它的财富和力量就必定能超过罗马人、英国人和君士坦丁大帝。这就是新罗马帝国。



当年美国的国父们在创作《联邦党人文集》时，所用的笔名都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人名，如“普布利乌斯”（publius）就是罗马著名的军队统帅之一。在美国国父们心目中，美国就是罗马共和国的再生。

历史上的罗马共和国很快演变成罗马帝国，并延续近千年。在建国两百多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终于展露建立新的千年帝国的心态，一个新罗马帝国计划在鹰派的主导下成形了。

一、执拗的野心

罗马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罗马共和国从建立到解

体，前后近千年。公元前3世纪中叶到前2世纪中叶，通过布匿战争、马其顿战争等多次侵略战争，罗马征服了迦太基、西班牙大部分以及马其顿、希腊诸地，到图拉真皇帝（公元98年—117年在位）时达到最大版图：西起西班牙、不列颠，东达幼发拉底河上游，南至非洲北部，北迄多瑙河与莱茵河一带。在征服了迦太基等强敌后，罗马成为地中海地区无人可以挑战的强权。

在罗马全盛时代，它不仅以强权维持了其广袤国土内的秩序，而且已经没有外在的敌人，没有一个外部势力能够对它构成威胁与挑战。罗马帝国秩序确立了！

这也是美国鹰派新罗马帝国的雄心所指。冷战结束、美国经济10年的辉煌，使鹰派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式民主制度的最后胜利，历史将终结于当前的美国政治、社会制度形态。

“新保守主义”理论一方面为美国的胜利提供了一种文化优越论的解释，另一方面迎合了美国的扩张意志，迎合了美国公众的权力欲望与自大心态。它为美国称霸全球提供了一种美国精神优越论，从深层的道德、思想、文化层面上，为美国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国家文明之关系建立了意识形态的基础。



鹰派觉得，美国完全可以超过罗马帝国，超过大英帝国，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帝国：这个帝国既能体现人类美德，又能让全世界人都过同样一种美好的生活。

这种太过专注自我的幻想是“新保守主义”的精神泡沫，它本应该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而挤出一些空气。但美国霸权越是受到威胁，新保守派和鹰派对新罗马帝国的幻想就更加执拗，美国的经济波动越大，美国国内对维持这种经济和实力地位的敏感性就越强。

鹰派们越来越倾向于在全球保持美国的利益和实力地位。为此，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更一意孤行地按照美国式的方法

来行事：按照美国的需要来维持和加强国际安全和国际秩序，防止地区安全领域内出现对美国利益的挑战，维护在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





鹰派认为，美国应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帝国

有人这样描述这些执拗的鹰派：

他们是一帮喜欢轰炸、喜欢帝国的重量级知识分子。

这些人最近被称为"战争党"，他们中大部分人从来没有到过国外，从来不说外国语，他们都好战，

但从来没有在部队里面打过仗。

他们喜欢研究古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并为此津津乐道，认为美国应该被古罗马帝国的伟大所激励。

鹰派的根基人群——新保守派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赞赏和支持。2003年2月，在华盛顿企业研究院（Enterprise Institute）的一次讲话中，布什总统完全不掩饰对新保守派的情有独钟。他对在场的信奉“施特劳斯主义”的新保守派记者、政治思想家和政策制定人说：

“你们是我们国家中最杰出的大脑，而我的政府雇用了20个像你们一样的人。”

实际上从2000年总统竞选开始，布什就已经显示出向鹰派和“新保守主义”立场靠拢的决心。他曾在竞选演说中说：



“避免被看作是丑陋的美国人的一个方法是作榜样——对世界说，我们是这样做的，所以你也应该这样。”

“世界很明显需要传播民主的价值观……，在美国，在我们的盟国朋友的矢志努力下，我们将建立一个进步和自由的时代。”

布什鼓吹要在美国价值观的基础上，制定新政府的外交方针。他说：

“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力量和天下无敌的影响力，我们将借重这些为民主服务，年年向世界宣扬和平。”

“我们对人类自由的立场不是空洞的外交形式，而是这块伟大土地的创始和指导原则。通过促进民主，我们奠定了一个更美好和更稳定的世界的基础。”

在人类历史上，一种思想一旦被一群人采用，就变成了破坏、阻碍或者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的力量。在“新保守主义”思维的影响下，美国政府从可以容忍大国的力量平衡，到不能容忍；从罗斯福的多边合作政策，转变为独断专行。

古罗马帝国为什么灭亡？孟德斯鸠解释说，这是因为罗马从共和国转变为帝国，丧失了自由；《大国的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认为，这是由于罗马帝国的过度扩张，最终导致帝国的经济无法支撑。



那么，今后的美国能不能够做到既对外扩张，又在国内不丧失自由；既穷兵黩武，又没有多大的成本负担，从而成为一个永远的帝国？对此，鹰派和新保守主义者们有着执拗的野心，也有着周详细致的打算。

二、新美国世纪规划

在有证可查的文件里，最细致周详地体现鹰派们对新罗马帝国的幻想的非“新美国世纪计划”的纲领莫属了，这又回到了本书的第一章。

“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创建于1997年，这个“新保守主义”智囊库的大本营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新美国世纪计划”的目标是建立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所有其他国家都应该屈服于美国的领导和意志：

“维持美国全球的显赫地位，事先排除任何竞争对手，使国际秩序符合美国利益。”

这完全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新罗马帝国目标。2000年9月，这一目标具体化成一个文件——《新世纪重建美国国防：战略、军队和资源》。这个文件要求改变美国多年来的军事战略目标，即美国能同时打赢一个半战争，且要求美国必须拥有“能够以绝对优势同时打赢多场中等规模战争的能力”，并可以执行“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安全环境”任务的能力。

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在军事上必须完成下列一些目标：

在东部欧洲、东南亚和中东重新安置永久性军事基地；使美国军队更加现代化，加强美国的空军力量和海军力量；发展和部署一个全球导弹系统，并由美国战略性地支配未来太空力量；在情报系统方面，由美国控制全球共用的“资讯网空间”。



而要达到以上目标，美国必须将其国防预算至少增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8%，并且在此基础上，每年递增200亿到300亿美元。1999年，美国军费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2001年为3.2%，这就已经使其拥有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核力量，世界最强大的空军、海军和独一无二的全球打击能力，使美国能同时赢得“一个半战争”。

新罗马帝国要建立无与伦比的强大军事力量，控制地球上的重要战略地区，其最终目的是什么？新保守派和鹰派精于计算，他们有的并不仅仅是狂热，而是丰富的市场经济经验，他们深谙经济运行规律。因此，所有这些军事上的巨大代价和冒险行为，结果都要在经济上体现出来。新罗马帝国军事计划的

直接经济目标就是要保证美元的霸权。

在《新世纪重建美国国防：战略、军队和资源》报告中，鹰派们指出：

> “必须使美国能够继续保持对欧洲、日本、中国等国家大规模的贸易赤字，用美元购买全世界的资源。”

新罗马帝国计划如此重视美元的地位，奥妙何在？这要从作为最强大的储备货币可以得到的好处说起。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在纸币产生之初，货币就可以把皇宫内部或者政府的财政危机转嫁出去，使皇宫或者政府自身的透支转化为让每个国民承担的通货膨胀。



在国际金融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国际储备货币同样可以把发生在货币发行国内的税收、财政危机转嫁到外国老百姓头上。

不但如此，在本国资本过剩、金融衍生品过剩的时候，货币发行国还可以利用本国货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转移到外部去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在国外发行本国货币来发展经济，或者掠夺别国财富来抑制本国资本过剩造成的国内通货膨胀。

因此，在当今世界上，主要资本经济大国都想把自己的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以此来减少自己国家的风险，保持和提高其经济实力。

美元的霸权地位除了能解决美国国内随时出现的经济失衡等结构问题外，它还能使源源不断的外国商品以掠夺性的低价格流入美国，并以此来维持美国的繁荣。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元的霸权地位，是美国经济霸权乃至政治霸权的重要实现手段。

香港《亚洲时报》曾经刊登文章认为，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美国没有任何突出的生产力繁荣，但是有一种进口繁荣。这种繁荣不是由美国经济的惊人增长所推动，而是由生产这些财富的低收入国家借给美国的债务所推动的。更直白地说，使美国现在政治霸权成为可能的经济繁荣，是由长期处于低生活水平并深陷于出口附庸位置的国家“进贡”所维持的：

> “世界贸易成了一场围绕美元展开的游戏。一方面美国生产美元，另一方面其他国家生产用美元买的产品。世界经济不再是互相竞争取得商业优势，而是大家纷纷追求出口以换取美元来支付外债并保持自己货币的稳定。各央行不得不保持一定的美元储备来防止本国货币的贬值。市场压力越大，要求的美元就越多。这样无形中支持了美元的强势，而反过来这一强势又吸引大家争抢更多的美元，进一步又巩固了美元的地位。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美元霸权。重要的商品，特别是石油，都用美元标价。美国要付出的代价是对美元的回收。”
>
> “美元天然上要投资于美国的固定资产，这为美国经济制造了固定资产账户上的盈余。尽管经过了一年的调整期，美国股市仍然保持近25年来的最高点，股票以56%的溢价率交易着。”
>
> “……美国固定资产账户的盈余又可以补偿其贸易赤字。另外，以美元为价格标准的任何固定资产，实质上成了美国的资产。当通过美国的国家行为使美元成为石油的价格标准和交易标准货币时，美国实际上无偿地占有了世界的石油资源。而且美国印的钞票越多，美国的资产价格就越高。这样强硬的美元政策



为美国带来了双倍的好处。”

最后，美元霸权也是美国处于越来越自由化的国际金融市场金字塔顶端的保证，这一地位使美国可以随时运用艰深复杂的金融工具，宰割“肥羊”，文明抢劫其他国家的发展成果。

当前全世界约有美元资金23万亿，占世界金融资产总量的60%，占各国外汇储备的70%。由于掌握着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市场、最先进金融手段和运作经验以及市场经济基础上最多的信息，美国经济总是能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巧取豪夺。下面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历史：

1992年，美国以索罗斯的“民间基金”狙击英磅和里拉，不动声色地巧妙离析本来试图挑战美元霸权地位的欧洲货币联盟，不但使英国和意大利损失了数十亿美元，并且使欧元诞生的日期不得不延后。



1994年，来自美国的投机资本再次洗劫南美，使南美多年发展的成就一大部分被美国人收入囊中，许多国家因此陷入外债的泥潭，失去了经济发展的良机。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来自美国的投机公司以1:130的杠杆比率，向国际大银行拆借上千亿以上的美元，撬动上万亿美元以上的投机活动。由于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开放了资本市场，东南亚四小龙、四小虎十几年辛勤积累的财富，被远远大于其国力的全球游离资本炒作，短短几个月，上千亿美元被席卷而去。

这些国家和地区本来可以用于工业转型和纵深开发的资金一下子为之一空，最终美梦成空，神话不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同时还彻底拆解了日元对美元的威胁，使“21世纪是亚洲世纪”的信念基本破灭，再也很少有人提起。

1997—1998年，来自美国的金融资本再次闪击俄罗斯，并

同时突袭香港、谋划登陆中国。金融危机把刚有复苏迹象的俄罗斯经济再次推向深渊，众多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爆富起来的“俄罗斯新贵”都未能幸免，财富遭到洗劫。

只是在中国大陆的预先防范和强力支持下，美国的金融投机资本洗劫香港的计划才没有得逞。

发展固有先后。美国在金融市场上的遥遥领先地位一时无法根本改变，如果放任自由是惟一的原则，则“信息不对称”必将使美国继续在这个领域里弱肉强食，随时洗劫他国的财富。也是因为如此，许多国家呼吁加强对投机资本的监管并限制其发展，但由于大部分基金是美国的，美国态度不积极，其他国家就无法有效实施。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美国一些大财团的支持下，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等开始在全球金融界兴风作浪，客观上对别国经济造成破坏，促使更多的资金流入美国。其中一大部分支撑了华尔街股市的上涨，为美国的科技、经济发展输送血液。



因此，新罗马帝国战略的制定者认为，只要做到如下几点：1. 拥有强大的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控制世界上能源丰富的地区和战略要地。2. 保持美元霸权，使美元能够继续购买全世界的资源，新罗马帝国就能梦幻成真，美国的霸权和霸权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就会相互促进，互相维持，长时间地延续下去。

三、最好的时机

但现在，美元的霸权地位却面临着欧元的严峻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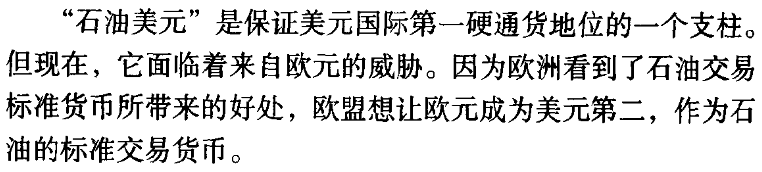
这首先是因为美国自身经济已经处于明显的失衡状态，当前美国的贸易赤字已达国内生产总值的5%，还有数千亿美元

的新增年度财政赤字。按以前的规律，这些因素已经足以使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甚至引发货币危机。

而最紧迫的挑战来自石油贸易。几十年来，在全球石油贸易中，美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英国的北海油田，到拉美的委内瑞拉，再到中东的产油国，几乎所有石油交易都把美元作为标准交易货币。美国印出数千亿美元的钞票供其各州从欧佩克手中购买石油和其他能源。

这些掌握在沙特等产油大国手里的美元，被称为“石油美元”。“石油美元”并不存放在这些国家，而是通过购买美国发行的债券以及其他形式投资，如股票、房地产等等，又回到美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石油美元”实质上为美国经济提供了一种补贴。





“石油美元”是保证美元国际第一硬通货地位的一个支柱。但现在，它面临着来自欧元的威胁。因为欧洲看到了石油交易标准货币所带来的好处，欧盟想让欧元成为美元第二，作为石油的标准交易货币。

2002 同年 4 月，欧佩克汽油市场分析部的总裁贾瓦德·雅贾尼先生访问西班牙时发表了一个演讲，提出欧佩克石油交易标准货币可否向欧元转换的问题：

> “从欧盟方面来说，非常愿意看到石油交易标准货币从美元向欧元过渡，这将降低欧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风险，同时会增加对欧元的需求，从而使欧元升值。最终它还会促进全球对欧元的接受程度。”
>
> “欧元是否能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确立自己的地位，挑战美元的统治地位，进而改变美元在石油市场的垄断？”



令美国智囊们心惊的是美元的命运



这并不是一个遥遥无期的预言，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实。因为欧佩克成员国中，已经有三个成员已经完全或部分采取了这一做法。伊拉克已经抛弃了美元，采用欧元；伊朗宣布要采取同样的步骤；委内瑞拉则与许多国家签订以货易货的石油交易，并有可能选择欧元作为石油交易货币。

虽然此时，美国的经济依然强大，没有敌手，但这些被美国媒体有意忽略的新闻，却使新保守主义者和鹰派忧心忡忡。

"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个普通人的喻世明言，也被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人物奉为圭臬。

自从欧洲开创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以来，地区性强国和霸权都希望利用自认为是最有利的时机来行动，这个最有利的时机可能稍纵即逝，所以对它的判断直接关系到战略行动的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在 1939 年爆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特勒认为 1939 年是德国相对于英法和苏俄来说最强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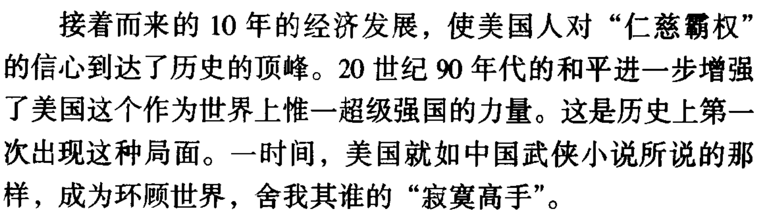
一个时期，等到1945年，英国和法国的力量就能足以抗衡德国，苏俄也会从整肃中恢复力量。

美国鹰派选择了新世纪的开端主动出击，发动伊拉克战争，也是出于这一判断，那就是当前是美国出击的最好时机。

苏联的突然解体完全出乎美国的意料，在这之前，没有人敢相信遏制政策鼻祖乔治·凯南在1945年的预测：有朝一日，强大的苏联会从内部分崩离析，由最强转为最弱。也没有人相信尼克松总统在他退休后的著作《1999，不战而胜》中对苏联即将崩溃的命运的分析。

正是因为出乎意料，美国决策层在忙于应付一连串随之而来的事件之外，并没有敢立即做出战略性的决定，利用苏联崩溃后的地缘政治真空，在全球推进美国的战略。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适可而止，没有把萨达姆赶下台，就是这样一种心态的反映。





接着而来的10年的经济发展，使美国人对“仁慈霸权”的信心到达了历史的顶峰。20世纪90年代的和平进一步增强了美国这个作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强国的力量。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局面。一时间，美国就如中国武侠小说所说的那样，成为环顾世界，舍我其谁的“寂寞高手”。

战争所产生的红利可能集中在战胜国一方，和平的红利则可能会泽被世界各国，10年的和平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发展。中国、欧洲、俄罗斯、印度，或者是全力追赶，或者在经济上直逼美国。

令美国哭笑不得的事情是，苏联的解体给美国带来了胜利，但同时也带来了多极化的势头，欧洲和日本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顾全美国的大局，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的发展也显示出新的力量中心正在勃发。

多极化成为欧洲、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外交政策的主

要目标。自从美国参与国际事务以来，美国就从来没有心甘情愿地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而一旦成为霸权之后，美国需要的是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而不是多极化下各国互相尊重和制约的世界和平。

如何在多极化还在发轫的时候，将其隔断？

这或多或少地让美国鹰派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他们认为，当时的法国和英国没有充分利用战争的胜利，把德国再次崛起的潜力统统钳制住，从而放虎归山，使德国很快在经济上崛起，并超过了法国和英国，最后再次要求与英国和法国重新分配世界的殖民地。

鹰派认为，如果美国不能在经济上一如既往地超越竞争对手，就很难保证类似的局面不会出现。欧盟、中国、俄罗斯等正在壮大起来的力量，在国际制度构造的过程中，必然要使之能够更加符合本国的意愿，这无疑是对美国霸权的威胁。



现在，在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美元的地位也受到了威胁，美国鹰派们更有理由这样担心了。在鹰派们看来，最危险的时候也是最应该采取行动的时候。就美国本身来说，10 年繁荣所积累的财富现在正处于顶点，军事力量也无所匹敌。借用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一句话说：

> “如果放着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使用的话，那要这些力量又有什么用呢？”

鹰派认为，当前世界多极化还只是潮流，没有形成稳定的结构。此时，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主动出击，可以瓦解可能的对手，分化可能的联盟。因此，现在是采取断然措施，及时阻止美国霸权衰落，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好时机。从前和以后，美国都没有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能让其去放手一搏。

第六章 当代“珍珠港”事件



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就等一个“珍珠港”那样的事件发生。最后，如美国鹰派所希望的那样，“9·11”事件适时地发生了。



也就是因为这一原因，有人甚至开玩笑说，“9·11”事件可能是美国人自己干的，也有人指责说，布什政府忽略了袭击前所得到的有关情报。

一、“9·11”袭击事件与民意

纽约曼哈顿世界贸易中心是20世纪70年代建的摩天大楼，当时造价11亿美元，是美国式繁荣的象征，来自世界各地的1200多家企业驻扎在这里，有5万人在这里上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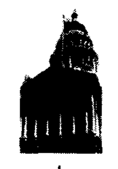
“9·11”恐怖袭击导致近3000人丧生，这是1812年美英战争以来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的外来打击。恐怖袭击给美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255亿美元，间接导致股市缩水4万亿美元，消费需求损失1600亿美元。美国经济活动的2/3以上依赖

于消费开支，这使美国本来被掩盖的经济衰退，骤然水落石出。

袭击事件发生后，投资者对美元长期走势看跌，大量投资开始撤离美国。债券市场是利润最小的市场，主要是长线投资者参与，他们是最坚定而理性的投资者，然而这些投资者也大量撤离美国，这表明美国市场最底层的基础开始动摇。剩下的投资者不是短线客，就是投机者，这种趋势如果维持下去，美国资本市场必然危机四伏。

还有更深的政治后果。世贸大厦是美国资本主义、"西方现代文明"的骄傲，它深处美国本土，却遭受如此灭顶之灾。美国霸权的支柱之一——高科技，可以被恐怖主义分子现成利用，成为反对美国霸权和全球资本统治的手段。

美国曾经依靠高科技和高成本，在 1991 年的海湾战争中基本实现了"零伤亡"。在那场中等规模的战争中，伊拉克伤亡 3 万多人，美国只有 148 人阵亡，但是美国军费支出达 600 亿美元。



如果按照海湾战争中美国士兵阵亡人数的标准，这次恐怖主义分子也基本做到了"零伤亡"，不但几乎没有成本，而且本·拉登的金融网络反而利用这一早就策划好的袭击，从各种投资市场上大大地赚了一笔。如果按照"成本收益"规律，恐怖分子的效率真是无可比拟。恐怖分子一不要命，二不遵守"国际惯例"，这样一来，弱者马上就变成了强者。

当高科技不再为西方文明所独占，而被其他文明利用，或者像西方主流舆论所说，被"反文明的野蛮势力"所利用，就足以置西方文明于十分狼狈的境地。

由此发出的疑问是，他们为什么这么痛恨美国？美国的价值观念是否适应于整个世界？美国的"全球化"准则是否能够在全世界普遍实行？这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在

给予美国同情、谴责恐怖主义的同时，脑子里思索的一些问题。他们大部分私下或者公开地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出了问题。

一些伊斯兰国家老百姓的反应，更真实地呈现出让美国人难以理解的事实：巴基斯坦的老百姓居然不惜使用武力与本国政府抗争，反对政府支持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也举行了类似的抗议。在中东、非洲、美洲、亚洲，凡是贫穷或者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老百姓，都普遍表达了一种美国“罪有应得”的情绪。

即使在发达的国家与地区，在谴责暴力的同时，60%以上的民众仍然认为：美国的中东政策出问题了！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其名著《大外交》中写道：



> “与多灾多难的欧洲旧大陆和古老的亚洲相比，美国就像一个身体强壮、对未来富于幻想的小伙子，经历的历史苦难较少。也许正是因为如此，美国人也更相信自己身边的事情，对身边的死亡更为敏感。”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虽然世界上每年死于战乱的平民数以万计，但这不会引起美国人多少伤痛，所以美国人在为“9·11”死难者哀悼的时候，一些贫穷或战乱国家的平民也没有多少真正的悲痛。

而在惟一一个没有表示同情美国的国家伊拉克，当地人谈论起“9·11”事件时如此轻描淡写。他们说，“9·11”事件不就死了几千人吗？而制裁伊拉克导致了160万人死亡，这不是恐怖事件吗？

美国人对此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和美国人一起悲痛，为什么他们如此冷漠？

美国本应该在打击肇事者的同时也反省自身，但遗憾的是，“以牙还牙”的呼声淹没了所有反省的可能。

就一般美国民众而言，要真正全面了解“9·11”袭击背后的复杂原因是很困难的。在美国媒体众口一词的宣传下，多数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事件的主要原因在于外部存在“邪恶势力”。

如同美国保守派期盼的那样，“9·11”袭击事件如同日本人袭击珍珠港一样，微妙地改变了美国民众的心理，使美国鹰派的立场得到更多的支持。

2002年1月29日，布什总统发表了他上任以来的第一个国情咨文，目标指向所谓的“邪恶轴心”。和170多年来美国历任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不同的是，布什这篇国情咨文以向一个在阿富汗牺牲的美军海军陆战队员的妻子作出承诺开始：



> 上个月，我们为在马扎里沙里夫牺牲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海军陆战队员米歇尔举行了葬礼，他的妻子香农·斯潘用海军陆战队的座右铭来告别她的爱人：“永远忠诚。”今晚，香农也在这里和我们在一起。
>
> 香农，我向你以及所有永失我爱的人们保证，我们的目标是伸张正义，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对米歇尔以及所有为自由奉献生命者所欠下的债。

这篇国情咨文据说是由布什的形象顾问和文笔班子精心谋篇布局的，开头可谓别具一格，委婉动人，但其后面的内容却充满火药味。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指责朝鲜、伊朗、伊拉克等国是“邪恶轴心”，在威胁着美国和世界的安全，导致了美国公民的死亡，要求美国以此为契机，重振道德旗帜：

> 我们中没有人希望发生“9·11”恐怖袭击，但在

美国遇袭之后，我们整个国家仿佛站到了镜子前，更好地看清了自己。我们意识到，作为公民，我们对彼此、对我们的国家和历史都负有责任。我们不再看重积累物质财富，而是看重如何积德施善。

我们有句老话："如果感觉好，那就做吧。"现在，美国要遵循的信条是："让我们开始冲吧。"

"我们要成为一个追求超越自我目标的国家。我们获得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我们不能让这个时刻从指缝中溜走。"

"通过这个事件，我们认识到，接下来的十年将是人类自由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十年，而历史也赋予了我们这样的使命。这个世界面临如此清晰而重大的选择，这在历史上是很少有的。"



二、反恐战略与霸权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新保守主义和鹰派的雄心很快就变成了美国的国家战略，连接二者之间的桥梁就是反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在美苏冷战时期，历届美国总统均选择"威慑"加"遏制"战略。西方专家普遍认为，二次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之所以没有发生新的世界大战，"威慑"加"遏制"战略明显起了作用。

而鹰派则认为，这个冷战时期的战略已经过时，今后美国必须选择新的战略才能确保美国的安全和在世界上的优势。布什上台之初，鹰派就开始为布什班底酝酿新的军事和全球战略。"9·11"事件使先发制人战略得以顺利出台。

据1986年通过的《戈德华特—尼古拉斯国防部调整法》

第603款的规定，美国总统应向国会提交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说明其安全外交的总体战略。在为"先发制人"战略进行了浓墨重彩的造势之后，2002年9月20日，布什政府公布了他的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简称《报告》）。

在宣布新战略的时候，布什表示：

> "9·11"事件表明，对于若隐若现的恐怖主义组织，用传统的"毁灭性报复"去威慑它们根本不起作用；对于失去理性的"无赖国家"，一旦它们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要遏制它们使用或扩散这些武器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当今美国面临的敌人已经"无法用遏制政策对付了"。
>
> 过去的敌人需要具有相当的军事和工业实力才能威胁美国的利益，现在许多秘密组织可以用非常小的代价就给美国造成巨大的混乱和痛苦。如果坐等恐怖组织发动袭击后再作出反应，那就为时太晚了。



因此，美国必须改变其在冷战时期奉行的"遏制性军事策略"，取而代之的是对那些阴谋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分子和国家采取"先发制人"手段进行打击。

这样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明确规定的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原则就被抛弃了。

《报告》说，为了防止恐怖分子对美国进行袭击，美军有可能会单独采取行动，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今后，美军也将进行重大改革，以保证美国的利益"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受到威胁"。布什强调，美军必须要强大到"任何潜在敌对国家都无法赶超的地位"。

新战略报告认为，搞好大国关系是重要保障。《报告》称，

"将通过建立大国间的良好关系来维护和平"，但报告同时指出，要促使这些大国和力量中心向美国所需要的方向转变。实质是要维护目前美国对其他大国的绝对优势，并在此前提下同后者"合作"和"建立良好关系"。

《报告》把欧亚盟国和俄、印、中列为"全球力量中心"，继续重申美国加强同欧亚盟国关系的重要性，还强调在新形势下重视志愿者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的作用，以弥补军事同盟的不足。

似乎一切只是为了反恐，其实不然。就像冷战时期苏联一直是美国战略报告中的敌手，同时也是美国控制盟国、维持自己在西方世界霸权的一个砝码一样，美国联合其他各国反恐，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这些力量中心成为挑战美国的力量，美国将在反恐的战略下，对这些力量中心进行分治和瓦解，或打乱其绕开美国互相结盟的进程，或使其依附于美国。反恐舞台上真正上演的是一曲新罗马帝国的雄心。



虽然《报告》没有明确提出"新帝国"等字样，但它指出：

> "美国在世界上拥有前所未有和无与伦比的实力和影响"，"将维护美国在全世界不可挑战的领导地位"。

这等于是说，世界各国不能向美国霸权挑战。美国乔治城大学地缘政治和全球司法教授 G. 约翰·伊肯伯里评价《报告》说，布什政府推出了以单边主义为核心的新帝国战略，其内容包括维护单极世界，彻底消灭恐怖主义，实施先发制人，裁定别国主权，轻视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和国际准则等。

在美国咄咄逼人的敦促下，日本对美国的新战略基本持支

持态度，欧洲则满腹疑虑，但由于一时还看不透新罗马帝国的野心究竟只是存在于鹰派的思想里，还是会最终表现到美国的行动上，因此还是表示了支持。

俄罗斯地缘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杜金这么描述欧洲对新罗马帝国战略的无奈：

> "欧洲又成了听话的角色，准备支持美国借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进行的地缘政治进攻。美国轻易找到了取代'苏联威胁'的说法，以维持其一手遮天的北约机构。敌人有了明确的轮廓，所以建立自己的欧洲安全体系的计划也就无限期地拖下来了。"



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则保持着礼貌的缄默，以观察未来事态的发展。

"9·11"事件给了鹰派一个梦寐以求的"珍珠港"事件，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顺利出台，接下来就是伊拉克战争，这是美国鹰派早就打算好的步骤。

据参与者称，武力推翻萨达姆具有某种特别背景：美国政府内部多年来一直有人主张赶走萨达姆，这次可以乘"9·11"事件之机将伊拉克推到"反恐战争最前沿"。《华盛顿邮报》2003年1月12日在头版发表文章，再现了本书开头所描述的发生在白宫里的伊拉克战争决策过程：

> 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第六天，也就是2001年9月17日，布什签署了一份如何对阿富汗开展军事行动方案的绝密文件，同时，这份文件也要求五角大楼认真研究军事入侵伊拉克可能采用的各种作

战方案，“倒萨”因此提到了美国的议事日程上。

由于上述战略的制定完全在秘密中进行，因此美国公众一直不了解美国对伊拉克的“原则”，也不知道政府对萨达姆的“底线”。布什政府将伊拉克放在反恐战争的“核心部分”，但并没有完整的文件或是重要会议纪录能显示美国的“倒萨”决定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

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当时这样评论“9·11”事件之后鹰派得以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美国：



> 美国鹰派终于在21世纪按照自己的思想来让全世界变得更加符合美国的口味。鹰派时代可能已经到来。可怜的鹰派们，他们曾经被美国总统们搞得如此沮丧，而且还不光是像克林顿和卡特这样的民主党软蛋总统。
>
> 然而，本·拉登帮了鹰派一个忙，使他们把美国民族主义动员起来，支持他们的纲领，即美国能够在世界上为所欲为，因为美国是自由的国土，是惟一真正自由的国土。
>
> 看来，鹰派将要全力以赴。美国政府正在从1972年核武器条约中退出。根据副总统切尼的明确警告，美国政府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拉克开战。美国政府已经抛掉了它在以巴纠纷中不偏不倚的所有伪装。此外，美国政府正在对世界各国软硬兼施，力图确保对它的决定不出现严重的不同意见。

不止是沃勒斯坦看透了鹰派在美国得势后的庞大野心，民主党人中间也有不少人担心布什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最后伤害

的可能是美国自身。前副总统戈尔的一位顾问利昂·福斯认为，布什的《报告》中提出要主导世界，而实际上美国无法承担所需的费用，布什政府在实践中将面临真正的考验。

"夏虫不可语冰"，此时此刻，任何人的任何劝谏已无济于事，对那些和平主义者或者希望美国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解决国际问题的人来说，向当时的鹰派和布什政府进言，实在是浪费唇舌，自讨没趣。



第七章
预先设计的帝国之战



于是，伊拉克战争打响了。



就像好莱坞大片中无数次出现的画面一样，依然又是美丽的军港，大兵与妻子离别；依然又是在蓝天白云下，总统和军队领导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依然又是华尔街西装革履的精英们，在股票交易的大厅里看着电视屏幕上的胜利镜头，优雅地鼓掌。

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和妻子深情的拥抱被美国报纸搬上了头条，这是多么感人的天伦之乐。但就在几十小时之后，这些刚刚和爱人、朋友依依惜别的美国士兵控制的精确制导炸弹，就摧毁了别人的家园，别人的朋友、妻子，别人的天伦之乐。

一、被盗用的名义

当巴格达市中心的萨达姆雕像被美军的装甲车拉倒时，美国媒体把这一幕与当年莫斯科人推倒苏联情报之父捷尔仁斯基的雕像相比，还有的媒体将萨达姆的雕像与当年在东欧各国被

推倒和砸碎的数不清的列宁雕像相类比。

而萨达姆的民兵和敢死队则被比喻为在罗马尼亚政权摇摇欲坠时齐奥塞斯库的安全部队。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则说，巴格达的情景让他想起了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

美国媒体放大了嗓门，欢呼美军占领伊拉克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是“人权”的胜利。真实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



伊拉克人不相信美国的宣传，不愿意美国以“为了伊拉克人民”的名义发动战争



首先，美军中央司令部和美国政府从来也不解释，在伊拉克战争中伊拉克平民的无辜殒命该算在谁的头上？据阿根廷《号角报》披露，美英联军攻击伊拉克时可能有5000至7000名平民被杀害，整个战争期间残废的平民可能高达上万人。他们的伤痛将怎么样去弥补？难道因为萨达姆，这些平民就理所当然被误伤、误杀？

被美国人普遍忽略的伊拉克人的流血和死亡也在被许多理由解释着。这些信誓旦旦的解释使伊拉克战争多了两个无辜的直接受害者：它们分别叫作上帝和世界和平。它们的名义被美国海军陆战队盗用了。

最根本的，也是植入美国老百姓血液深处的一个信念是，美国政府从事的是惟一正义的事业，美国海军陆战队所从事的是上帝让美国人去做的事情，但显然最有资格做上帝代言人的教皇保罗二世却没有赞同美国人的事业。

布什总统发表演说时，每次提到“自由”这个词，总是用一种凝重的口吻和嗓音，配上双眉微锁的面容，仿佛是在宣布开天辟地。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演说中谈到民族和解问题时曾经这么说道：



> 今年秋天，在白宫，在由希拉里主办的一次世纪末的晚宴上，一位人类遗传基因工程的杰出科学家告诉我们，从基因上来说，我们所有的人，不管任何人种，有99.9%是相同的。

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也告诉世界“人生来是平等的”，人类应该自由、平等、博爱。1776年，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美国《独立宣言》也以政治纲领的形式提出，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他们享有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生存自由、追求幸福。

但是，就是这样十分珍视生命的国家的士兵，却向载着伊拉克妇女和儿童的车辆开枪。伊拉克战场上频频出现妇女和儿童被杀死的惨景，许多孩子留下了终生的残疾，他们的未来不得而知，更不被只关心战场胜利的美国人所理睬。

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在答复记者的质问时，竟公然声称，美军的行动“完全正确”。一时间舆论哗然。

在伊拉克这片土地上，在世界最早的文明之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源地上，镌刻在黑色玄武岩石柱上的《汉谟拉比法典》依然不朽，但土地上的人却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猛烈的轰炸。

在著名的反战电影《现代启示录》中，一个美国新兵在越南战场陷入恐惧和迷茫，最终完成了心理转换，逐渐成为了杀人机器，而一位喜欢冲浪的上校则把屠杀越南平民变成自己的陆上“冲浪”。

正如这部电影所表现的，所有在战场上的美军士兵都要经过一次血淋淋的心理转换，从而为到别的国家的领土上射杀“敌人”甚至是妇女儿童找到一个自我安慰的理由。对美国人来说，这个理由之一是恢复伊拉克人的“人权和自由”。



果真是这样吗？答案当然是不。

当年反拿破仑革命的急先锋、“全欧洲贵族，联合起来”的倡导者、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曾经有这样的名言：

> “理所当然之事经大肆宣扬，反而会失去其应有的力量，欲将客观存在之事物当作立法的对象，其结果是欲保障之事物反受束缚。”

他的意思是说，人们能否享受自由权利，享受多少自由权利，是由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关系决定的，宣言不过是一纸空文。在他看来，拿破仑大帝把《人权宣言》与《拿破仑法典》的原则强加给整个欧洲，无非是利用它们去争取民心，最终的目的是为帝国的扩张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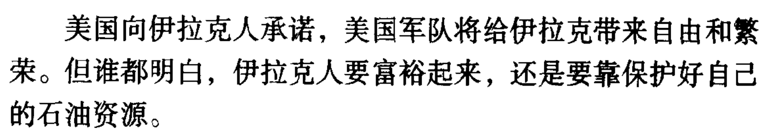
这也正是美国政府“人权、自由”大旗之后的秘密，虽然

简单，但不容易看穿。美国政府和媒体将人权炒作得震天响，摆出一付替天行道的架势，但他们却首先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讳莫如深。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欧洲、亚洲等地倡导“民主、自由”，反对殖民统治，但却将西半球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许其他国家涉足；美国当年赶杀印地安人，并认为这是文明的使命；美国不会给予国内的土著民族印地安人、黑人及其他一切非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的美国人以真实的平等待遇；在全世界所有地方的美国公司里，如果没有绿卡，即使干着同样的工作，薪水也可能只是美国公民的十分之一。

对这些过去和现在，美国人一直保持着一致而惊人的沉默。如同梅特涅评价拿破仑一样，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所举的几杆大旗，真实目的是为了掩盖美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真相，并刻意瓦解伊拉克的民族凝聚力，搞乱萨达姆的阵脚，乱中取胜。





美国向伊拉克人承诺，美国军队将给伊拉克带来自由和繁荣。但谁都明白，伊拉克人要富裕起来，还是要靠保护好自己的石油资源。

即使退一步说，美国这个理由成立，那结论岂不是全世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比美国生活水平低的国家都可以因此接受美国的占领，随后由美国扶植一个政府？然后，这些国家就像美国一样繁荣。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使让美国人去做，美国人也不愿意。历届美国总统，包括布什和他的幕僚们比任何人都认为，世界上有限的资源只能让一部分人维持着奢侈的能源消费。一些美国人甚至指出，在当今的发展程度下，如果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和美国人一样生活，地球资源是无法承受的，“这个世界将不堪想像”。

另外一个理由是伊拉克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积攒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危险。但最有发言权的联合国监核会主席、瑞典人布利克斯可不这样认为，在美国一心要联合国配合其表演时，他一句“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让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只能在旁边干瞪眼睛。

到2003年7月20日，美军在伊拉克挨家挨户地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3个多月了，他们基本上已经找遍了整个伊拉克，并因搜查民宅而引起当地民众开枪还击，但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现。

担负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重任的另一支重要队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已经开始抱怨说，布什政府给的压力太大。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2003年5月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的讲话中提出了现在已广为人知的看法：伊拉克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永远也发现不了”。



拉姆斯菲尔德说，可能伊拉克人“在战争开始之前”就销毁了它们。由于美、英把伊拉克战争的最主要理由都归结为这些武器将会给他们造成威胁，所以，拉姆斯菲尔德的这番话实在是不打自招，那就是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根本就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但现在，美国公众似乎是忽略了这个美国道德上的巨大瑕疵。

在没有被新罗马帝国幻想麻醉的英国，首相布莱尔立即陷入了麻烦。在英国的政治体制下，“误导”国会是一个大罪，由于拉姆斯菲尔德的讲话，导致布莱尔为此遭到严厉抨击，并受到一定的调查。

日本的小泉政府也面临着同样的指责，因为他在没有弄清楚伊拉克是否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前就表态支持美国。

在战争刚刚结束时，全世界似乎已经忘记了要求美国出示

出兵的证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一切尘埃落定之后，美国还是要面对这一关系到胜利合法性的根本性问题——伊拉克是否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因此，美军依然要在伊拉克的每一个城市寻找这些道德的依据，但结果可能是令人失望的。美国可以指出，萨达姆已经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藏了起来，或者运送到了别的国家，这个道德的根据将无法找到，但它是存在的！可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可能并不像美国老百姓那样相信五角大楼发言人的话。

布什政府还指责说，萨达姆是一个威胁世界和平的邪恶暴君，是一个疯狂的人，越早干掉他，就越有可能阻止他造成破坏。包括不少伊拉克人在内，他们或许同意萨达姆是一个暴君，但要说他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危险，相信的人恐怕没有几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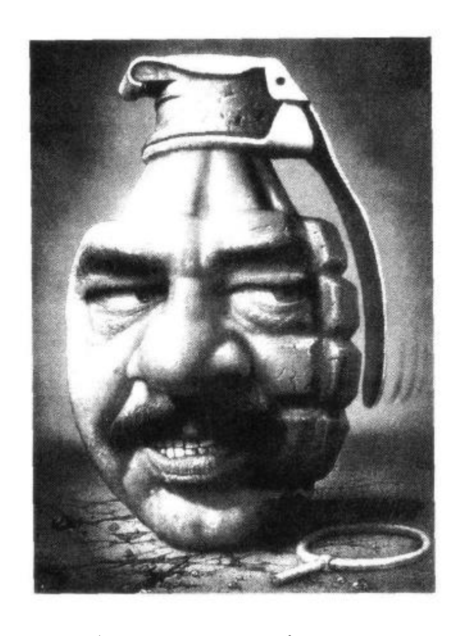


关于萨达姆的疯狂，有许多故事，其中有这样一个传说：

> 萨达姆在年轻的时候就不是一个善茬，他常常奔跑在提克里特的山丘上，对养育他的家乡发誓，一定不走寻常路，要做一个不平凡的人。
>
>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在高山之巅，就在幽谷之底，但绝不会一马平川”。

这个传说和萨达姆本人的许多性格一起，被看作是萨达姆可能不会停止折腾美国人的根据之一。但事实是什么样的呢?

在1991年海湾战争失败之后，萨达姆已经被解除了主要武装。萨达姆本人也更加谨慎，不希望再次开罪美国，惹来杀身之祸。大多数人把他看作是地缘政治游戏的一个“谨慎的棋手”，几乎所有国家都认为，萨达姆对世界和平和美国的威胁没有布什从赖斯那里听到的那么大。



“不在高山之巅，就在幽谷之底，
但绝不会一马平川”



说到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的联系，更缺乏可信度。伊拉克可能与基地组织在战术层面上有一点无关紧要的接触，但密切程度远不及美国政府过去和本·拉登的联系。

实际上，萨达姆和本·拉登是信仰激烈冲突的两方，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本·拉登认为萨达姆是叛教者，他们之间的仇恨与敌对和本·拉登对美国的仇恨程度差不多。

如果了解这些，人们就不难看出，美国政府对萨达姆的这些指控都是宣传。

美国人指出，萨达姆在 12 年里蔑视了 16 个联合国的决议，这些决议警告他“全部并且立即”解除武装，不要错过

"最后的机会"，否则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美国经常给伊拉克扣上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的帽子，但如果它的盟友违反了联合国决议，结果又会如何呢？美国旧金山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文研究指出：

在过去的25年之中，以色列共32次忽视或违反安理会决议，而且并没有因为违反这些决议而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惩罚。

二、帝国战略中的战争



在许多国家都认为美国企图独自控制世界的时候，不少美国人可能都会像美国防部信息研究中心主任布鲁斯·布莱尔博士一样这么辩解：

美国确实事实上已经拥有"霸主"地位，但是，也许是我太天真或是理想主义，反正我看不到美国有一个战略去阴谋控制全世界，建立美国霸权。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很难想像自己的国家像希特勒一样思考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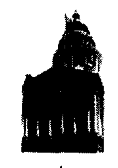
这样的辩解真让人叹服：美国人的世故和天真总是调和得那么恰到好处！已经不需要去辩论来给这场战争定性了。在美国的霸权战略中，伊拉克战争是无法避免的。那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对美国霸权有什么好处呢？要说清楚这一点，必须回顾一下历史。

美国生于战火之中，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就是在被英军

舰船一夜炮击后而诞生的。20世纪以前，美国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如：征伐印地安人的战争、对英战争、美墨战争、美西战争，以及多次的海外殖民战争，都是为美国开疆拓土，使美国获得广袤的土地，这为其日后成为世界大国打下了物质基础。

20世纪以来的历次战争，则一步一步将美国塑造成当今世界的超级霸主。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遭受重创，英、法等老牌帝国辉煌不再。而美国则从列强中的普通一员脱颖而出，并从债务国转化为债权国，使美元代替英镑成为世界核心货币，纽约也成为了世界金融交易中心和国际资本的供应中心。

二战则把美国造就成了独一无二的经济巨无霸。如果把二战前1937年的工业生产指数定为100，战后的1946年，美国的工业指数为150，而其他工业化国家都大幅衰退，英国为88，意大利为72，法国为69，德国为31，日本只有24。美国在西方工业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从战前的42%上升到战后的53.4%。二战后，美国借欧洲萧条之机，主动实施向欧洲进行资本扩张的“欧洲复兴方案”，即“马歇尔计划”，推进了美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



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还及时倡导创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世界金融体系，进一步强化了美元在世界经济中核心货币的地位。产业资本的扩张和对世界金融体系的主导，确立了美国经济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无可争议的中心地位。

纵观美国历史，战争带给美国的多是福音，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有如此的经历。美国也从历次战争中总结出许多独到的经验，这些经验使美国总能利用战争为本国争取最大的利益。美国通过战争获得的好处涉及金融、能源、战略等各方面。

经济好处：从整体上来说，战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无疑是不利的，但也有从中得到好处的国家。这就像在一场瘟疫中，和医疗有关的企业会获得利益一样，战争使整体效益减少的同时，还会带来财富的转移。

战争被赋予经济政策的含义，可以用所谓“破窗理论”来解释：

> 一个顽童打破了邻居的窗户，邻居就得更换新的窗户，于是带动了玻璃工人和木匠就业，而他们又进一步带动了更多原材料提供者就业，整个社会便得以欣欣向荣。



在经济衰退阶段，能够带来类似破窗效应的行为，被人们赋予了带动经济发展的期望。战争，就通常被视为这样一个打破窗户的行为。

美国是最早实行新殖民主义的国家，它通过战争建立亲美政府、让被占领国采取自己的一套标准，或者通过种种名目的援助，把本国经济辐射到对象国，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做法，已经炉火纯青。根据美国的计划，美国在伊拉克将通过建立过渡政府和亲美政府的方法来控制伊拉克战后重建。

在对伊拉克人经济利益产生深远影响的一切问题上，都由美国人拍板。美国将操纵伊拉克的私有化进程。美国对伊拉克未来经济的规划远远超过“重建”范围，美国鹰派钟意的财团将视伊拉克为实践其理想经济模式的处女地：产业私有化（允许外国企业拥有）和完全开放的市场。

大大小小的战后合约都由美国国际发展局（USAID）邀请美国企业竞投，从道路重建、供水系统至分发教科书，无不如此。

美国共和党议员伊萨提出议案，要求国防部在伊拉克建立CDMA移动电话网络，令“美国CDMA专利权持有者受惠”。CDMA由美国高通公司（QUALCOMM）开发，在美国大规模适用。

石油利益早被人们讨论。布什政府不会公开说，将会出卖伊拉克的石油资源给埃克森美孚和壳牌石油公司。他会让伊拉克“新政府”开口，将部分石油业私有化。曾被美国五角大楼钦定为萨达姆继承人的伊拉克反对派领导人沙拉比说，他们早就建议美国将伊拉克资源私有化，布什政府则投桃报李，承诺在“新政府”里给他们留位置。

除了石油，还有供水、道路、铁路、电话网络、港口和医药等。如果真的按照美国的打算去私有化伊拉克，伊拉克将成为全球出卖国家资产比率最高的国家。觊觎伊拉克市场并不稀奇，单单其重建合约总值就高达1000亿美元。



还有一个被人忽视的所谓机会成本。美国人的计算结果是：占领了伊拉克比不占领要花美国纳税人更少的钱。成本核算后，占领伊拉克是最经济的方法。不妨看看2003年4月3日《华尔街日报》刊载的《打伊拉克战争有什么好处》一文所引用的数字：

> 过去12年，美国每年为遏制和空袭伊拉克而投入的军费达130亿美元，未来将增至每年190亿美元。今年65岁的萨达姆如果再活20年（还不说他会在死后把权力交给儿子），那么美国为遏制打击伊拉克还得花3800亿美元，此外维护本土安全还需要2500亿美元，总共得6300亿美元。而这次“倒萨”之战，战争预算是600亿美元，才是遏制和打击伊拉克预算的10%。

这样利润丰厚的生意，美国的资本怎么会不乐意支持?

最令人惊异的要数建立中东自由贸易区了。布什总统2003年5月9日宣布，美国拟在今后10年内与中东各国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以帮助这一地区“实现经济繁荣和永久和平”。

近年来，美国的跨国企业在中东遇到愈来愈大的阻力。这些跨国企业跟主权国家谈判不容易，而“先占领再按心意重建”则容易得多。布什在中东要形成自己的新策略：先轰炸，再私有化，再自由贸易。

建立中东自由贸易区是以色列前总理希蒙·佩雷斯早在1993年就提出的梦想，这一年正是克林顿让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签订《奥斯陆协议》的时候。布什政府如今又提起了这一宏伟的梦想，这再一次向世界表明：美国要通过经济控制在整个中东地区扎根。



打击对手：战争同时也是打击对手的一个好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西欧结成不对等的盟友关系，实际上保障了美国商品在西欧的市场，而苏联则失去了这一块市场，陷于不利地位。伊拉克之所以是美国霸权布局中的棋子，在于它对美国对手们的重要性。

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世界基本上是一超多强的格局。美国希望在21世纪继续加强而不是削弱这种领导地位，但是本世纪刚刚开始，美国延续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繁荣就结束了，公司丑闻不断，美元独霸世界的形势急转直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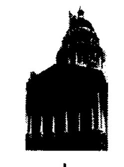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因为欧元的诞生，一个经济上强大的欧盟指日可待。这是美国的一块心病。而且，欧洲要成为独立的欧洲，欧洲的联合使其具备了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分庭抗礼的实力。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伊拉克就是这样一个突破口，

通过伊拉克战争，美国可以阻断，至少是暂时延缓欧盟的上升势头。

伊拉克战争对欧盟来说有三个后果：最直接的是美国公司取代法国和德国公司与伊拉克签订经济合同。战争硬生生地扯断了伊拉克以前所有的经济联系，在过去，美国和伊拉克之间是没有什么合同的，敌意使伊拉克只把合同给俄罗斯、法国、德国等国家。但现在，美国在伊拉克站稳之后，美国的公司将全面接过这些原先属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项目。

二是欧盟的能源来源被美国掌握。如果不包括英国，欧盟国家的石油进口依赖率高达 80% ~ 90%，其中德国最高，达到 98%，对能源进口的高度依赖，是欧盟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软肋。数字显示，伊拉克目前探明的石油蕴藏量约在 1220 亿桶左右，堪称全球第二，而如果强化探勘，其蕴藏量可能会高达 2500 亿桶左右，从而成为真正的世界第一。如果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欧佩克的一部分命运将被美国掌握。



另外，伊拉克被形容为“漂浮在石油大海上的陆地”，其石油开采成本极低，一桶只有 2 美元左右。因此，美国鹰派认为，只要取得了对伊拉克石油的控制权，再加上沙特阿拉伯等亲美产油国的蕴藏量，美国将控制全球原油总量的八成，将实际上取得世界石油的定价权。这将使美国获得打压欧元的能力，当然，日本和中国也是鹰派没有公开说出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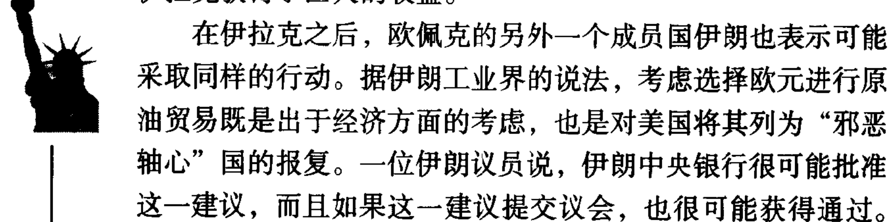
> “这样，它们就会出于对因为失去至关重要的能源供应而被掐死的担心，不敢向我们提出挑战。日本和欧洲国家已经处在这种不堪一击的地位，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将如此；不过，随着中国现在越来越多地依赖来自波斯湾的石油，它也开始处于这种地位。”

三是在欧洲打入分裂的楔子，除英国外，美国又把波兰等一批中、东欧国家拉入伊拉克战争支持者的队伍，并在战后加强了与他们的关系，极力制造所谓新、老欧洲的对立，以分化欧盟，阻挠其一体化的步伐。

维护美元：这是美国新罗马帝国计划中和军事优势同等重要的目标。

这又回到了本书的开头。2001 年 11 月，欧佩克成员国之一的伊拉克决定采用欧元代替美元作为石油贸易的结算货币，并迅速抛弃了美元。2001 年以来，欧元对美元几乎增值了 25%。伊拉克存放在联合国的用于“石油换食品计划”的 100 亿储备金原先是以美元形式保存的。通过这次向欧元的转换，伊拉克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在伊拉克之后，欧佩克的另外一个成员国伊朗也表示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据伊朗工业界的说法，考虑选择欧元进行原油贸易既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是对美国将其列为“邪恶轴心”国的报复。一位伊朗议员说，伊朗中央银行很可能批准这一建议，而且如果这一建议提交议会，也很可能获得通过。2002 年间，伊朗将大部分央行储备换成了欧元。

第三个欧佩克成员国委内瑞拉，也宣称它将像萨达姆在 2001 年 11 月所采取的行动一样，可能向欧元靠拢，并已经和 12 个国家签订了以货易货的贸易协议，美元实际上部分地被放弃了。

这一系列动向对美元霸权来说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征兆。因为欧佩克将来有可能会宣布使用欧元或他们自己的货币作为石油标准交易货币。根据本书开头那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前政府官员的观点，一旦欧佩克突然转向欧元，就会发生下述情况：

> “如此，欧佩克成员国会将他们（中央银行）的美元储备纷纷换成欧元，使美元贬值 20% ~ 40%。这意味着什么？只要想想阿根廷货币危机就知道了。这样，国外资金流出美国股票交易市场和地产市场，像 1930 年一样，账户瘫痪，赤字横生等等。这将和第三世界经济危机没什么两样。”

以上情形产生的后果是：美国将不可能再继续利用其巨大的贸易赤字来保持其经济运行，美国霸权三大支柱中的经济支柱，将不能继续。

如何阻止这一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应该说武力不是惟一的选择，美国完全可以承认美元今不如昔的现实，并与欧盟共同商讨欧元和美元的各自角色，作出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安排。但美国鹰派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无疑是政府出面主动降低美元的尊严，因此，伊拉克战争就成为了最合适的选择。



在伊拉克扶植一个新政权，可以使伊拉克重新回到石油美元的轨道上去。在战后初期，美国就事实上废除了伊拉克当地货币，纵容匪徒抢劫伊拉克中央银行，并用美元给伊拉克公务员发工资。美国可能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伊拉克纳入美元货币圈，会让伊拉克拥有本国的货币未来，但美国完全可以让伊拉克离不开美元的轨道。

占领伊拉克同时也可以警告其他欧佩克成员：如果想投奔欧元，就面临政权更迭。可以肯定的是，推翻萨达姆后美军就可以在波斯湾实现大量、永久性的军事存在，只要没有真正控制伊拉克的石油，没有真正主导中东的政治版图，美军就不会有所谓的“退出”一说。

也正是因为石油美元的重要性，所以继萨达姆之后，挑战

美元地位的伊朗就成为美国的下一个“反恐战争”的对象。

因此，从维护美元的角度来说，伊拉克战争是一场石油货币的战争。美国政府的真正目的是阻止欧佩克将欧元作为标准交易货币的进程。如果可以的话，美国还将要借伊拉克战争尽快地瓦解欧佩克。

萨达姆能避免这场战争吗？简单的回答是不能。

因为美国要的就是与伊拉克开战。无论核查人员说什么，无论安理会其他成员国说什么，当然也无论萨达姆可能会说什么，美国鹰派都不会把其当作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从而停止战争机器的运转。

这就像置身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当中一样，所有结局都已经被事先安排好，只不过，死去的是众多的伊拉克平民。



三、受到鼓励的鹰派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

上面这句常常被人提到的名言，很多时候只是一个哲学概念。当今世界，人再多，如果没有相应的装备，也是没有用的，充其量是活靶子。

从这个角度说，伊拉克战争的结果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在被国际制裁 12 年之后，在伊拉克的武器销毁到再销毁之后，在美国的军事专家们实地考察再实地考察之后，一个军费达 4000 亿美元的国家对军费只有 14 亿美元的国家开战。萨达姆如不接受布什的最后通牒，无异于螳臂当车。

即使是这样，美军的胜利还是值得书写的，因为它是鹰派

和新保守主义者中意的美国军事力量的具体展示，也为美国鹰派“能打人的军事力量才是有效的军事力量”的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

这次伊拉克战争，除了主要依赖高科技控制的远程导弹攻击、空中定点轰炸、灵活机动的快速装甲部队之外，还有美军大批特种部队的加入。在高精确的炮火和空中力量的配合下，特种部队迅速抢占要地，制约了萨达姆回旋的能力。

美军的重大成功是保住了伊拉克的主要油田。

伊拉克共有大约73个油田，1500口油井。如果萨达姆毁掉这些油井，全球油价将会飙升。按照欧佩克主席、卡塔尔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拉亚的战前预测，如果伊拉克有一半油田遭毁坏，全球油价将会从战前的一桶40美元左右飙升到80或100美元一桶。



而一旦全球油价飙升，将对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所有石油进口国的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尤其是日本，它是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最大的赌注之一。日本对中东能源的高依赖性决定美国一旦不能在伊拉克战场上取得速胜，日本将因能源短缺而出现经济危机，其直接后果就是日本市场将无法替美国分担美元贬值的压力，而日本是掌握美元储备最多的国家，这将直接威胁到美元的地位。

战争打响后，美军特种部队迅速抢占了油田要地。在伊拉克南部的600口油井中，只有4口被萨达姆军队放火焚烧，另有5个输油管道遭纵火。伊拉克中、北部的900口油井中，绝大部分也迅速被美军掌握，正是因为美军保住了伊拉克的油田，全球油价不仅没有飙升，反而下跌30%。

在保住油田的同时，美军地面部队迅速进入巴格达，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次美军共投入兵力大约25万，要攻占面积相当于12个

台湾、人口有2400万的整个伊拉克，还要尽量减少平民伤亡，应该说是一场艰难的大战。但出人意料的是，美军以极其小的代价取得了迅速胜利，并只有百名左右军人阵亡（占25万美军的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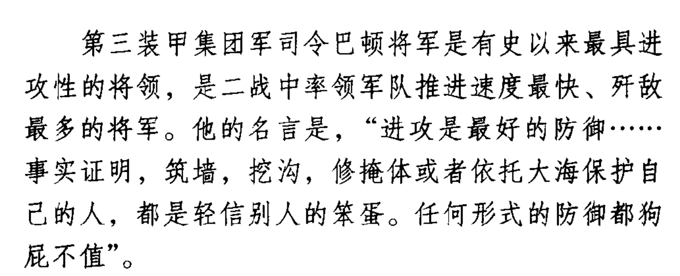
美国军事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以这么小的损失取得这么重大的战绩，是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

战前预定的目标都已基本达到：第一，没有使美军遭到重大伤亡；第二，伊拉克主要油田没有遭到毁坏；第三，尽量避免了众多平民伤亡，美军阵亡率也很低；第四，是战争进行不到三个星期就攻占了首都巴格达。

这一战争的成功激励了华尔街的金融家们，更激励了美国鹰派。



美国名将巴顿将军的孙子、《巴顿们》的作者罗伯特·巴顿在接受CNN采访时强调说，伊拉克战争是他的祖父军事战略思想的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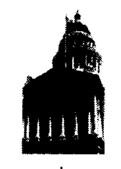


> 第三装甲集团军司令巴顿将军是有史以来最具进攻性的将领，是二战中率领军队推进速度最快、歼敌最多的将军。他的名言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事实证明，筑墙，挖沟，修掩体或者依托大海保护自己的人，都是轻信别人的笨蛋。任何形式的防御都狗屁不值”。
>
> “9·11”事件之后，美国提出先发制人，以主动进攻来进行防御，这正是巴顿在二战中全力推行的战略。

伊拉克战争的迅速胜利似乎证明了巴顿将军“进攻是最好的防御”的正确性，而在鹰派的眼里，则是在证明“先发制

人”的帝国战略的正确性：

> 美国上空每天有约6万架飞机在飞行，以每架100名乘客计算，每天就有600万人飞行在美国空中；美国的港口每天接纳100万个集装箱；美国和墨、加边境，每天有成千上万辆货柜卡车进出；仅一个纽约市，每天就有11万来自全球的游客；还有数不清的各种国际会议、商业往来等等。这样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面对自杀性恐怖袭击，根本是防不胜防的。
>
> 虽然美国成立了新内阁机构“国土安全部”，并采取了很多防范措施，但天长日久，不仅人的警惕性会降低，而且也会消耗大量资金。仅战争打响后纽约为增加警力每个星期就多开支500万美元。因此铲除萨达姆比任何防护美国本土的措施都要安全得多，也更划算。这更证明了“先发制人”战略的眼光。



更重要的是，伊拉克战争同时是向不听美国话的国家发出信号，冷战结束后，在美国成为全球惟一超强的新战略格局下，美国有军事能力、有政治决心、更有“道德勇气”，来铲除那些敢于向美国权威挑战的国家。

2002年11月，布什总统在华沙大学演讲时说，人类绝不应再有“雅尔塔协议”，绝不应再绥靖邪恶。这次对伊拉克开战，就是布什实现这种丘吉尔式诺言的开始。

正如丘吉尔的孙子小丘吉尔撰文所说：

> “今天的联合国和20世纪30年代的国联一样，都是无能的，面对邪恶不采取行动，不承担道义责任；而布什和布莱尔所展示的决断力和精神，证明今

天自由世界的领袖已从丘吉尔那里得到了启示，伊拉克战争绝对是正确的，它将铲除萨达姆这个邪恶政权，解放伊拉克人民，进一步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使美国和世界更加安全。”

人们有理由猜测，美国的鹰派们将被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胜利所鼓励，进行早已经做好铺垫的下一步部署。美国的高级官员，包括国务卿鲍威尔在内都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对国际社会的恐惧予以安抚，表示没有攻击其他国家的计划。

但白宫发言人有另外的说法：

布什总统从来没有允诺放弃武力，只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这个“万不得已的时候”是由美国人自己决定的，这让其他国家的人感到恐惧，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美国人相信自己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四、从阿富汗到朝鲜

鹰派的远大抱负远远不止伊拉克。

2001 年，美国已借反恐的名义控制了阿富汗。地处欧亚心脏地带的阿富汗，虽然土地贫瘠，但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 19 世纪以来列强争夺之地。美国控制了阿富汗，等于获得了向欧亚大陆中心地带辐射力量的空间。可以说，阿富汗是美国新罗马帝国战略实施的起点。

阿富汗战事结束后，2002 年 1 月，美国公开点名说伊朗、

伊拉克、朝鲜是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家。它认为邪恶势力掌握着这些国家的政权。5月份，美国又把“邪恶轴心”国家的范围扩大，提到了叙利亚、利比亚、古巴等国家。认为这些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对它构成威胁。

这些国家是长期以来敢对美国说不的国家。

美国借反恐为名，把它们首先列为“邪恶轴心”国家，然后对其进行打击，为自己的全球战略进一步扫清道路。早在美国进攻阿富汗的时候，人们就开始猜测美国的下一个目标，那时候，有不少人真的相信美国发动战争是为了反对恐怖主义。

现在人们已经不相信美国的反恐战略了，而是更相信美国的帝国战略。美国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包括以下一些国家。

叙利亚：美军攻陷巴格达后，一种意见立即被提上了白宫讨论的桌面，那就是美国是否应乘胜追击，利用美国在波斯湾驻有30万大军的机会，进攻叙利亚或伊朗，铲除中东和波斯湾地区的“流氓国家”与“邪恶轴心”国。



《华盛顿时报》2003年4月12日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称，伊拉克几名主要生化武器科学家已经逃往叙利亚，其中包括“炭疽夫人”胡达·阿马什和“细菌先生”哈比·塔哈。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也数度指责叙利亚偷运俄制武器至伊拉克，并让伊拉克高级官员偷渡至叙利亚。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关键人物纷纷出面，对叙利亚横眉怒目。英国《卫报》大呼：

“叙利亚是下一个目标。”

2002年成功游说布什攻伊的鹰派，试图进行第二次游说，说服布什政府完成伊战之后，挥兵进攻叙利亚。叙利亚的国土面积只有18万平方公里，还不及伊拉克的一半。分析家认为，

如果美国再对叙利亚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从军事角度上讲，应当是易如反掌，因为美国大部分军队还驻扎在海湾，而且又有伊拉克作为基地。

据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国内就对叙动武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对叙动武的支持率达到了42%，反对率为46%，相差无几。这对叙利亚是一种危险的信号。虽然美国鹰派还不至于愚蠢到盲目进攻的境地，但从长远来看，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谴责最为严厉的国家叙利亚将是美国中东战略的眼中钉，美国迟早要促使叙利亚发生“美国所希望看到的转变”。

伊朗：2002年8月，布什政府班子中的一位高级官员对《新闻周刊》说：



> “每个人都想去巴格达，但是真正的小伙子则是想去德黑兰。”

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2003年2月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同以色列官方人士交谈时承认，伊拉克战争胜利之后，美国将“收拾”伊朗、叙利亚和朝鲜。种种迹象显示，伊朗在美国鹰派的打击黑名单上，处于非常显要的位置。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开始，美国与伊朗就是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的死对头。对美国来说，伊朗是头号的恐怖主义国家。尽管没有证据，美国人还是怀疑伊朗与1996年沙特阿拉伯宰赫兰卡车爆炸事件有关，此次事件中有19名美国军人丧生。

伊朗是布什“邪恶轴心”名单上的一员，伊朗一直拒绝承认以色列。美国和以色列政府都认为伊朗在支持反以色列的恐怖组织，伊朗是最危险和最不能容忍的敌人。2002年底，以色列总理沙龙公开表示，美国在对伊战争之后应该推翻伊朗政

府这个“世界恐怖中心”。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发誓要粉碎的七个“恐怖主义”国家中就包括了伊朗。不过，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和对伊拉克的政策有很大不同。伊朗有着三倍于伊拉克的人口和军备，实力要比经过十多年经济制裁的伊拉克强很多。伊朗并没有明显违反联合国的决议，伊朗在外交上与欧洲、俄罗斯、中国和印度都建立了稳固的联系，并且着力修复与邻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关系。

但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矛盾依然很现实、尖锐。美国认为伊朗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和积极发展核武器，并认定美国和伊朗现在的当权者不能达成妥协。美国媒体指出，五角大楼迟早要做出决定命运的抉择：要么伊朗政府改变外交政策，要么改变伊朗政府本身。

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卢格说：



“伊朗在核能力方面已经走得太远，我们将不得不处理伊朗。”

在谈到布什将伊拉克、伊朗和朝鲜比作“邪恶轴心”时，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凯尔说：

“我认为总统在提到‘邪恶轴心’时，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当被问到美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对付伊朗时，民主党参议员多德笑着说：

“如果美国政府要对付你，那一天你会很紧张。”

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政府和伊朗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美国指责伊朗搞核武器，窝藏“基地”组织的领导人。还有一个鹰派没有说出口的大不赦之罪：那就是伊朗追随伊拉克，要抛弃石油美元。

伊朗则指责美国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对伊朗别有居心，支持伊朗的反政府组织，企图颠覆伊朗，双方一时剑拔弩张。虽然难以确定美国鹰派已经决定要攻击伊朗，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现政府一定是美国极力要颠覆的目标。

朝鲜：对于朝鲜，美国甚至已经制定了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方案。根据美国军方透露出来的方案，一是战术性先发制人，用“外科手术式轰炸”来去除朝鲜的核能力。鼓吹战术性先发制人的观点认为，美国在东亚驻军中有性能良好的航空攻击器，如F—117战斗机，这可以将美国自身暴露于朝鲜空防设施威胁之下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实施这一行动，只需出动一两组飞机分队，对朝鲜核设施发动奇袭，成功的关键也在于奇袭，对美国在伊拉克等其他地区的军事部署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而战略性先发制人，则是推翻朝鲜政府。在这一选择之下，美国须先组织几十万美军力量，然后才能开始“酿造”敌意，最后准备展开攻势。当然还要等好天气以便激光制导炸弹发挥他们的最大威力，并在战争初期设法灭掉朝鲜的远程火炮和火箭，以限制其攻击韩国城市的能力。

持战略性先发制人观点的人认为，美国可以实施这一方案，并赢得战争，但可能会使几千名美军士兵和数以万计的韩国士兵丧生以及几十万平民伤亡。

美国之所以现在没有实施这些行动，是因为目前“美国对朝鲜政策中的军事选择并不是没有，但看起来都不灿烂”，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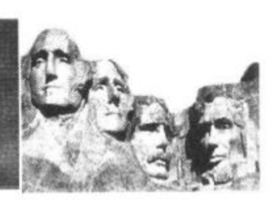
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欧汉伦说。

上述这些国家，有些拥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如朝鲜对于东北亚，叙利亚对中东；有些拥有对维持美元霸权至关重要的石油资源，如伊朗。

它们都是新罗马帝国战略日历上未来的一系列可以看得见的目标，此外，还有一系列密而不宣的目标。美国不会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立即开始进攻，美国要首先消化好伊拉克战争的收获。



第八章 看不清楚的胜利





美国鹰派在庆祝伊拉克战争胜利的同时，下一步的行动也正在筹划之中。然而，战争胜利并不等于美国得到了所有想要的。相反，它可能意味着美国更大的失败。鹰派要以伊拉克为新罗马帝国奠基，但结果却难遂人愿。

伊拉克战争有三个直接目标：建立伊拉克“亲美、民主”政府；控制伊拉克的石油；借伊拉克战争的胜利解决中东和平问题。

这三个目标如果不能达到，美国一样还是会迷失在伊拉克沙漠的风暴里。

一、“美化”伊拉克难如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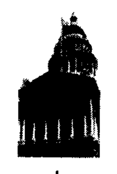
美国的理想是试图让伊拉克美国化，使之成为它在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桥头堡，发挥类似冷战时期日本在亚洲的作用，如果做不到这点，则取其下驷，在伊拉克建立起像科索沃或者阿富汗一样的“亲美、民主”政府，可这些目标差不多和神话一

样遥远。

把日本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是在《雅尔塔协定》中早已写下的明文规定，是美国和苏联瓜分协议中的一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单一民族国家日本是被普遍谴责的战败国，面临着来自周围所有国家的仇恨与敌视。

这个狭小的岛国，高度依赖外来能源的输入，如果没有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庇护使之能够廉价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能源，没有美国的资金和市场来挽救其奄奄一息的工业，就无法稳定和发展经济。

伊拉克则不同，其国内的民族、宗教因素之复杂，牵扯到整个中东国家的神经。伊拉克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并不需要美国的市场，不卖给美国石油，不向美国出口电子商品，也一样会生活得很好，战争中失败的伊拉克还获得了阿拉伯世界心照不宣的同情。



而且，美国在伊拉克的政治安排无法肆无忌惮，法国、俄国、德国等国家反对战后由美国来对伊拉克进行政治安排，主张只有联合国才有权主持伊拉克重建工作。这些大国在伊拉克都有石油利益，它们会以联合国为舞台，不让美、英顺利取得战后重建的控制权。这个争执不仅关系到联合国权威，也关系到各大国在中东的利益。即使是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已声称，决不承认美国扶持的任何伊拉克新政府。

也正是因为如此，坚信民主政体与自由市场是历史演进的终级模式的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再乐观：

> “这（对伊动武）是一场赌博。”
>
> “在德国与日本的成功是否适用于阿拉伯国家，对此，我没有答案。”

伊拉克也不是科索沃或者阿富汗。科索沃阿族占多数，美国的战争是帮助阿族赶走塞尔维亚族，因此，占当地人口80%的阿族人支持美国，选举自然产生亲美政权。阿富汗的塔利班作恶多端，美国支持反塔利班的北方武装，又同世界其他国家对阿富汗提供无偿援助，因此，阿富汗支持亲美政权的人数也达到多数。

在萨达姆时期，伊拉克政权镇压过王族，镇压过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还镇压过亲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这些伊拉克内部的各种力量不是专制、极端，就是反美。萨达姆还镇压过库尔德人，但库尔德人不是伊拉克的主要力量，他们的人口在伊拉克是少数，他们的政治目标是在伊朗、伊拉克同土耳其交界的边界地区建立自己的国家，除非美国要肢解伊拉克，否则他们不可能主导伊拉克政治。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权衡过后，在伊拉克各种政治力量当中，反而是萨达姆最适合美国需要。实际上，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相比，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是最西化的一个阿拉伯国家。

而且，海湾战争前的萨达姆是不反美的，当时的萨达姆政权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根据英国前下议院议长罗宾·库克的指责，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还曾经卖给伊拉克生物毒剂和化学弹药，其中就包括炭疽剂。

美国消灭了萨达姆，也就消灭了在伊拉克的最佳代理人。剩下的各种政治势力，没有一个会全面满足美国的需要。美国的理想是找到一个有广泛基础，能够在“民主选举”中获胜，同时又亲美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现在在伊拉克不存在。

萨达姆的复兴社会党势力庞大，但是已经被美国打倒，对其残余势力也无法进行有效改造。库尔德人只是一个少数民

族，无法成为伊拉克的主要管理人。伊拉克的海外派别成份复杂，其中很多人本来就属于反美力量，最主要的是他们离开伊拉克时日已久，在伊拉克民众中缺少影响力。

美国人赢得了第一回合，却迎来了更麻烦的事情。在伊拉克真正有影响力的是当地宗教势力，而这股力量恰恰是反美的。美国占领巴格达没有几天，伊拉克各地就发生了多次反美示威游行，他们要求美军离开伊拉克，反对美国侵占伊拉克的石油资源。

游行有时多达几千人，数量远远超过美军占领巴格达第一天时欢迎美军的那几十个人。这些示威群众既有什叶派穆斯林，也有逊尼派穆斯林，伊拉克的这两大宗教派别虽然矛盾重重，但在反美建国的问题上，却走到了一起。

2003 年 4 月 20 日，在什叶派宗教圣地卡尔巴拉，来自伊拉克各地和伊朗的数万什叶派穆斯林聚集在一起举行大规模的宗教仪式。游行者捶打胸脯，挥舞利刀在自己身上划出一道道伤口，鲜血四溅。这些激昂的宗教情绪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



伊拉克著名什叶派穆斯林毛拉法尔图西在经过一家美军检查站时遭逮捕，之后他通过阿布扎比电视台对所有伊拉克人说：

> “美军逮捕我们的手段比萨达姆逮捕学生时的手段还要狠毒。我们被反复殴打，”“整个晚上我们的双手都被反绑在背后。”

伊拉克人会不会把选票投给这些宗教势力？答案是非常有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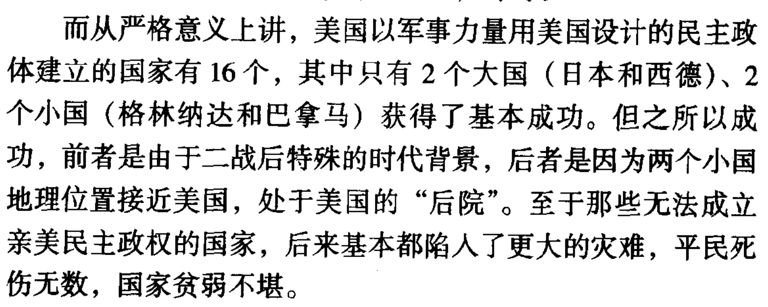
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伊拉克的社会秩序变得异常恶劣，

医院被抢、政府部门被烧、博物馆被毁、使馆被劫、银行被盗，最后连图书馆和动物园都没有幸免。根据国际法，占领军有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历史文物的责任，对巴格达发生的大抢劫，美国难逃其咎。

巴格达市民说，自美国占领之后，他们的生活状况比萨达姆时代还要恶劣：暴徒获得了抢劫自由，好人丢了工作、丢了存款、失去了安全。美国不负责的行为，进一步破坏了美国在伊拉克老百姓心中的形象，在这种状况之下，伊拉克的宗教势力通过选举上台是很有可能的。即使没有，它们也将在今后伊拉克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角色。

美国自建国以来，利用军事力量干涉其他国家已经不下200次，其中包括反对共产党政权（越南）、维和（波斯尼亚）、支持傀儡政权（20世纪80年代尼加拉瓜和安哥拉）、暗中策反（1973年智利政变）、人道干预（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半岛）和报复（1986年轰炸利比亚）等等。





而从严格意义上讲，美国以军事力量用美国设计的民主政体建立的国家有16个，其中只有2个大国（日本和西德）、2个小国（格林纳达和巴拿马）获得了基本成功。但之所以成功，前者是由于二战后特殊的时代背景，后者是因为两个小国地理位置接近美国，处于美国的“后院”。至于那些无法成立亲美民主政权的国家，后来基本都陷入了更大的灾难，平民死伤无数，国家贫弱不堪。

这些记录显示，美国单方面在其他国家主导建立政权，只是制造代理政权。历史已经证明，这些由美国幕后操纵的傀儡政权都无法长久执政。正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迈克尔·伊格奈泰夫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脆弱在它的脚后跟：

"从长期看，帝国远远不是民族主义的对手!"

倒是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展示了一个智者应该有的直率，他说:

"如果伊拉克民主，它就不会亲美；如果伊拉克亲美，它一定不民主。对伊拉克而言，亲美与民主互不兼容。伊拉克可以实现西方民主，但是无法实现美国所期望的民主。

美国期望伊拉克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一个亲美政权，这个政权不但要使美国感到安全，而且要服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美国希望在伊拉克设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希望获得大部分重建项目，希望用伊拉克的石油来支付美国公司的重建费用。

总之，美国希望出现一个既民主又亲美的伊拉克政府，这个政府给予美国'解放者'的光环，同时又满足美国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还要成为中东民主的样板。可惜的是，这个目标不切实际。"



美国要把亲美派推上台，通过民主选举是不行的。如果通过非常手段，硬扶植一个亲美独裁政权的话，势必将形成另外一个萨达姆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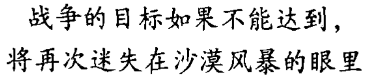
这样一来，美国花了数百亿美元，牺牲了一百多名美军士兵的性命，可能只是徒劳地回到起点。而这个亲美独裁政权最终可能像萨达姆一样被美国抛弃，或者反美，或被革命推翻。1979年伊朗发生的伊斯兰革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先例，亲美的独裁政府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什叶派穆斯林宗教力量，

而反美随后成为和圣战一样的事业。

找不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合法性已大打折扣，而解放伊拉克人民的宣传又难以服众。倘若美国再不能建立起一个亲美的伊拉克政府，或者即使建立起这样的政府，也得不到伊拉克人支持的话，那美国的入侵不仅彻底没有了合法性，而且将一点利益也得不到。







战争的目标如果不能达到，
将再次迷失在沙漠风暴的眼里

美国老百姓迟早会恍然大悟，到时候，他们就会质问布什政府，美国从这场花了数百亿美元，牺牲了上百名美国青年的战争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当美国人民认真地提出这个问题时，也就意味着布什政府走到了终点。

二、控制石油的问题

即使建立了一个亲美的伊拉克政府，离新罗马帝国在中东的目标还是很远。必须要有第二步，这就是所有人都说到了的石油问题。

这已经不仅仅是能源问题了。在当今的世界经济形势下，美国要保住美元的世界第一储备货币的地位，需要付出比以前大得多的代价。其中保证美元在石油交易中的标准货币地位是必不可少的。

美元可以源源不断地购买中东国家丰富的石油，拿到美元的中东产油国家然后又将这些美元投资到国际资本市场上，“石油美元”当中的一大部分最后都回流到美国。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石油美元”规模急增。当今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石油美元”已经达到数万亿的规模，是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一块巨大蛋糕。

“9·11”事件前的几十年中，由美国得克萨斯石油公司、洛克菲勒与摩根财团控制的加州“美孚”、新泽西州“美孚”等组成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曾享有沙特阿拉伯一半石油开采权。1980年该公司被沙特国有化后，美国只要能维持和沙特的友好关系，仍可以取得沙特的石油资源，因此，基本不用担心欧佩克会改变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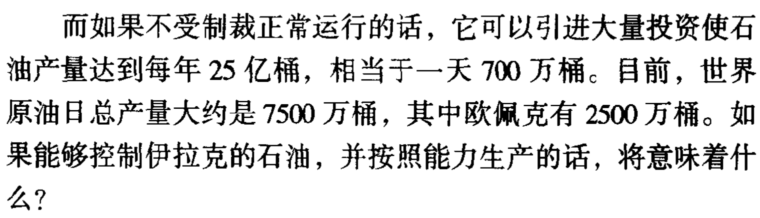
但现在沙特已经不是那么可靠了。纽约世贸双子塔灰飞烟灭，19个撞楼恐怖狂徒中，竟有15个是沙特阿拉伯籍。面对三千冤魂，美国人在沙特阿拉伯利益再深，也不得不承认“有些东西打碎了”。国内舆论认为沙特背叛了1945年罗斯福与沙特国王的互利条约的精神：你给我石油、我给你军事盾牌。

如今，要达到同样的目标，美国不仅仅要控制伊拉克本土的石油，还需要控制欧佩克。法国《世界报》文章指出了伊拉克战争的这个赌注：

> 攻伊战争给美国石油财阀们设计了两种结局：要么是布什、切尼策划的战局陷入泥潭，每桶油飙升至60美元。要不就是萨达姆被推下台，伊拉克基础设施损伤又不太严重。如此则伊拉克石油再次汩汩横流，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被美国制服，每桶油降到10美元以下。



根据新罗马帝国计划的精心计算，伊拉克是再好不过的开始：伊拉克原油生产量与其巨大的储藏量是极不相称的。海湾战争以来，伊拉克受到制裁，原油生产被限制，出口也须按照石油换食品计划进行，最近5年才卖了600亿美元的石油，平均每年不到10亿桶。



而如果不受制裁正常运行的话，它可以引进大量投资使石油产量达到每年25亿桶，相当于一天700万桶。目前，世界原油日总产量大约是7500万桶，其中欧佩克有2500万桶。如果能够控制伊拉克的石油，并按照能力生产的话，将意味着什么？

有两件事很明显：首先欧佩克会完蛋。有这样生产能力的伊拉克不会愿意欧佩克将其限制在每天200万桶的配额上。如果伊拉克突破了配额，开足马力生产的话，哪个欧佩克国家会容忍那多出的500万桶石油？欧佩克会寿终正寝。

接着是第二件事，那就是石油价格会跌到10美元左右一桶，比欧佩克的限价低15美元。每年世界石油用量是250亿桶，这就会为石油消费国一年节省3750亿美元的石油开销。

最大的受益国当然是美国。美国经济可能因此而降低运行成本，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从而摆脱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拉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美元将因此而巩固其摇摇欲坠的地位。

但这个如意的算盘要实现起来，难度很大。由于美国在伊拉克老百姓中的恶劣形象，它要肆无忌惮地控制伊拉克的石油生产和销售，首先必须以重建来证明自己。

只有在伊拉克成功地完成战后重建，国家运行进入正常轨道，其石油投资环境成熟后，新罗马帝国在伊拉克的石油战略才可能实施。这需要大笔金钱和相当长的时间，而这两者恰恰都是新罗马帝国的软肋。

伊拉克战后重建的盘子究竟有多大？各方有不同的估计。

世界银行估计，伊拉克重建至少需要 3 年时间，每年仅基础设施建设就需投入 200 亿美元，加上食品、医疗、教育、治安等开支，数额巨大。



美国战略及预算评估中心认为，重建大约需要 5 年时间，5 年内重建的费用在 1050 亿美元至 4980 亿美元之间。

而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估计，重建伊拉克所需要的资金大约从 10 年耗资 1200 亿美元到 1.2 万亿美元不等。这笔钱还不包括美国用于扩大海湾地区民主和建立自由市场制度所需的费用。

如果按照联合国为黎巴嫩、东帝汶和波斯尼亚等地重建所作的估算标准，重建费用是平均每人每年 1000 美元左右，伊拉克人口大约是 2500 万。这样算来，重建投入应该在每年 250 亿美元。这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和日本实施重建计划以来最大的一次战后重建行动。

人们曾普遍认为，伊拉克的油田可以为重建提供充足的资金。但问题似乎没那么简单。首先，伊拉克经济能力有限。伊

拉克石油生产能力即使达到战前正常水平，也就是日产量约300万桶，按照目前价格，每年收益大概是250亿美元，得全部投入重建，这几乎是难以想像的。

而且，石油出口恢复正常也需要时间。战争期间，石油商曾经预测，伊拉克石油将在2003年5月底到6月初大规模重返国际市场，但是伊拉克石油生产的进展状况并不遂他们的愿，而即使恢复了出口，生产能力的限制也使其出口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纽约石油业研究基金说：

“伊拉克回归的势头比预料要慢得多、弱得多。”



2003年6月11日，欧佩克峰会决定，将不削减石油产量，因为伊拉克石油在未来7到10年中都没有能力突破欧佩克原先为其设定的限额。如此，伊拉克战争只是使美国获得了未来7到10年后可能的对伊拉克石油的控制权。而这一权利能否最终兑现，依然要看伊拉克局势的发展。

萨达姆政权欠下的高额债务也将危及伊拉克的战后重建。

据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估算，目前伊拉克外债总额约为3830亿美元，其中15%是拖欠外国企业的合同款项，23%是欠外国银行的借款，还有1750亿美元是应赔偿给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受害的政府、公司和个人的。

伊拉克新政府一旦成立，各路债权人便会蜂拥而至，要求偿还拖欠的债务。

伊拉克无力支付巨额重建费用，而美国也难以为伊拉克重建埋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莫里斯·阿德尔曼曾建议伊拉克出售未开发的石油储备开采权，这样就可立即获得将近1000亿美元的收入，这个建议最后不了了之。

在控制中东石油的斗争中，美国的对手欧佩克也并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棋手。

斗争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中东爆发第四次战争，欧佩克利用石油禁运这一利器，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停止战争。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因此而受到重创。

从那时起，瓦解欧佩克便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目标之一。伊拉克战争还没有结束时，伊拉克美国临时管理当局就规划了伊拉克尽快重返国际市场的日程，预设了雄心勃勃的伊拉克出口石油目标，要冲淡欧佩克的石油定价权。

现在看起来，美国人笑得太早了。

美国扶持的伊拉克代理石油部长加迪班曾经夸口说，战争结束后两个星期就能实现每天出口100万桶。可是直到6月22日，伊拉克才开始恢复石油出口，而且这些石油都是战前生产的。伊拉克的实际状况让美国政府的战后设计落了空。



与美国的尴尬情状相比，欧佩克却在心里偷着乐。回想战争爆发前夕，欧佩克曾经提心吊胆地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拉克石油增产如何冲击他们已经成功运行了4年的配额机制，虽然有了应急计划，但欧佩克还是担心不足以平息伊拉克增加产量带来的油价地震。

目前，欧佩克正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迎接未知的挑战。欧佩克轮值主席阿卜杜勒·阿提亚呼吁非欧佩克的石油生产国，包括墨西哥、俄罗斯和挪威，与欧佩克一起避免石油价格跌破25美元。

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就是轻松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美国对能否摧垮欧佩克仍不是把握十足。

欧佩克当然早就意识到美国想突破他们的价格控制（22到28美元一桶），并为此有所准备。如果美国在伊拉克大量生

产和出口石油，欧佩克是否会对伊拉克的石油超产忍气吞声呢?

欧佩克可能会反戈一击，单独采用欧元作为石油标准交易货币，以同伊拉克脱离开来。这样反而更早地结束了美国的超级经济大国地位。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欧佩克就发表声明，要重新核查伊拉克的成员资格。欧佩克现在已经开始抱怨美元的交易货币制度，因为美元兑其他主要货币如欧元和日元的下滑损害了欧佩克的收入。一位欧佩克官员称：

> “美元兑欧元已经下跌 20%。这相当于石油进口国正从我们这里获得折扣。”



欧佩克的努力还将得到欧盟和俄罗斯心照不宣的配合。欧盟和俄罗斯不愿意坐视美国控制世界石油的轮盘。2002 年，俄罗斯曾经有意加入欧佩克。2003 年，在进一步洞悉美国的石油战略之后，俄罗斯表示要和欧佩克加强合作，稳定世界石油市场。

三、中东和平

中东和平是新罗马帝国计划的目标之一，“倒萨”必须与中东和平挂钩，不然，美国即使“倒萨”成功，也只会激起伊斯兰国家同仇敌忾，联合起来反美，使日后美国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在开战之前的 2003 年 2 月 26 日，布什在华盛顿的智囊机构“美国工业协会”发表演讲，说明伊拉克战争对中东和平的

好处。他说：

> “伊拉克现政权的暴政在中东地区引发不和与暴力，而解放伊拉克将在这一重要地区显示自由的力量，将为数百万人的生活带来希望和进步。”
>
> “在伊拉克的成功将为中东和平开创一个新阶段，向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巴勒斯坦国迈进。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垮台意味着恐怖组织失去了一个财大气粗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对其他政权的一个明确的警告：支持恐怖主义是不能容忍的……”

布什总统的演讲等于是承诺：征服伊拉克之后，他将做一些大好事，给中东地区的老百姓带来安稳的生活。

但这种和平是美国主导下的和平。2003 年 4 月 30 日，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正式拿出了 10 个月前由布什提出的中东和平路线图，然后提交给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这一时间上的巧合表明，布什总统要借伊拉克战争胜利的势头，解决中东和平问题，同时也借中东和平问题，巩固伊拉克战争成果。



但中东和平有一个从未经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美国确定能控制中东地区，或者说中东阿拉伯国家承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宗主式的地位。

否则，美国不会让和平真正降临中东，因为这不会让美国有任何好处。一个安宁无事的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存在将失去理由，而富有石油的阿拉伯国家也完全可以在欧元和美元之间自由地选择了。

2003 年 6 月 3 日，布什在埃及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伊拉克战争后的第一次会晤。《华盛顿邮报》当天在头版如此介绍了布什的中东之行：

布什再次展示出粗犷的牛仔风格，对具体而复杂的巴以谈判细节感到厌烦，也不希望美国卷入太深。

巴以最终边界和耶路撒冷最终地位问题是巴以纠纷的关键，但每当助手们提起这些复杂的事情时，布什反应冷淡。布什的前任克林顿曾亲自和巴以领导人详细地讨论这些导致和平迟迟不能降临的棘手问题，但布什显得不屑一顾，称又是那些“老掉牙的事”。

布什还时不时语出惊人，让助手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比如，他对助手讲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的做法是瞎浪费钱，因为那些房子最终住的是巴勒斯坦人。布什的助手和一些中东问题专家认为他在这些问题上太天真了。



布什这些混乱的态度和言辞并不值得惊奇，因为美国关心的中东和平问题本来就是美国人心目中的和平问题，而不是以色列，也不是巴勒斯坦人眼中的和平问题。

当前，美国的中东和平问题是：美国能否趁热打铁，把巩固伊拉克战争成果、巴以和平、中东国家配合美国的反恐战略，放在一个篮子里，让中东地区所有国家接受。

以色列沙龙政府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中东和平希望的曙光又一次展现。但事实是，中东和平不会很快到来。

因为敌视美国的叙利亚政府、伊朗政府、摇摆不定的沙特政府依然存在，中东自由贸易区这个“要中东美国化”的计划还遥遥无期，甚至伊拉克的未来也难以确定。

这些因素决定那些巩固伊拉克战争成果，让阿拉伯国家臣服美国的目标根本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

在美国觉得已经作出足够的姿态，稍微安抚一下阿拉伯人因伊拉克战争而加剧的仇美情绪之后，巴以冲突将在美国对以色列心照不宣的纵容下继续。美国一边督促实现中东和平，一边会乐意看到和平计划在被以色列政府接受后又遭到破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边界争端基本平息，但巴以之间的冲突基本没有停止过。经过四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了力量上的均衡，以色列虽然有能力发动战争，但不能承担战争的后果。阿拉伯国家则不愿意让战争毁灭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妥协与和解应该是必然的结果。但这一必然结果却迟迟没有到来，因为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巴以双方，也不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而在插手其中的大国。

美国势力较晚进入中东地区。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时，尼克松政府一改此前不介入中东地区的政策，对以色列提供了一揽子援助。因为尼克松政府相信，以色列获胜将能削弱苏联对埃及和叙利亚的影响力。美国由此开始介入中东问题。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攻势的咄咄逼人和萨达特在埃及的掌权，促使美国加强介入中东地区。当时的局势显示，苏联决策者企图压服伊朗，取得伊朗一部分油田的开采权。这促使卡特政府宣布，美国视海湾地区为影响美国关键利益的地区。几乎同时，“戴维营协议”使美国成为以色列和埃及双方的安全保证人和经济援助者。

1979 年伊朗革命要求美国必须在海湾地区保持持续的军事存在。里根时期，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苏联空军对美国地中海舰队的威胁日益增大，促使美国将以色列作为“战略伙伴”。

决定政策的是利益而不是价值观。美国在此期间的中东政策并不是出于对该地区或当地居民的感情，而是出于对石油资

源和对抗苏联威胁的考虑。美国决策阶层希望以最小的介入获取尽可能大的利益。

冷战后，老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目标更为宏伟。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美国决策层认为，这是铲除中东地区长期存在的激进政权的好机会。萨达姆政权被清除后，该地区将奉行进步的、亲美的政治架构。美国要把设想中的伊拉克局面推行到其他国家，按美国的目标重塑这一地区。但现在看来，美国的目标还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

巴以之间多年来一直处于低烈度冲突状态，殊不知低烈度战争政策正是美国控制重要战略地区的一种手法，多少年来，美国在巴以之间扮演了一个看似不偏不倚的公平角色，但实际上是支持了以色列。



美国在中东的目标一时还难以实现，包括伊拉克也是个未知数，因为伊拉克人并不欢迎美军。这也就决定了中东和平不会很快到来。

中东和平路线图的诞生，是巴以血与火对抗的结果。它符合巴以老百姓的愿望，但它能否帮助美国实现新罗马帝国在中东的目标，则真正关系到其生死存亡。

如果美国的上述目标长时间无法实现，美军将不得不更长时间地驻扎中东。对美国殖民式驻军的反感，再加上对以色列的仇恨，很可能会引发中东地区新的反美浪潮，导致中东地区的不稳定，使油价不正常波动，进而严重影响新罗马帝国的战略目标的实现。

第九章 不同以往的分裂



伊拉克战争让美国与最重要的盟国分裂了。

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专家罗伯特·卡根的眼里，“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



这一分裂暴露出大西洋两岸关系“地壳构造般的变动”。这一变动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老欧洲的死亡和新欧洲的诞生，但它不是拉姆斯菲尔德的“新、老欧洲”论可以解释的。

不过，倒是可以借用“新、老欧洲”这个名词。今日之欧洲已经不同于过往，拉姆斯菲尔德局限于古老的帝国政治思维，认为给予中、东欧刚从苏联势力圈脱离的国家以安全承诺，就可以在欧洲插入一个阻挡其统一的屏障，使欧盟难以推进一体化。这是没有看清楚历史发展的大势。

一、法国

“9·11”事件使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脆弱，

不过它同时获得了法国人的无限同情。巴黎《世界报》在“9·11”事件次日发表了一篇经典的社论说：

“我们现在都是美国人。”

但在不到18个月内，布什政府就把法国的这些史无前例的同情浪费了个精光，法国再次带头反美。

关于法国为什么反美，或者一直特立独行于美国，有许多见仁见智的解释。

第一种来自历史。美国独立战争时，法国的拿破仑皇帝给予了美国无私的支持，当时的拿破仑基于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



让美国成为英国海洋上的对手，会增加法国对英国的优势。

至今屹立在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像就是法国赠送给美国的，它已成为美国的象征之一。

不仅如此，法国在美国独立之初，还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将密西西比河以西广袤的法国殖民地卖给了美国，从而奠定了美国世界大国的基础。

反观美国对待法国，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应该说，从美国立国以来，美国能关照法国的地方并不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被希特勒纳粹德国占领后，它才真正得到了美国力量的支援。但罗斯福对法国人非常不信任，他看不起戴高乐也看不起法国。

据基辛格的著作《大外交》记载：

"在 1945 年 2 月举行的关于战后秩序安排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曾经当着斯大林的面，指责丘吉尔也不看看法国有何分量，值得让盟国考虑把法国培养成世界强国之一。"

罗斯福甚至把法国列为应该被接管的国家之一。罗斯福关于战后世界由四大警察维持秩序的构想中，也没有法国的份。罗斯福认为，战后的法国充其量也只是个二等国家，应该由英国、苏联、中国和美国来担任四大警察。

罗斯福对法国的看法和做法深深地伤害了法国人骄傲的自尊，让法国人从此耿耿于怀。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抵抗运动冷嘲热讽、态度消极和极度不信任，这是 50 多年来法美关系风风雨雨、起伏不定的根源。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法国不喜欢美国，是出于法国老贵族式的心态对美国新暴发户式摆阔的不满、嫉妒和无可奈何。



欧洲曾经诞生过许多世界级的强国，英、俄、法、德、意、西、荷兰等都曾是世界的中心。它们对悠久传统和历史的珍视体现在其对本国文化的骄傲中，法国是欧洲大陆文化最辉煌的国家之一，因此更是瞧不起美国文化，认为其浅薄、庸俗、商业化气息太重。

下面的这则新闻报道也许能形象地反映，美国人目中无人的作风在法国人眼里是多么令人反感：

艾菲尔铁塔下，一群美国中学生正在电话亭外边吵闹着要给远在美国的家人挂电话。其中相当一部分孩子竟然不知道应该先拨美国的国际代码，再拨地区号码和自己家的号码，还问"为什么要有国家代码"?

这样的对话让法国人不舒服，一位法国人表示，美国的国家代码是01，是所有国家代码中的第一个，这还不够？难道“其他国家”都是不存在的？

在强势的美国文化向全球渗透的过程中，法国人更是坚持“文化例外”，顽强地捍卫法语的地位和纯洁，努力抵制美式饮食文化和大众文化，就像当初法国人抵制德国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占领一样。

而美国人看法国，也充满了轻蔑和不信任。美国人认为法国人动不动就罢工、游行，中央高度集权、效率奇低，工作时间越来越短、要求的享受却越来越多，夸夸其谈、忘恩负义等等。

近几年来，甚至有人重翻罗斯福时代的旧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再次诘问：



“法国凭什么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由于法国不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的一些媒体更是把今天的法国和二战爆发之前实行“绥靖主义”的法国相提并论，认为法国软弱、出卖朋友、背信弃义、卑躬屈膝等等。还有人提到法国自拿破仑以来，从来就没独立打过胜仗。1944年夏天，要不是以美英为主的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法国还出不了对强大邻国、侵略者德国的“那一口恶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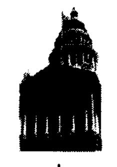
所以有美国记者冷嘲热讽地说，法国人是“当然的和永久的和平维护者”。

尽管法美不和有着众说纷纭的理由，法国和美国也曾经多次爆发过激烈的争吵，但诚如一位美国政治评论所说，1945年以来，美国在推行其全球政策中仍然怀有这样似非而是的自

信：

> 不管法国对它的某项政策有多少保留，也不管它可能造出多大声势去表示反对，美国从来都依靠这样一个事实，即当美国做出决定时，法国都会支持美国。
>
> 美国政府还确信，盟国对其世界事务领导作用延后的支持是一个他们能够依靠的常数。

但现在，这一点突然变了。法国成为“不志愿联盟”的领导者之一，得到德国、俄罗斯以及世界舆论的强大支持，美国人惊讶地发现，法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比和美国的关系更亲密，甚至有人开始谈论法国—德国—俄罗斯三国牵贯而成的大欧洲。



如果说以往法国对美国的批评还是出于法兰西自身的骄傲和法国对美国固有的优越感，那争吵只不过是情人之间的口角，可这次伊拉克战争则完全使法国愤怒了。在战争胜利后，美国也没有得到法国的谅解。2003 年 6 月 2 日在法国召开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希拉克和布什之间的分歧依旧，布什和希拉克之间连个像样的握手都没有。

这不能怪法国，因为美国在伊拉克这么做就是根本没有把法国放在眼里，是要求法国联合欧洲的雄心永远地屈服于新罗马帝国，如果在这样的要求面前，法国还能迁就的话，那可就真如戴高乐所说的——“法国就不能成为法国了”。·

2002 年 11 月 1 日，巴格达国际博览会上外国商贾云集，50 个国家上千家公司的 2 万多客商来到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巴格达参加国际博览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法国公司。伊拉克战争直接损害了法国公司在伊拉克的利益，这是法国反对此次

战争最本能的原因。

伊拉克是法国在中东地区的传统盟国，法国和伊拉克的关系超出了其他任何一个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法伊友好关系达到了顶峰。1981年，法国外交部宣布，法国在与伊拉克达成的有关协议的框架内，将向伊拉克转交60架米格战斗机。同一年，法国向伊拉克的食品出口也达到47亿美元。这样，法国一跃成为伊拉克在西欧的最大经济贸易伙伴国。在伊拉克、伊朗之间长达8年的战争中，法国进一步加强了与伊拉克的军事合作。

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法国也加入了讨伊联盟。但海湾战争之后，法国再次走到了其他西方国家之前，与伊拉克恢复了关系。法国石油与经济代表团相继访问伊拉克，并与伊拉克签署数项经济合作协议。法国在伊拉克投资达数十亿美元。法国的石油公司承包了伊拉克25%的石油开采权。伊拉克20%的对外贸易往来是和法国进行的。在军火交易中，伊拉克拖欠法国高达200亿美元的债务。



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政府后期，法国与俄罗斯一道为解除对伊拉克的国际制裁作了大量努力。因为法伊经贸关系如果中断的话，将可能导致法国国内20多万人失业。

“9·11”事件之后，在伊拉克问题上，法国受到来自美国的多方压力。尽管这样，法国还是希望在不招致美国反对的情况下，继续发展与伊拉克的关系。为此，法国与俄罗斯等国一道努力，希望阻止美国推行其单边主义政策，试图将伊拉克问题限制在联合国范围内解决。

法国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预感到一旦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法国在伊拉克的所有利益将可能得不到保障。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印证了这一点。

除了切实的经济利益之外，法国的大国意识也促使其在伊

拉克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1995 年当选、2002 年再次当选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号称戴高乐主义的传人，是法国政坛上的常青树，也是世界政坛上国际影响较大的一位老资格政治家。

多年来，希拉克长袖善舞，在法国国内出色地经营了自己的传统右翼阵线，在世界舞台上为法国的大国地位纵横捭阖、活跃异常。独立外交和大国地位是希拉克从戴高乐那里传承下来的理想。在小布什面前，希拉克是有资格找到“前辈”、“长者”的感觉的。

法国一直是国际政治博弈中高超的棋手。自美国发起“倒萨”的舆论攻势之初，法国就高举反战旗帜，因此成为国际社会反战阵营的领袖。

法国在美国打击伊拉克问题上一再“为难”美国，将加强法国在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盟国家的领导地位。如果法国的这一政治博弈取得成功，法国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声望将得到空前提高，一个新的法国形象将出现在 21 世纪的国际舞台上，这将有利于欧盟的独立外交政策。



美国人斥责法国反对美国有野心，有一定的道理。法国试图通过反美，在国内顺应民意，在世界上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作为西欧大陆惟一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法国政府非常清楚，法国在安理会的表现直接受到国内外的密切关注，不管采取何种立场，都将直接影响国内选民对政府的看法及法国在欧盟的威信。

现在，法国已经被美国当作可恶的“犹大”。美众议院把餐厅菜单上的“法式薯条”改为“自由薯条”，纽约人将法国葡萄酒倒入阴沟，《纽约时报》以及大大小小的报纸、网站均不惜笔墨，大量刊登抵制法国商品的广告，并列出法国公司的名单当“靶子”。

除了老百姓的“反法”情绪外，美国政要的一些言辞更是

令人感到一股“杀气”。白宫安全问题专家米歇尔·李登在华盛顿某著名战略研究论坛指责希拉克说：

> “（希拉克）鼓励了萨达姆的抵抗行为”，“法国总统的政策使我们的一些士兵失去了生命。”

他甚至不加遮掩地称，只要希拉克在任一天，法、美之间的伤口就不可能愈合。

中情局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则认为：

> “巴黎建立了一个反美联盟，它走得太远了。”



希拉克曾在美国度过一段时光，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对美国最友好的法国政治领导人之一，而现在却遭到辱骂中伤，甚至被妖魔化。

美国提出要惩罚法国的反战政策。

这些惩罚措施可能包括希拉克别想得到布什的访问邀请、法国公司在伊拉克的传统利益将难以得到美国的保障、一些法国公司在美国的活动将受到影响、美国将限制美国企业在法国的一些商业行为，比如美国国防部和很多美国航空公司大幅降低了参加 2003 年巴黎航空展的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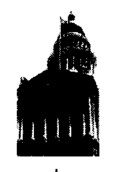
美国国防部在伊拉克战争胜利后决定，至少在一年内禁止法国的军事人员踏足伊拉克。据报道，这是一项非公开的决定，不会出现在国防或军事领导人办公室的任何文件中。美军还任由匪徒抢劫了法国在巴格达的大使馆，这可能也是报复的一种。

为了惩罚法国，美国还一度打算寻找法国支持萨达姆政权的“证据”。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

"战争期间，美军第三机械化步兵师在巴格达国际机场发现了51枚法德合资生产的"罗兰德—2"型防空导弹，上面标着'2002年生产'的字样。美军还在萨达姆官邸等地发现了大量酒类、糖果、香烟等法国货以及贴着'法国制造'标签的军用无线电台。"

伊拉克战争打响前，美国就已经传出"法国暗中帮助萨达姆"的消息，这些"发现"无疑为这一传闻找到了佐证。

萨达姆政权倒台后，法国对美国发出了一系列"求和信号"。比如，不再呼吁国际社会注意美英发动战争的"非法性"；同意支持伊拉克战后重建；同意取消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等。



但法国并没有放弃基本原则。2003年6月，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法国小镇埃维昂落下帏幕后，布什前脚刚走，希拉克就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虽然支持伊拉克战后重建，但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伊拉克战争是不合法的。

法国外长德维尔潘此前在土耳其安卡拉访问时也称：

"法国在伊拉克危机的整个过程中，与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国家一起坚持遵循国际法原则。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法国都将继续捍卫这一原则。"

法国不能容忍布什政府奉行实力说话的原则，也不喜欢看到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法国左派第一大报《世界报》的一篇文章认为，一种以救世主自居的思潮，正在美国愈演愈烈。这种心态使美国自认为"别人都应该向我们学习"。也正是因为如此，法国才如此坚持自己的立场。

但在美国单边主义盛行、不可一世的情况下，美国恐怕不会对法国充满自尊的和解姿态表示谅解，在涉及重要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估计更是如此。两国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原本就存在的矛盾将更加难以解决。对伊战争使美法之间“旧恨”重提，而伊拉克重建问题又可能使它们再添“新仇”，美法关系将会因此越来越冷淡。

也许，美国现在还不愿也不能把法国当作强烈对抗的对手，在法国多方要求和暂时软化的情况下，会给法国一些机会，让它参与伊拉克的重建。法国也不愿意和美国直接冲突，它更希望在美国的一些让步下体面地下台。

但一道鸿沟已经形成了，法美的这次妥协和以前不同，这是一次更加接近战术性的妥协。



二、德国

2002年2月，在巴基斯坦北部城市白沙瓦，53000多名阿富汗难民挤在这里的难民营里，自“9·11”事件后，美国猛轰他们的国家，难民数量迅速膨胀起来。

16岁的贾马出生于难民营，他在一家砖厂工作，表兄恩雅塔的父亲认为儿子应该到伦敦才能过上好日子，于是决定把儿子送到那个理想中的幸福之地去。贾马给他介绍了一位蛇头，恩雅塔的父亲花了2万美金请蛇头将儿子带到伦敦，而贾马凭借自己会几句英语成了恩雅塔的同伴。

于是两人带着梦想上路了。他们从巴基斯坦进入

伊朗，一路上偷偷摸摸地躲在各种汽车里，时时刻刻担心被发现遣送回国。他们历尽艰辛翻越高山来到土耳其，在条件恶劣的工厂里打工，最后和许多难民一道躲进集装箱偷渡到意大利。然而，密不透风的集装箱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旅程结束时，只有贾马和一个哭泣的婴儿活了下来。

这是一部名为《尘世之间》的电影的大概剧情。2003 年 2 月，在全世界反对美国对伊动武的同时，这部描述阿富汗战争中难民痛苦潦倒、生活如地狱的反战电影，在第 53 届德国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最高荣誉——金熊奖。

影评家认为，这是德国人把反战的政治因素注入到了艺术活动之中。



这同时说明了一个事实，电影触动了几乎全体德国人最伤痛的一根神经：战争和苦难从来就是双胞胎。

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战争不仅给世界人民带来苦难，也使德国人民蒙受了痛苦和屈辱。德国人民痛定思痛，一再表示要远离战争，至少不能让德国人民参加战争。

二战结束以来，反思战争已经成为德国政治家的一个传统。

1970 年 12 月 7 日上午，联邦德国的第四位总理维利·勃兰特来到了位于华沙老城内的原犹太人聚居区。站在这片还残存着战争创伤的土地上，作为一个曾经屠杀了 600 万犹太人的国家代表，面对着周围眼中饱含愤怒的大屠杀幸存者们，这位德国总理无言以对。

于是，他默默地屈身，面色凝重，低垂着头，双膝跪倒在犹太死难者的纪念碑前！这一惊人之举不仅令在场的许多人感动得落泪，也在 20 世纪的外交史册中永恒定格。

勃兰特这样解释他的下跪之举：

> "不仅是对波兰人，实际上首先是对本国人民。"
>
> "太多的人需要排除孤独感，需要共同承担这个重责……承认我们的责任不仅有助于洗刷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大家生活在一起。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我们应该生活在一起。"

这一勇敢的行为使勃兰特成为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为他杰出的政治生涯画上了浓重的一笔，使他成为德国战后最伟大的政治人物之一。而反对战争也成为德国历届领导人的标志性政策之一。



二次大战后，德国军队第一次参与国外军事行动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科索沃战争期间，当时德国军人在北约的框架下，主要参与了一些后勤支持以及侦察等辅助性军事活动，并没有直接参与作战。

德国国会是在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才批准了有关议案的，而且是在当时的国防部长鲁道夫·沙尔平出示了所谓的塞尔维亚方面进行种族清洗的照片之后才批准的。

以上两个例子，足可以反映了德国人民反对战争的强烈心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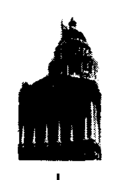
德国总理施罗德在2002年9月大选获胜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竞选时许诺不参加对伊拉克的战争，而且不承担由战争发生的任何费用。施罗德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一场"不聪明"的战争，他反对将战争闹着玩。他向选民表示，一定不会附和美国之意见，轻易参战。法国《世界报》前主编安德鲁在评论此次德国大选时说：

"此次选举的显著特征是一个欧盟国家的选民首次受外交政策关切的驱动，德国施罗德总理在伊拉克问题上不同于美国的立场，明显地帮助他赢得蝉联。"

施罗德的立场得到了选民的支持，但被布什和美国政府看作是反美的行为。特别是当时的德国司法部长赫塔·多伊布勒·格梅林在一次竞选集会上，不小心拿布什与希特勒作比较，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白宫发言人称德国司法部长恶化了美德关系，从此美德关系进入低潮，连施罗德赢得大选，继续任德国总理，布什都不发一个"贺"字。

当然，德国的反战政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国要想成为有影响的世界大国就必须和法国及整个欧洲站在一起。



与法国建立法德轴心，实现统一的欧洲是战后以来，德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目前法德与美国对立，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为了建立一个与美国平等的欧洲。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洲统一步伐加快，但是从科索沃战争来看，欧洲还不能独立解决自己家门口的事务，也因此受到了美国的摆布。

正因如此，德国和法国一样痛感有必要形成欧洲统一的外交政策。布什总统上台后表现出的严重单边主义倾向，傲慢自大，不善于与盟国事先沟通，更引起德国的反感。

德国的一份报纸曾评论说：

如果小布什能像 1990 年他父亲老布什那样，提早派人到欧洲游说，那么美国早就建立起了如同当年

一样的反伊拉克统一阵线了。

施罗德政府的反战立场也反映出，在重新统一之后，德国要求在世界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

在冷战尚未结束，德国尚未统一时，德国处于北约与华沙条约国对抗的最前线。在国际法意义上，德国还被美、英、法、苏四大国占领，自己没有完全主权。因此，历届德国政府的外交基石都是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甚至惟美国马首是瞻。

但，这与德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经济实力很不协调。重新统一后，德国不仅没有了直接面对的强敌，而且国力大增，又有了完全主权，自然也就不甘心无条件地担当美国的“小伙伴”了。



但，美国依然还是像在过去几十年中那样要把在华盛顿作出的决定强加给德国。德国外长当时提醒华盛顿，“同盟的伙伴不是卫星国”。柏林一家报纸毫不留情地揭穿美国这种单干做法是自私地利用一切机会，增强其超级大国地位：

> “从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与我们如此的不相干”，“从来没有一个德国公民对他们最为强大的盟友表示过如此程度的怀疑。”

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夫·波特兰姆从前是一位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他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标题是《德国不会成为美国的附庸》。

他认为布什对德国人对美态度的变化负全部责任，并预言欧盟将不得不“让成员国在防卫问题上联合起来，正像欧盟在货币政策上所做的那样”。

对美国的反感也促使德国对军事力量的重视。2003 年 5 月出台的德国国防政策白皮书，已经显示出了美国“先发制人”军事战略对昔日盟国的反面影响。德国新的防务政策把“攻击是最好的防卫”的理论纳入主要考量，称今后德国军队的主要任务将从国土防卫转向出兵国外，处理地区危机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新的防卫政策称，德国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不再面临传统意义上的外国入侵。所以，冷战时期制定的以国土防御为主的军事战略将相应调整，而出兵国外，包括到北约成员国防区以外执行任务，而排除可能威胁德国本土安全的地区危机则成为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最优先任务。

对此战略的调整，德国国防部长施特鲁克形象地解释说：

> “德国将在中亚的兴都库什山保卫自己的国家安全。”



为此，德军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关闭一系列军事基地，大幅度压缩开支，用于更新武器装备，提高德军在国外执行任务的战斗能力。今后 10 年内德国将关闭 40 多处军事基地，淘汰一大批冷战时期为国土防御而装备的重型武器，节省开支。

德国《柏林日报》2003 年 5 月 22 日发表评论称，新的防务政策奉行“攻击是最好的防卫”这一军事哲学，同美国“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柏林日报》在评论德国新防务政策的时候，还不忘对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揶揄几句：

> “按照这一逻辑和目前的国际局势，美国人在全球将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时时处处都要进行防卫，

那么攻击也就不能始终都是最好的防卫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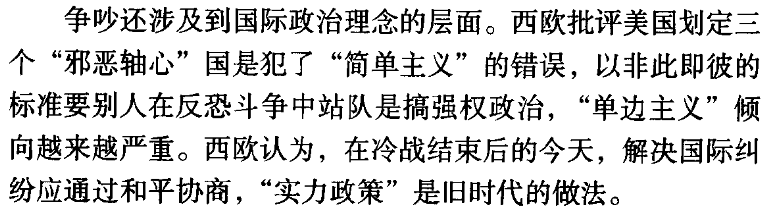
三、美欧冲突

欧盟的两个核心国家法国和德国一起，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站到了美国的对立面。

实际上，除了阿富汗战争，布什的其他重要外交政策几乎没有得到欧洲国家的任何支持。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反弹道导弹协定》，反对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等等，都受到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强烈谴责。

欧洲舆论忿忿地说，好像超级大国就可以不守规矩。





争吵还涉及到国际政治理念的层面。西欧批评美国划定三个“邪恶轴心”国是犯了“简单主义”的错误，以非此即彼的标准要别人在反恐斗争中站队是搞强权政治，“单边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西欧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解决国际纠纷应通过和平协商，“实力政策”是旧时代的做法。

美国的一些观察家看到了欧洲和美国的种种分歧，但认为这种分歧的背后渗透着欧洲人的民族情绪。美国《企业家协会》杂志的编辑卡尔·辛斯梅斯特2002年4月在波兰华沙参加一次会议时说，他发现欧洲充满对美国的“敌意、嫉妒和恶意中伤”。《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雷德曼说：

“这种新反美主义是对美国超强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嫉妒和怨恨。”

罗伯特·卡根在《强大和虚弱》一文中将这种分裂做了更加无情、却更明了的解剖：

“现在我们不应该继续假装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世界有相同的看法，甚至也不要认为他们在同一个世界上。”

“在权力这个重要的问题上——包括权力的效力、权力的道德和对权力的渴望，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观点大相径庭。因而现在有人说，在主要的战略和国际问题上，美国人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他们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他们越来越难以相互理解。当涉及到确定国家目标、定义恐怖主义和执行外交及防务政策等问题时，美国和欧洲离得越来越远。”

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强大无比，而西欧各国由于战争的破坏而脆弱不堪。当时在西欧，有25%以上的人愿意投票给共产党，不少人担心，国内共产党力量的崛起加上驻扎在中欧的大量苏联红军，将把西欧国家全部变成“赤色”地带。

在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担忧中，1949年，北约创立，将西欧与美国的联盟制度化，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西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担心美国实行“孤立主义”超过担心美国实行帝国主义。而当时的美国也支持欧洲建立跨国结构，以让法国接纳西德，并以联盟形式抗衡苏联。

20世纪60年代后期，大西洋联盟的物质和政治基础开始动摇。西欧经济复兴，并不再依赖美国。恰恰相反！它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经济竞争对手。苏联的威胁开始显得遥远。同时，由于一个强大的欧洲越来越成为大西洋联盟的威胁，美国对欧洲一体化建设的热情开始消退。美国鼓励英国追随自己，希望以此分化欧洲。后来，美国出于同样的愿望而催促北约迅速“东扩”。

自西欧国家走上联合的道路后，美国曾多次尝试对其加以阻挠。英国就是美国打入欧洲的一个楔子，而且效果似乎不错。英国在欧洲统一问题上满怀醋意，孤悬海外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英国即使加入统一的欧洲，也必然被法国和德国挤在更加靠后的位置，与其在法国和德国后面做老三，还不如在美国后面做老二。

二战之后，丘吉尔，这位拥有贵族品质和骄傲的英国领导人，出台了三环外交，其核心就是美英特殊关系。以后历代英国领导人就在美国和欧洲之间骑墙，视形势而倒向其中一边，不过如此一来，英国也将自己放逐到核心欧洲之外。

从美国控制其盟国的角度来看，1991 年苏联解体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它使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居领导地位的主要依据消失了。没有了苏联的强大威胁和百万军队陈兵国门，现在，西欧还要害怕何人？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直试图寻找一个苏联的替代品，以便给欧洲一个忠诚追随美国的理由。但现在更没有这种理由了，美国已经成为新的帝国，除非它自己就是理由。

不可否认，当前美国和欧洲还有不少共同利益，比如在南北关系、恐怖主义问题上等等，但没有一项具有往日苏联军事威胁那样的紧迫性。

欧洲各国感到，它们对一些问题的解决方式至少与美国一样高明和管用。在老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欧洲的这种自信导致美国和欧洲之间不少激烈的争吵。随后小布什当上了总统，这时鹰派掌控下的白宫已经没有兴趣同西欧辩论了。对于伊拉克、巴勒斯坦或朝鲜问题，美国政府认为自己知道该怎么做，并确信欧洲应接受美国不容置疑的领导。

欧洲鄙视美国的实力法则。在过去的 50 年里，欧洲在重建它的经济体系的同时，给了美国大笔的防御经费。欧洲不仅

精简了陆、海、空三军的人数，还减少了军费在国民支出中的比例。所有西欧国家基于“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ies）而弱化他们的军事基础。有人如此评价说：

> 欧洲意识进入了后军事时代、后国家时代，这使欧美之间产生巨大的鸿沟。曾经发明“军事民族国家”（martial nation - state）概念的欧洲人，现在再看美国的爱国精神时，发现美国人除了挥举国旗的过激主义外什么都没有。

欧洲认为，美国的反恐战略孕含着极大的危险。法国《解放报》曾发表社论指出，如果可以借反恐的名义为所欲为，那将是“国际秩序的倒退”，等于给“各种新殖民主义行为打开方便之门”，后果不堪设想。



美国学者则反唇相讥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欧洲人搞的不就是“实力政策”吗？如今它反对“实力政策”，恰恰是力量虚弱的反映。他们甚至指责欧洲又出现了“绥靖”思潮。

从根本上讲，欧美之间的争吵是双方利益不同的反映。这种不同从经济利益到政治利益，遍布所有层面。今天的地缘政治与过去已经非常不同。欧洲感觉到，布什对伊拉克的政策既是针对萨达姆的，也是针对他们的。他们看到，现在欧洲的体制建设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布什却在试图破坏欧洲的独立、统一和强大。

拉姆斯菲尔德关于“老欧洲”如何孤立的所有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欧洲，包括东欧在内，没有一个国家的民意测验不是反对美国立场的，波兰政府虽然出兵伊拉克参加战后维和，但波兰人却投票加入欧盟。

与萨达姆相比，提出“先发制人”的美国则被认为是一个更为重大的危险。伊拉克战争以美国“胜利”而告终，但美国和法、德的分裂并没有以法、德的屈服而结束，相反，在战后伊拉克重建问题上，法国和德国都和美国展开了新的表面看来是友好的较量。在伊拉克重建过程中，美国必须用大部分伊拉克的权益来回报国内的资本家和纳税人。但这将使法、德找到更多的理由反对美国，分裂将可能由此进一步加深。

四、与以往不同

大西洋两岸的这次冲突，与以往的性质完全不同。



新罗马帝国在中东的战略，对欧盟有见识的政治家来说，是要欧元屈服于美元，要欧洲防务屈服于美国的防务，要欧洲经济屈服于美国经济，最后就是欧洲人屈服于美国的新罗马帝国野心。

在这样的野心面前，既然没有什么能说服欧洲应该以新罗马帝国的大局为重，那么竞争就将在所有领域展开，欧洲共同防务注定将取代美国的保护伞，欧洲注定将夺回军事工业的主导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欧洲央行注定要争夺国际货币体系控制权。欧洲将抵制而不是支持美国的领导地位。

一个地位上升的欧盟将肯定会尝试挑战美国。其结果就是一个曾经团结一致的西方世界将要一分为二，成为竞争对手，更多的冲突将由此而来。美国人对一个统一的欧洲所带来的挑战曾经不很在意。大多数美国决策专家都一厢情愿地认为，即使欧盟拥有政治经济强国的所有特征，也不用大惊小怪，因为大西洋同盟的友好关系是无法改变的，欧盟与美国分道扬镳近乎不可想像。

现在看来这些想法是错误的。虽然欧盟目前并不是一个中央化的联邦，其一体化过程尚处于推进阶段，但是，欧洲一直在尝试将以前各自为政的国家联合成一个政治实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有点像美国自身的历史。1781 年，《南部邦联条例》生效，美国 13 个州组成了邦联国会，形成了邦联性质的国家。当这种形式被证明太软弱、没有足够的约束力来维持这个邦联时，美国于 1789 年选择了更为紧密的联邦形式，当时的财政部长 A·汉密尔顿甚至组织了联邦党，主张中央集权。随后美国又花了大约 100 年时间增强管理机构、培育民族特征，并最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目前的欧盟也在走一条相似的路，欧洲近 50 年以来一直在努力建立一个政治联盟，虽然它在今后面临着诸多障碍，但欧盟已成为一种集体力量。



实际上，美国和西欧所奉行的社会模式是有差异的，欧洲各国的经济运行与美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也有着很大的差别。

美国人对在欧洲盛行的接近于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予以谴责，欧洲人则对美国收入不平等、夸张的消费主义、物质利益至上的倾向嗤之以鼻。

随着欧洲继续推进一体化，欧洲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将与美国利益经常发生碰撞，双方的敌意将日益明显。2003 年 6 月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击败了美国的波音公司，同中东 3 个国家签订了价值 170 亿欧元的合同，它们还在蚕食波音公司在中国和拉美的飞机市场。





战争让大西洋两岸关系出现“地壳构造般的变动”

来自挪威的诺基亚公司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厂家，它们打败了摩托罗拉公司，成为这个全球利润最丰厚行业里的老大。

空中客车公司和诺基亚公司只是击败美国竞争对手的众多欧洲公司中的两个代表。

在其他敏感产业领域，欧盟国家也将抛开美国，另起炉灶，如欧盟决定建设自己的卫星网络——加俐略计划，以减少欧盟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20 世纪 90 年代支撑美国经济繁荣的投资，其中很大部分

近来不断流向大西洋对岸，现在的德国已经比美国更受资本的青睐。更多的资本的流入，使欧元获得了抗衡美元的力量，也使欧盟能够加大投入，更快地提高生产力。

从一开始，欧洲一体化除了经济上的目标外，还有政治上的目标：将欧洲大陆长期交战的国家联合在一起，成为地球上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欧盟在1999年任命了其首位外交官员，尝试以同一个声音，解决巴尔干、中东以及其他麻烦热点地区的问题。欧洲单一的安全政策在欧洲民众中的支持率超过了70%。

现在欧洲一体化的许多目标已经实现。从德国边境去法国如同驱车从美国东海岸的纽约到西海岸的旧金山一样便利：没有护照管理、没有海关和汇率、没有任何其他的阻碍。

较为年轻的一代欧洲人正在取代老一代欧洲人，他们既未经历过两次大战也未曾经历过冷战，没有战争痛苦的回忆，没有对马歇尔计划的感恩。在年轻一代欧洲人的思想里，一种新的欧洲意识在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逐渐成型。



新欧洲意识认为，一体化是提高欧洲实力，实现欧洲国际雄心的一个必然之路。更多的国家应该加入法国抗衡美国的努力中去。德国总理施罗德就呼吁建立一个“更加统一的欧洲和扩大的欧洲，以抵制美国的霸权”。

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也表示：

> 欧洲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在欧洲大陆建立一个“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

瑞典首相佩尔森表示：

> “欧盟是为数不多的能与美国世界统治地位相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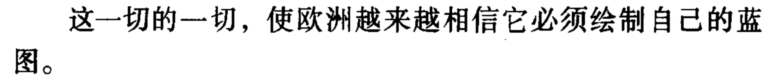
衡的机构之一。”

双方奉行的外交政策也不相同。美国人依然信奉实力政策法则，把军事威胁、高压与战争视为外交的必要工具，而欧洲人大体上在近50年中一直设法驯服国际政治，赞成法制，主张将枪炮搁在一边。美国把国际组织看作是对美国主权的损害，而欧洲则把这些组织看作是建立国际间正常制度的工具。

美国感兴趣的是权力的再分配，而欧洲人则试图建立国际间相互交往的规则，欧洲已经越来越不能忍受美国在世界事务问题上对欧洲发号施令。

布什不愿签署《京都议定书》、不再遵守反导条约，与不少多边机构关系越来越疏远。“9·11”事件后，欧洲人希望面对恐怖主义威胁的美国重新回到多边主义的轨道上来。但是不久，布什就单方面宣布伊拉克、伊朗以及朝鲜是“邪恶轴心”，并暗示，不管其盟友是否同意，美国都准备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这一切的一切，使欧洲越来越相信它必须绘制自己的蓝图。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再也不会回到老路上去了。伊拉克战争“胜利”后，欧洲和美国将有越来越多的争吵，美国会坚定不移地分化欧洲，对法国和德国采取不同的打压、分化策略。但这次，欧洲人已把美国的意图看得清清楚楚了。

欧洲将会更加相信自己的道路，新欧洲意识将使欧洲变得更为独立强大。这种不同以往的分裂，正如一位美国政治评论家所说，可能预示着历史的又一个轮回：

“在脱离了大英帝国之后，美国成为一个单一联

邦，成为一个世界主要国家，最后它使得欧洲列强黯然失色，它的软权力是欧洲所难媲美的。

但现在事情好像全部颠倒了过来，在国际关系中，美国强调硬权力，喜欢用独断专行和武力来解决问题，而欧洲强调软权力。现在轮到欧洲上台并摆脱一个拒绝交出其至高无上特权的美国的时候了。”



第十章 震耳欲聋的沉默





佛经故事说，最可贵的东西是得不到和已失去的。不管萨达姆是被美国人炸死了，还是被美国人买通了，还是和“侵略者”做了一个交易，阿拉伯国家这次是失去了萨达姆，同时也体会到萨达姆对于阿拉伯世界的可贵。

伊拉克战争中，阿拉伯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在静默中同美国保持了较远的距离。但在这一普遍沉默的深处，隐约可以听到振聋发聩的“惊雷”。

一、拉登与文明

一个让很多美国人头痛的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头号通缉犯拉登，却赢得了阿拉伯世界青年的敬佩，成为他们的英雄模范，这个事实到底说明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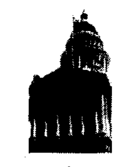
拉登祖籍也门，其父20世纪70年代定居沙特阿拉伯，随后经营建筑公司并成为中东最大的建筑商之一，负责为波斯湾国家建造道路、大厦、清真寺、机场等基础设施。拉登早年已

表现出对伊斯兰宗教的虔诚，在家族生意中主力负责重建麦加和麦地那两座清真寺。

1979年，拉登取得土木工程学学士学位。当苏联挥军入侵阿富汗时，他响应阿富汗穆贾赫迪——圣战者（Mujahideen）的援助呼吁而举家前往阿富汗，他认为再没有比参与伊斯兰圣战更能获取他世的特殊位置的事情了，用拉登自己的话说：

“在阿富汗生活一天，胜过在普通清真寺祷告一千日。”

在阿富汗，拉登不只是出钱在海湾国家招揽阿拉伯战士投入阿富汗的反苏联入侵之战，他本人也踏上战场，与农民和战士在前线与苏联军队展开激战。20世纪80年代，沙特阿拉伯国王曾同意让拉登负责重建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的清真寺，合约非常可观，但拉登以阻碍他专注圣战为由予以了拒绝。



其后，拉登返回沙特阿拉伯，眼见国家竟容许美军进驻，及未能有效实施伊斯兰法律，于是公开批评沙特王室，最后在1991年流亡苏丹。

拉登的生意并未因逃亡而萎缩，相反更蒸蒸日上。拉登把做生意赚来的钱大量资助阿富汗、波斯尼亚、也门、车臣等地的“圣战”活动。1996年夏天，苏丹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将拉登逮捕并将其遣送出境，拉登遂将总部从苏丹迁移至阿富汗，继续资助和组织全球的“圣战”活动。

1996年8月26日和1998年2月23日，拉登先后向全球穆斯林发出《反对美军占据伊斯兰两个圣地的宣战声明》、《赶逐异教徒离开阿拉伯半岛》的声明以及名为《向犹太人和十字军

发动圣战》的伊斯兰法令。在上述声明和法令中，拉登“慷慨陈词”地谴责以色列和美国的联盟，认为这一联盟是犹太主义者跟基督徒十字军的阴谋，目标乃是打击伊斯兰世界和非法占领伊斯兰圣地。

明显地，拉登的恐怖主义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极端行为，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阿拉伯世界群众的反抗情绪：抗议美国控制波斯湾地区、占据伊斯兰圣地和抗拒敌对伊斯兰的价值观进入伊斯兰社会。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各洲的殖民地纷纷获得解放，但对阿拉伯世界而言，强势的西方力量一直试图长期控制中东地区。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英国和法国犹如中东国家的“宗主国”，1956 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苏联和美国的势力开始渗入中东地区。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中东地区惟一存在庞大势力的国家，并有变本加厉的迹象。



因此，拉登提出将美军赶出伊斯兰两个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和重新夺取穆斯林心目中被以色列占领的耶路撒冷，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很多穆斯林的共同希望。

循此脉络理解，假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对中东伊斯兰国家施加制裁和轰炸，那么类似拉登的极端反西方立场和恐怖主义将会持续下去。著名穆斯林文化研究学者萨特（Ziauddin Sardar）指出：

> 拉登的激烈、跨国恐怖主义正是西方强暴全球伊斯兰社会的产物，当拉登在阿富汗阻挡苏联军队进入时，美国不单予以支持并视他为抵抗共产主义扩张的英雄，但现在拉登却变成全球恐怖主义的恶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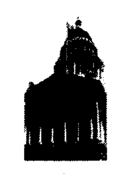
影响阿拉伯民众对拉登看法的因素，也同样影响着他们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

二、震惊的阿拉伯世界

在美英联军占领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之后，CNN 等美国媒体一再向全世界播送巴格达市民欢迎美军、捣毁萨达姆雕像的场面，这些市民中可能有萨达姆的反对者、什叶派穆斯林，也有不久前刚刚焚烧美国国旗的萨达姆的支持者。

但这个场面不是全部，在镜头不能到达的地方，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沙漠和平原上，另外一些眼睛里的镜头也许更平衡、公允地说明问题。

约旦河西岸城市拉马拉的一个居民说：



“这是一场悲剧，也是一场血腥的喜剧，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发生了什么？伊拉克好像没有战斗就放弃了巴格达，伊拉克军队在哪里？他们都消失了吗？”

一个名叫贾达赫的工程师说：

“这是耻辱的一天。在今天，阿拉伯人成为奴隶。惟一敢对美国说‘不’的人消失了。而留下的就是一群卑躬屈膝和苟延残喘的阿拉伯领导人。”

“如果这是真的，那真挺叫人沮丧。我们本来希望萨达姆会狠狠打击侵略者，尽可能给对方造成大量伤亡，给他们一个教训，好让他们在打算进攻下一个

阿拉伯国家时三思而后行。”

在埃及首都开罗，41岁的地区市政委员会职员阿卜杜勒·法塔赫拒绝相信美军已经进入巴格达：

> “这是一场心理战”，“即使消息是真的，那也只是（伊拉克的）一种军事战略，目的是引诱美军跳进圈套”，“萨达姆自己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一名23岁的叙利亚美发师说他感到“非常难过”。

阿曼一名大学教授阿卜杜勒·穆奈姆·侯赛因表示，他希望共和国卫队和守卫巴格达的伊拉克正规军仍能够在某个时候出现，展示一下他们的威力。



很多阿拉伯人认为，美英军队控制下的伊拉克与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已经没有多大差别。

在内心深处，许多阿拉伯人都承认这一点，即伊拉克的倒下意味着阿拉伯世界又一次屈服于外界的强大力量，这是中东地区这么多年冲突不断的最主要原因。因此，从心理上，阿拉伯国家的老百姓难以接受巴格达如此之快地被美军占领的事实。

对美军战争的胜利，一名埃及志愿者说：

> “阿拉伯人将不会忘记这场战争。几天前，我听英国一位政治家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几百年前英国跟法国之间的战争。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这场伊拉克战争。”

在约旦首都安曼，人们不时看到，一个阿拉伯男子透过汽

车的窗户向一群在咖啡馆里的西方记者大喊“伊拉克万岁”。另一个男子则向街上的一个西方妇女喊道：“下地狱吧。”“不要告诉人们你是美国人。”一个出租车司机警告记者说。一名没透露姓名的、在西方受过教育的约旦上层妇女说：“民众的愤怒已经到了顶点。”而其他国家，像科威特、卡塔尔、巴林以及沙特等，人们都呼吁美英退出海湾地区。



“傲慢地炫耀”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
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严重受损



美国与英国一直宣扬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师出有名，因为萨达姆政权没有与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进行合作，战争是为了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但是在阿拉伯世界，民众通过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黎巴嫩电视台以及阿联酋“阿布扎比”电视台转播的战争图像，看到

的是巴格达不停遭到轰炸、伊拉克平民不断出现伤亡的画面，这些画面与美英宣传的完全不同，使阿拉伯民众难以相信美国。

战争期间，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穆萨在接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家媒体采访时说：

> “因为他们（美国与英国）选择用战争来对付伊拉克，阿拉伯民众十分生气，感到失望、愤怒。”

约旦的政治评论家乌莱卜·兰塔维说，阿拉伯世界对待战争的态度已经恶化到了“最坏的程度”。他说：



> “看到伊拉克境内设立的检查站与伊民众的伤亡，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绪越来越严重。如果他们（美国和英国）想要在中东地区保持他们的长期利益与友好伙伴关系，他们就不能用‘阿帕齐’武装直升机来输出民主。民主取决于伊拉克人民的广泛民意。”

阿曼的一位教师苏莱曼·艾哈迈德说：

> “美国人之所以要推翻萨达姆，是因为他们想在巴格达建立一个为其利益服务的傀儡政府，这没有什么可以高兴的。我们不会看到他们所承诺的和平，只会看到新一轮的冲突。”

伊拉克战争虽然是在阿拉伯国家的沉默中发生的，但萨达姆如此不堪一击在震惊了阿拉伯民众的同时，也震惊了阿拉伯世界的精英。

在以见解大胆犀利而著称的黎巴嫩《生活报》上，沙特学者哈立德发表了题为《伊拉克战争：复兴的破灭》的专栏文章，揭示了阿拉伯国家为什么如此震惊。该文痛陈阿拉伯世界的孱弱和分崩离析，分析了伊拉克战争对阿拉伯世界的深远影响，呼吁整个阿拉伯世界深刻反省，亡羊补牢，再图振兴。现将此篇文章要点摘译如下：

对于美国来说，这场战争的胜利必将它的霸权推向亘古未有的高度，但对于阿拉伯民族来说，则无异于历史的退步，他们又回到了被殖民、被统治的原地，如何想像今后世界上哪个大国能够颐指气使地指挥我们，我们只能顺从，否则只有被武力征服？但这确实发生了，而且是在阿拉伯国家独立后仅仅半个世纪。



冷战结束后，阿拉伯国家纷纷乐观地认为，苏联的解体将使以色列失去其对美国的战略意义，美国将更倾向于中立，阿拉伯世界将迎来振兴的良机。于是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以后，阿拉伯国家毫不犹豫地投向美国的怀抱，帮助美国去打败他们中的一员，坚信与他们利益相悖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拉克。而进程的发展却恰恰相反。一是因为美以的战略关系超越冷战，它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阀门”，也就是说只要有它，美国就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中东局势。二是因为阿拉伯世界的孱弱。就连他们内部的斗争都无法处理，只能任人干涉。

同美国的联盟只不过是鼠目寸光、各怀私心的结果。解放科威特非但没有振兴阿拉伯民族，相反更深化了他们的矛盾。而伊拉克虽然战败，却堂而皇之扛

起了阿拉伯的大旗，赢得了阿拉伯人民的同情，结果使其他各国政府失去人心，政治、经济形势更加糟糕。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迎来了新一轮的美伊战争。这场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有这样几个结果：复兴破灭、阿拉伯世界体系解体和阿拉伯声誉尽失。我们和整个世界都清楚，这是阿拉伯世界败落的开始。阿拉伯世界的无能、虚假和分裂，所有的污秽丑事一览无遗。地区的安排已不由我们来选择，而是由超级大国来主宰和操纵。

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却无人知道如何进入？将要付出什么代价？如果要对抗这种局面，却又不知道如何去做，如果拒绝美国的安排，我们是否有能力和意志选择别的道路？光说要维护领土、主权和伊斯兰是不够的，侃侃而谈于事无补，以往的做法只能使我们回到无休止的争斗和倾轧之中。我们最需要找到一个机制，使我们能出现那些能够做出令人信服的阿拉伯自己决定的组织和政府，来团结内部，赢得尊重。



现在，阿拉伯人眼睁睁看着伊拉克沦陷，看着这个地区走向毁灭，看着美国人收拾这个政府。阿拉伯国家的无能和不负责任以及联合国的退缩，使得美国按着自己的意志和利益重组伊拉克。难道阿拉伯国家只能袖手旁观，熟视无睹在伊拉克发生的一切吗？

在伊拉克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军事占领的同时，不远处另一个国家以色列，屡次违反国际公理和联合国决议，美国却

不闻不问，甚至百般包庇。这使绝大多数阿拉伯人认为，美国是一个打着现代标签，行西方殖民统治之实的敌对国家，是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世界的敌人。

一旦这个观念形成，任凭美国军力有多么强大，任凭美国提供多少援助，任凭美国如何利用阿拉伯代理人作宣传，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麻烦将源源不断。

三、垂涎已久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也有它的脆弱之处。石油就是美国的脆弱处之一。美国维持着世界上最高的能源消费。其人均能源消耗是世界人均水平的5倍以上。



美国人的生活是“泡”在油里的。一天不能离油，三天不能断油。如果全国断油七天，多数人就会冻饿而亡。

美国家庭的冰箱中只贮存了3—7天的食物，家家每周开着车到超市去采购。超市的食物则靠庞大的运输网络日夜不停地补充。美国是个驾在轮子上的国家，轮子转不起来，先进反而不如落后。

美国的粮食、肉蛋也是高能源消耗产业。1994年美国的农业人口只占2.24%（中国占76.37%），生产出的粮肉蛋还要远销外国。这种高能耗农业，实质是用油换粮。一旦缺油，则种子难下地，粮食难成长，谷物难收回。

美国的强大国防机器，离开了油就是废铁一堆。美国物资应有尽有，却又是个十分依赖世界进出口贸易而生存繁荣的国家，缺了油贸易立即枯萎。

1992年美国人均能源年耗（石油当量）为7.662吨（中国为0.6吨，为美国7.8%）。美国1992年进口石油达4.48亿

吨。油价上涨20%就会全国恐慌，上涨50%就会导致经济衰退，繁荣消失，陷入经济恐慌之中。

正是因为如此，美国更依赖第三世界那些石油输出国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石油输出国家掌握着美国的生存与繁荣。美国可以让日本对自己说不，但绝对不能容忍富产石油的海湾国家对自己说不。

中东阿拉伯国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因为他们得天独厚，拥有大量的石油资源，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7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随着工业、军事急剧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石油的依赖也到达顶点。

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在经济法则上占尽便宜，赚了无数的钱，但却不得不把赚到的钱拿到中东国家去购买石油，中东阿拉伯国家因此而富裕。阿拉伯国家控制着石油，等于控制着西方国家发展的命脉，这是西方国家不能容忍和一直想改变的。



侵占和控制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一直梦寐以求的事。阿拉伯国家地域甚广，各国以真主的名义相互支持，曾经形成一个比较牢固的防御系统，让美国无机可趁。假设阿拉伯国家一直能团结一致，美国本事再大也无法闯入中东。

为了最安全地取得中东地区的石油，长期以来，美国想方设法分裂中东国家，积极扶持反政府势力，帮助叛逆者推翻旧政府，试图建立一批听话的傀儡政府。通过多年渗透，美国逐步间接地控制了一部分石油，但这远远不能满足美国的胃口。

苏联解体后，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力的跃升，使它具备了独吞伊拉克的能力。阿拉伯国家的分裂瓦解，则在另外一方面为美国立足中东，施行侵略扫清了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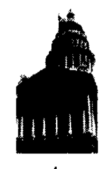
正因为阿拉伯国家各自为战，民族分裂，当伊拉克被外人

明目张胆地侵略欺凌时，中东国家几乎无人敢勇敢地站出来，只有叙利亚敢对伊拉克说几句同情的话。

人必自侮而后外人才能侮之，正是阿拉伯国家的不团结，才会给外敌趁虚而入的机会。伊拉克战争和萨达姆政权的迅速倒台，使阿拉伯人看到了美军常驻伊拉克的远景，看到了一个亲美的伊拉克政权的远景，看到了伊拉克可能和以色列相互呼应的远景。

在伊拉克战争向前推进的时候，以色列一直没有对巴勒斯坦人采取任何动作，这是因为美国的压力，美国要求以色列在战争结果还没有明确的时候，不要给自己添乱，因为它的任何动作都可能会打破已经非常脆弱的阿拉伯世界的沉默。

美军占领伊拉克全境之后，以色列是最高兴的国家。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中对美国最强硬的国家，如今它完全被美国征服了，这对于以色列来说，就像美国的胳膊突然伸到了自己的后腰，踏实得不得了。



阿拉伯国家现在开始担忧“盎格鲁—犹太帝国主义”：在伊拉克之后，肢解沙特、叙利亚、约旦、伊朗，建立“大以色列帝国”，确立以色列在中东的“超级强权”地位。

在伊拉克战争胜利之际，华盛顿一位官员宣称：

> “中东地区将翻开新的一页”，“今后一段时间包括叙利亚、伊朗、沙特和埃及在内的众多国家将发生巨大变化”，“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将产生民主政府”。

美军轻而易举进入巴格达，将萨达姆雕像拖倒的时候，许多阿拉伯人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不愿意代表阿拉伯世界最强悍声音的国家就这么轻易地被美国扼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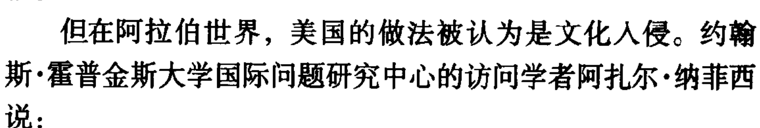
从此，中东可能再没有萨达姆，美国将以伊拉克为改造阿拉伯国家的榜样，而且，这个榜样是这么容易征服，美国会不会因此认为，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是这样？

四、100个新拉登？

征服土地容易，征服土地上的人民难；破坏一个国家的文明容易，改造一个国家的文明难。而强加在阿拉伯文明上的改造可能激发更多的仇恨。

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3年4月21日报道，美国政府已着手安排编写新教科书，替代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教科书。同时，美国要在伊拉克推出新电视节目，扩大广播能力，并招聘数百名讲阿拉伯语的新闻工作者。美国要在伊拉克发动一场文化战役，以证明美国式的民主可以在阿拉伯世界扎根。





但在阿拉伯世界，美国的做法被认为是文化入侵。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阿扎尔·纳菲西说：

> “如果你不了解文化背景，宣传可能有害无益。对伊拉克等国的任何宣传的基础应该是对话，而不是向人们进行灌输。”

美国和伊拉克各自的文化背景是什么样的呢？美国文明源自欧洲，美国文明和伊拉克文明的关系可以从欧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关系上略见一斑。

在欧洲处于“黑暗时代”的中世纪时，两河流域的阿拉

伯—伊斯兰文化迎来光辉时期。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天文台、医院均在这个地区。巴格达是世界文化中心之一。巴格达智慧宫藏书200万册，此外这座城市还有30座图书馆。

希腊欧几里德几何学、托勒密天文学和阿基米德物理学都有阿拉伯文译本，有的还不止一种。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其门人的各类哲学、伦理学、逻辑学、修辞学著作，都有经过了阿拉伯人考证、勘误、增补和诠释的译本。

11世纪巴格达尼采米亚大学、开罗埃资哈尔大学都已经分系建立神学以外的学科，如天文、医学和数学等系，并接受来自欧亚非三洲的留学生。据说，法国巴黎大学分系的设想便是直接受此启发。

14至15世纪，欧洲“黑暗时代”走到尽头，欧洲文艺复兴开始了。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被重新认识和发现了。欧洲从阿拉伯文化里找到了“复兴”的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本的希腊典籍，被欧洲人译成拉丁文和西方各种文字，并被当时的欧洲各大学当作教材。



西班牙的长利多城曾经成为欧洲学习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源泉和中心，那里设立的主要翻译阿拉伯文典籍的翻译局直到近代以后方才撤销。没有阿拉伯人保存了古希腊、罗马文化，欧洲文明将可能找不到源头。从这个意义上讲，阿拉伯人是欧洲的“恩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美国的轰炸机和“战斧”式巡航导弹穿过巴格达夜空呼啸而去的时候，当建国才200多年的美国要改造伊拉克文明的时候，普通的阿拉伯人会怎么想？也许他想到了昔日阿拉伯帝国曾给予欧洲人的种种恩泽，也许他觉得悔不当初，不该用阿拉伯文化当作“桥梁”沟通了欧洲的古今文明，到最后落得了恩将仇报的下场。

如果说，“9·11”事件还只是少数激进的伊斯兰分子对西方文明的仇恨所致，著名学者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无法正确解释这一事件的话，那么伊拉克战争正在使这个预言部分地成为了现实，不过这个文明冲突不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而可能是美国文明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冲突。

也正是因为如此，阿拉伯人难以接受美国要改造伊拉克文明的做法，并痛恨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一些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的约旦人指出：

> 布什是侵略者和恐怖分子，他把在伊拉克发动战争当作“电子游戏”。同萨达姆比起来，“我们更恨美国人”。



在开罗，有人威胁说，一个伊拉克人被杀死后，将有四到五个人来为他报仇。穆斯林不会忘记美军在阿拉伯土地上犯下的罪行，因此“美国是阿拉伯世界的敌人”。美军希望能通过伊拉克战争来震慑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做法肯定是徒劳的。

早就有人说过，伊拉克战争可能引发全球新一波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而在占领伊拉克之后，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将更趋复杂，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会进一步展开。同时，反美、仇美的情结也可能会在更多的阿拉伯民众中酝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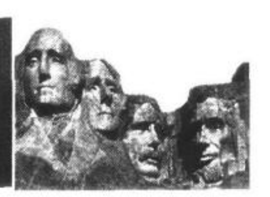
因此，伊拉克战争根本不能根除恐怖主义的土壤。美军可以通过这场战争击败萨达姆政权，但它同时也失去了10亿穆斯林的民心，许多原本持“温和立场”的阿拉伯人反而会因此投入极端分子的怀抱。专家们指出，制定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计划的人根本不了解伊拉克的真实情况。这些人过分迷信压倒性的武装力量可解决一切问题，他们必将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美国鹰派称，美国不能因为“怕遭到袭击”和仇恨便“向敲诈和勒索低头”，否则将“永无宁日”，各种更苛刻的条件将接踵而来。针对美国鹰派的叫嚷，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警告说：

> 伊拉克战争可能促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壮大。
>
> 如果战前还只有一个拉登公开同美国作对的话，那么战后可能会出现“一个萨达姆倒下去，100 个新拉登站起来的局面”。



第十一章 戒心、恐惧和愤怒



在1840年的经典著作《美国的民主》中，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写道：



> “一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抱着这个世界上的物品不放，就好像他确信自己永远也不会死去，他急功近利，贪得无厌，以致人们会以为美国人总是担心自己不够长寿，无法尽情享用这些物品。”

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追求自己的利益，更加为所欲为。被美国认为是潜在敌手的国家，或者是被美国认为妨碍了其利益的任何国家，迟早会被美国找到打压分化的借口。

这样的美国，怎能不让其他国家感到自危？事实正是这样，当前，世界上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戒心和恐惧比过去要深得多。

一、俄罗斯

伊拉克战争严重损害了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人认为，美国这绝对不是最后一次，在消化伊拉克之后，美国还将继续蚕食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

除了法国，伊拉克战争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俄罗斯了。虽然美国极力拉拢俄罗斯，但这就像是一边抢夺别人的东西，一边说我们友好吧，不能让人相信。

从1996年底至2002年7月31日，俄罗斯共向伊拉克出售了价值41.8亿美元的商品，主要是日用品、食品、药品、采油设备等，这对于日用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的俄罗斯来说，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最重要的是石油利益。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1997年赢得伊拉克西库尔纳油田价值200亿美元的开采权。此外，在伊拉克石油开采和转手销售中，俄罗斯也获利匪浅。2002年5月结束的一轮6个月的“石油换食品计划”内，俄罗斯购买了伊拉克2.26亿桶出口原油中的9000万桶，价值约18亿美元。俄罗斯将这些伊拉克原油转手卖到美国、欧洲和亚洲，给俄罗斯公司至少带来2亿美元的利润。

但如果伊拉克建立亲美政权，俄罗斯在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将基本成为泡影，俄罗斯自身的石油战略资源的价值也将大打折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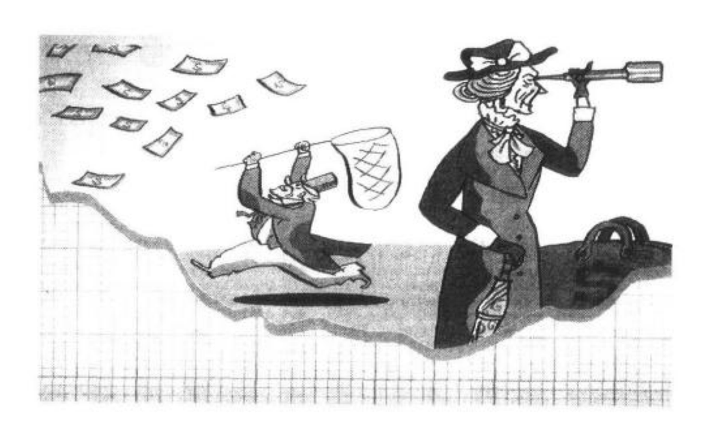
美国完全可以通过控制伊拉克的石油来影响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控制俄罗斯经济的复兴。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所称，如果国际市场上每桶石油价格下跌6美元，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将下降一半。而如果油价跌到13美元/桶以下，俄罗斯所

有石油公司都将亏损，俄罗斯经济面临崩溃危险。

为此，俄罗斯曾要求美国做出承诺，确保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国际市场的油价能够稳定在21美元/桶左右。对俄罗斯的这一要求，美方官员当时的答复是模棱两可：美国愿意尽力确保国际市场油价的相对稳定，但以美国的能力并不能完全控制国际石油市场走势。

南下波斯湾，获得出海口，是自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就有的梦想。在苏联时代，伊拉克是俄罗斯在中东的重要政治盟友。普京执政后，加强与两伊的关系进而涉足中东事务，成为俄全方位外交的重要支点，也是利用“无赖国家”对美形成牵制的主要手段。





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追求自己的利益

“9·11”事件后，面对美染指中亚高加索的强硬攻势，俄罗斯无力正面狙击，转而侧面迂回，借助美国对武器扩散等问题的担心，强化与伊拉克和伊朗的军事关系，获取制约美国的手段。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俄罗斯军队一直不安地关注着从前的盟友——伊拉克人与美国人之间的这场较量，并希望美国能在伊拉克战争中陷入泥潭，或者在伊拉克战争之后遭遇挫折。

在伊拉克战争的头两个星期，叶利钦总统时期的国防部长、空军将领沙波什尼科夫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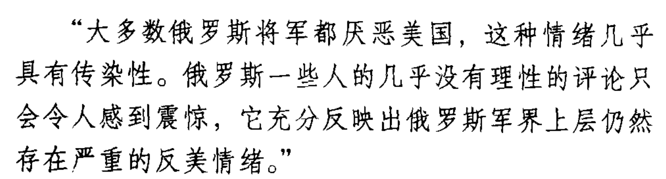
“联军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伊拉克当局没有对他们的国家和部队失去控制。”

苏联时代曾经当过国防部长的亚佐夫元帅讥讽地说：

“迄今为止，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军只控制住了沙子。”

美国人也充分感受到了俄罗斯的不满。美国媒体评论说：





“大多数俄罗斯将军都厌恶美国，这种情绪几乎具有传染性。俄罗斯一些人的几乎没有理性的评论只会令人感到震惊，它充分反映出俄罗斯军界上层仍然存在严重的反美情绪。”

“正是这种状况迫使普京假装忘记了‘9·11’事件后已变得更加牢固的俄美战略联盟。”

“俄罗斯领导人正充满戒心地看着美国在伊拉克战场上的胜利。”

美国人反过来责怪俄罗斯幸灾乐祸，认为俄罗斯希望美国在伊拉克失败完全是不怀好意。

但俄罗斯公司丢失掉的合同，现在到了美国公司的手里；

俄罗斯和伊拉克政府的亲密关系，将变成美国和伊拉克政府的密切关系；被普京总统用来加强他在国内威望的伊拉克，现在成为布什总统用来追求连任的战利品。

一切表明，美国和俄罗斯在伊拉克的竞争是零和性质的。美国所得到的，就是俄罗斯所失去的。而且有迹象显示，同样性质的争夺还将扩展到俄罗斯的软肋中亚地区。

中亚地区，幅员辽阔，人口稀少，但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20世纪初英国战略学家麦金德曾说：

> “中亚及其附近地区是国际政治的心脏地带，而亚欧大陆则是世界岛。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控制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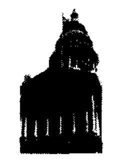
位于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五个国家都是多民族的国家。中亚五国曾都对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塔利班表示支持，与美国在反恐方面统一步调。

乌兹别克斯坦甚至向美军提供位于其边境城市铁尔梅兹附近的军用机场，美军第10山地师1000名官兵由此取道乌兹别克斯坦，参加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这是“9·11”事件以来美国向阿富汗北面的中亚地区派遣的第一支地面部队，开创了历史先河。俄罗斯在中亚发挥主导作用已有100多年，但现在，美国在渐渐取代俄罗斯的位置。出于反恐需要，美国对车臣问题暂时低调反应，这只是为了不刺激俄罗斯，是美国人“政治现实主义”的具体体现。一旦需要，美国还会重新提出车臣问题。

俄罗斯方面认为，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不会真正相信美—俄伙伴关系，美国会利用任何可能出现的有利时机，抢夺俄

罗斯的利益，在这样心态下的俄罗斯，对美国的戒心急剧上升。2003年5月12日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专门刊载了美国一些军事专家的预言：未来10—15年内，美军可能出兵俄罗斯。这份由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推出的报告上，列举了几种美国可能出兵俄罗斯的情形：

> 俄罗斯内乱丛生，陷于崩溃。作为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能源丰富且拥有生化和核武器的大国，如果内乱不止甚至分崩离析，将引发地区和全球大乱，美国绝不能坐视不理，必将派兵或联合盟友到俄罗斯本土维持秩序。
>
> 个别独联体国家受俄罗斯欺负而向美求助。近年来，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之间龃龉不断。俄罗斯指责格、阿支持车臣叛匪，向其提供物资和藏身之所；而格、阿则批评俄罗斯挑动格、阿两国境内的分离势力，鼓励其独立或加入俄罗斯。
>
> 俄罗斯为惩戒两国，可能向边境集结重兵，威胁动武。而与格、阿两国交好的乌克兰则宣布支持格、阿。这三个亲西方国家无力与俄对抗，将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求援，美将借机对俄罗斯出兵。
>
> 俄罗斯和欧美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危害中亚地区多年的极端宗教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近年虽遭到有力打击，但其残余力量仍在继续活动，并不断制造恐怖暴力事件。他们声称已掌握核武器，将攻击俄罗斯大城市，并对欧洲和美国发动恐怖袭击。
>
> 美特种部队将以打击恐怖主义之名进入俄罗斯境内。虽然俄罗斯可能不愿美军借此进入其领土，但美



认为俄罗斯单独行动难以成功，况且俄罗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安全，也会绕过中央，直接求美出手。

在一些俄罗斯人看来，美国把俄罗斯当作是和苏联竞争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站，只要俄罗斯还拥有可以打到美国的战略武器，只要俄罗斯还是一个潜在的大国，美国就不会真正对它放心。因此，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并不是天方夜潭，美国是完全有可能干涉俄罗斯内政的，对美国的戒备怎么加强都不为过。

二、南亚:印度



印度的10亿人口中穆斯林人口约为1.2亿。但印度对美国的戒心，主要来源于克什米尔问题引起的印巴争执以及印度自身的核武器问题。一位印度学者提出：

“美国代表了对印度外交和政治上最主要的威胁。在几乎所有牵涉到印度的问题上美国都有使用‘否决’权和其号召力的能力，这些问题包括核武器的、技术性的、经济上的、环境上的或政治上的，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否定印度的任何目标并集合他国对印度进行征罚。”

印度和中国一样，曾经是世界上强大的国家。早在印度独立以前，尼赫鲁对印度的未来地位就已做出了明确的阐述：

“印度，是不可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

> 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我不相信中间地位。”

作为曾经的不结盟国家领袖，印度珍视自己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这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但伊拉克战争开始时，由于担心将来美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偏向巴基斯坦，印度政府并没有强烈谴责伊拉克战争。

这一模糊政策立即遭到印度国内反对派的指责。印度联合政府内部的非人民党党派成员对瓦杰帕伊的讲话普遍感到“震惊”。他们认为：

> “如果印度政府今天不表明坚决反对美国进攻主权国家伊拉克的立场，那么总有一天当有人侵略印度时，也没有人会支持我们。”



此后，印度的立场有了改变。瓦杰帕伊在与布什通话时说，印度认为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在同许多国家一起努力化解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危机，因此无法给美国提供援助。瓦杰帕伊告诉媒体：

> “我还致信包括俄罗斯、中国、法国和美国等许多国家的首脑，因为这场战争是同联合国精神相违背的，我们对此深表不安和关注。”

印巴关系是南亚次大陆最重要的关系，双方因为克什米尔问题而敌对。当初，英国殖民统治者一手安排了印巴分治，并留下民族宗教复杂的克什米尔问题，目的是为以后插手南亚事务留下伏笔。

美国的新罗马帝国战略目标之一就是，要在全球重要战略地区取得发言权。印巴冲突将是美国插手南亚事务的一个天然的机会。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印度更加意识到，要想让美国难以介入印巴冲突，最好的方法就是由印巴来主导双方问题的解决。

这就是2003年4月份以来，印巴关系有所升温的最主要原因。

在印度外长辛哈公开表示印度有权对巴基斯坦实行“先发制人军事打击”后不到半个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2003年4月18日在印控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举行的群众集会上一反辛哈的强硬姿态，表示印度方面愿意再次伸出友谊之手，与巴基斯坦就包括克什米尔未来地位在内的所有问题进行对话。



瓦杰帕伊在这次讲话中十分罕见地称巴基斯坦为“兄弟”，认为两国之间的“兄弟情谊”能够解决彼此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了使巴方确认接收到印度方面伸出的“橄榄枝”，两天后，瓦杰帕伊再次在克什米尔发出呼吁，希望双方尽快恢复对话，共同开创印巴关系的“新时期”。

当有记者问瓦杰帕伊如何评价辛哈此前的讲话时，瓦杰帕伊回答说，他与辛哈的讲话是基于不同的背景，针对不同出发点做出的反应。

这个“不同的背景”就是美英军队对伊拉克发动的军事打击。

美国攻打伊拉克，用武力推翻他国政权，印度朝野上下对此反应相当复杂。印度方面曾幻想搭上美国的“反恐班车”，借重美国的力量来解决克什尔米问题。

因此，当美国总统布什与瓦杰帕伊通电话，要求印度对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给予支持时，瓦杰帕伊先是不做正面承诺，继而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所谓巴方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恐怖

渗透问题，借机要求美国加大对巴基斯坦的施压力度。

然而，美国从自身全局战略出发，在印巴两国间左右逢源，明确表示克什米尔与伊拉克不具可比性。印度政府由此意识到，想搭“反恐”便车把巴基斯坦纳入美国反恐打击目标已无可能。相反，这可能会正中美国下怀，使美国能借机更深地介入南亚事务。

随后，当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根据伊拉克战事的进展情况提出美国将在战后介入南亚争端，着手解决印巴冲突时，印度方面反应强烈，透出十分的戒心。印度政府当即表示，解决印巴争端是本地区国家自己的事情，任何外人都没有介入的权力。

印度十分清楚，尽管印巴双方长时期剑拔弩张，但双方都拥有核武器，任何一方都不能指望靠战争解决问题。在目前形势下，为了避免印巴争执成为外来势力尤其是美国介入的借口，惟一正确而可行的途径就是依靠本地区政治家的智慧，以积极的态度与和平的方式寻求问题的最终解决。



印度对美国戒心增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核武器问题。

无论美国出兵伊拉克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其摆在桌面上的借口只有一个：即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印度新闻杂志《一周》曾载文指出，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往往源于学术界的研究和讨论。在阿富汗卡尔扎伊政府刚刚上台之后，美国的权威学术杂志上便不断有学者大谈萨达姆手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伊拉克与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之后便发生了伊拉克战争。

在研究了那些与白宫成员来往甚密的美国学者所发表的一些学术文章和研究报告之后，印度学者认为，印度已经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因为 1998 年，印度不顾美国的反对，进行了核试验。美国不会忘记这一点，一位美国官员曾撰文说，印度在 1998 年的核冒险中没有得到足够的惩罚，并且指责印度

的核试验改变了印巴间的武力平衡，促使巴基斯坦也开始核试验。

此外，印度一些专家还指出，美国军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印度的核能力以及印度对核扩散的“暧昧”态度将会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印度随时可能会因为核武器问题而被美国锁定为“惩罚目标”。正如印度核问题专家维杰奈尔所说：

> “每当他们（美国）考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时，印度便会得到最大的关注。”

美国中情局在最近的一篇报告中，把叙利亚列入了印度对外输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受益者。



更加令印度人担忧的是，美国核政策已经从“防止扩散”（anti-proliferation）转变为“打击扩散”（counter-proliferation）。如果说前者更多地涉及到外交手段，后者则意味着美国将会采取如伊拉克战争般的军事行动。

如此看来，印度学者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

在这种心理下，印度不得不对美国心存戒备，并且希望尽快改善同其他世界大国的关系，以平衡美国对自己的影响力。

三、拉美：委内瑞拉

伊拉克战争之所以让委内瑞拉感到恐惧，一样是因为石油。

委内瑞拉是第四大石油生产国，是美国石油的第三大提供者，每天向美国出口 152 万桶石油，而且只要 4 天的运输时间

就能到达美国，对美国能源安全所具有的重大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1998年底，在委内瑞拉大选中获得80%民众支持的前陆军中校、1992年未遂政变领袖乌戈·查韦斯，以绝对优势当选为委内瑞拉总统，其领导的第五共和国运动党跃居为全国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2001年，委内瑞拉修改宪法，查韦斯的总统任期将持续到2007年。

查韦斯一俟就职，立即着手落实他所做出的“严惩腐败，消灭贫困，石油工业国有化”等深合民意的三大许诺，对上届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做出了重大修正，制定了国家经济多元化政策，一方面大力强化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石油工业的国有化程度，另一方面加大了对中小型企业的支持力度。两年多来委经济止跌回升，在拉美国家中属于经济发展态势较好的国家。



但是，美国不喜欢委内瑞拉的石油国有化政策。查韦斯也因此开罪了和布什政府关系密切的美国大石油公司。

犯了美国大忌的是，委内瑞拉不仅要把石油工业国有化，还宣称它可能将向欧元靠拢。这是美国政府最不愿看到的情况：又一个欧佩克国家要在其石油贸易中改用欧元。

虽然委内瑞拉还没有正式采取这一步骤，但是它已经和其他国家签定了13个用石油进行易货贸易的协议。这对美元也是一种威胁。如果这种交易方式得到推广，美元的地位自然受到影响。

查韦斯还坚持拉美解放者玻利瓦尔的“拉美大家庭思想”，积极促进拉美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合作，对美国霸权主义颇有戒心。

2001年4月，美洲国家33国首脑在魁北克举行会议，讨论2005年达成“美洲自由贸易区协议”，惟有查韦斯一人略有微词，他坦言说：

> “这一计划对美国有利，但对多数拉美穷国却有许多不利之处。”

这使他和竭力推动该计划的美国总统布什之间产生了芥蒂。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成员国，基本不与美国合作。

委内瑞拉外长查德顿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后说：

> “世上不存在好的战争，即使是打赢的战争。战争显然使得国际关系失调，联合国安理会里就出现严重分歧，有的欧洲国家反对战争，也有一些国家支持美国。可以说战争造成了国际关系紧张。战争对我们这些不是冲突主角的国家尤其不利。”



针对美国希望欧佩克在战争期间增加原油产量的愿望，委内瑞拉能源和矿业部长拉米雷斯在 2003 年 3 月 22 日表示，委内瑞拉同其他欧佩克成员国一样，不会因伊拉克战争爆发而增加石油产量，它将严格遵守欧佩克的产量配额。

在谈到伊拉克可能退出欧佩克的问题时，拉米雷斯警告说，欧佩克成员国不仅拥有 70% 的世界石油资源，而且生产成本较低，完全有能力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进行一场石油价格战。这是针对美国瓦解欧佩克企图的一次警告。

委内瑞拉的上述所言完全是出自维护本国利益的行为，却被美国看作是自己后院的不安分的骚动。

美国早就想找机会“教训”查韦斯。2002 年初，美国没有说明理由就冻结了许诺给委内瑞拉的发展贷款，并支持委内

瑞拉反对派。

美国还指责查韦斯政府支持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恐怖主义者”。这一指责正式把委内瑞拉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为将来美国以反恐为由，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埋下了伏笔。

查韦斯政府的外交政策，被美国定性为“在南美制造不稳定”的政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在参议院汇报时，攻击查韦斯所作所为“有悖美国利益”，声称美国“必须重新研究对委政策”。

在美国授意和挑动下，2002 年以来，委内瑞拉反对派频频造势，一会儿罢工罢市，一会儿示威游行，称查韦斯是独裁者，他们或要求以公民投票方式结束其任期，或要求立即举行大选，或直接要求查韦斯立即辞职，并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没有成功的政变。



瓦解欧佩克、维持美元主导国际石油贸易的局面是新罗马帝国的宏大目标。委内瑞拉则被美国看作可能会颠覆石油美元的关键地区之一。

这让委内瑞拉政府有理由担心，美国不会放弃通过某种形式，在委内瑞拉扶植一个亲美政府的政策，因为这样可以一劳永逸地让委内瑞拉保持在石油美元的轨道上，并稳定美国的拉美后院。



四、印度尼西亚

印尼是东盟的成员国，也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它自一开始就强烈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这完全是出于对同是穆斯林国家的伊拉克的同情和对美国的愤怒。

总统梅加瓦蒂是最先谴责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她表示，美国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是一种侵略行为，违反了国际法：

“印度尼西亚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拉克单方面的攻击，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促请停战。”

印尼百姓则举行了大规模的反美游行。不同寻常的是，印尼议会议长拉伊斯也参加了反战游行。拉伊斯不仅是印尼议会议长，而且还是印尼穆斯林的一个重要组织领导人，也是2004年印尼总统大选候选人。他致信联合国驻雅加达办事处，要求联合国在国际战争法庭审判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



印尼一些极端穆斯林组织则要求美国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尽快离境。而美国和英国政府也告诫其国人不要去印度尼西亚旅游。

最令美国人震动的一个消息，恐怕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际，该公司发布消息说：将考虑在原油和天然气交易中减少使用美元。

这一行动被外界解释为更多的是从经济目的出发，和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毫无关系，和伊拉克的紧张局势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印尼方面也公开表示，此举的理由是美元币值不够稳定。印尼副总统哈姆扎·哈兹说：

“可以肯定，采用欧元作为支付手段可以有效避免投机盛行的美元交易。”

但这个看似巧合的消息，确实让美国人感到担心。

2003年4月17日，布隆伯格财经新闻专栏作家威廉·派塞克在东京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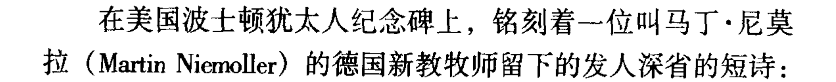
> 该消息短期内不会对其他亚洲国家产生太大的影响。但长期来说，对美元意义深远。也许是美元地位受到动摇的一个标志。

另外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这个消息反映出亚洲削弱美国在本地区影响力的愿望。亚洲国家领导人希望：抛弃美元能加速这一进程。

不管如何，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际做出这个决定，不是对美国友好的表示。



五、后果



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纪念碑上，铭刻着一位叫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的德国新教牧师留下的发人深省的短诗：

>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上文所列举的对美国存在戒心、恐惧和愤怒情绪的国家，不过是很多国家中的一部分。新罗马帝国的雄心表明，美国将继续实行控制世界上重要能源、战略地区的政策。那么，伊拉克战争会不会成为美国单边主义行动的一个模式？美国已经成为让不少国家感到自危的帝国力量，正如美军把在伊拉克展开的军事行动命名为“震慑”一样，新罗马帝国的形象将带来更多的戒心和恐惧。

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鹰派势力又上了一个台阶。曾经自诩为民主政治大国的美国，长期以来存在着文化的优越感，自认为美国的霸权符合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利益，因而在外交行为上表现得更加傲慢霸道。这提醒并迫使各国在与美国打交道时，不得不提高警惕，以防本国成为美国帝国战略的牺牲品。

如果美国鹰派依然故我地按照新罗马帝国的目标行动下去，结果将是什么？有人如此评论：



> 波斯就如同苏联一般，曾对希腊世界造成威胁，而美国则犹似雅典，在与波斯的对抗中取得盟主地位，并趁机建立霸业。
>
> 然而，当其不断自以为是地一意孤行后，终于引起其他城邦的戒心，而步入自我毁灭之途。

这个中肯的评论应该是让美国鹰派醒悟的良言，但遗憾的是，美国鹰派可能要到事情无法挽回的时候才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第十二章 仁慈霸权的消解



鹰派主掌美国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唾弃一些国际条约和规则。



如果说，伊拉克战争前美国的一意孤行还可以勉强以一个超强国家的任性来解释的话，那么，伊拉克战争则如黄钟大鼓一般，震天价地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已经认定，许多即使是美国自身曾经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已经成为新罗马帝国行动的绊脚石。

伊拉克战争毁灭性地动摇了美国仁慈霸权体系的基石。

一、规则之外的美国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虽为超强，但克林顿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并把多极化看作一些大国合理的要求。在这一时期，克林顿政府倡导国际合作，以取得共识的方式来处理国际问题，为美国获得了“仁慈霸权”的美名。

在这一盛名之下，美国也相应地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支持，以美国的优势地位，只要师出有名，各主要国家也会尽量配合美国，如 1991 年的海湾战争。

但自鹰派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增大了发言权之后，国际合作的精神就开始逐渐消失。2001 年以来，美国的决策者让世界看到，在新保守主义的主导下，美国开始独断独行，布什政府实际上试图否定 1648 年威斯特法利亚和会以来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法。一个凌驾于一切国际公认规则之上的帝国形象越来越清晰。其具体的言行表现如下：

1. 迫使其他国家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采取美国的价值观和标准，并以符合美国标准的方式对其他国家划分等级。

2. 企图以治外法权方式在其他国家执行美国法律。



3. 在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口号下，保障全球各地的美国私人公司的利益。

4. 为了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修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政策。

5. 压迫其他国家采取有利美国经济利益的政策。

6. 反对其他国家外销武器，但自己却大量对外销售武器，是全球最大的军火商。

7. 对违反美国政策的国家，动辄采取经济制裁，或战争威胁。

8. 对不与美国合作的国家，称之为“流氓国家”，并尽量将这些国家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9. 对联合国极尽刁难侮辱之能事。

美国近年来已先后拒绝了五个重要的国际条约——《国际地雷公约》、《国际刑事法庭公约》、《京都议定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以及《反弹导导弹条约》。这些协议都是经多年努力，许多国家热心参与的成果。美国一开始也曾支持，但在

接近达成协议时，却以美国内部反对为由而拒绝签字。美国这种态度充分暴露了美国的自私、自大和不负责任。

1.《国际地雷公约》(Banning Land Mines Treaty)

据统计，世界各地埋有 8500 万个地雷，每年约有 2.5 万人因误触地雷被炸死，更多的人被炸伤。为了防止悲剧的扩大，《国际地雷公约》应运而生，在 1997 年便得到了 100 多个国家的支持。1999 年，《国际地雷公约》在加拿大渥太华签署，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之为“世界上弱者与易受伤害者历史性的胜利”。

但美国拒绝在这个公约上签字，其推脱理由之一是美国必须保护在韩国的美国驻军，埋设地雷可以阻挡朝鲜可能的南侵。

2.《国际刑事法庭公约》(Conventiono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冷战结束后，种族纠纷、冲突和战争频频发生，种族屠杀的暴行不断出现。联合国认为应有一个超国家的组织直接处理这些暴行。美国本来支持这个构想，但希望这个机构设在安理会下，且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1998 年 7 月罗马会议通过了《国际刑事法庭公约》，决定设立独立于安理会的国际刑事法庭。这个公约当时就得到 120 个国家的支持。

但美国人认为，这一公约可能使美国公民被调查，美国不应该参加此公约。他们指出，如果美国在参加联合国维和工作时，不慎卷入事端，就会面对其他国家的审判，这是不可思议的。换言之，他们认为美国公民不应该接受任何国际调查和审判。

最露骨的说法来自两位美国参议员，其中一位格兰姆斯(Rod Grams) 说：

> “美国不可能将其主权交给一个国际组织，由这个组织来超越美国的法律制度，决定美国的外交政策。”

另一位保守派大将赫尔姆斯（Jesse Helms）更直言：美国可以入侵或轰炸任何地方，只要他一息尚存，他永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庭来判断保证美国安全的决定。他指责国际刑事法庭是一只“怪兽”，“美国的责任便是在它壮大到吞掉美国之前，先把它杀死”。

3.《京都议定书》(Treaty on Global Warning)

1997年，近100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为了减少排放温室效应气体，达成《京都议定书》，规定在2008—2012年间，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削减5.2%。



许多国家签署了这个协议，但美国总统布什2001年3月拒绝在该议定书上签字，理由是这个协议有损美国经济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1990年其排放量为全球总量的36%，如今为24%。

4.《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于1971年12月由联合国大会通过，1975年3月26日生效，是一项划时代的条约，截止2002年11月已有146个国家批准了公约。由于原条约并未就核查问题作出具体规定，1994年各国开始讨论此一问题，并在2001年完成修正。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从无异议，但布什政府上台后却认为，拟议中的核查手续将影响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利益，宣布拒绝签署这一修正草案。

为了给自己开脱，美政府还宣称俄罗斯和中国可能也不支持。但事实上，不仅俄罗斯、中国支持，连美国心目中的“流

氓国家”——伊朗，也支持这一修正案。

面对国际社会的批评，布什表示，美国不是走回孤立主义，美国也愿意听取其他国家的意见，但他将坚持他认为对美国以及对全世界正确的立场。

既然美国不准备遵守许多规则和制度，它应该能想到其他国家也难以去独自遵守。规则不起作用之后，最起作用的只能是枪杆子了。这就像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经常引用的芝加哥黑帮老大常说的那句话：“道理再多，也不如带把枪有用。”

秉承拉姆斯菲尔德这个口头禅的精神，2001 年 12 月美国宣布退出另外一个重大的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建立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这个系统将保证美国可以武力攻击其他国家，而他国无法还击，这使美国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绝对的优势。绝对的军事优势代表美国的强大吗？恰恰相反，它只能说明美国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不相信别的国家，说明美国这个帝国内心的脆弱。



二、制度基础的流失

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联合国可以说是惟一一个能体现“以法制促和平”的国际机构，它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为维持第二次大战后国际秩序所一手设计的，得到了世界各国最大程度的认同。

但近年来，它已经被美国当作自己的使用的一个工具，一些美国人甚至把它看作美国政府的一个部门。如果需要利用联合国，便支持；如果联合国的决定对美国不利，便踢开。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布赖特曾公开表示：

“联合国的维和工作只能帮助美国，而不是扯美国后腿。”



战争已毁灭性地动摇了“仁慈霸权体系”的基石



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也是欠联合国会费最多的国家，当美国国会通过1999年8000亿美元减税方案时，却为积欠联合国16亿美元会费而争议不休，最后由美国大亨特纳捐款才解决了联合国一时的财政危机。

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而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保守主义大本营之一的媒体《华尔街日报》2003年4月11日发表题为“可笑的联合国”的评论，历数联合国的“荒谬和失误”，并认

为美国应该凌驾于联合国之上，因为“联合国在历史上的两次辉煌都是美国努力的结果”：

> 即使面对类似 1944 年法国解放和 1989 年柏林墙倒塌的画面，美国投入资金并浴血奋战解放伊拉克人民，却仍然面临合法性的问题，美国道义上的信誉似乎还不如帮助萨达姆政权支撑了 12 年的联合国。
>
> 联合国模式一再被证明具有致命性问题。

屠杀是旧式帝国运转的主要手段，现在已很难再秘密地进行，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并且被现代文明的发展所唾弃。美国一度有“仁慈霸权”的美誉，是由于美国处于一个得到其他国家认可的制度的中心位置。



制度上提供全球认可的“公共产品”，是美国霸权的重要基石。而制度安排只有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时才成为可能。如果只向全世界发表一个宣言或文告，而不实践它们的内容，则制度安排也便成为空谈，只有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才能使制度安排具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力。

但现在，不但新的制度安排没有出现，而且业已存在的制度安排也遭遇严峻挑战。

布什上台之后，美国政府蔑视联合国的做法达到了新的极致。

美国《新闻周刊》2003 年 3 月 24 日刊登分析文章指出，布什政府完全抛弃了二战时期总统罗斯福当年树立的多边主义典范：

> “当时罗斯福积极建立联盟与多边体制，美国持续提供经济与技术援助给他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联合

军事演习，即使有些演习对美国战略利益帮助不大亦然。美国总统与国务卿更是经常出访并接待访客，以无止境的外交行动与他国建立情谊。这些援助、分享与沟通动作，事实上都符合美国的利益，让美国在过去几十年来稳居民主阵营领袖地位。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善意让其他国家不会恐惧美国的力量。”

“布什政府的作风却完全相反，他上台后第一年，就退出了五项国际条约，并完全抛弃了克林顿政府在中东与朝鲜的和平政策。布什政府官员很少出国，布什自己是40年来出访次数最少的美国总统，副总统切尼上任来只出访过一次。”

“美国政府想以黑帮作风主宰世界，结果似乎是一场灾难。”

就本质而言，单边主义纯粹是为了实现本国利益而损害他国利益，因此单边主义不可能提供全球维度的普遍福利。

因此，世界其他国家无法继续相信美国的诺言，也无法继续认可美国想要提供的全球公共制度产品。当前的美国也许还想为全球“立命”，但它的价值已经受到其他国家的怀疑。

伊拉克战争表现了美国的孤傲与自负，美国已经远离国际民主。而肆意运用手中的权力将引发更多权力的滥用。这是帝国对全球制度安排的腐蚀，如果美国在干涉国际事务时无视国际民主程序及其价值，那它的权力将损害其自身原有的制度安排的权威，今后，美国作出制度安排将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承认。

美国的“敌人”一直在努力消解美国制度安排的影响力，比如，恐怖主义分子不惜用大规模毁灭平民的方式来表达对美国制度安排的怨愤。

但现在，美国自身的行为也在破坏其在全球制度安排方面的影响。这正是其“敌人”梦寐以求的。这是一个绝妙的讽刺：美国用单边主义帮助它的诸多“敌人”实现理想。

三、遭到质疑的话语权威

这次伊拉克战争，人们见识了伊拉克新闻部长萨哈夫的侃侃而谈，也更见识了美国撒谎、造假的手段。从发动战争的理由，到战争进程中具有代表意义的营救女兵林奇事件，美国从政府到媒体，上下配合一起撒谎，堪称伊拉克战争中的又一个奇观。

如果说，美国过去在国际社会享有最大的话语权威的话，那么伊拉克战争基本上埋葬了这个虚假的偶像。



其实，美国以捏造事实的方法来发动战争，或者煽动国内不明真相的人民，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约翰逊时期，为了介入越南战争，美国政府大肆渲染所谓的“东京湾事件”。即使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时期，为了获得国内民意的支持，美国媒体也编造了诸如：“萨达姆陈兵沙特阿拉伯边界”、“伊拉克士兵在科威特医院抛出婴儿后把育婴箱运回伊拉克”等等假新闻。

但这一次却是扇在美国“脸上”最响亮的一记耳光，因为在全球化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下，谎言如此之快就被拆穿了，布什政府在全世界的注视下露出了不光彩的“后腚”。

众所周知，美国侵略伊拉克的主要理由是，伊拉克藏有和研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核武、化武和生物武器），又和“基地”恐怖分子有密切关系，迫切地威胁到邻国和美国的安全。

但停战后3个多月了，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是不见踪

影。美国军方泄露出来的报告表明，美国政府在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根本没有找到伊拉克有违禁武器的任何证据。所谓美国拥有可信的证据，根本是一个用来糊弄世界的谎言。



话语的权威并不取决于声音的强大



总部设在伦敦的《简氏防务周刊》编辑约翰·艾尔德里奇对此评论说：

> “我认为，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压力，要求提供发动战争、更换巴格达政权的理由，特别是在美国政府内部尤其如此。我认为，真凭实据肯定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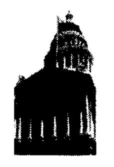
众目睽睽之下，美国政府自己再次用谎言发动了一场战争。不管最终能不能在伊拉克找到违禁武器，这个巨大的瑕疵

已经形成。

伊拉克战争中最令美国人难以忘却的，恐怕是通过媒体传播出来的两个画面：一个是美国特种部队深夜抢救女兵杰茜卡·林奇的紧张镜头，另一个是在巴格达伊拉克人民轰轰烈烈地拉倒萨达姆雕像的热闹镜头。这些情景，美国媒体不知重播了多少次，全球已家喻户晓。

伊拉克战争初期，美军运输线频频遭到伊拉克士兵袭击，美军伤亡较大，士气低落。就在这时，美国国防部突然曝出猛料，特种部队深夜拯救美国女兵林奇的动人故事出炉了。随后强大的美国媒体，水银泄地般地宣传说林奇如何勇敢杀敌，不幸严重受伤被俘，受尽伊军侮辱和殴打；英勇的美军特种部队，又是如何不顾生命危险，深降敌地，英勇救出林奇。

这个故事极大地鼓舞了美军士兵的士气，也鼓舞了美国民众。试想，作为一个美国人，在看到美国特种部队，如同好莱坞大片——《拯救大兵瑞恩》中描述的那样营救女兵林奇，怎不动心？



但英国媒体却披露根本没那么一回事！“拯救大兵林奇”是美国国防部精心策划的一个“肥皂剧”。英国《卫报》、英国BBC电视台经过实地详细调查后发现，女兵林奇的实际经历和美军公映的长至5分钟的新闻片段完全两样：

女兵林奇没有枪伤，也没有刀伤；当时，美军知道伊军两天前已撤退，医院根本没有防卫；伊拉克医护人员给予了林奇最好治疗，包括给她输血；医护人员曾用救护车送林奇至美军检查站，却遇美军炮火而放弃；美军援救林奇时，在敌军没有开火的情况下，不要伊拉克人送来的钥匙，硬要破门而入，等等。

真相出来之后，BBC电视台这样评论这个“英雄救美”的报道：

"这是迄今为止，最令人震惊的假新闻。"

当女儿在德国医院停留时，林奇的父亲也告诉记者，林奇的伤势不重，没枪伤没刀伤，也没患失忆症。但当被问及美军如何营救他女儿时，这位父亲却说：

"你们应该知道，现在我们实在不能谈那个问题。"

这恐怕是林奇的父亲对这场假新闻的闹剧最婉转的评价了。



另外一个场面是，美军占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后，伊拉克人潮水般涌上街头，拉倒了巴格达中央广场上萨达姆的雕像。看到这些伊拉克人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的镜头，美国人很少有不为这场战争感到骄傲的。就是笔者也几乎相信，伊拉克人是真的欢迎美军。

实际上，这也是美国国防部精心炮制的假新闻。

美军和美国媒体造假的经过，被一位路透社摄影记者以高空长镜头拍下，当时的情景和人们在电视机前看到的短镜头新闻片完全不同。据报道，当时的实际情形如下：

巴格达中央广场四周停着三辆坦克和一辆军车，场外毫无人影，场内不到200人，很多是媒体工作者，其他是美军雇请而来的。当时，一位BBC广播员一直在问，人哪儿去了？人哪儿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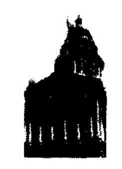
而就是这样一些镜头，被美国媒体巧妙地加工后，成为电

视上成千上万的伊拉克人兴高采烈地拉倒萨达姆雕像的热闹场面。

英国媒体报道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巴格达市民根本没有几个人敢上街，即使他们不怕美军的流弹，也会担心萨达姆的敢死队。英国《独立报》资深记者罗伯特·费恩克在评价拉倒萨达姆雕像的新闻时说：

> “（这是）自 1945 年硫磺岛战役以来，排演得最上镜的镜头。”

布什上台后，公关手段十分好莱坞化。布什和他的班子的一切言行都被包装得很有看头。不过，包装得再好的谎言，也掩盖不了事实真相。从上述两个明目张胆的骗局中，世界各国看到了什么？



不是美国人的胜利，也不是伊拉克人欢迎美军，而是美国政府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真实面目。

1991 年海湾战争中，美国有一个常为人忽视的重要胜利，那就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胜利。由于是惟一一个在战争现场报道海湾战争的媒体，CNN 新闻画面被全球媒体争相转载。CNN 胜利的意义不在于其企业本身，而在于它所胜利的那个时代正是全球化如火如荼的时候，CNN 的胜利和微软公司的胜利一样，带有老百姓难以觉察的战略性意义。

它使美国的声音传遍全世界，使美国史无前例地扩大了其文化霸权中的话语霸权。多年来，美国经常谴责其他国家没有新闻自由。美国的新闻自由确实是显示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面，如对“水门”事件的报道等等。这使美国媒体显得客观公正可信，也使得美国政府的政策和宣传很容易地被世界各地接受。

但伊拉克战争戳破了这个美国软力量的得力工具：美国的新闻自由。美国媒体一样是强烈代表着美国资本家的利益，它为了影响民意，会弄虚作假，也会严格遵守政府部门的要求。

据说，美国媒体还报道过这样一条伊拉克人如何喜爱美国领导人的新闻：

> 一个伊拉克老头告诉记者，为了感谢美国人，已经给他儿子起名叫“切尼”，还说如果再生一个儿子就叫他“布什”！

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国新闻报道虽然得到了大部分美国民众的认可，但却将其真实面目暴露给了全世界。



伊拉克战争刚一打响，全球媒体就投入到一场激烈的信息大战之中。对美国民众来说，这是一场实况转播的战争，父母妻儿坐在家里，就可以看到自己的亲人在前线战斗的情景。

在中东国家，许多民众则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半岛”电视台的实况报道。当一架美国“阿帕奇”直升机坠落后，他们甚至比美国人还更早看到当时的场面。

半岛电视台为采访这次美伊战争，派出大批记者分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巴士拉、摩苏尔等地，全天候采访及报道最新战情。

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角度本就不同于西方媒体。在采访这次美伊战争时，该台与英美两国的所谓主流媒体相比，更出现极大的落差。例如开战以来，该台积极转播伊拉克官方播放的萨达姆电视演说及伊拉克军政领袖的记者会，更不遗余力地呈现伊国平民伤亡的景象。

美英两国未获联合国授权就径自挥师伊拉克，在全球掀起涛天反战巨浪，不少地区的民众格外渴望看到英美主流媒体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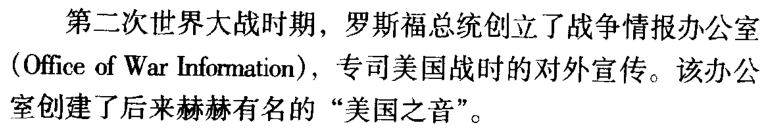
外的战况报道。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显示出美国媒体对伊拉克战争早有很强的预设立场。也是因为如此，美伊开战以后不久，该台在欧洲的收视人口就增加一倍，伊拉克战争开打一周，该台就增加了400万个订户。如果美伊之间还有第三次战争，美国的第一波攻势应是先将像半岛电视台这种全天候播放的阿拉伯语卫星电视台击毁，然后再展开大规模的空袭和地面攻击。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话语权威将像在中东一样，遭遇当地强势话语力量的挑战。很多国家、很多人民都不会，也不敢相信美国的言行了。这是世界惟一超级强国的悲哀。

四、倒塌的形象



美国历届总统都非常重视在国际上的宣传与公关，力图提升美国的形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罗斯福总统创立了战争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专司美国战时的对外宣传。该办公室创建了后来赫赫有名的“美国之音”。

在冷战时期，杜鲁门总统发起了一场“真相战役”，他说：

> “这就像在战斗中武装部队或者经济援助一样重要。”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形象推崇倍至，他拒绝法国希望美国保护越南的要求，因为：

> 美国居于反殖民主义大国中最强大的一国之地

位，是它在自由世界无可估量的资产，因此，美国这个道德地位，远比东京三角洲甚至整个中南半岛，更值得保护。

这些做法使美国在中立国家地带建立了至少比苏联高大得多的形象。冷战结束后的 10 年，美国的国际形象达到了其建国 200 多年来的巅峰，全球化伴随着所有代表美国形象的符号：快餐、好莱坞、民主自由，它们组成了一个奇妙的混合体，成为美国“仁慈霸权”的关键部分。

对美国形象的自信已融入每一个美国国民的血液里，他们觉得，美国是世界上不是绝对最正确也是相对最正确的国家。在任何一个国家，美国的子民们都可以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加无所顾忌，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指责其他国家的落后，无视其他国家的法律，傲慢地对待其他国家的禁忌风俗。



如果不知道审慎自斟，即使一个道德再高尚的人也有可能陷入自我陶醉的迷茫，何况美国从来就不是这样一个道德高尚的国家。

自“9·11”袭击事件以来，美国政府和人民一直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这么恨美国？”布什总统在袭击事件发生后一直声称“他们是嫉恨我们的自由”。但问题并非“嫉恨自由”那么简单。很多美国人都感到了美国的形象危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曾公布一份报告说，许多国家，特别是穆斯林国家都认为美国“自大、狂妄、虚伪，不愿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展开对话”。报告还称，在应对国外高涨的反美情绪方面，美国政府表现得很糟糕，其对外政策亟待改善。

一位负责对外宣传的美国官员称，“9·11”事件留给美国人的教训之一就是美国应在宣传上作出更多的努力，以改善外国人对美国的态度。美国国务院中东事务专家克里斯托弗·罗

斯说：

"在冷战结束和2001年9月11日之间的10年中，我们忘却了外部的世界。这种尖锐的反美措词，开始压倒了最初的国际同情与支持。这表明人们是怎样看我们的。我们被震惊了。"

如果说"9·11"事件之后，美国鹰派们许多一意孤行的做法大大地削弱了美国形象的话，那么伊拉克战争则使美国的形象如世界贸易大厦双子塔楼一样轰然倒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布什政府成了拉登的代理人。

布什总统在宣战时，虽然表情凝重，眼神中包含对上帝事业的虔诚，但丝毫也没有让世界相信，美国是为正义而战。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际，全球反战示威如火如荼。一些国家如俄罗斯和保加利亚的示威者打出了这样的标语："布什滚蛋，你是现代希特勒"、"我看布什只如希特勒！"德国传媒更屡次拿布什和希特勒比较。德国《世界报》一篇文章的大标题是：

"希特勒已死，布什还活着"。

布什眼中的"邪恶轴心"国家认为美国自己更像"邪恶轴心"。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斥责美国政府歪曲民主和人权的本来面目，为攻打伊拉克找了个"名正言顺"的借口，如同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向世界宣战。

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历来被认为是萨达姆政权的死敌，但在美军进入伊拉克后，纳杰夫和库姆等伊拉克南部城市的什叶派宗教领导人却发出了禁止和美英军队合作的教谕。教

谕宣称，抗击美英侵略者是一种道德和宗教义务。

对这一现象，有人这样描述：

> “美国的官员们似乎对一件事实视而不见，那就是美国越是攻击一个他国的领导人，就越抬高那个人在他的人民中的威信。他的人民会为他能够在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面前挺胸而立而鼓掌欢呼。
>
> 一直以来，对他国领袖的诽谤并未能缩短他们掌握权力的期限，从卡斯特罗（他一共经历了8个美国总统），到萨达姆都是如此。事实上，作为一个小国的独裁者，延长他掌权时间的最好手段就激怒美国，使美国将其宣布为无赖政权的领袖和全球和平的威胁。”



上面这段评论虽然有失偏颇，但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就是美国对其他国家采取帝国主义政策，效果实在是难说，甚至往往会适得其反。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一场“硬权力的炫耀、软权力的失去”的战争，就在布什向萨达姆下达的最后通牒期限即将来临之际，美国参议院最资深的参议员、85岁的伯德在参议院发表演讲，批评布什是在“傲慢地炫耀”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严重受损：

> “在全世界，我们的朋友不再信任我们，我们的言语受到质疑，我们的动机受到怀疑。今天，我为我的国家而哭泣。”

澳大利亚是最支持美国的铁杆盟友之一。该国的一家媒

体——《澳大利亚人报》网站2003年6月16日刊载一篇题为《布什正在打输一场民望战》的文章指出，布什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不受欢迎的人物。这个结论来自一项对在44个国家超过3.8万人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伊拉克战争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形象：

> 巴勒斯坦只有1%的人对美国有好感；印度尼西亚只有15%，而在1999年至2000年间，这个比率为75%；在美国最指望的盟友之一土耳其，对美国有好感的人由原先的52%跌至现在的15%；巴西由56%跌至34%。

美国要成为当今世界秩序的缔造者和维护者，必须以身作则，树立良好形象。否则，美国凭什么要求其他国家接受和遵守“世界秩序”？然而不幸的是，在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看到了美国太多的言行不一，甚至自我否定的事实。



美国一向主张军备管制和裁军，但如今却片面追求军备方面的绝对优势；美国声称美国最大的利益是防止核武扩散，但如今美国却要发展太空核武和小型核武器。

在冷战时代，美国一直抱怨北约盟友对欧洲防御不够热心，如今欧盟国家要想建立一支属于欧洲的武装部队，美国却指责他们破坏北约的合作，并暗中加以阻挠。

在亚洲，美国曾声称要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但却又想把中国升级为头号敌人。美国多次表态承认一个中国，但却不断卖给台湾更多先进的武器。

美国说要关心不发达国家的人权状况，但却对援助贫穷国家没有兴趣。

影响美国和其他国家关系的主要因素不是美国的强大，而

是美国强大后的行为。如果美国不愿履行对联合国的义务，拒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条约，总是言行不一，美国如何指望其他国家相信美国，支持美国？

遗憾的是，美国人并不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华盛顿时报》2003 年 6 月 20 日报道说，最近数项美国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并不在乎外国对美国的批评，美国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惯和心态源自美国开国元勋所推崇的自治以及独立精神。

美国广播公司（ABC）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 60%的美国人表示不在意美国与法、德、俄的关系因伊拉克战争而受损。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有 2/3 的美国人表示喜欢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



五、如果反美成为时髦

美国在某些方面正越来越像一个它自身所谴责的恶棍：傲慢无信；破坏地区和平；以美国例外论来置身于国际公认的规则之外；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001 年 1 月 15 日，《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原子能机构 1991 年的一份秘密文件承认海湾战争“盟军”在当地遗留下至少 40 吨贫铀，理论上足以造成“50 万人死亡”！

此次伊拉克战争显示，美国已经把自己放到了世界的对立面。美国不仅因此失去世界的好感，而且可能使反美成为世界各国政治的时髦。其他国家的选民会把反美当作选择国家领导人的一个标准。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声称，有 45 个国家支持美国发动伊

拉克战争，其中 15 个国家不愿公开名字。对这一说法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国家为什么在支持“自由正义”的时候反而匿名？这 15 个国家靠在美国这棵大树身上还害怕什么？伊拉克的制裁？法国的恐吓？

不断地一意孤行，终于
引起了其他城邦的戒心



显然都不是。真正的答案是这15个国家的老百姓反对支持美国。所以当布什在向美国公众辩解说，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府实际上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只不过它们是以“悄悄的方式”支持美国时，《新闻周刊》拆穿了这个好笑的辩解：

> 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真的如布什政府所说，即他们悄悄地支持美国，那么这恰恰说明更深层的问题，即这些国家偷偷摸摸地支持美国不是因为它们害怕萨达姆·侯赛因，而是因为它们害怕自己国家的公众。



实际上，在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支持美国在政治上已经变成了非常危险的事情。例如在德国、巴基斯坦等国家，美国因素已经成了大选中最有争议的议题。在这些国家中，持反对美国的立场往往可以让候选人获得更多的选票。

即使在那些公开支持美国的国家，情况也变得令支持美国论者沮丧。英国首相布莱尔被讽刺为“美国的长卷毛狗”；西班牙和意大利领导人在各自的国内也面临强大的反对声；匈牙利、捷克和波兰等东欧国家有70%到80%的公众反对美国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布什政府曾对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支持大肆渲染，但捷克当新总统克劳斯上台后立即表示，哈维尔只能代表他个人，在伊拉克问题上，他的立场同捷克公众一样。

为人所忽视的可能是其经济后果。多年来，在海外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一直致力于提升其在当地的形象。而如今，伊拉克战争使其形象犹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黄金储备一样急速下跌”。

随着反美情绪的上升，美国的跨国公司可能将面临严峻的

考验。据《华尔街日报》2003 年 3 月报道说，自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的有关新数据显示，尽管欧洲和亚洲的多数消费者没有疏远美国品牌，但仍有相当比例的消费者表示他们不愿购买美国货。营销专家称，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它表明，即使是最具活力的品牌也不能忽视反美情绪持续存在所带来的潜在影响。

法国一家市场研究公司 2003 年 3 月在全球 8 个国家进行了一项调查，这些国家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俄罗斯和西班牙。调查发现，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不愿购买美国品牌，在接受调查的欧洲人中，有 21% 的人基本同意如下说法："我目前不愿购买美国产品及服务。"

在过去数月中，一些标志性的美国公司已感受到了伊拉克战争的影响，许多自发反对美国战争政策的团体发起了抵制美货运动。这些团体遍布从欧洲到亚洲几乎所有主要国家。



不喝可口可乐、不抽万宝路、不吃麦当劳、不加美孚石油、不刷运通卡、不看奥斯卡……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德国，众多民众加入到了抵制美货运动的行列中。靠着国际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先进通讯手段的帮助，一份长长的商品"黑名单"在德国民间广泛传播，从微软到星巴克，大约 300 多家美国公司及其商品"榜上有名"。

德国一些饭馆制作了新菜单，将所有与美国有关的东西删去。在柏林、汉堡、慕尼黑和波恩的酒吧里，如果有顾客想点杯可口可乐来解渴，一定会得到这样的答复："抱歉，由于目前的政治原因，我们这里不再供应可口可乐。"然后，他们还会为你奉上一杯德国自己产的可乐。

战争打响后，德国一家自行车厂立即停止从美国供货商那里进口零部件。车厂老板米勒说："只有当关系到钱的时候，美国人才会注意你所说的话。如果美国供货商不明确表示反对

自己政府的所作所为，我们不会再跟他们签合同。”据米勒介绍，他的工厂每年都从10多家美国工厂那里进口30多万美元的零部件。

一家法国饭店的老板不仅不再卖美国番茄酱，甚至准备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如果美国人不能冷静下来的话，我将开始拒绝接受美国运通卡。”这位老板说，他此举一方面是反对战争，另一方面是报复美国人将“法国薯条”改成了“自由薯条”。

法国的一些面包店也正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战争的厌恶，把原名“美国派”的面包重新命名为“和平派”，最后还用巧克力酱在面包上注明“和平”二字。据一家面包店的店员说，这种“和平派”非常受欢迎，只要一端上货架就会被抢购一空。



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在欧洲开设的加油站也遇到了反战人士的抵制，门庭冷落，有些加油站门口还被涂上了“不为石油流血”的口号。

在瑞士名城苏黎世，一些旅行社正在忙着发展新的旅游线路，因为许多瑞士人不喜欢布什的做法，决定不去美国度假。

在东南亚、中东以及其他一些伊斯兰国家，商家开始有意生产可口可乐、麦当劳等消费品的效仿品，以取代美国商品。利用这些国家和地区穆斯林的反美情绪来推广其产品，已经是一个难得的发财机会。

在中东地区，购物者对美国的商品更加敏感。伊拉克战争开始后，中东地区可口可乐等美国公司的销售额连续几个月下滑。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的跨国公司还可能成为恐怖报复的目标。2002年12月，印度尼西亚一家麦当劳餐厅内发生炸弹爆炸事件，造成3人死亡，结果造成印尼的麦当劳店一度陷人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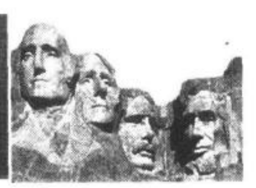
慌。

马萨诸塞州布兰代斯大学的国际营销学教授 Shih - Fen Chen 对此评论说：

> “消费者对美国品牌的态度可能迅速改变”，“如果有一枚炸弹扔错了地方的话。”



第十三章 扩张极限的到来





在新罗马帝国的雄心里，控制伊拉克是控制欧洲和亚洲的关键一步。除此之外，还要使美军在每一个关键地区拥有塑造秩序的能力。要达到这一目标，美军必须借助新一轮换防，扩大在东南欧、亚洲的军事部署。

但美国的经济能够承受新罗马帝国多长时间、多大范围的扩张？

一、无限大的目标

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军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在推翻一个国家的政权后，留下驻军，这样既保证亲美政权的存在，也使这个国家成为美国全球军事网络上的链条。冷战后以来，这一动向有增无减。

1999 年，结束对南联盟的军事行动后，美军在科索沃建立了邦德斯蒂尔营军事基地。2001 年，阿富汗战争后，美军又把触角伸向中亚，在吉尔吉斯斯坦建成了比什凯克空军基

地。到目前为止，美军共在中亚9个国家建立了13个新军事基地，成功地打入了传统上被认为是俄罗斯后院的地区。

伊拉克战争是新罗马帝国计划中最关键的一步，战争的胜利将鼓励鹰派按照原先设想的步骤继续下去，即继续寻求控制全球重大战略地区。遵照这一原则，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军事部署的基本思路是：驻军伊拉克，稳守中东；倚重中、东欧，羁绊欧盟；东扩防线，合围俄罗斯；强化东北亚，遏制中朝。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伊拉克战争基本结束之际，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声称，美国无意在伊建立长期军事基地，美军将根据需要驻扎在伊拉克，不会多呆一天。言下之意，只要有可能，美军将不会少呆一天。

据英国《卫报》日前透露，美军有意在伊拉克建立4个常设军事基地。这样，美国在中东地区除了可靠的盟友以色列之外，将另有伊拉克在自己的军事控制之下。它保证了美国独家控制中东局势的前景，使中东地区的政治环境不会朝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发展方向急转。





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广，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

在欧洲，美军准备重整驻军基地。其具体做法是削减驻德国的军事基地，向东欧强劲扩张，潜在对象国包括波兰、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专家称，美军相中这3个国家是因其与土耳其及中东地区的地缘接近性。

五角大楼的一位资深官员在伊拉克战争将告结束时向《洛杉矶时报》透露，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素有"铁鹰"之称的美军第一坦克师1.7万名官兵，将不再返回原驻扎的德国军事基地，而是迁移至保加利亚靠近黑海的小城萨拉福沃。

美军还将减少在德国的军事基地，并不再在欧洲部署重型坦克师，取而代之的是装备有轻型装甲武装的高速机动部队和空降兵。现驻扎在德国的第一步兵师和第一装甲师共计3万人也将由两个旅——不到1万人的兵力替换。大批的美军将陆续从德国、意大利的军事基地迁往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的新基地。



美军这一调整将起到一石数鸟的作用。它不仅警告、惩罚了德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美国的重要对手欧盟，同时对在战争中"异常慷慨和大方"地为美国开放领空和提供军事基地的几个东欧小国，提供"保护伞"，以诱使这些国家跟随美国。

在中、东欧拥有驻军基地，还使美国前所未有地逼近俄罗斯。目前，在挪威距俄罗斯边界40公里的瓦尔德市，美国已建立了作为其国家反导防御系统的关键环节之一的雷达站。此外，在爱沙尼亚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地区，美军也建立了军事基地。俄爱边境距俄罗斯最伟大的城市圣彼得堡仅有300公里，从这里美国的战术导弹能随心所欲地打到冬宫。

再考虑到美国不断扩大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合围俄罗斯的态势已经基本形成。

根据美国国防部一份名为《2020远景》的报告，在解决

伊拉克问题后，美军会尽快将战略中心转向亚太地区，以对付正在崛起的中国。

美军情报声称，从中国加快人民解放军现代化的步伐、引进军备确保“攻防兼备”的战略来看，预计到200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兵力投射能力，将会突破日本、我国台湾地区至菲律宾这条弧线所构成的“第一岛链”。

因此，这份报告建议美国调整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并在作为第二道防线一环的关岛基地增设重兵，最终对中国形成一个半包围圈。

据韩国媒体透露，美国政府正计划从当前的太平洋司令部内，分离增设一个以日本为据点的独立的“东北亚司令部”，把美国在日本与韩国的军事基地连成一体，互成犄角，形成对东北亚的包围态势，一旦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附近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美军立即可以调动部署在日韩的部队介入冲突。



同时，美国还计划在朝鲜半岛周边，建立空中和海上“两个中心”，并已开始策划由驻日美军向韩国增派F—15战斗机和U—2高空侦察机。

《2020远景》报告的一些建议已经开始实施，为确保若干年后在西太平洋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美国已决定在最接近亚洲的关岛基地，部署在科索沃战争中锋芒最劲的B—2隐形战略轰炸机、威力强大的AGM—86A型空射巡航导弹、3艘吨位最大的两栖攻击舰和5艘核动力潜艇。

此外，美军已使新加坡樟宜基地成为美国航空母舰重要停靠地，并觊觎俄罗斯在越南金兰湾的军事基地。

经过冷战后的迅速扩张，目前，美国大大小小的海外军事基地已达1000个，将美军在全球的存在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其势力范围之广，可谓空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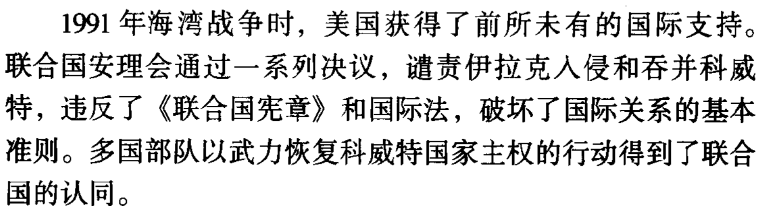
二、软力量的缺席

美国的新罗马帝国野心，并不符合今日的世界形势。这一逆流而上的追求决定了美国在今后的行动中，将得不到软力量的支持。

从冷战结束后的老布什时期，到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一度在外交政策上较为重视合作，在对外干涉时注重联合，以尽量减少美国的损失。

比如，克林顿政府的外交特色之一就是避免对战略问题作明确的界定。基本上，他尽量不作重大决定，如国家导弹防御体系问题就留给了后来的布什政府。一些人认为，美国这是以极小的代价维持了冷战后美国的特殊地位和既得利益，是一种难得的“廉价的霸权”。学者保罗·肯尼迪曾骄傲地指出，美国以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3%的军费水平维持着如此突出的国际地位，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应当归功于美国的“软力量”。这些软力量包括：联合国的支持、盟国的忠诚、国际社会的认可、道义上的清白等。





1991年海湾战争时，美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系列决议，谴责伊拉克入侵和吞并科威特，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破坏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多国部队以武力恢复科威特国家主权的行动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同。

参加海湾战争多国部队的国家有36个，它们分别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其中甚至包括与伊拉克同为阿拉伯国家的埃及、叙利亚以及海湾6国。此外，还有更多的国家对战争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海湾战争结束后，这些国家基本上分

摊了巨额的军费开支。

但在伊拉克战争中，直接参战的国家除美国外，只有英国和澳大利亚等极少数国家。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北约国家反对在北约框架内向美国提供对伊动武的军事支持。

没有联合国的授权，美国就擅自发动战争，其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高昂的战争费用只能由美、英、澳等少数国家承担了。

虽然美军已经基本控制了伊拉克，但缺乏道义上的正确性，美国无法消化伊拉克战争的成果，不得不重新拣起了被自己抛弃的联合国。但这种回头只是一种策略性的，法国、俄罗斯等国还将发现，美国将利用其在伊拉克的军事占领地位，最大限度地排斥联合国和其他国家进入伊拉克。

如前章节所述，美国和盟国的分裂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冷战结束后，没有经过考验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关系依然被很多人定位为“铁杆盟友”，但伊拉克战争彻底打破了这个虚假、温情的面纱，已经没有什么外部的威胁力量能够让美国和欧洲重新团结起来了。



当前，在美国如此流行地糟践法国的行为并不是反法，而是反欧，欧洲人懂得这一点。

西方国家的联盟仍然存在吗？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美国在今后所有帝国式的行动中，都将很难再有盟国的支持。美国领导人常说美国代表整个国际社会，但这个国际社会指的是什么？是俄罗斯、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拉伯国家、东盟、非洲或拉丁美洲？

以上这些国家或地区，在很多时候都不认为美国说的国际社会有它们的份。美国说的可能是包括英国、澳大利亚以及一些欧洲小国家，也许还有以色列和日本。这些国家能代表整个国际社会吗？

实际情况是：美国真正的朋友愈来愈少，在很多问题上，多数国际社会成员与美国立场是相对立的。

美国国际问题学者伊格奈泰夫教授批评说：

> “美国人无力完全依靠自己来建立一个全球秩序”，“美国应该和欧洲国家进行新的分工，即美国负责战争，法国、英国和德国负责维和，而荷兰、瑞士、挪威和瑞典等国负责人道主义援助。”
>
> “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和我们期望的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刑事法庭和其他国际人权与环境组织，以及以机制为核心的跨国法律与经济秩序的国际政治图景相去甚远。”



只要继续追求新罗马帝国的目标，美国就会日陷孤立。美国的鹰派们没有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在两极世界中，或许一些国家愿意接受美国的保护，以防止另一超强的入侵，但现在美国已经成为惟一的超强，它的帝国式政策必然成为其他国家的威胁。

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主要国家都不会喜欢美国介入与它们重大利益相关的区域问题。伊朗不会喜欢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介入，因为波斯湾是伊朗的重大利益；印度也不希望美国介入克什米尔问题，因为它不希望美国利用这一问题玩弄平衡战术，从中获得利益。

这种缺乏软力量支持的扩张和旧殖民主义有着本质上的雷同，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可以引用不同时代的两位专家的话来概括。冷战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乔治·凯南在1999年指出：

> “在这个世界上，将永远不会由一个政治中心来

管理，无论它军力有多大”。

“美国如果认为它自己是开明政治的中心，可以作为其他国家的榜样，将是头脑不清，爱慕虚荣以及不必要的”！

美国当代政治评论家、学者理查德·哈阿斯认为：

“由于缺乏美国民意的支持，美国巨大的军力和经济力量既不是无限，也不会长久。国际社会的结构也会使美国维持霸权的代价愈来愈大，成果愈来愈小。”

三、美元的未来



一切负担最后都要落到美国的经济上来，最后的决定因素是美国还能不能最大限度地用美元来支配全世界的资源。

如前所说，50多年来，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与一种兑换标准，使美国人沾足了全世界的便宜。美国人可以用美元到世界各地购买真实价值超过美元面值的矿产、资源、机械设备等，支撑着美国公民的高消费、高福利，也为美国打造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但近年来，美元的地位日渐堪忧。美元汇率在2002年1月达到顶点后不断贬值到2003年中期美元兑欧元贬值了30%，兑日元贬值了19%，兑其他货币也不同程度贬值。美元之所以在近年来不断贬值，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经济自身。目前，美国经济存在着高债务、高逆差、高财政赤字。“三高”最终都会威胁到美元的地位。

目前，美国每年要付出的债务利息相当于 GDP 的 1.5%，即 1400 亿美元，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就更高。此外，它每年还要增加许多新债，这使还本变得很困难。根据有关统计，2000 年外债占美国 GDP 的比例是 18%，2001 年达到 2.3 万亿美元，约为 23%。如果债务继续按照过去几年的速度递增，而 GDP 按每年 5%的速度递增的话，那么到 2006 年，美国外债将达 5.8 万亿美元，占其 GDP 的 46%，到 2025 年，美国的外债将是 GDP 的 155%，到 2050 年是 375%。

这等于说，按照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不久以后，美国人干了一年，赚到的钱还不够还债。债务太高会引发信誉危机，债主要么不肯借，要么要高利息。这种问题如不早解决，越往后代价会越大。

最坏的结果将会是没有人再相信美元，也没有人会再借钱给美国。



美国一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庞大。一般认为，美国可以承受的经常项目赤字应该是其 GDP 的 2.5%，以美国 GDP 为 10 万亿美元计算，应该为 2500 亿美元左右。但实际上美国的贸易逆差远大于这一数字。预计 2003 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将在 5000 亿美元左右。而专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帝国扩张政策将进一步损害美国经济、削弱美元的地位。

英国《金融时报》2003 年 5 月 20 日刊载一篇名为《华盛顿的弱势美元政策》的文章指出：

> 市场感到震惊的是，美国正在奉行帝国外交政策，这将对它的财政政策、对外贸易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未知的后果。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英国曾有巨额经常项目顺差。一个国家在有巨额对外收支逆差

的情况下，扮演全球超级大国的角色是史无前例的。

与此同时，资本外流也是在动摇美国强势美元政策的基础。在前几年的泡沫经济下，大量公司相互合并、收购，资金大量涌入美国市场，而今大势已去。遭“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公司丑闻、油价波动、战争阴云，一系列的利空因素接连打击美国资本市场，预期的复苏一波三折。在这种情况下，外商也纷纷下定决心，携外资撤离美国市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当前外资对美国的兴趣继续减弱，2002年包括并购活动和建设新工厂在内的外资投资降至330亿美元，与2001年的1080亿美元比起来大相径庭，更不用提2000年2460亿美元的规模了。



目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美国吸引的外国投资的品质已位于卢森堡、法国和德国之后，名列第四。

向来金额庞大的美国资本项目盈余竟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但现在却是美国最迫切需要用外资来弥补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防止美元继续走弱的时候。

就美国的经济而言，低通胀是其维持强势货币的主要政策之一，这一政策要求必须限制财政赤字。而现在的美国政府，一边是对外扩张需要资金的支撑，一边是在国内大幅度减税，减少财政收入，讨好国内资本家。这将使美国的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其对美元信誉的影响不言而喻。

从以上这些因素，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要长久地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加大其海外部署和兵力投送，将进一步给美元的国际第一储备货币的地位带来巨大压力，最后的结果不容乐观。

世界最大的金融投资机构之一摩根·斯坦利的金融分析师

斯蒂文·罗奇在其一篇分析文章中认为，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无法继续向不断扩大的军事扩张提供资金，与非美元资产价格相比，美元资产价格必定下降，而且很快出现急剧下降。

这种情况下，美元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呢？斯蒂文·罗奇如是断言：

> “对一个不平衡的全球经济来说，弱势美元很可能是惟一的出路。”
>
> “（美元）实际汇率下降20%，名义汇率下降幅度接近这个数的双倍，实际利率提高，国内需求增长下降。”



承认弱势美元，意味着美国承认其霸权“三维棋”中的经济霸权已经难以为继。美元霸权的崩溃将使国际资本大量外流。2002年美国贸易逆差近5000亿美元，这就是说美国必须保持每天净流入13亿美元的国际资本，才能维持对进口帐单的支付。如果失去这一资本流入，美国国民消费水平要暴跌30%以上，对美国经济的破坏程度将相当于1929年的大危机。这对新罗马帝国的追求者来说，是一件无法接受的事情。

但积弊形成已非一日。如果继续实施新罗马帝国的野心，美元的霸权地位迟早要崩溃。不久的将来，即使出于保护本国人民血汗钱的考虑，更多的国家也会把手中的美元储备换成其他通货。石油美元将无可阻挡地变成石油欧元或者其他货币组合的权值。

而如果美元处于弱势而欧元处于强势，欧盟必定要求美国在货币与财政政策上进行自我约束，这就如同20世纪80年代美国要求日本约束自己的货币政策一样。这样的前景，将是一场革命。

四、过度扩张的到来

服务于战争的军事经济可以暂时拉动经济增长。如“军事消费的乘数作用”理论认为：若在一个封闭的区域内驻有一支军队，该军队的生活和装备所需均采购于该地区，那么，军队每一单位货币支出都可以拉动该地区经济增长。

但指望依靠战争的“乘数作用”来发展经济，犹如“饮鸩止渴”。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目的，必将导致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军事经济的过度扩张，最终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苏联曾常年将30%—40%以上的财政收入投入军事领域，形成了军事经济过重、民用经济过弱的国民经济格局，致使社会发展走向险境。



即使是美国自身，也经历过军事经济的痛苦回忆。噩梦来自1964—1973年的越南战争时期。近10年的战争，使美国财政负担沉重。1965年越战升级时，美国用于越战的直接军事开支是1.03亿美元，至1966财政年度达58.12亿美元，1967财年猛增为201.33亿美元，1968财年为270亿美元，1969财年达到288.12亿美元，国防开支由1965年的512亿美元上升到1968年的807亿美元。

越南战争使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财政负担过重，最终导致美国核力量停滞不前，危及美国在欧洲和中东利益。

此后近10年的时间内，美国不得不选择了痛苦的战略收缩，对苏联采取“缓和”战略，并被迫和中国恢复外交往来，开始了被基辛格认为是和美国理想主义格格不入的现实主义外交：以共产主义中国牵制苏联。

精确地计算美国的扩张成本，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但

我们基本上可以勾勒美国在未来扩张需要付出成本的轮廓。

失去“软力量”支持的新罗马帝国的扩张成本包括4个方面：扩张本身的消耗、收买和贿赂追随国的需要、征服地区美国化的成本和向国际社会遮掩和解释的成本。

伊拉克战争所花的费用，将几乎全部由美国自身承担。据《华盛顿邮报》2003年7月13日报道，目前伊拉克战争的费用已经达到500亿美元，超过2003年预算的14%。今后每月维持任伊拉克驻军的费用将达到30亿美元，是先前预计的2倍。到2004年，美国将要为伊拉克战争本身花费约1000亿美元，使美国2004年的财政预算赤字达到近5000亿美元。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美国纳税人将为美国帝国政策付出沉重代价。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以联合国名义出兵，基本不需要对追随国家作出承诺，就可以换来其他国家的军事支持。而这一次伊拉克战争，美国还必须给追随者以好处，否则将难以拉拢这些国家追随美国。这些好处可能包括：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外交援助、军事帮助、制裁豁免、对背离美国标准的情况保持沉默（如对以色列的纵容政策）、在国际组织支持对方、贿赂以及邀请其政治领袖对美国的访问。只有在美国给予的有利条件面前，一些国家才肯点头追随。如美国给了新加坡以自由贸易国的地位，给了波兰以更多驻军的机会，提升与中东欧一些国家的军事合作层次等。

没有道义力量的支持，美国要收买追随者将不得不付出更多代价，如这次收买土耳其让美军过境的行动就没有成功，土耳其要求美国提供至少300亿美元的援助，而美国最多只能付出200亿美元的援助，所以美国没有能获得土耳其的允许，不得不放弃“北方战线”的计划。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将来的扩张步伐中，如颠覆伊朗政权，美国将必须花费更大的代价来拉拢一些追随者。

随着形势的变化，追随者在道义和战略选择上的机会成本也将越来越大，必然要求美国的付出越来越多。

将被征服地区美国化是一个更大的无底洞。如前章节所述，重建伊拉克每年需要花费至少250亿美元，美国根本无力负担这一任务。这也是美国在抛弃联合国之后又不得不回到联合国的重要原因。

美国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已经近两年了，但美国给予阿富汗的经济援助少得可怜。在阿富汗南部，当地农民看到的不是美国的援助工人，不是水利工程师，而是第82空降师。美国每个月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大约要花掉10亿美元，而对阿富汗的援助只有2500万美元。这点钱根本不够重建阿富汗，它反映美国对被征服地区进行重建和美国化时处于一种困境，但如果不进行重建和美国化的话，战争的胜利将变得毫无意义，美国把军队开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又所为何来？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肯尼迪在1987年提出的“帝国过度延伸论”中认为，任何强权都必须在其国防需要和维持这样需要及承诺的经济能力间，取得相对的平衡。一个强权若是过度扩张，它同时也扩大了国防安全的需求，增加相对的经费负担，因此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予以支撑。历史中的西班牙及大英帝国皆因经济实力无法继续承担其帝国的负荷，而终于走向衰退之路。

肯尼迪提出此观点时，冷战尚未结束，美国刚走出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衰退的阴影，但国内的预算赤字仍然庞大，又有日本经济及工业的强力挑战，再加上苏联的威胁并未完全消除，因此肯尼迪提出警告，认为美国若不调整其全球战略布局，其经济实力将无法承担这些责任及负担，最终会促成美国步上帝国过度延伸而转向衰退的后尘。

肯尼迪的论点被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批评者认为是一厢情愿唱衰美国的看法，且与事实不符。这些反对者坚持美国并未衰退，而是在经济转型后再度复兴。他们以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政治发展为证，指出美国的霸权不但没有衰退，反而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日本经济泡沫化后，成为当今世界惟一的经济及军事的超强。

此外，美国30多年来的预算赤字，也在克林顿政府任内获得平衡。因此鹰派认为，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美国经济实力，可以承担新罗马帝国全球战略布局的需要。

但“新经济”泡沫的破灭在短短时间内让山河变色。进入新世纪后，摆在美国人面前的事实是：2000年后美国经济衰退，预算赤字再度出现；克林顿政府时期创造的宏观经济稳定条件不复存在，一个重新军事化的国家也开始出现，布什政府一方面是低税收，另一方面是大规模扩展军备、提高安全和战略方面的承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走帝国扩张之路，必然会出现如同冷战时期一样的财政与贸易的双重高赤字，美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也必然回到冷战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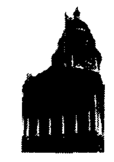
美国的决策者和许多学者都为美国能够以大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3%的代价保持其霸权而自豪。其实，美国还要用许多“软力量”来充实这3%，一系列国际规则和世界对美国的基本认可与合作态度，是保证美国能够保持较低防务费用开支的重要原因。

但现在，随着“软力量”的逐渐消解，美国即使要维持和20世纪90年代同样的地位，也将不得不花费更多的军费。3%的骄傲将成为过去。

英国《新政治家》周刊的记者约翰·格雷这样评论美国当前已经显示出来的过度扩张态势：

军事上，美国不可一世，但经济上越来越不堪一击。与“日不落”时期的英国不同，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而帝国时期的英国则向全世界输出资本。这种军事力量强大无比与严重依赖外国资本的两种特性的合二为一必然削弱美国奉行单边对外政策的能力。

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费用是由一个联盟支付的，包括德国、日本和沙特阿拉伯。而此次出兵伊拉克将只能由美国单独承担费用，因此白宫放出风暗示：占领伊拉克的费用将通过抽取伊拉克油田的部分收入来支付。美国的财力无以支撑它自诩的“全球霸主”的角色。



五、富庶的蛮荒地带

公元1世纪时期，罗马帝国向北扩张到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带、向东扩展到位于伊朗高原的帕提亚王国边界后，就再也无法再越雷池一步，帝国的扩张道路至此嘎然而止。北部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过于野蛮落后，帝国征服得到的利益根本抵不上战争的消耗；向东，帕提亚王国的力量过于强大，双方几度交战，各有胜负，基本上是难分高下。

所以，从此之后的罗马帝国基本上都采取守势，其目标限于维护一个已有的庞大帝国的广袤边界。最后，当罗马帝国从内部腐朽之后，广大的国土成为帝国无法承载的负担，罗马帝国终于被野蛮人攻破了。

目前，美国的情况也基本与此相似。它虽然有无限大的目

标，但行动之后却发现再也无法前进一步。有着如此富庶石油的伊拉克，却将是新罗马帝国扩张的“蛮荒之地”，在这里，美国已达到其国力所能支撑的扩张极限。

布热津基在其《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为美国霸权勾勒了三个重要任务：

> “帝国地缘战略的三大任务是：防止附庸国家的相互勾结并保持它们在安全方面对帝国的依赖性”、“保持称臣国家的顺从并维持向它们提供的保护”、“防止野蛮民族联合起来”。

对新罗马帝国来说，阿富汗、伊拉克、伊朗、朝鲜这样的“邪恶轴心”国家就是“野蛮民族”，它们是不发达国家，对美国文明极不认同，更不承认美国的霸权地位，敢于挑战美国的意志。在新罗马帝国的支持者看来，没有其他地方比这些国家更遥远了，恐怖分子就在这些“山高皇帝远”的地方策划了恐怖袭击活动，如“9·11”袭击事件。



全球帝国的野心使鹰派觉得有必要将帝国秩序延伸到这些遥远地方，防止这些“野蛮民族”联合起来，其方法就是征服。阿富汗战争是新罗马帝国对“野蛮民族”的征服，伊拉克战争也是如此，而征服的目标是要把“野蛮民族”变成俯首帖耳称臣的国家。

从已经逝去的数千年的历史来看，帝国主义从来不是民族主义的对手。

要真正让伊拉克称臣，并从伊拉克获取利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美国已经动员和调动了全世界最强大和最先进的军事力量，但现在看来，也不能彻底地制服伊拉克这个小国。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布什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近三个月之后，不

得不承认美军在伊拉克陷入了游击战。如前所述，美国对伊拉克战争有三个目标，但这三个目标依然遥远。



新罗马帝国的目标是要把“野蛮民族”变成俯首贴耳称臣的国家



伊拉克虽然有丰富的石油，但要真正控制这些石油，可能还需要等上10年的时间，更何况，即使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而不能控制欧佩克，伊拉克的石油本身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并不大。这个“野蛮国家”让美国付出了巨大的征服代价，但美国所获可能十分有限，其后果将在日后逐渐水落石出。

在“野蛮民族”之后，美国全球帝国的野心遭遇的目标就是俄罗斯、欧盟、印度、中国这样的强国或区域集团。在新罗马帝国计划中，俄罗斯是苏联问题的继续。俄罗斯从共产党国家到民主国家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俄罗斯是美国对手的实质。

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看，苏联的垮台不过是美国和这个对手斗争中取得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现在的俄罗斯依然还是美国全球帝国的障碍。

俄罗斯拥有除美国以外最强大的核力量。它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敢于对美国作出军事反应。美国在国际海域进行军事演习时，只有俄罗斯敢于派出战斗机，飞越正在演习的美军航空母舰；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俄罗斯也在印度洋海域进行军事演习，俄罗斯军舰在美军航母战斗群附近游弋。

庞大的核武器库为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中提供了立足点和政治影响力。所以，美国解决俄罗斯问题，就是要以遏制的手段加上发展经济的蜜桃为诱饵逐渐将其大国地位压缩。最终摘除俄罗斯的核武库。而长期的目标则是解除俄罗斯武装，把俄罗斯变成一个没有独立抗衡美国军事力量的、附庸于美国的国家。在2002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美国认为俄罗斯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期，认为美国应试图使其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方法是促使其内部发生美国所希望的变革，从而消除俄罗斯未来向美国挑战的可能。否则，俄美之间竞争的古老模式可能会复活。



欧盟的联合之路表明，欧盟已经率先进入后现代国家时代。一体化的欧洲将在许多方面令美国黯然失色。新罗马帝国对欧盟的目标是阻挠其形成美国联邦式的整体力量，但美国的行动已经太迟。欧洲联合已无法避免。一个联合的欧洲将从经济到政治的每一个领域与新罗马帝国展开争夺。

印度早就自我定位为全球性大国，其独立的大国意识和政策也将与美国帝国政策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产生碰撞。拥有10亿人口的印度一旦经济发展起来，将是美国全球帝国的天然对手。

中国的发展壮大也是美国必然面对的未来。

现在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力量有限，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将永远落后。在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一个繁荣强大中国的出现是迟早的事情。中国的强大对世界公正合理的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将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对那些企图称霸世界的国家的约束。

以上这些力量中心都将是美国帝国雄心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美国没有绝对战略优势的情况下，它不可能迫使这些强国或地区就范。当前的物理科学已陷入停滞，没有有效的技术能抗衡核能的释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寄予厚望的导弹防御系统是靠不住的。

与此同时，世界已经全面进入市场经济，强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必将逐渐进入平衡状态。美国的军事牌、经济牌的作用已今非昔比。鹰派即使消化好了伊拉克，也难以进一步推进其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伊拉克就是美国新罗马帝国的扩张的“蛮荒地带”。



第十四章
僵化的帝国灵魂





罗马帝国在5世纪衰亡了。其原因可以简单地说：内忧外患。但罗马帝国曾经如此强大，它面对所有来犯的敌人几乎战无不胜，但为什么后来就抵挡不住“野蛮人”的进犯呢？关键还是“内忧”，因为罗马帝国首先已经从内部衰败了，内忧使罗马帝国无法再创造性地维持庞大的帝国，最终走向腐朽。

新罗马帝国遵从古老的帝国思维，走向扩张之路，这是美国失去创造力领先后的不得已选择，它将反过来加剧美国创造力的流失，新罗马帝国最后将只剩下僵化的灵魂。

一、知识产权战略

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先后成为主要强国的国家其工业化过程基本上是通过模仿来实现的，美国、德国、日本都是如此。美国虽然是当今最强大的国家，但它主张的市场经济最终会培养出强劲的竞争对手，美国的技术可以帮助敌人精确地打

击自己，美国的信息科技革命可以在全世界传播反美主义，更可以成就竞争对手，颠覆美国自身的霸权。

对这一点的深刻认识，使美国许多精英认为，要维持美国的战略领先地位，创新虽然重要，但保证美国在创新方面的垄断能力，控制其他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更为重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制定强制性的国际法律架构，允许美国垄断最先进的创新成果。这就是美国的知识产权战略的目的所在。

在冷战时期，由于优先考虑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联盟，美国一度以宽厚的态度对待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允许其偏离自由市场政策，未经许可便将美国的先进技术拿为己用。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信息科技的发展使知识经济在国民经济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比重越来越大。执世界信息技术之牛耳的美国，开始发力在全球推广知识产权战略。这个实践得到了极大的成功，美国政府和企业将知识产权定义成功地扩展到了全球，使未来的每个产品都印上了知识产权的烙印。但这种看似保证自由竞争的法律体系，实际上是保证了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从商业角度来说，知识产权包括产品品牌、服务品牌、技术专利保护等内容。技术专利是当今知识产权竞争的最核心部分。据统计，目前美国企业大约拥有全世界商品品牌和服务品牌的 70%。而在技术专利方面，美国在美、日、欧三强中也是独占鳌头。

由于美、日、欧是世界专利技术角逐的主要场所，所以一般认为欧、美、日集中了世界几乎全部的专利技术。从下列数据可以看出，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在信息技术、制药、空间技术等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在其他方面则占有较大的优

势，只有在劳动力密集型等低端产业上和欧、日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与1990年相比，1996年欧盟在美、欧申请专利的份额下降了15%，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减少2%。美国在这6年间增加了20%，即每年增长3%以上。日本的增长明显停滞：它在美国申请的专利量维持不变，在欧洲的专利每年减少3%，即6年间下降20%。请见表1。

表1　欧、美、日在美、欧申请专利变化情况(指数)

	1990年（%）	1996年（%）
欧　盟	100	85
美　国	100	120
日　本	100	100（美国专利），80（欧洲专利）



在欧洲申请的专利中，欧盟最好的技术领域是陆上运输和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它们分别占世界各国在欧申请专利总数的60.5%和53.5%；最弱的是电子部门，占29.8%，而美国占39.8%。在制药技术、空间技术、化工技术，美国也领先于欧盟。具体比较请见表2。

表 2 欧、美、日工业部门在欧申请专利所占份额（1996）

工业部门	份 额（%）		
	欧 盟	美 国	日 本
空 间	43.6	42.5	2.2
电 子	29.8	39.8	25.0
制 药	36.3	43.0	12.7
化 工	41.1	36.5	15.5
资源密集型	47.6	29.3	12.9
劳动力密集型	53.5	25.7	9.5



在向美国申请的专利中，美国几乎在所有的工业部门都领先于日本和欧盟。（详见表 3）

表3 欧、美、日在美申请专利所占份额（1996）

工业部门	份额（%）		
	欧盟	美国	日本
空间	25.7	65.5	3.7
电子	9.6	46.8	36.6
制药	26.0	51.6	14.8
设备	18.3	50.1	23.3
陆运	23.9	41.3	25.3
化工	23.0	50.4	20.1
资源密集型	19.1	50.4	20.1
劳动力密集型	19.6	49.0	17.9
所有部门的总体水平	17.8	49.0	24.4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网 http：//www.sts.org.cn：《欧、日、美技术地位比较》。

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专利方面则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国际知识产权协会主席布鲁斯·卢曼在2002年曾这样描述：

目前，全球专利制度存在问题，显然它并没有给不发达国家的发明人提供平等的机会。

专利权的关键就在于专利权人能够在全球市场上以最获利的方式出售专利。来自专利交易不发达国家的权利人，必须获得一些大国，如美国、欧洲专利条约成员国的专利保护。然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民难以负担在这些大国进行专利申请的高额费用。

> 这种状况阻碍了发展中国家有效地参与全球专利市场。无疑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由于在技术专利领域积累了雄厚的历史优势，美国极力推行知识产权战略。2002 年，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了 21 世纪发展战略纲要，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以“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重要的手段，用知识产权来保护整个美国经济，推动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战略。

美国推行知识产权战略的好处已经显山露水，如在品牌战略方面，美国尽管很少生产电冰箱，买的电冰箱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和马来西亚进口的，但美国通过品牌授权，从各国的冰箱生产中赚取的利润几乎是一些国家制造工厂利润的四到五倍。

在技术专利方面，微软产品就是最明显的代表。WINDOWS98 操作系统在进入中国市场时零售价为 1980 元，比美国的价格高得多。根据这一价格如果我国所有电脑均预装 WINDOWS98，仅此一项微软即获得至少 20 亿元。美国消费者协会调查后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微软掠夺了全球用户 100 亿美元。



美国人也为美国企业能占据专利的制高点而欣喜，美国的《财富》杂志曾刊登文章，盛赞另外一个专利竞争中的大赢家：

> 移动通讯业的迅猛发展造就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赢家，这就是美国的高通公司。在众多厂商为 3G 的标准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只有高通公司能够开心地宣告：“不管谁能胜出，我都是赢家！”因为它所掌握的核心技术和标准已经能够使它立于不败之地了。

在全球各大电信公司斥资数百亿美元争夺尚属空中楼阁的

3G 牌照时，高通公司却不声不响地将左右 3G 发展趋势的核心技术专利一个接一个地掌握到了手中。现在，连高通公司竞争对手都不得不使用它的专利，受制于它，这无疑让高通公司左右逢源，上下通吃。从而可以“不再做任何事，只出售技术许可，也能够活得很好”。

了解了美国政府和企业间默契推行的知识产权战略，我们就容易明白为什么微软公司不仅被看作是美国财富的一个标志，而且还是美国霸权的一个标志。这也是美国司法部一直迟迟没有能分割微软的真正原因之一。比尔·盖茨已经成为美国的国际资产，如果真像愚人节新闻中说的那样，比尔·盖茨被人刺杀，那将会是和世界贸易大厦被撞毁、伊拉克战争爆发一样震惊人心。



知识产权战略本来是美国“仁慈霸权”的实现手段，同时也是目标之一。新罗马帝国的信奉者不希望美国在这方面的优势受到对外扩张的伤害，因为这种伤害将直接毁灭美国未来发展的“根”——美国的创造力。但事实可能恰恰与愿望相反。

二、开放社会的式微

要在短暂时间内实现一个宏图大略，必不可少的是自我约束。

新罗马帝国的蓝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美国公民保持有政治方面平等自由等传统权力，经济上的高消费、高福利的优裕生活，从而使美国保持创造力，充分实践上文所说的知识产权战略；另一方面美国以强大国力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别的国家不会有和美国平起平坐的权力，最终实现美国治下的世界永久和平。

这是存在于美国鹰派理想中的目标，实现起来的结果必然是一面为另外一面所吞没，一面为另外一面所牺牲。鹰派要么放弃新罗马帝国的野心，要么就必然会扼杀美国的创造力。当前的趋势表明，美国选择了后者。

发展经济学认为人类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最简单的是资源投入型，经济要素投入多，回报就比较大。东亚各国现在基本上是这种发展模式。高一级的就是技术创新型的增长，通过技术创新来创造新的需求，获得垄断利润。美、欧、日包括中国技术创新的能力都很强。最高级的是制度创新型增长，可以使各种经济资源用倍数效应的形式产生结果。

不管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都是和一个国家的社会开放特性联系在一起的。开放就意味着自由度比较大，各种各样的创新形式都有机会存在和得到发展。



“开放社会”的概念是由哲学家卡尔·波普在其 1944 年出版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首次提出的。在这本著作中，他提出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例如法西斯主义——是对开放社会的威胁，因为这些意识形态都声称自己找到了最终的解决途径，找到了关于人类命运的终极真理。为了实践或者让所有人遵守他们的终极真理，他们愿意通过高压政治和压迫来强制推行他们所谓的真理。

在开放社会中，人们对自由和民主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各个国家也有选择不同道路的权力，但是现在布什政府却认为美国已经找到了终极真理。布什曾在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极告》中这样写道：

> “20 世纪自由与集权主义的伟大斗争以自由力量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并向人们显示了一个国家成功的惟一可延续的模式：自由、民主与自由企业。”

这段话有两个非常武断的地方。首先，世界上并不只有一种可延续的国家模式；第二，美国国家的成功的模式并不一定适用于他国，美国的成功极大地依赖于美国在国际资本体系中的支配性地位，而其他国家并不具备这种地位。这种绝对而错误的认识是“美国至上”的基础，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布什政府才如此自信，傲慢。在所有国际问题上，布什政府的态度是：“如果你不同意我们，那就是同我们作对。”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斥责在伊拉克问题上与美国有分歧的欧洲盟友，并对国际合作有着本能的反感，认为如果对方不听话就不必罗嗦，拿出枪就可以了。

美国司法部长约翰·阿克什罗夫特则谴责《爱国者法案》的反对者是在给敌人以援助和安慰。



以上这些经常性出现的典型论调，显示了当前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都是极端主义者的看法，与开放社会的精神背道而驰。但“9·11”事件以及美国媒体的单方面的宣传，已经使美国民众大大忽略了一个事实：美国社会的开放性正在一点一点被美国鹰派的主张所吞噬。

在过去一年里，美国政府和公民权力的天平开始向政府方面倾斜，美国开始转向加强社会控制和政府管理，开始强调对公民的控制和监视，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思想上，美国由强调个人自由转向强调安全至上；军事上，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军队成立了北方司令部；警察方面，警察拘留嫌疑人的时间延长一倍；FBI 监听私人电话的范围扩大，移民自由受到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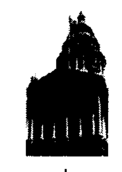
情治系统方面，美国以反恐为名，加强了对老百姓的控制和监视，美国国防部情报部门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推出一个史无前例的监视和搜集国民资料的超大型电脑数据库计

划——“监视国民计划”（TIA），以便揪出有“恐怖倾向”的可疑人物。

国防部还打算推出包罗万象的“终身”系统。据称，“终身”系统是一套拥有“良好意义”的科技系统，它能帮助“记忆不好的人记录其过去”。因此，“终身”系统将比TIA计划更能有效搜集美国公民的资料。

此外，美国三大情报机构还另有监视系统。现在，被司法部秘密监视的美国公民是过去23年总和的两倍多。司法部还提出了名为“猫眼”的居民举报计划。这一计划将训练居民互相监视，向当局举报可疑活动。

伊拉克战争大功告成后，美国国内刮起了一股“麦卡锡主义”之风。那些曾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挺身而出、参加反战游行示威的名人，正在受到国内媒体的清算。他们被冠上了“不爱国”和“不是美国人”的标签。



一些好莱坞明星们主演的影片、主持的节目和所撰写的作品都受到了抵制。他们包括马丁·西恩，曾参加反战游行；格莱美音乐奖多个奖项的获得者迪克西·切克斯，他发表过反布什总统的言论而惹火了许多听众，听众要求广播电台停止播放其音乐，许多电台也确实已经这样做了。

演艺界名人莎朗·斯通原定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一个公开活动，因为这场扑面而来的清算风暴而不得不取消，这次活动原定是庆祝她及其合伙人蒂姆·罗宾斯的影片《BULL DURHAM》的上映。但一位在里根当政时期在白宫工作过的博物馆馆长认定：影片的观点会危及美国军队。

《纽约邮报》专栏作家理查德·约翰逊还以醒目的标题将10多名美国演艺界的人士称为“萨达姆的热爱者”，并敦促观众抵制他们的作品。历史学家斯蒂文·罗斯说：

"那些在公众中名声不好的电影明星，那些被认为是不爱国的电影明星，将被视为票房价值的毒药。"

演员马克·法雷尔相信，这种对反战者进行惩罚的情况很可能再度发生，他说：

"我们知道存在着有组织的企图，要把那些'异己分子'从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清除掉。"

这再次让人想起麦卡锡时代的情景：禁止播出那些由"共产党的同情者"所拍摄的影片或电视。目前，这些反战明星们正在为自己言行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相反，这是一个得到美国公众支持的做法。



许多美国公众已经准备把任何对这些政策提出疑问的美国公民谴责为叛徒。国会中的民主党人也不敢对鹰派的军事计划说"不"，惟恐被当作不爱国而受到攻击。

在鹰派主宰的当今美国，美国的少数族裔现在变得越来越不敢说话。"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一度出现对阿拉伯裔的敌视，针对阿拉伯裔美国人的种族犯罪有所上升。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政府官员称，在美国提出移民申请的所有阿拉伯人中，1.3万多人可能会被驱逐出境。《纽约时报》报道称，这将是美国自"9·11"事件以来驱逐出境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布什政府利用国家移民系统来打击恐怖主义的一个突出例子。

在这1.3万多人中，许多人主动表示愿意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以换取政府的宽大处理。然而，美国政府官员称，他们没多大指望获得特殊待遇。

2003年6月，美国政府启动了驱逐出境的程序，美国某

些移民社区一度甚至已经出现了“大逃亡”的景象。

差不多与此同时的2003年5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美国一组织的上诉，支持美国政府允许对被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国人实行秘密驱逐的政策，这一政策将给予美国政府不需要举行公开听证会就可行使驱逐外国人的权力。法律专家认为，这个判决的结果必然是使美国政府可以进一步加强对在美生活的外国人的监控。

《波士顿环球报》的詹姆士·卡罗尔在评价美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时这样说：

> “它是一个如此失控的国家，甚至不敢再看一眼自己的实际情况。”



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民主党参议员伯德几乎是惟一一个敢说不同意见的美国政界元老，现在，他对美国政府加强控制民众的做法已经不能容忍，在最近一次长篇讲演的结尾时，伯德忧心忡忡地说：

> “最近屡见不鲜的‘权势们’有计划地胁迫只能让忠心耿耿的反对派暂时不作声。因为慢慢地，正像总会发生的那样，真理将浮现出来。当真理显现的时候，建在谎言上的纸牌房子就会倒塌。”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政府对公民加强控制的做法，已经导致美国社会内部的信任度前所未有地下降，美国社会的开放性也极大地受到了损害。

社会信任、公民自愿精神和社会的开放性基本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它们都是社会的宝贵资本，能激发国民的创新

精神，是美国曾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关键。现在这方面正受到新罗马帝国计划的侵蚀。而这也只是刚刚开始，新罗马帝国的雄心将必然要求美国国内自由、开放的传统为其让路，一个开放社会将逐渐为封闭社会所替代。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权力将逐渐强化，而公民的权利则逐渐受到削弱。

虽然目前看来，美国还远不到这一步，但只要新罗马帝国的扩张继续下去，这一步就迟早会到来。

三、创新能力的危机

所谓创新能力，不仅仅是指科技创新的能力，而且还包括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的创新，如创造新思想、新理论、新经济、新科技和新文化的能力。在20世纪最伟大的创新和发明中，有1/3以上属于美国，所以美国取得了今天的地位。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布拉肯曾提出，世界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表现在“打破延续了数百年的一种程序上”，他认为，创新力比物质力更重要。

但新罗马帝国的追求，将最终窒息美国在创新方面的能力。这是从思想根源上开始的阻碍与窒息。新保守主义的圣经《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提出，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要寻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内容并非因人而异，它是惟一的，是符合自然正当的生活。这完全否定了自由主义基础上构成的西方政治秩序：

> 政教分离，政府只关心秩序，个人有信仰自由、舆论自由，美好生活的问题由个人选择；在国际上，它主张不同的主权国家都有寻求不同美好生活方式的

权利，不同的主权国家为了保证有一种秩序，就发展出了国际法。国际法的目的是维护和平、秩序，而不是保证所有国家都追求一种美好生活。



新保守主义向往的是一种美好的生活



新保守主义强调世界上只有一种美好的生活，而其他不同于这种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是邪恶对美好的挑战，卑下对崇高的挑战。这样的新保守主义必然将排斥个性，排斥任何与自己不同的见解与观点。这就如《历史的终结》作者弗朗西斯·福山所梦想的那样：

“人类不是会盛开千姿百态美丽花朵的无数蓓蕾，

而是奔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一辆辆马车。”

对古罗马帝国来说，排斥个性可能有助于打造强悍的军队。但对处于当今世界的美国来说，排斥个性，必将压制创新，新罗马帝国的思想机器如果全部开动起来，将给美国的未来发展带来巨大的问题。

刚刚过去的10年，既是信息技术辉煌的10年，也是科技创新能力得到前所未有重视的10年，这10年把创新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张显到历史的高度。可以说，创新能力是美国成为当今世界惟一超强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其金融霸权、强大的军队、眼花缭乱的外交博弈，不过是这个强大内核的外现。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教授曾经如此概括：



> “美国的竞争优势是由许多领域支撑起来的。它拥有一流的大学、在某些市场具有独一无二的需求条件、国民冒险精神以及活跃的新企业创造能力等特色。”“它在技术变革上的快速步伐，则提供许多创造发明与企业的发展机会。”
>
> “长期而言，决胜关键不在资金成本或美元价位，而在人力资源的素质”，“美国要成功，真正的关键是改革与创新。”

未来社会发展的浪潮，创新将更加居于一个无与伦比的重要位置。这就要求鼓励个性化，鼓励不同方向的探索：在哲学上则承认美好的生活不止一种；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实行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在文明认同上抛弃惟我独尊的视角。而这一切，恰恰与新保守主义形成截然对立。

鹰派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但依然要追求新罗马帝国的梦想，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帝国天然具有守成的倾向，害怕新事物的出现，更重要的是因为鹰派觉得有办法可以克服这一点。那就是利用知识产权，加大对“昨天”固有优势的保护力度。并通过知识产权全球性的立法来极大地限制、控制其他地区的创新发展。

不妨按照新罗马帝国在这方面的设想，看看他们理想的情况：一方面是控制或垄断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市场。当前，“技术+品牌”投资已成为发达知识区控制市场、占有资源、资本和工业生产的重要方式。这种知识、技术输出策略最终会形成这样一种局面：美国知识区成为“知识帝国主义”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则成为边缘。新的、以知识分布为标准的“中心—边缘”世界体系重新形成。

另一方面是通过知识产权立法，强化“保护过去”。这包括：对后进的国家提高知识产权的价格和门槛，约束它们对知识的需求，限制它们利用已有的技术成果。



最后将是这样一个局面：美国保持其在世界知识和技术体系金字塔顶端的位置，让高附加值产业为美国所独霸，这样其他国家的任何生产将为美国创造进贡。

这个理想的图景能实现吗？答案是不能。美国这样做将最终给自己造成这样的一种局面：一方面从源头上抑制创新，另一方面又在实际利益上依赖创新，形成内部的发展困境。对此，波特忧虑地指出：

> “国家可以成为指导繁荣带动结构变迁和产业升级的主导力量，也有防碍再进步的高度风险，当它保护过多时，不当对实验和创新没有帮助，反而会钝化生产力的提升。”

> “不幸的是，今天美国从政府到企业的兴趣是保护‘昨天’，而不是创造明天的研发成果。美国近年来一连串动作，从努力延长专利权年限，推动严格限制模仿产品设计和造型的法案，坚持以输出技术来收取专利费等，在显示美国缺乏创新的信心的同时，还无形中降低了竞争的力量。
>
> 历史经验指出，前述的做法没有一项能达到持续竞争优势的效果。创新需要强大的诱因配合，而各国历史与美国产业发展经验证明，一味防止创新成果的扩散，正是创新诱因的致命伤。”

新罗马帝国战略的实施，或许在短期内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对手，但长期来看，则把竞争对手推到创新的先行者位置上去。如美国控制石油的做法，已经使欧洲以及中国、日本等大国警觉。这些国家为了摆脱对石油能源的依赖，必然将花更大的努力寻找新能源，一旦成功，新罗马帝国的石油战略就成为自身的陷阱。



失去自由精神，失去创新能力，将迫使美国政府和企业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到如何形成垄断方面去，甚至是如何违反规则，通过各种不光彩的手段来维持既得利益。

这在2002年爆发的一系列企业造假丑闻中已可见端倪。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这些造假行为是一种“传染性贪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瑞奇就此指出，布什政府本质上是一个政商勾串、政企一家的政府。因此，布什政府是美国安然等一大批企业弄虚作假的原因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布什政府无法真正将许多的犯法者揪出来，而只有一些漂亮的空话。

瑞奇认为，布什政府若不能以大幅度改革，来挽救投资大众的信心危机，对于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会有不良影

响，甚至引发另一次的全球经济衰退。作为冷战结束后惟一的全球霸权，美国曾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橱窗，同时也是竞争和创新精神的大力鼓吹者，如果政府任由巧取豪夺式的企业丑闻泛滥，而不有所作为的话，将会是自由经济的最大悲歌。

四、帝国道德毁灭之路

一个有活力的灵魂，必然来自一个道德健全的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也应该是一个公正、具有同情心的国家。美国正在一意孤行地追求新罗马帝国的目标，朝着这个方向演变。帝国必然会忽略其他民族的意志，惟我独尊。

法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埃德加·莫兰如此批判美国：

> “对于自己痛苦十分敏感的西方，对于别人的痛苦却是麻木不仁甚至毫无怜悯之心。对世贸中心的3000多名死难者的极大的同情心，与对死于轰炸的阿富汗平民和对巴勒斯坦的无辜受害者的无动于衷形成鲜明对照，这正如历史上西方对包括广岛在内的亚洲与非洲死难者毫不动情一样。”



美国是冷战的胜利者，也是后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美国没有因此而更多关心贫穷国家和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只是变得更骄傲，更自大，更自私。身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最关心的事便是领导世界的能力，而不是世界的发展。

1997年在七国集团丹佛高峰会议上，克林顿总统在演讲中说美国经济的成功足堪为所有其他国家的榜样。国务卿奥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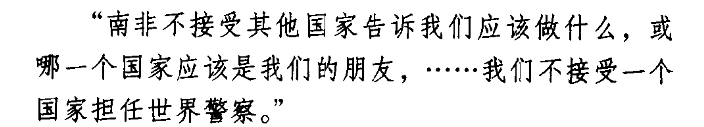
布赖特称美国是不可缺少的国家，因为美国站的高，所以看的比其他国家远。她还说，美国可以否决联合国的决定，但联合国不能否决美国的决定。

美国的“自我正义感”已经成为一种“优越主义”，美国上下不仅相信美国是“人道和正义的榜样”，并自认为“一个正义的美国使其他国家既不恐惧，也无需猜忌”。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家把这种优越感发挥到极致，1992年争取总统提名的共和党人士布坎南曾大声疾呼，“第一、第二、第三都是美国”（American First and Second，and Third）。美国自认是“良性的霸权”，但现在已经越来越背离这一曾经的骄傲。其他国家只看到美国的傲慢与专横。美国领袖认为世界的事就是美国的事，但其他国家对比却不认同。

南非总统曼德拉就曾告诫美国说：





“南非不接受其他国家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或哪一个国家应该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接受一个国家担任世界警察。”

美国因“自大和自私”而变为“傲慢和专横”，表现最露骨的便是对其他国家，包括整个国际社会的“不平等精神”。

美国《独立宣言》中强调人类生而平等，但却频频以美国例外论拒绝了这么多重要的国际条约。

美国正在从“仁慈的霸权”向新罗马帝国转变。美国《哈泼斯》杂志在一篇题为《企图建立一个帝国而执行的路线》中这样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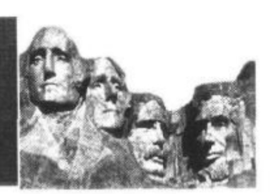
1798年，美国政治家、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指责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急躁冒进地

试图建立一个全球帝国”。两个世纪后，美国自己却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要执行汉密尔顿所谴责的这种“帝国路线”的迹象。美国对于使用武力的喜爱和信仰，对于非民主国家的合理性否认，以及疯狂寻求全球绝对安全这三个特点都具有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患有的那种“疾患”的特征。

布什不受传统的“必须以合法方式行事”概念的束缚，也不受必须致力于多边主义的概念的束缚，因此，总统以及这个国家发现，国际社会的限制是一个既没有必要也无法接受的负担。于是，美国开始有计划和有预谋地果断向全球帝国迈进，然而美国踏上的这条道路却几乎没有人理解。



第十五章 挑战者





简单地说，美国当今的霸权地位有三个要点：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的经济、科技领先地位。但对挑战者来说，并不需要在三个方面全部和美国势均力敌。三者有其二即可撼动美国霸权。

当前惟一能挑战美国霸权的是欧盟。而10年后，日本、俄罗斯、印度、中国的发展将使世界力量的中心更为分散，对美国来说，这些力量中心的崛起，即使不会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也同样是一种挑战。美国如果要阻挡这种趋势，提前和上述力量中任何一支发生冲突，必然两败俱伤，新罗马帝国将立即结束。

一、欧洲：当前的挑战者

2003年6月14日，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公布了他主持起草的“欧洲宪法”，此举意在效仿美国，通过一部宪法来联结整个欧洲，成为一个“新的联邦”。德斯坦也自视为“欧洲的杰

斐逊”。

根据这个“宪法”，整个欧盟25国将结成一个新的联邦体：设立两个永久总统职位，一个外交部长，统一货币，对外一个声音。这个庞大的欧洲“联邦体”名称有三个选择：“欧洲合众国”、“联合欧洲”或者“最亲密形式的联合体”。

欧洲大家庭是几代欧洲人的愿望。1713年，法国人圣·皮埃尔在《争取欧洲永远和平方案》中最早提出了建立“欧洲邦联”的构想，皮埃尔主张所有的欧洲国家缔结一个永久的盟约，制定并服从共同的法律，组建武装部队来保证盟约及法律的贯彻执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带来了痛苦，但也给欧洲联合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动力。1925年，时任法国总理的赫里欧在展望未来欧洲时明确表示：



“我的最大愿望就是有一天能看到欧洲合众国的出现。”

1929年，法国外长白里安向德国政府建议成立“欧洲联邦”，也就是欧洲主权国家的联盟，取消关税、建立共同市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取得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只有欧洲的统一，才能彻底解决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杜绝可能引发战争的因素。1946年，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欧洲国家需要建立起“某种类似于欧洲合众国的东西”。

1959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在一个有关欧洲前途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当时令人们瞠目结舌的预言。他说：

“要使欧洲成为大欧洲，必须有一个重大的变化：首先苏联不再是现在这样的苏联，而成为俄国……这

个提法只是一种历史的预见。”

40多年后，戴高乐的这个预见竟然成为现实，苏联的确已经解体成为俄罗斯，欧洲的联合也走到了一个关键时期。

欧洲一体化进程是20世纪世界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从1950年“舒曼计划”开始，到1993年“欧洲联盟”的成立，欧洲一体化走过半个世纪的历程。欧洲的联合给欧洲带来了稳定与和平，使分散的欧洲各国在国际事务中有了更大的发言权，成为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一极。

2004年，欧盟拥有25国成员后，其疆域将从大西洋岸边一直推进到俄罗斯边境，连成一片，总人口达4.5亿，其国内生产总值将达9万多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约11万亿美元）。



一个强大的货币——欧元已经成为现实：在目前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虽然有61%是美元，但欧元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在欧元区内，欧元在方便性、影响力等方面，与美元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国家可能会抛弃美元而采用欧元作为本国的储备货币。

政治上，一个统一的欧盟宪法正在形成之中，这意味着欧盟将向邦联国家形式迈出历史性的一步。法国《费加罗报》曾认为，欧洲应该用自己的“仁政”来对抗美国的霸权。什么是欧洲的仁政？

欧洲的仁政是欧洲式的“软力量”，是在欧盟扩大的过程中形成的。任何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必须在经济、财政、制度等方面达到欧盟的标准。为了让入盟国家达到这一标准，成员国内的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予以提携，使该国的经济和财政政策达到欧盟所需要的健康水平。

在这一过程中，入盟国家会享受到欧盟广大市场的好处。同时，在成为成员之后，这些国家将在意识和制度上和其他成

员国变得几乎一样，核心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就这样被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如爱尔兰在1973年刚加入欧洲共同体时，人均GDP不到欧洲人均GDP的70%，失业率更高达17%，但现在爱尔兰的生活水准已经在欧洲平均水准之上，而且由于经济蓬勃发展，甚至出现劳工短缺。其他入盟的中、东欧国家也得到了类似的好处。

有人这样描述欧盟整合过程中的独特现象：

> “如果能在柏林的旅馆住上一晚，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床单会送到波兰去清洗；如果在维也纳的餐厅吃饭，你会发现，许多服务生都是从斯洛伐克赶到这里来上班的。”



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预估，从1995年以来，东欧各国平均经济年增长率达到4%—5%，拉脱维亚更高达7%，比起西欧国家平均每年2%的经济增长，东欧的表现十分亮丽，“加入欧盟使他们生活变得更富裕”。

这就是二战结束后的50年中，欧盟形成的独特仁政，它目前所泽及的国家都只在欧洲范围内，但也因为其范围的狭小而显得更加有效。这是欧盟不同于美国的“软力量”，用欧盟驻华大使的话说，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邻居更像我们”。如今，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在谈论“欧洲特性”、“欧洲模式”、“欧洲价值观和道德观念”。

也正是因为如此，美国在欧洲打入的楔子才不能长期奏效。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几个新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采取了有限支持美国的政策，与法德有所不同。这一方面是新老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磨合”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对东欧国家所提供的好处所致。但这不足以造成拉姆斯菲尔

德所形容的新老欧洲的分裂。

因为美国提供的好处并不可靠，也不长久。波兰、斯洛伐克等国家，不能从和美国的军事关系中提高本国民众的福利，它们的产品更多地出口到欧洲国家而不是美国，投资也是更多地来自欧洲国家而不是美国。在当前的环境下，波兰等国和美国的亲密与其说是为了讨好美国，不如说是想提高自己在欧洲国家的位置，它们最终投奔的还是欧盟的怀抱。

2003年6月，波兰和捷克的公民投票证明了这点。赞成加入欧盟的波兰人和捷克人都超过77%。两国新闻界、知识界、商界都持热烈的赞成态度，波兰最大的报纸《新闻报》在公决当天出版了"号外"，呼吁人民踊跃投票。波兰的电信公司向它的1000万用户每10分钟发送一个信息，提醒他们距投票截止时间还剩下多少。



捷克最大的报纸《Mlada Fronta Dnes》则在头版用半个版的篇幅，印出三个巨大的字母Ano（捷克语Yes），用该报主编的话说：

"加入欧盟不仅促进我们国家的发展，它还提供希望，我们将永远摆脱东欧共产帝国主义的遗产。"

被视为欧洲最亲美的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在公决后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兴奋地说：

"我们终于回到了伟大的欧洲家庭。我们回到了波兰和波兰人民1000年历史都证明配得上的位置。"

今年79岁的波兰前政府将军雅鲁泽尔斯基在投了赞成票后对记者说：

“如果在20年前有人预测会发生这种情形，我一定认为是天方夜谭，是科幻小说。”

“但这是现实，这是生命的美丽。现实改变了，无论国内、国际还是历史上。这是新的现实，人们得承认。我以支持波兰加入欧盟来承认它。”

在美国的帝国形象受到越来越多指责的时候，欧盟却以一个崭新的形象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再认识。这是欧盟挑战美国最重要的力量源泉。除此之外，欧盟还在打造自己的独立防卫力量。

美国在冷战时期的胜利，不仅在于它通过“和平演变”成功地使苏联解体，而且也在于它通过北约这个军事同盟巧妙地完成了对盟国的控制，解除了它们的军事武装。



苏联解体后，在解除了“敌人”的军事威胁的同时，欧洲各国也发现，现在自己最害怕的军事力量是盟国美国。摆脱美国的控制，已成为欧洲打造未来防务力量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欧盟国家甚至开始与俄罗斯接近，借俄罗斯的核力量制衡美国。

1948年，欧洲统一建设者的先驱曾成立了一个防务组织“西欧联盟”，试图锻造自己独立的“防务臂膀”。但这个组织还未显露锋芒，就被美国拉起的北约所覆盖。“西欧联盟”苟延残喘了50多年，直到1999年归入欧盟，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1999年底，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决定，组建一支由5—6万人组成的欧洲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以便一旦发生地区性危机或冲突，欧洲能够在北约不愿直接参与的情况下自主决策和采取军事干预行动。这表明欧盟在军事一体化道路

上迈出了一大步。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更加刺激了欧盟。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在2003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称：

> "伊拉克危机把我们引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选择一条新的道路。""如果欧盟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有效和更积极的作用，就必须拥有更有效的防务。"

2003年4月29日，法、德、比、卢四国"小型防务首脑会议"和5月3日的欧盟15个成员国和10个候任国外长会议应势而召开。这两次会议是欧洲防务问题上的一次重要"跳跃"。5月3日外长会议50年来破天荒地达成一致，要制定欧洲首份共同安全战略。这被认为是欧洲共同防务建设的一个历史性事件。



尽管形成强大统一的防务力量还有待时日，但欧盟仍是当今世界惟一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力量。这是因为这种挑战将不会以军事对抗的形式来进行。

历年来美国对欧盟的对外贸易都占其外贸总额的20%—23%之间，美国和欧盟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占美国整个对外投资的一半，美国吸收的外来直接投资中60%来自西欧。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如果欧洲不同意，"美国就不可能达成全球性的贸易协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主动对欧洲动用军事力量将意味着两败俱伤，这将直接结束美国的霸权。

欧盟建立共同的防务政策，与其说是要抗衡美国，还不如说是要最终从体制上完成欧盟的联合，使其成为维护欧盟政治可信度的有效手段，当然，这最终也将有助于欧盟以一个整体

与美国竞争。

欧盟挑战美国霸权的另一个条件也在日趋成熟，那就是建立欧洲的连横体系：提升欧洲和拉美关系、欧亚关系、欧俄关系。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欧盟的全球战略已经清晰可见：南下中东、北非，与俄罗斯修好，巩固与非洲、加拿大、太平洋地区国家的传统联系，与拉美建立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等等。这些动作显示出欧盟在全世界重要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力，也表明欧洲试图在国际格局重组中为欧盟战略定位占据优势。

亚欧首脑会议是屈指可数的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全球性峰会。现在，亚欧首脑会议已经从当初的主要讨论经济和金融问题，转向讨论安全合作问题。欧盟必然将提高与中国、南亚国家、东盟国家的战略关系。



在对俄罗斯关系方面，欧盟可以说进展更大。1999年6月，欧盟通过了“对俄罗斯共同战略”。而现在，已经有人猜测会不会形成一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大欧洲。新罗马帝国战略必然将把俄罗斯、印度等力量中心逐渐排斥到其对立面，这也将有利于欧盟在外交上的合纵连横。

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院（SAIS）的戴维·卡莱欧教授在他的著作《反思欧洲的未来》中提出：

> “一个通向合作的欧亚框架具有重大的意义。未来世界会再次出现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公约，却无需经受30年战争之苦。亚欧大陆的威斯特伐利亚多极体系将比美国主导的霸权模式更有效。”

正是因为一体化集团后盾和全球战略联系网的支撑，近年来，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自主的外交攻势益发加强。在《京

都议定书》、导弹防御计划、发展对朝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它都拂了美国的意志，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2002 年，当巴以冲突急剧恶化之时，欧盟一再出手调解，并与美国唱反调，主张巴以间应保持平衡，反对让阿拉法特下台，对美国过分偏袒以色列不满。

“9·11”事件后，欧盟在支持美国反恐战争的同时，从反恐定义和范围、反恐战争打法和步骤、联合国的角色地位，以及攻打伊拉克等重大国际问题上都唱独立调门。在经贸领域、国际事务等方面，欧盟都表现出不怕开罪美国，甚至公开与美国较劲的态度，这在冷战时期是不可想像的。

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和对外关系理事会欧洲研究小组组长查尔斯·库泊辰是美国最有影响的欧洲问题专家之一，他认为：美国独霸世界的时代即将结束，与之争锋的既不是伊斯兰世界或正在崛起的中国，而是逐渐统一、经济力量可与美国匹敌的欧洲。



“美国的统治地位并不如其外表那样稳固，它已开始被削弱了。崛起的挑战者不是中国或伊斯兰世界，而是欧洲联盟。

这个政治实体正处于将欧洲各个不同民族国家资源以及历史抱负集中整合过程之中。欧盟一年经济产值达到了 8 万亿美元左右，美国为 10 万亿美元。欧元将很快对美元的全球统治地位构成威胁。”

在近代历史上，欧洲一直是国际关系舞台的中心。英国、法国、德国曾经如同今天的美国一样，是世界的中心力量。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后来居上。但现在欧盟这个美国昔日最大的盟友，已经成为美国霸权的最有力挑战者，欧盟要求与美国建

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平等地享受国际政治、经济体制中的好处。而一旦世界形成两个互相平等的力量中心，美国的霸权自然不复存在。

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

俄罗斯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几百年来，俄罗斯有两个互相矛盾的梦想，一是融入欧洲，另一个是建立俄罗斯帝国。这两个梦想都是对新罗马帝国的挑战。

联合起来的欧洲一度给俄罗斯带来了无穷的遐想。先是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全欧大厦"的设想，接着叶利钦在 1997 年提出俄罗斯要加入欧盟，俄罗斯总统普京则为俄罗斯融入欧洲加进了很多实质性的内容。



但是，毕竟俄罗斯太大了。如果欧盟完全接纳俄罗斯，与俄罗斯合为"大欧洲"，将会打破两个平衡：欧盟内部的平衡和世界格局的平衡。前一个结局是欧盟忌讳的，后一个结局则是世界尤其是美国最极力反对的。其次，俄罗斯虽然一度要极力重新融入西方文明，并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但这个庞大的国家依然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

此外，欧盟不需要借助俄罗斯就足以拥有相当的综合实力，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关键的平衡力量。没有俄罗斯的融入，欧洲照样可以成为"大欧洲"。

所以，今后俄罗斯与欧盟依然是世界格局中的两极而不是一极。既然融入欧洲的可能性比较小，那么俄罗斯帝国就是俄罗斯的命运所系。

这和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俄罗斯兴起的"新欧亚主义"思潮不谋而合。19 世纪，俄罗斯知识界为弥合西化派与保皇

派之间的分歧和争执，提出了“欧亚主义”。“欧亚主义”主张俄罗斯的任务不在于全盘模仿或否定西方自由和民主，而是要整合欧亚大陆丰富多样的资源，配合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化传统，取东西方之长，另辟蹊径，发展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帝国。这就是“新欧亚主义”的源头。

“新欧亚主义”认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会把世界带向非持续发展的道路，最终会毁灭民族文化和非西方文明。为防微杜渐，俄罗斯须利用德国和东欧斯拉夫民族的复兴为契机，让欧洲摆脱美国主导的大西洋联盟。

“新欧亚主义”为俄罗斯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重任：在美国强权的威逼之下，俄罗斯是欧亚大陆安危和全球多样化文明存续的关键。因为俄罗斯的东正教是惟一和儒、释、耶、回都有渊源的宗教，因此是惟一可整合东西方文化的宗教。俄罗斯目前经济条件虽然欠佳，但仍然可以引领全球走向崭新的后工业、多元文化世界，取代以消费主义和霸权为骨干的美国式的世界观，拯救全世界。



“新欧亚主义”糅合了俄罗斯另外两股重要思潮：欧洲—大西洋主义和现代斯拉夫主义。欧洲—大西洋主义是俄罗斯历史上主张全盘西化的西方派的变种。它主张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应当是在民主化、非意识形态化、非军事化和非全球化的基础上，使俄罗斯同西方结成“伙伴”和“盟友”，以“返回欧洲”，重新成为西方“文明国家大家庭”的成员。

现代斯拉夫主义则与欧洲—大西洋主义相对立。在对外政策上，它更重视独立性和以俄罗斯为中心，主张斯拉夫的团结和统一，主张俄罗斯同白俄罗斯、乌克兰重新联合起来构成一个强国的中心。而“新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而是某种特殊的欧亚现象，其鼓吹者自称为“欧亚人”。在对外政策上，“新欧亚主义”给俄罗斯界定的位

置是东西方之间之均衡因素。它不是西方的后院，而是东方的大门，应以东西方中介人的身份而复兴，在欧亚主权国家的联盟中占中央地位，它是世界大国，是俄罗斯帝国的复兴。莫斯科倡导“新欧亚主义”的重要杂志《要素》的主编杜金宣称，俄罗斯的中心地理位置决定了俄罗斯的未来使命就是成为帝国：

> “不是帝国的俄罗斯是不可思议的。”
>
> “俄罗斯的土地或许是足够的，也不想同谁打仗，可是地缘政治的规律是无情的。如果我们不是帝国，我们就将一文不值。”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采取的是亲西方的对外政策，按其所开的“药方”建设国家。结果是处处受制于他人，不仅没有使国家繁荣强大，反而变得越来越穷。



在此情况下，美国乘机压缩俄罗斯的战略腹地。1995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无视俄罗斯的反对，开始东扩步伐，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正式加入北约后，其势力范围延伸到了俄罗斯家门口。

在北约东扩的同时，美国还从俄罗斯存在重大利益的国家下手，前南联盟、伊拉克，今后可能对伊朗等等，美国将会逐次逼迫俄罗斯退出。

这使“新欧亚主义”的论点进一步得到印证：俄罗斯的强大将必然和美国的霸权发生碰撞，两者不会和谐相处。因此，美国不会让拥有苏联核武器库的俄罗斯，重新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秩序的大国，美国希望把俄罗斯的力量永远地局限于俄罗斯的版图之内。这使俄罗斯对俄美真正伙伴关系的幻想破灭。

2003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必须“建立强大的俄罗斯”，俄只能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在现有边界范围内继续生存下去。当前俄罗斯的三大任务是：GDP翻番、消除贫困和加强武装力量建设。这也正是“新欧亚主义”思潮给俄罗斯提出的任务。俄罗斯正在力图复兴，其强大的每一个步伐都将对美国的霸权构成天然的挑战。

从军事上来说，尽管美国试图要逐渐销毁俄罗斯的核武器库，但俄罗斯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惟一一个能够与美国互相毁灭的国家。曾于1990—1994年担任俄驻联合国代表及1994～1999年担任俄驻美大使的沃龙佐夫如此看待核武器对俄罗斯的重大作用：



> 我不认为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我经常就这个问题与美国人争论。我问他们，你们先前为什么承认和接受苏联是和你们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是因为它的经济、它的财力，还是它的生活标准？显然都不是。惟一原因是它的核能力。那么现在为什么不承认俄是超级大国呢？俄的核能力改变了吗？一点也没有，俄仍能在90分钟内彻底摧毁美国。别瞧不起俄罗斯。

新千年之后，俄罗斯先后出台了《俄联邦军事学说》、《俄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俄联邦外交政策构想》等战略性法规文件。其核心思想最后都落脚到一点上：重振俄罗斯世界一流大国地位，保证俄罗斯未来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全面强大。

俄罗斯认为，军事力量是保证国家安全、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可靠保证之一。为此，俄罗斯加强质量建军，大力裁减非

战斗部队，优先发展机动力量，重视建设快速反应部队，为军队重点研制和装备高新技术武器。俄罗斯依然认为其庞大的核武器库和发展力量是确保俄罗斯大国地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因此，俄罗斯放弃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在军费极其有限的情况下，继部署了两个白杨—M 洲际弹道导弹团之后，准备再部署一个团。

与此同时，俄罗斯还注意加强与友好国家进行军事技术合作，尤其是加强与独联体各国的军事合作，倡导集体防御。目前，俄罗斯在巩固独联体国家领导地位的同时，积极推进独联体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以此保证稳固的后方。此外，俄罗斯还积极向一些国家输出武器装备，扩大军事实力的影响。



即使在常规武器方面，俄罗斯也不会让自己的军队信心崩溃。

新千年以来，俄军战机已经三度“奇袭”在日本海进行军事演习的美国“小鹰”号航母战斗群，虽然没有投下炸弹，但战斗机躲过美国雷达的跟踪，飞越美军航母上空的事实表明，俄罗斯空军有能力摧毁美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从经济上来说，虽然俄罗斯的经济规模远不如美国，据 2001 年的统计数字，俄罗斯的 GDP 仅为美国的 5%左右，但俄罗斯也是最不担心美国经济制裁的国家，也是和美国发生冲突时遭受可能经济损失最低的国家。

2002 年，俄罗斯与非独联体国家的贸易总额为 1264 亿美元。欧盟是它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到了俄罗斯与非独联体国家贸易总额的 44%，而与美国的贸易往来只有 70 亿美元，与俄罗斯同荷兰或比利时的 65 亿美元的贸易额相当，更不及俄罗斯与中国当年 92 亿美元的贸易水平。

自1996年以来，俄罗斯吸引了19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其中美国仅仅占40亿美元，而欧盟则占到70亿美元。

正如《亚洲时报》2003年4月8日文章所说：

> 俄美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如打击恐怖主义、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能源合作等，这些因素都能丰富双边关系，但不足以使之天长地久。

俄罗斯真正的经济利益并不在太平洋对岸，而是在西方和东南。俄罗斯和欧盟经济的互补性远远大于俄罗斯和美国经济之间的互补性。也正是因为如此，俄罗斯比其他大国更敢于挑战美国。



“新欧亚主义”提出，俄罗斯应整合欧亚大陆的资源，形成对抗美国霸权的体系。这一点反映在俄罗斯当前的外交政策上，就是打造一个形式广泛、层次不一的欧亚联盟体系，而俄罗斯是这个体系的中心，以此放大俄罗斯的影响力。

俄罗斯外交捭阖的核心层是独联体国家，这些国家曾经和俄罗斯一起构成苏联，对其广大的势力范围记忆犹新。独联体国家中，至今还居住着大约2500万俄罗斯人，这些国家是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其他方面特殊利益的地缘战略区。

独联体国家是否对俄罗斯实行友好政策，关系到俄罗斯是否有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是否有一个稳定的原材料产地和巨大的商品市场。独联体国家还是俄罗斯战略防御空间的天然延伸，对俄罗斯自身防御具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总统普京2000年12月24日在谈到对独联体政策时说：

"对于我们来说，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不是与独联体这个组织，而是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过去是将来也是头号重点。"

普京上台后首先积极开展对独联体国家的"首脑外交"。还在担任代总统期间，普京就将首次出访的国家定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出任总统后，首次出访也选择了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并先后访问了9个独联体国家。俄罗斯总理、外长、国防部长等政府要员也频繁出访独联体国家。普京的"首脑外交"和俄罗斯其他官员的外交活动，加强了俄罗斯在独联体的地位，增强了独联体的凝聚力。

在经济上，俄罗斯也利用其最大的市场地位，加紧推进与独联体国家经济一体化进程。2000年10月，为有效推动5国关税联盟和统一经济空间的进程，在普京的倡议下，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5个关税联盟成员国总统签署了建立欧亚经济共同体条约，使独联体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对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军事合作方面，继续维持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的军事存在，巩固以俄罗斯为主体的独联体地区安全机制。普京积极促进集体安全合作，倡议建立共同防御系统，并率先与白俄罗斯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2001年1月26日俄白联盟条约生效，正式组成俄白联盟。此外，在俄罗斯倡议下，2000年12月在莫斯科成立了独联体反恐怖中心。

俄罗斯希望能与欧盟建立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扩大同欧盟的经济合作。欧盟是俄罗斯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和投资者。俄罗斯70%的外贸顺差来自欧盟国家。俄罗斯吸收的全部外资中有一半以上来自西欧。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与欧盟发展关系可以改善俄罗斯与欧洲的安全环境，冲破美国在安全、经济等领域对俄罗斯的孤立，加大俄罗斯同美国的周旋余地。

普京上台后加大了对欧外交战略力度。一是推动俄罗斯和欧盟一体化进程，以提高欧洲对俄罗斯的接纳程度。二是在安全方面，俄罗斯主张建立由欧洲人主导的欧洲安全新结构，主张与欧盟联合建立反导防御系统，希望以此来抗衡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同时也以此在未来的欧洲安全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

2000年6月，俄罗斯和欧盟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了自普京当选总统以来的首次首脑会晤。2001年3月，受欧盟领导人邀请，普京首次全程参加了在瑞典举行的欧盟各国领导人会议，这对于俄罗斯与欧盟关系来说是一次重大突破。2001年5月俄罗斯与欧盟在莫斯科举行第7次最高级会晤。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合作，特别强调要努力建成欧洲统一经济空间。



2003年5月31日，正值俄罗斯圣彼得堡建市300周年庆典之际，俄罗斯和欧盟举行首脑会议，主张创建“没有裂痕”的欧洲。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欧盟国家领导人就开放边界、车臣危机等议题达成一致。

通过几次与欧盟的重要会晤，俄欧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俄与欧盟在各方面的互信和合作。

同时，俄罗斯积极发展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这是避免两线作战的必然要求。亚洲不仅事关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也是它在西方与美欧较量的筹码与后方。2000年7月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指出：

“亚洲在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中具有日益重要的意

义，这是因为，俄罗斯本身属于这一迅速发展的地区。”

俄罗斯在亚洲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俄的亚洲领土上储存着大量的自然资源，如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这笔资源，加上俄罗斯本身的影响力，是俄与亚洲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对亚洲事务发挥影响的无价财富。

普京上任后，积极活跃在亚洲的舞台上。

俄罗斯与中国于2001年7月在莫斯科签署了新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取代50年前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毫无疑问是两国双边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

中俄经贸关系近年来也有所发展，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显示，2002年中俄贸易额达到120亿美元。俄罗斯与中国还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就中亚地区的安全、打击恐怖主义等事务方面加强了协调与合作。



2003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俄罗斯期间，俄罗斯与中国就“安大线”石油管线问题达成协议，这是两国经济和政治合作的重大事件，将使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加牢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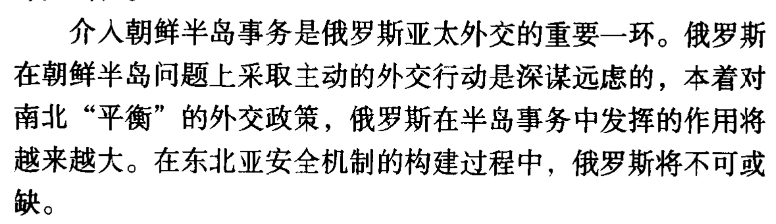
从历史上看，在整个冷战时期，俄罗斯与印度一直是盟友，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有着极自然、顺畅的先天条件，俄印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有着良好的传统与前景，近年来俄印在军事领域每年都有15亿美元左右的稳定贸易额，眼下俄印拟议中的军事技术合作协议就有300多项，且有从普通军火贸易向研发合作领域拓展的趋向，这无疑将推动俄印关系向更深层发展。

2002年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接着飞向新德里，访问了印度。俄印签署了包括新德里宣言和反恐合作备忘录在内的八个外交文件，表明了在当前反对恐怖主义的新形势下，俄印进一步强化了战略伙伴关系。正如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普京访问前夕对媒体所说，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形势下具有特殊意义。

现在，印度军队80%的武器装备来自俄罗斯，包括最先进的坦克、驱逐舰和潜艇、战斗机和轰炸机等。两国在国防合作领域已结束了以往“俄罗斯卖印度买”纯粹的交易关系，开始迈入“共同研制和开发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轨道。

在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上，俄罗斯也在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2000年2月，普京在韩国议会发表演讲时阐述了俄罗斯对朝鲜半岛局势五个方面的基本立场。2001年8月，普京邀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访问俄罗斯。金正日成功访问俄罗斯，表明俄罗斯意欲在朝鲜半岛统一进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在朝鲜半岛事务中扮演“积极参与者”的角色，而非“旁观者”。





介入朝鲜半岛事务是俄罗斯亚太外交的重要一环。俄罗斯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采取主动的外交行动是深谋远虑的，本着对南北“平衡”的外交政策，俄罗斯在半岛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在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构建过程中，俄罗斯将不可或缺。

总之，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近年来，俄罗斯全力推行其明确而又务实的全方位外交战略，构筑欧亚不同层次的关系网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2003年5月，在圣彼得堡市建市300周年的庆典上，44个国家的首脑齐聚俄罗斯。有媒体如此评价这场盛大的庆典：

站在这座教堂外的涅瓦河畔，一向表情冷峻的普京说，“这座有着300年历史的城市迈入了新的发展纪元。”而此刻，在遥远的太平洋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天刚破晓——幅员辽阔、横跨11个时区，占世界陆地总面积1/6的俄罗斯，沉浸在对彼得大帝的追忆之中。

300年前，彼得大帝建造了圣彼得堡，为俄罗斯开辟了向西望的视野和走向强大的契机。这位俄罗斯强人当时说：“设若天假我以年，圣彼得堡将变成另一个阿姆斯特丹。”

“给我20年，还你一个奇迹的俄罗斯。”这是普京的承诺。两人的语气多么相似。

圣彼得堡盛典已经成为普京、这个被誉为彼得大帝继承者的人，带领俄罗斯回归辉煌帝国的一个标志性记忆。



三、日本：下一个技术

为了制衡中国和苏联，半个多世纪来，日本在美国的军事庇护下实力不断增强。现在日本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经济上紧随美国之后；科技十分发达，某些方面还超过美国；其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在世界上也属佼佼者；军费投入总额名列世界第二位。

日本的强大也让美国担心，毕竟日本是惟一一个遭到美国原子弹轰炸的国家。

日本挑战美国的力量在于其经济力量和科技，日本目前拥有最大的海外美元储备，总额达到将近6000亿美元，估计到

2008年将达到1万亿美元。

学者亨廷顿认为，以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美国主要战略利益之一是：应付未来日本经济上的挑战，经由美日之间的军事同盟来防止日本在东亚重拾霸权。

2000年10月，美国国防大学曾发表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研究报告，题为《美国与日本：迈向成熟的伙伴关系》。这个报告的主持人就是现布什政府内的鹰派人物、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因此，该报告又称为"阿米蒂奇报告"。该报告旨在"强化美日安全关系，以美英特殊关系为榜样"，使日本成为"远东的英国"。

日本能成为"远东的英国"吗？

在中国唐朝强大时，日本人对中国敬畏无比。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制造工艺、建筑美术、典章制度等等，并仿照中文草书偏旁等创造日文，使日本开始走出原始时代，完成所谓大化革新。当时日皇即告诫其使者：



"言语必和，礼意必笃，毋生嫌疑，毋为诡计。"

但近、现代中国落后时，日本对中国实施了近代历史上最野蛮的侵略。

美国人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花与刀》中如此概括日本的民族特性：

"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顺从又不甘受人摆布，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

顺从和好斗两种矛盾的特性使日本民族中存在着崇强鄙弱

的天性，即使对美国也是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占领日本后，日本对美国千依百顺，连天皇也每天早晨起来去给麦克阿瑟鞠躬行礼，以获得美国的信任。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成功时，就看不起美国人。《日本敢于说不》一书把美国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水平说得一无是处。索尼总裁曾声称，日本的一兆位的存取芯片就能打破美苏的战略平衡，日本人的智力无与伦比。

> 作为世界自由贸易中的“搭踏板车者”，日本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激起的恐惧甚至超过了苏联。就像在裁军会谈中对苏联所做的一样，西方也敦促日本“自愿”地控制一下它的出口。日本屈服了。但日本生产厂家纷纷通过在欧洲和美国建厂来摆脱政府的限制。例如，当东京已无法再推迟开放肉类市场的限期时，日本公司就马上在澳大利亚购买了许多养牛场。
>
> 在日元升值的帮助下，日本公司进一步扩建它们在亚洲国家的“桥头堡”，促成了所谓“亚洲奇迹”的出现。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就有目的地扩大在战时“大东亚共荣圈”所包括地区的经济影响。从70年代后期起，日本厂家开始把生产向这些低工资国家转移。经济学家把亚洲国家的发展比作一个雁群，在头雁日本的带领下呈阶梯状飞行。



上文这一段描述的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以令人惊奇的速度书写经济奇迹。但90年代却成了日本“失去的10年”。日本模式从天上滑落了。

统计显示，近10年来，日本经济增长率几乎为零，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5.4%，政府财政赤字和银行呆坏账都达到空

前庞大的规模。

与此同时，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取得巨大进步，把日本远远抛在后面，日本人又重新学习美国。

美国想把日本变成“远东的英国”，主要是出于其称霸世界的需要，实际上是要把日本变成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附庸”。为了达此目标，美国不得不“迁就日本”。

但二战后日本没能很好地反省自己的战争罪行，美国为了利用日本对付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没有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因此才出现了日本阁僚一再在战争问题上“失言”，以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事件等问题。

这是日本右翼势力在日本坐大的表现。据报道，在 1990 年，只有 18%的日本民众支持向海外派兵，2003 年，这一比例达到 46%，另有 31%的民众不支持也不反对。这样的思想转变说明，日本有朝一日必定会成为明目张胆的军事大国。



美国将来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掌控日本”，除了继续在日本驻军、保持日美同盟关系外，还将取决于日美之间的经济力量，日本经济一旦再次获得强劲发展，就必然危及美国的经济霸权。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当前，日本上下正在寻求振兴日本经济的良策。虽然存在“内需不足说”、“竞争落伍说”、“结构失衡说”、“政策失误说”等等原因，但日本产业界基本认定，在产业政策上的失误是日本经济危机的主导原因，其他因素则加剧了这一危机。

日本正在瞄准下一个 10 年的决定性的新技术，并认为掌握未来的关键技术将是日本经济的起爆剂。日本政府和民间权威机构对 21 世纪的日本技术竞争力进行了分析、评估，预测到 2010 年，在 16 个主要技术领域中，日本可以与美国平分天下，即有八项技术能占领先地位。

日本有关方面对主要技术领域的评估如下：

（一）电动汽车领域将更拉大与美国的差距。

（二）在下一代移动电话技术领域日本将领先。

（三）“光”技术领域优势显著。兆兆位光通讯方式、兆兆位光纤产品和新型玻璃这三个领域，日本有绝对优势。

（四）在超级并行计算机领域日本甘拜下风。目前日本正在一步不让地紧追，市场占有率只相差几个百分点。

（五）超级高速汽垫船是日本强项。日本从 1989 年开始把研究开发这种船舶的计划列入国家项目，有七个大造船公司参加。1994 年实验船“飞翔”和“疾风”相继问世。预计将来 90% 的市场将操纵在日本手里。



（六）电视技术各有所长。日本国家电视机构 NHK 首先开发出高清晰度电视，又有索尼、松下电器等在家电行业绝对领先的企业，有足够的实力占领未来电视技术的市场，但从目前来看，数字传输将是下一代电视主流，而日本的程序模技术赶不上美国，此外在 HDTV 技术方面欧美走在日本前面，所以胜负难分。

（七）大型客机市场没有日本的立足之地。日本的“YSX”80 度客机的研究开发一直没有进展，这是最大的缺项。

（八）半导体超晶格元件等领域仍将由美国领先。超智能芯片是多功能芯片能将以往的识别声音芯片、推理机能芯片、逻辑机能芯片集中于一体，从而降低

生产成本，目前各生产厂竞争日益激烈，美国仍领先一步。但是日本政府将其当作重点研究开发项目，作为国家项目投入经费，此方面的人才正在增加，所以，日本人期望值很高，但美国到2010年的领先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

（九）地下物流技术方面日本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日本正在研究开发的地下物流网进展顺利，这项技术是开通物流专用隧道并实现网络化，建立集散中心，形成地下物流系统。这在相对人口集中、国土狭小的日本首先实现是毋庸置疑的。

（十）二氧化碳和垃圾处理技术的市场将三分天下。在二氧化碳固化的催化剂研究开发上，美国企业略占优势。废物处理技术集中在塑料制品的销毁上，与光分解相比，生物分解优点多，被认为是未来的主流。美国两家化学公司走在前面，欧洲也不弱，预计2010年各国相差不大。



如果日本在下一个技术浪潮中能领先美国或者与之平分秋色，都将再次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直接危及美国的经济霸权。

而且，日本的民族主义以及右翼势力对大东亚共荣圈的不死野心，将可能危及美日军事同盟。

四、中国的底线

1405年，中国明朝时期，大臣郑和第一次出使西洋。据记载，他率领的被西方后来称为“中华帝国”的舰队有船员

2.7万多人，他们乘坐200多艘海船，浩浩荡荡地从刘家港出发，远航至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

在1433年之前，郑和又曾六次下西洋，最后一次，传说因为思念皇帝而早早归来：

> 当时郑和所见到的洋人的脸色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农民红”，他们哼着当地的土曲，放着羊，喝着家酿的酒。
>
> 当地人告诉郑和，再往北的欧罗巴很荒凉，只有羊毛和酒，郑和思念恩重如山、垂垂老矣的永乐皇帝，命令舰队返航。
>
> 如果郑和再向北航行到达英伦三岛，在百年战争中打得不可开交的英法双方一定会竞相祈求郑大人助战，就像故事里小人国的国王请巨人帮忙一样。



这是消逝了的中国的辉煌。

500年前，当许多欧洲人还处于刀耕火种时期，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欧洲控制亚洲和美洲之前约100年，中国具有全世界最大、最精良的海军，最先进的航海技术，具有能够控制全世界的发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

具有那么多优势，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全世界的领跑者，反而落在了欧洲人的后面？英国著名学者、《中国技术史》作者李约瑟认为：

> 中国在15世纪时期技术仍然先进，但由于压制企业家，担心威胁皇权，已经开始失去优势。帝国要求内部稳定，但代价是面对西方挑战日益萎缩。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在10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鸦片战争时，清王朝已经无法对抗西方列强。西方形成了关于中国人的标准观念：墨守陈规，不善创造。

最落后的时候也是追赶的开始。自鸦片战争起，中国人奋起追赶。在经过百余年的探索、试验后，中国终于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中国成为影响全球的巨大市场之一。美国《新闻周刊》2003年的一期文章如此描述当前中国的变化：

> 中国过去20年的成绩是惊人的。尽管你认为它的经济增长数字是夸大的，但它的确使成千上万的人摆脱了贫困并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说："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发展最成功的国家。"
>
> 中国的经济政策在过去的几年里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国家。亚洲的经济地图被重新描绘，中国成为亚洲的经济中心。这是这一年的故事里最重要的情节，但它却被反恐战争埋没了。
>
> 看看以下情况：1985年，中国外资公司的出口额仅为3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到2001年，外资公司的出口额达到1330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0%。中国现在成为日本的最大进口商品产地。
>
> 从长远来看，中国变得富强的结果可能会证明对地区有好处。毕竟中国既出口商品，同时也进口商品。譬如，中国大陆是台湾地区商品的最大进口地，它进口台湾地区总出口商品的1/4左右。这比10年前增长了一倍。而且，结果可能证明日本和中国的经



济相互补充。但是想要出现愉快的前景，那还有赖于政治，有赖于中国融入世界的程度。这取决于北京，但更多的是取决于华盛顿。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多极化的体现，也是人类的1/5以上人口要求获得幸福生活的努力所致。中国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发展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贡献。在这里，不妨引用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论述，它简单而有力，是中国发展对世界贡献的最好阐述：

对中国的发展，国际上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从各种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发展对他们有利还是有害？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考察和回答这个问题，一个是政治角度，一个是经济角度。

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过去，在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是“好战”的。对这个问题，不仅我，还有中国其他领导人，包括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多次声明，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日本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所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制定中国的国策，同样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核武器谈判，外层空间武器谈判，看不出有什么进展。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



再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我过去跟很多日本朋友谈这个问题，跟欧洲朋友、美国朋友也谈这个问题，他们脑子里也是装了这个问题。现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几亿，第三世界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家，包括苏联，东欧（东欧不能算很发达），西欧，北美，日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十一二亿人口。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当然，第三世界有一部分国家开始好起来，但还不能说已经发达了，而大部分国家仍

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容易。中国这么一个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对外贸易额去年才刚刚达到五百亿美元。如果对外贸易额翻一番，达到一千亿美元，国际上的市场不就扩大了吗？如果翻两番，达到两千亿美元，中国同国际上交往的范围不就更大了吗？贸易总是一进一出的，如果达到翻两番，中国容纳资金、商品的能力就大了。一些发达国家担心，如果中国发展起来，货物出口多了，会不会影响发达国家的商品输出？是存在一个竞争问题。但是，发达国家技术领先，高档的东西多，怕什么！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壮大，是美国和中国关系的关键，也是世界和平的关键。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关系的主动权在美国手中。诚如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所说：

“如果美国把中共视为敌人，中共就是敌人；如视为朋友，就是朋友。”

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壮大问题，最后将落到台湾问题上来。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

虽然美国鹰派没有明确提出，但在新罗马帝国的战略中，台湾是美国支持和认可的世界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是因为美国鹰派认为台湾是所谓“民主世界”的一部分，在意识形态上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因为台湾的归属表明了中美力量

的消长。

但随着中国的发展，台湾地区和大陆的统一将是两岸的民心所向。只有回到祖国大陆的怀抱，台湾才真正可能赢得受人尊重的国际地位。目前，大陆已经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台湾地区和大陆在经济和贸易上的联系已经说明，中国统一是大势所趋。

不阻挠、不干涉中国的统一进程，是中国对美国关系的底线，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跨过了中国政府的底线，公然支持"台独"，必将把中美关系推到深渊，而如果美国在中国实现祖国统一问题上进行武力干涉，那么中美之间发生战争再所难免。其结果将是美国和中国两败俱伤，而美国将因为和中国的冲突而更早地失去其当前的霸权地位。



五、印度

如果让时光回到1970年前后，印度就是这样一幅情景：

> 水灾、旱灾肆虐，到处是饥荒的人，印度货币卢比汇率固定且平稳；各大银行均为国有；外资企业被查禁，无人谈论外贸问题；印度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少得可怜。

可以说，当时的印度经济是与世界经济绝缘的。当时的印度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许多人因为饥荒而四处逃生，印度是一个被遗忘在热带土地上的贫穷国家。

30年之后，印度在不知不觉中改头换面。

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 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达 4794 亿美元（人均 460 美元），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居世界第 5 位。

进出口额分别为 750 亿美元和 610 亿美元，外汇储备 320 亿美元，成为理所当然的世界贸易大国之一。

农业方面印度推行“绿色革命”，不但解决了印度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使印度一跃成为世界上的粮食出口大国。

印度有 3 亿人口正在变成富裕的中产阶级，他们将使印度出现一个新的消费高潮，使印度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之一。

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在 1947 年 8 月 14 日独立日前夕曾说：

> “多年以前我们的命运就注定了，现在是我们实现我们的承诺的时候了。我们今天的庆祝只是迎向等待我们的伟大胜利和成就的起步而已，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



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机会终于来临了。在印度不知不觉之间发生沧海桑田的巨变之后，人们似乎像发现美洲新大陆一样重新发现了印度。

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以及亨廷顿等著名学者均认为，在 21 世纪的国际体系中，印度将同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一起，成为世界六大力量中心。

1991 年，拉奥政府上台后，打出了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旗帜，大力引进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改革外贸体制，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印度经济向国际化转轨。

1998 年，人民党的瓦杰帕伊政府上台，提出了“五项优先政策”，即 10 年内使粮食产量翻番；加速社会基础设施的发

展；加速扩展物质基础设施；施行国家水政策；使印度成为世界级信息技术强国。瓦杰帕伊政府更大的雄心是，计划在未来10年内把印度变成一个繁荣、充满自信的世界第4大经济实体。

不仅在经济方面，印度在科技、军事等方面都令人眼睛一亮，如今的印度已毫无争议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被世界公认为是继中国之后崛起的“又一只东方雄狮”。

软件业是印度科技行业中耀眼的明珠。它创造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硅谷之外的另外一个奇迹。目前，印度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软件大国，以至于比尔·盖茨认为，21世纪的印度必将成为软件超级大国。

印度的软件之都班加罗尔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建，迄今已有高科技企业4000家以上，其中外资企业1000多家，是全球第5大信息科技中心。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海得拉巴市，吸引了当今世界级的IT业巨头：美国微软公司在本土以外的第一个软件开发中心就设在这里。IBM 、爱立信、摩托罗拉、通用电气等大公司都把该市当作海外基地。



印度本土的软件公司已经具备了强大的竞争力。早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著名财团塔塔咨询公司就已涉足软件开发领域。目前印度已有软件从业人员140多万。号称“印度的比尔·盖茨”的WIPRO公司总裁普伦姆吉，20世纪70年代投身硬、软件开发，如今个人资产已达350亿美元。

IT产业的迅猛发展提高了印度的国际地位。据权威机构调查，1999年全球软件的销售额是1500亿美元，其中美国公司占78%，印度公司占16.7%，仅次于美国。2001年，印度软件业出口达到62亿美元，是中国的10倍以上。

西方学者曾经认为，印度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内省的文化，难以形成科技发展所需要的土壤。软件业的发达，激励了印度

人对印度科技发展的信心。在21世纪初召开的印度第87届科学大会上，瓦杰帕伊总理声称，印度要成为21世纪的世界科技先锋。印度科技与工业研究会总干事马歇尔说，21世纪世界产业知识的中心将转移到印度。而普伦姆吉，这位“印度的比尔·盖茨”，更口出豪言：

“我们的运气不错，我们要实现一个梦想，即让世界对印度刮目相看，使印度成为全球科技的火车头。”

印度也是当今世界军事强国之一。印度的精英阶层认为，21世纪，全球将出现由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欧盟和印度形成的多极力量中心，因此，印度要“保持最低的核威慑，防止核威胁”。



只有这样，印度才能成为多极中心的一极。然后，印度才能将其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国家的经济、技术、社会和政治发展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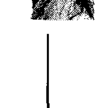
印度著名的安全战略专家苏布拉马尼亚姆在印度进行核试验十几个月前，多次发表演说，为印度发展核武器造势，他说：

“如果印度打算扮演一个全球的角色和避免战争，那么它就应当发展最低的威慑力量，拥有适当数量的核弹头和2500—3000公里射程的导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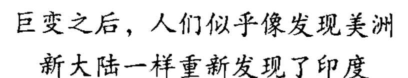
1998年5月11日、13日，印度成功地进行了五次地下核试验。震惊世界的核爆炸尚未平息，印度人民党政府就宣布印度已成为第六个核大国。

西方分析家推测，印度目前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大约在60—100枚之间。与此同时，印度已建成了五种不同类型的中程和短程导弹体系。印度还公开透露，不久即可完成射程1万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21世纪初，印度将建立起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朝世界军事强国的目标迈进。

陆军是印度规模最大的第一军种，其实力被认为居世界第三，编成东、西、南、北部和中央五个军区。庞大的规模和先进的装备，不仅承担了“称雄次大陆”的战略任务，而且是其走向世界强国的军事保证。







巨变之后，人们似乎像发现美洲
新大陆一样重新发现了印度

印度半岛像一艘巨大无比的航空母舰伸向印度洋，纵深达1600公里，使印度天然地成为海洋大国。“海权论之父”马汉早在1901年就曾说过：

印度洋是大洋的关键。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控

制了亚洲。

从英帝国到后来的苏联、美国，这些海洋大国，都曾有一支庞大的海军，印度人认为，“海军是大国的象征，印度应拥有世界级的海军”。

目前，印度已拥有两艘航空母舰；前不久，印度又宣布要再自行建造一艘航母，使其航母总数达到 3 艘，与英国持平，在美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二。

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都凸显了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强大作用。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在苏联和后来俄罗斯的帮助下，印度已基本建成一支攻防合一的空军。根据计划，21 世纪初，印度的空军总兵力将达到 20 万人，拥有 1000 架世界先进飞机，印度将真正成为“世界第四空军大国”。



在尼赫鲁“雄伟预言”之后的几十年中，印度的精英们一直把追求世界大国地位作为印度的国家战略目标。

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方法上，印度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尼赫鲁时期，印度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主要表现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更注重在世界上树立道义和政治上的大国形象，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

尼赫鲁去世后的几届国大党政府总理英·甘地、拉·甘地和纳拉辛哈·拉奥尽管讲的是理想主义的原则，但实行的都是现实主义主导的对外政策。

近年来，在印度政坛上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和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右翼政治力量不断上升，这些政党的观点和主张对印度对外战略思想的变化起了重要的影响。印度人民党极力推行的观点是，印度必须实行“尊重实力”的现实主义政策。

他们认为圣雄甘地和尼赫鲁强调印度教的道义和精神方面

偏离了印度教的正道。他们现在需要纠正这种过失，复归印度教的准则。印度退休的海军上将奈雅尔在美国全球战略委员会论坛演讲时，这样表明他的思想：

> “在甘地忽视实力的40年之后，国家意识到，当今的世界不幸还是军事实力说了算。”

印度负责导弹计划，后来负责核计划的印度国防与开发组织的高级国防官员阿布杜尔·卡拉姆更为直截了当地说：

> “弱小并不令人尊重，因此我们必须强大。”

印度人民党在其1991年的竞选宣言中主张：



> 印度应当建造一支足能控制从新加坡到亚丁湾直至整个印度洋的舰队。

依靠军事实力和外交策略实现大国地位的现实主义行为，已成为印度国家战略的主流。印度政府一方面鼓吹“南亚是南亚人的南亚”，力图独霸南亚；另一方面又宣称“印度属于亚太地区”，要积极参与亚太事务。

这不仅是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同时也是为分享亚太地区的经济繁荣。近年来，印度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尤其在安全事务上，印、越、日将建立海上军事安全关系，最近，印度又派海军分别与韩国、越南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苏联解体后，昔日的印俄特殊结盟关系不复存在，但印度从全球战略出发，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恢复一度冷了下去的

印俄关系。

目前，印俄传统友好关系已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双方的经贸、文化合作加强。俄罗斯仍然是印度武器的第一来源国。俄不仅支持印度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努力，而且表示了对印试爆核武器和拒签核禁试条约的理解。

此外，为提高国际地位，印度还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宣传改革联合国和扩大安理会的主张，宣称自己不仅应当成为常任理事国，而且“已经做好了担任常任理事国的各项必要准备”；此外，印度还积极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强调南南合作，力图继续维持其“ 不结盟运动领袖”的角色。

印度人认为，“印度的生存是作为一个大国的生存，其安全即意味着印度的发展、繁荣、具有政治影响力”。

大国梦，跻身世界大国行列，是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一条主线。以强大的军事、经济力量“称霸南亚，控制印度洋”是印度总体战略的阶段性目标，而“争当世界‘一等强国’”才是其终极目标。



六、眼花缭乱的外交时代

欧盟、俄罗斯、中国、印度是公认的欧亚大陆四大力量中心，而日本是大陆边缘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除了日本之外，这些力量中心没有一个支持伊拉克战争和美国的帝国政策。

而日本也只是因为受制于美国的巨大压力，才委曲求全，它仍然对阿拉伯国家小心谨慎，担心得罪了阿拉伯国家。如此看来，美国如果不能完全控制中东地区，日本尾随美国的中东政策并不可靠。

除了上文所列举的这些力量中心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次力

量中心也在发展之中，如东盟国家、南美国家。即使是在美国试图分化的中东地区，也随时在孕育新的力量中心。

这些力量中心兴起的结果是什么呢?

它们在某些方面将可以代替美国，如为周边的国家提供庞大的商品市场和充足的资本。欧盟在这方面已炉火纯青，地缘的接近性使其周边国家舍弃美国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转投邻居国家的怀抱所获得的好处会更实在、更多。中、东欧国家的民众会把加入欧盟放在第一位。即使是美国的铁杆兄弟英国，也在观望之中，希望能寻找一个最高的要价点，融入欧盟。

重要的是，在和周边国家经济上形成相互依赖的同时，这些力量中心也会逐渐尝试着提供有别于美国的“公共产品”，也就是所谓的国际制度安排。如果新罗马帝国野心进一步膨胀，它将会亲手毁灭更多的全球“公共产品”，这将为新力量中心提供“公共产品”创造真空“市场”。



一旦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在单边主义行动中消失殆尽，新的力量将迅速填补“真空”，取美国而代之。当前全球各个力量中心在争夺新的制度安排权力中此消彼涨，这是全球新均势的开端，同时也是美帝国终结的加速。

这正是美国担心，但却无法阻挡的事情。因此，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智囊们四处为美国寻找新的对手，其对外政策的波动甚至一度比华尔街的股票市场还难以预测。

1989年福山宣布“历史终结”的余音尚在，敢于说“不”的日本就上升为美国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围剿的头号敌人。紧接着，麻省理工学院的梭罗教授在1992年的著作《迎头相撞》一书中，把统一德国主导的欧洲视为21世纪的最大赢家，并认为欧洲将是美国未来的天然对手。在梭罗的“棋局”上，中国还不足以成为美国的一个竞争者。然而不到一年，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把中国代表的儒家文明视为整个西方文明的挑

战者。这一理论在媒体炒作之下，使福山、梭罗之辈黯然失色。

“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和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家，成为了美国瞄准的新准星，伊拉克战争于是爆发。在新罗马帝国的目标中，伊拉克战争是美国恢复被袭击后荣誉感的需要，也是美国曲线瓦解欧盟、并试图控制其他力量中心的一个战略性动作。

但如本书前面章节说述，新罗马帝国的战略是违背历史大势的动作，它难以从根本上阻止这些力量中心的壮大。

为了防止成为美国帝国野心的牺牲品，这些力量中心将展开新的立盟结义时代。

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短短几个月中，人们已经目睹了许多重大外交事件。如俄罗斯最高领导人200多年来第一次访问英国；印度和中国关系的发展和进步；欧洲宪法的推进等等，不一而足。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时代已经来临。



美国必须小心谨慎，不能与这些力量中心的任何一个发生战争或者严重冲突，那将玉石俱焚，毁灭对手的同时，也直接毁灭了美帝国。

第十六章 美国会是例外吗



自从 16 世纪主权国家概念确立以来，国际政治已经显示出一个清晰的模式：拥有巨大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超级大国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害怕和怀疑，结果是那些弱小、自觉受到威胁的国家联合起来抵制这个超级大国，以制约其滥用权力。



17 世纪的哈布斯堡帝国，18 世纪后期和 19 世纪初法国拿破仑帝国，20 世纪初期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以及 20 世纪后半期的苏联都曾经有这种经历。英国讽刺作家得雷登的诗句可以恰如其分地描绘这种现象：

> “当上帝的选民变得强大后，正当的事业最终变成错误。”

美国人对此提出质疑，因为“美国是不一样”的帝国，美国真的是例外吗？

一、美国是例外吗

美国人认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是“天定命运”，是美国不情愿但不得不承担起来的角色。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美国必定要领导世界，他们会回答说，如果美国不来领导这个世界，那么谁来领导呢？

2002年2月，《华盛顿邮报》评论员塞巴斯蒂安·麦勒比在《外交》杂志发表《不得不帝国主义》一文，提出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美国的强大力量优势迫使它不得不担任领导角色，为维护世界秩序、消除“失败国家”的动荡和混乱，在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都行不通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实行帝国主义政策。



“不得不帝国主义”后面的潜台词是只有美国有资格当世界的领导者，美国比别的国家更好。这也正是美国鹰派的心态，他们根本不理会在当今世上还有联合国这个民主的管理机制的存在。退一步说，即使没有联合国，美国就真的最有资格、比别的国家更好吗？

美国人常常自豪地宣称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能力在世界各个地区进行力量的平衡。

不可否认，在过去几百年人类历史上，议会民主制是人类在政治体制上最大的创举之一。这一被丘吉尔称为“最坏体制中的最好体制”，由于有效地利用了权力制衡原理，客观上虽然不能创造最好的结果，但却能避免最坏的结果，因而在近百年里得到广泛推广。但议会民主制的设计只是限定在一个特定的定义域里，实际上，美国在夸耀“民主”的时候，对别的国

家却喜欢自己说了算。

还有更多美国人不敢说出口的更为重要的事实：美国要控制世界上能源最丰富的地区，要把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美国随时可以不理会国际法，如果觉得国际规则不再合乎自己需要时，就会毫不犹豫地践踏包括自己主导制定的规则，美国想垄断军事打击别国的权利，垄断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使用暴力的权利。从英国到法国到德国，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民意，对美国行为的看法都是负面的。

正如中国学者林语堂所说，中国历史上的贪官污吏个个都是好家长好父亲，把大伙儿的东西拿回家，把儿子孙子安排得好好的。但没有人愿意让贪官来领导自己。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富裕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富裕和强大越来越成为美国人实行帝国政策的理由，其他国家的发展被美国看作是对自己利益的威胁。



在当今的世界上，有更多的国家比美国更尊重各国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些国家不宣扬非友即敌、非好即恶的“二元论”，更能倾听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声音；更坚持民主的普遍性和不可侵犯性，不管他国民选的领袖合不合自己的口味，不颠覆他国，不搞军事对抗包围圈；更遵守法制，更讲究协商和平，更关心人类的生存问题、环境问题、共同富裕的问题等。

即使从国家内部方面来说，美国也不能说是最有资格的世界领导者，比较今天的美国和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人们可以发现，虽然美国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决定了她能吸收全球一流人才的智能，从而保持在全球绝大部分领域的领先水平，但从全民教育和公民成熟程度来看，欧洲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显然要大大超过美国。

这也是欧洲的民主呈现出一种较美国更为深厚和成熟的底蕴的原因之一。这一底蕴加上欧洲社会对两次大战的惨痛记

忆，直接导致了此次欧洲朝野空前反战的结果。

真正有资格当“世界领导”的，是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联合国。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本应该担负起推动联合国改革与完善这一重要职责的重任。

但事实正好相反，美国现在开始有意让联合国成为自己的工具。其“先发制人”战略是对联合国倡导的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原则的践踏。英国牛津大学现代史荣誉教授迈克尔·霍华德如此评价布什政府政策行为可能的后果：

> 也有的历史学家感到不安。有些人当然想起了希特勒的例子，想起当年错过了将其侵略行为扼杀于萌芽状态的机会。但是有些人回想起 1914 年更为不祥的先例。
>
> 当时，奥匈帝国将力量日增的塞尔维亚视为对自己领土完整的威胁，对后者发动了它所说的“预防性战争”。德国目睹俄罗斯的军事潜力不断增长，越来越感到担忧，急于找俄国算账，因此支持奥匈帝国的做法。以最乐观的看法，这种预防性战争也只能算是巨大的赌博。
>
> 而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感到，美国通过袭击伊拉克来实践其新的理论也是巨大的赌博。



美国帝国政策是要使地球上重新盛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诚然，美国会是这个丛林中最大的野兽，而且会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正直。但这仍是一个丛林，如今其中的每只动物都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

新罗马帝国梦想指导下的“先发制人”战略有两大支柱：第一，美国将会动用一切力量来保证其霸权；第二，美国拥有

采取行动的先发制人权力。这两大支柱结合到一块将支持两类统治权：美国凌驾于国际条约和责任之上的统治权；对臣服于布什主义的国家的统治权。这就像是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所描述的：

> 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为平等。

不少人认为，一些国家反对美国不过是嫉妒美国的强大。有人甚至以玩笑的口吻说，欧洲反美人士的面纱之下常常隐藏着微不足道的个人野心，比如有人想借此得到哈佛大学的一个客座教授职位，或者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他的一篇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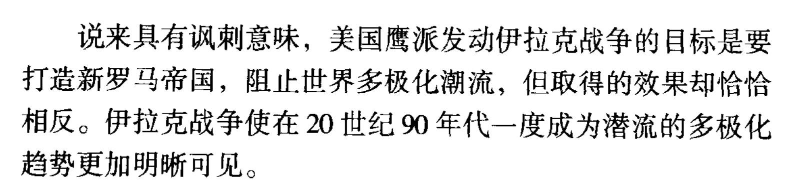
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
动物比其他动物更为平等

事实明显不是这样。《新闻周刊》曾刊登文章这样解释：这种“他们反对我们是因为我们强大”的说法有一种深层历史性的谬误。不管怎么说，美国的主导和主宰优势绝对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事情，美国的大国地位差不多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之久。但美国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后才让全世界如此充满恐惧和戒心的：

> “包括我自己，都认为美国从来没有寻求过征服别国，一直认为美国是一个进步和解放力量。但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所有曾经主宰过这个世界的超级大国都曾经认为它们不一样。”



二、多极埋葬帝国



说来具有讽刺意味，美国鹰派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目标是要打造新罗马帝国，阻止世界多极化潮流，但取得的效果却恰恰相反。伊拉克战争使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成为潜流的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晰可见。

如上一节所述，伊拉克战争已经使欧亚大陆的力量中心充满戒心，也更坚定了多极化的信念。美国的帝国政策越发抬头，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就越发有牵制美国单边主义的紧迫感，越发认为有必要在国际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主张。

因而，出于保护自己利益的相同出发点，世界多个强国之间会形成做而不说的默契，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对美国的单边主

义形成遏制。伊拉克战争结束几个月来，没有美国出现的首脑聚会开始增多。

白宫没有迎接到尊贵的客人，而在以往，这个时候是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领导人竞相前往华盛顿的时候。

布什不能仅仅依靠与英国首相布莱尔、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以色列总理沙龙的聚会，在华盛顿营造世界中心的氛围。

东方哲学中的阴阳相克相生理论，戏剧性地体现在美国的新罗马帝国战略上：美国大力推行单边主义，推进新罗马帝国，追求美国21世纪长久霸权的扩张行动，客观上反而推动了世界多极化格局的进一步形成。

即使从美国自身来说，新罗马帝国的野心最后也只能是归依于多极化。如果历史能够提供任何借鉴的话，那就是：美国总统很难长时间吃战争胜利的老本。除非他能把美国经济问题解决了，给美国人带来繁荣。



老布什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先例，虽然他挟有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胜利，但在经济政策上败给了不见经传的克林顿，而导致白宫失守。现在，经济问题再次成为布什总统的威胁。

伊拉克战争没有解决美国经济存在的结构问题，相反，它的不正义性和背后隐藏的极端自私的新罗马帝国野心，反而可能会损害美国的资本主义运行体系，恶化美国的外在经济环境，扼杀美国的创新能力。

2003年6月在法国召开的八国集团会议，是如此短暂和苍白。由于法国、德国、俄罗斯甚至是美国的邻居加拿大都不赞成美国的战争政策，八国集团会议不欢而散，各国在贸易、经济、金融政策上没有达成共识。

而伊拉克战争本身也不能为美国经济带来看得见的好处。在当今非常规战争和恐怖威胁时代，干净利落的胜利不会很容

易获得。美国在伊拉克的局面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伊拉克犹如一个无底的黑洞，吸收着美国老百姓的税收和美国政府的道德感，最终使美国政府无法兑现给民众的承诺，也无法兑现对盟友的承诺。

眼下，美国经济相对疲软，鹰派的帝国改革使美国军费开支直线上升，对经济发展犹如雪上加霜。为了安抚国内的资本家们，伊拉克战争之后，布什政府终于使国会通过了巨额减税计划，但这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吗？对此，美国一位分析人士评论道：

> “他们真的想要减税？沃伦·巴菲特不想要，乔治·索罗兹不想要，比尔·盖茨不想要（通过他父亲代言）。他们要的是一个稳定的资本主义体系，而布什给他们的不是这个。早晚他们会把自己的不满变成行动。他们可能已经在这样做。
>
> 资本主义体系中还存在着市场。市场不是万能的，但它也不是无能为力。当美元崩溃的时候——它将会崩溃，地缘政治上的一切都将发生变化。因为美元的崩溃远比基地组织袭击双子塔楼重要。美国显然从后一个事件中幸存下来。而一旦美元崩溃，它会变成一个大不一样的美国。美国将不再能依靠巨额透支生存，靠花世界其他地区的钱进行消费。
>
> 美国人可能开始体验第三世界国家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结构调整时的感觉，即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
> 甚至今天发生在美国各地的州政府几近破产一事也在预示着将要出现的情况。而历史将会如此记录：在面对美国糟糕的潜在经济状况的时候，布什政权使



尽了浑身解数使之变得更糟。”

此外，布什政府在政治上始终孤立无援，除了以色列之外，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认为布什政府的战争立场合乎情理。还有一些国家不敢或不愿直接反驳美国，但它们的迟疑态度对美国也是不利的。伊拉克战争开战之前，英国《泰晤士报》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列数布什外交的“十宗罪”导致了这样一场错误的战争，结果是既难以达到目的，又失去了全世界的支持：

1. 搞出“邪恶轴心”。布什“对付”伊拉克只是因为伊拉克对付得了，这使美国逐渐失去了国内外的支持。



2. 不愿参与中东事务。如果说美国去年春天的中东政策是一团糟，这还言之过轻了。尽管布莱尔一再劝说，美国仍不愿参与中东事务，执意专攻伊拉克问题。这使它失去了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支持。

3. “政权更迭”。去年 8 月，关于伊拉克的传闻出现的时候，“政权更迭”是最终目标。布什政府坚持说，这个词只是反映了美国的长期政策。然而，这一表述如此露骨，它无法与联合国的原则吻合。

4. 对联合国心不在焉。在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和老布什的前顾问的敦促下，美国政府开始在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上心不在焉地寻求联合国的支持。

5. 理由多变。美国在寻求联合国支持的时候，提出了另外一套发动袭击的理由。“政权更迭”的说法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解除武装说，接着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扩散的威胁之说，然后（就在最近）

是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之说。这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它让本来可能成为盟国的国家产生不信任，也让法国外长德维尔潘借机吓唬阿拉伯国家，说美国在收拾伊拉克后，不会就此罢手。

6. 军事集结。军事集结让外交努力变得复杂。首先，军事集结的时间表比联合国武器核查工作负责人汉斯·布利克斯的时间表更为紧迫。虽然这显然给伊拉克施加了压力，迫使它与布利克斯合作，但集结兵力的做法也把美国限定在了开战这条路上，生怕蒙受让军人打道回府的羞辱。

7. 误判法国。美国错误判断了法国，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美国低估了欧洲的反美情绪。美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察觉欧洲的不满。



8. 误判俄罗斯。俄罗斯的反对比法国更慎重，但它的态度自始至终没有什么变化。美国低估了俄罗斯对布什政府一连串怠慢做法，特别是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恼怒。

9. 误判土耳其。美国最近遭到土耳其的严重怠慢，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布什政府的一些人显然以为能够收买到土耳其的支持。

10. "无声"不等于不反美。它不能庆幸阿拉伯"街道"一直保持着安静——比欧洲的街道安静。更好的解释是，这里缺乏的不是反美情绪，而是对反美运动的有效组织，或者是抗议的自由。这很难代表美国在外交上取得的胜利。

很明显，布什政府被人遣责的错误要远比上面说的多。布

什在即将到来的2004年大选中竞选下一任总统时，对手们将把这些失误当作攻击他的“炮弹”。布什政府能够避免这些外交上的失误吗？天可怜见，这些失误连一个英国人都能看得如此清楚明白，有着一班高智商顾问的美国政府，却没能看出来？

显然不是这样，只要美国继续追求新罗马帝国的目标，还将有更多的外交错误，更多的不该发生的战争，即使换了一个政府也不可避免。

今后10年，美国面临两种抉择：一是继续走鹰派指出的道路，继续追求新罗马帝国的所有目标，这将给所有国家尤其是给它自己带来不利后果：

美国一意孤行，在新罗马帝国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最终将使美国成为全世界的敌人。这只能使美国在今后10年内，成为一支阻碍世界发展的力量，并最终重蹈古往今来所有帝国的覆辙，落入历史学家们总结出来的霸权—扩张—衰落的岁月轮回。



或者，美国可以及时醒悟。布什总统即使连任，也会不得不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鹰派可能会被不满的美国资本家和老百姓赶下政治舞台。

100多年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分析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时提到，公元9年，罗马人在条顿堡一次不起眼的战争中失败，成为罗马帝国衰亡的转折点。这次战争后，罗马人逐步放弃了战争与扩张的战略，但这次战争使罗马帝国内部的问题暴露并最终走向经济危机，让延续千年的罗马帝国走向灭亡。

今天的伊拉克战争相对于美国的战争机器而言是一场微不足道的战争，虽然美国在战场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战争在世界引起的震荡，对美国软、硬权力的伤害，对其外在经济运

行体系的破坏，以及战争所激发的各国的戒心与恐惧，足以使美国鹰派有所警醒。不管是一意孤行，还是及时回头，美国最终都将不得不回到多极化的道路上来。这可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帝国的扩张导致美国力量的下降，从而被迫顺从多极化潮流；另一种可能是，美国发现帝国的扩张最终可能损害美国自身，因而放弃帝国战略，从而早日承认世界多极化的不可避免，并主动回归。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场胜利的伊拉克战争就是美国帝国的转折处，是新罗马帝国的“条顿堡之战”。

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兼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柯普岑警告说，世界向多极转化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对世界的主导大概还能持续10年。如果美国当政人物意识到这一点，明智的作法是设计一种自由世界的秩序，以适应欧盟及中国等势力的崛起，而不要一意孤行地维持美国对世界的统治。



沃勒斯坦在《老鹰坠地》一文中的评论，或许最好地概括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每一个美国总统都必须面临的痛苦选择：

> “为美国霸权做出贡献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同时也将是不可抗拒地导致美国衰落的因素。”
>
> “几乎没有疑问，美国未来十年在世界事务中作为决定性力量将继续衰落。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霸权是否正在衰弱，而是美国是否能设计出一种办法，使之跌降得有点绅士风度，给世界和它自己造成的损害减到最小限度。”

沃勒斯坦大胆地预言美国在走向世界霸权的顶峰时，也

“不可抗拒”地走向衰落，而且就在未来10年。伊拉克战争恰好验证了他的预言。毫无疑问，沃勒斯坦是一个爱国者，他洞悉美国的衰落，也力求延缓这种衰落，但他不隐瞒不回避他所不愿看到的事实。所以说，他是智者，更是勇敢者。

